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三十七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 · · · ·

第 · · 七 · 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三十七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开

本850x1168 1/32 印张11 插页9 字数 245,000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平) 16,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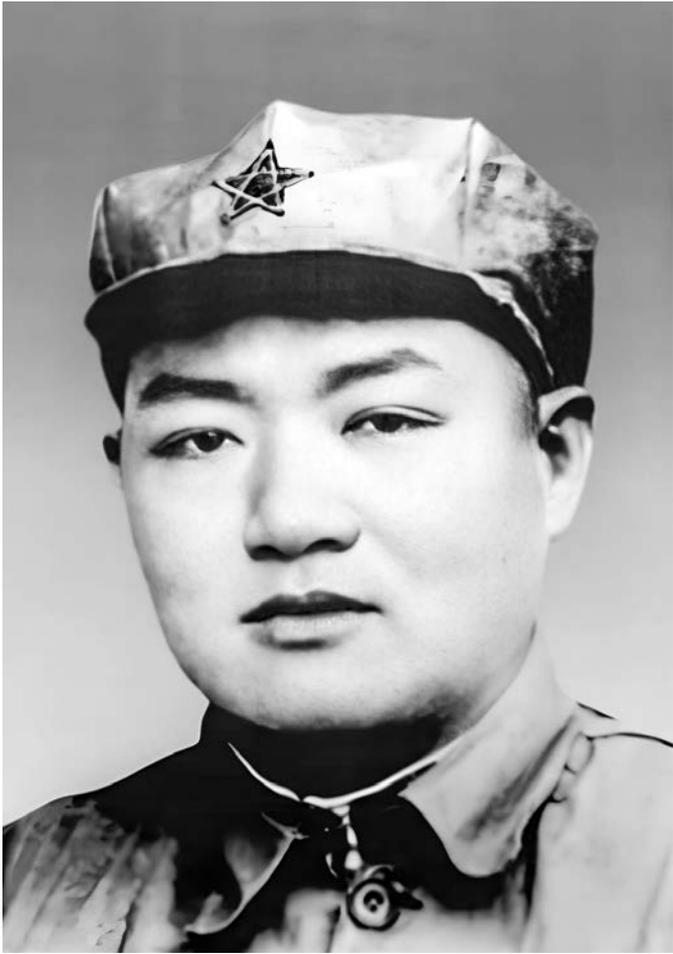
ISBN 7-221-00168-6/K·33

统一书号: 11094·237 定价: (平)3.20元

毛泽东博览 网站编辑
www.mzdbl.cn

目 录

罗炳辉	宋 霖	(1)
杨昭植	宋玮明 卢伟民	(87)
袁德生	邓启沛 刘传政	(107)
徐 洪	曾长秋 谢发达	(127)
乔国桢	宋新勇 陈德仁	(143)
张学思	刘永路 吴国良 胡序文	(160)
何 伟	罗英甫 向庆祥 徐永昭 孔令清 周圣亮	(193)
杨一辰	齐文华	(228)
张子意	曾长秋 吴兴强	(242)
刘永生	刘国梁	(272)
黄炎培	陈竹筠 许纪霖 陈起诚	(291)
加 伦	周玉凤	(337)



罗炳辉



杨昭植



袁 德 生



徐 洪



乔国桢



张学思



何 伟



杨 一 辰



张子意



刘永生



黄 炎 培



加 仑

罗炳辉

宋 霖

(一)

罗炳辉，原名罗德富，自字宿星，1897年1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冬月二十九日）诞生在云南省今彝良县大河乡阿都村偏坡寨一汉族农家。

罗炳辉的远祖居江西省，后迁湖南省邵阳县占籍。清中叶，在“湖广填四川”大规模移民运动中移居四川省隆昌县。因“十邑之苦，莫苦于隆”，再迁云南省镇雄县，复分系至今彝良县^①。

清道光初年，罗炳辉的高祖父罗凤鳌，携家带着，向着莽莽苍苍的乌蒙山腹地进发。他们越过原始森林，涉过金沙江支流之一洛泽河，攀上阿都山，在离山顶不远的峭壁上端开山造田，安下家来，繁衍子孙。罗炳辉是第五代。

经过三代人的辛勤垦荒，到罗炳辉的祖父时代，家境已相当富裕。但是，在官府和土霸交相盘剥下，到罗炳辉的父亲罗

^①据罗凤鳌墓碑碑文、罗炳辉亲属张明秀、罗新安的回忆，参见《邵阳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三年）、《隆昌县志》（清乾隆二十九年）。

守清幼年时，家境又一贫如洗。罗守清成年后，租地主的田耕种，收获与地主平分，还四出做零工，入冬又肩挑山货做小生意，逐渐衣食自给，遂造屋置田，娶黄氏成家，先后生一女三男。长女成年后嫁蒋姓农民。三男为罗德富、罗德生、罗德银，德富即炳辉，居长^①。

罗炳辉出世后，父母起早贪黑、勤苦劳作，家道日兴，逐渐从富裕中农升到富农。父母在体格奇伟、相貌堂堂的长子身上寄托了极大希望。罗炳辉7岁入私塾读书，读了三年；10岁时，因土霸敲榨、家境复艰而辍学务农^②。

四代人的顽强挣扎发愤兴家和仿佛是命定般的惨败，击垮了罗守清的意志，使他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人。黄氏却性格刚强，常痛哭着对罗炳辉说：“儿呀，你要争气！长大了除掉这帮土霸，我死才闭眼！”罗守清则责骂妻子乱说，会招来横祸，害死全家^③。

当时的云南，偏远闭塞，贫穷落后，官府腐败，匪霸横行，人民痛苦甚于各省。这里租高税重、徭役繁多不说，穷人的妻女长得漂亮一点，一旦被土霸看中，就于夜间明火执仗率众抢去，并绑架亲夫或父亲到旷野，威逼在写好的文书上打手印，按脚印，舔舌印，形同匪域。

罗炳辉11岁时，一个土霸登门勒索。罗炳辉大声抗辩，毫无惧色。土霸说：“这个干娃娃^④吃了雷公胆啦！长大了还不要翻天？非弄死他不可！”父亲吓坏了，骂罗炳辉惹祸，把

①据罗炳辉1939年冬《祭先父文》和罗炳辉1943年至1946年亲笔撰写的《自传》。

②③据罗炳辉《自传》。

④干娃娃，土语，意即穷孩子。

他狠狠捆打了一顿。夜里，母亲把他搂在怀里，抚慰说：“好孩子，有志气。”被捆打时没掉一滴眼泪的罗炳辉，伏在母亲怀里放声大哭了。父亲则蹲在一旁叹息①。

罗炳辉12岁时又惹了一场塌天大祸。一个在当地最有权势的土霸带着打手到罗家讹诈，父亲吓得不敢说话，罗炳辉挺身而出跟土霸辩理。土霸说：“老子在这片地方，比谁都要跳高三尺！”罗炳辉说：“老子长大了要飞起来！把你这样的坏蛋杀光！”父亲慌忙出外借钱消灾，罗炳辉阻拦说：“拿钱塞狗洞，还不如跟他打官司！”土霸命令打手行凶，罗炳辉幸得乡邻保护，逃下阿都山，在亲戚帮助下写了状纸，尽数这个土霸的平日罪恶，直奔县衙，击鼓喊冤，正正经经打起官司来。传审时，县官十分震骇：“这个12岁的娃娃好大的胆！”土霸偷鸡不成蚀把米，花钱贿赂县官，才勉强判了个平头。顿时，“吃了雷公胆的干娃娃罗德富”轰动四乡，成了众口称颂的人物，也成了土霸劣绅们的眼中钉②。

这场轩然大波，把罗炳辉的父母全吓坏了。他们怕罗炳辉还会闯出祸来，殃及两个幼弟，便硬着心肠决定分家，让罗炳辉结婚，分出去独立门户，以免日后受连累。父母料定年幼的罗炳辉无法独立生活，等到他要求合并时，再以“约法三章”捆紧他的手脚，免得再生事端。

罗炳辉13岁时，与比他大4岁的李贵秀订婚。岳父家是破产地主，此时正因与土司打官司败讼而携家外逃躲灾，也同意立刻嫁女。于是，13岁的罗炳辉又羞又怕地做了新郎。新婚之夜，他受不了贺喜亲友的戏谑调笑，躲了起来。家人慌忙打

①②据罗炳辉《自传》。

着火把遍山寻找，寻到天亮才发现他睡在柴房里。众人来拉，被他乱打乱咬，当场伤了4人。李贵秀以为罗炳辉不喜欢她，伤心地哭了一夜^①。其实，罗炳辉还是很体贴她的。婚后两人发愤兴家，精耕细作，居然种出一季好庄稼，产量冠于全乡；农闲时他们做小生意，又侥幸赚了点钱，全都拿去孝敬了父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30日（旧历九月初九日），昆明“重九起义”成功。11月1日，大中华民国云南军都督府在昆明成立，公推蔡锷为云南军都督。云南各府、州、县，传檄而定，全省迅速光复。然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并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根本性变化，只是国号改称民国，县衙改叫县政府。罗炳辉的家乡于民国2年新设置了彝良县，县治设在阿都山下不远的角奎镇。但社会依旧黑暗，土霸依旧嚣张，罗炳辉因与土霸结仇，处境依旧险恶。

民国2年，罗炳辉得一子，按家谱取名罗代勋^②。同年，彝良城里出了一件大事，大恶霸谢戒城白白被两名士兵痛殴了一顿，家具也被捣毁大部。谢戒城气汹汹坐轿去见驻军连长，要求严惩那两名士兵。连长却不予理睬。谢戒城无可奈何，威风扫地以尽！原来，这两个士兵是亲兄弟，本城人，父早丧，寡母曾受过谢戒城欺压，这次总算报了仇。这件事使罗炳辉受到极大鼓舞，他认定：要报仇雪恨只有一条路——去当陆军！

罗炳辉几次离家出走，都被家人追回。1915年冬，他出

^①据罗炳辉《自传》。

^②罗炳辉家谱系为：国、卫、天、星、凤、成、学、守、德、代、安、宁。

走成功，艰难跋涉 2000 多里，到了省城昆明^①。从此，再也没有回过故乡。

(二)

罗炳辉到陆军报名，才知道当兵要求很严，须有殷实铺保，还不能零补。他身无分文，举目无亲，只得打零工糊口。老板有家产 10 万，膝下无子，见罗炳辉正直忠厚，提出要收他为子。工友们都说他交了鸿运，但是罗炳辉不为所动，辞掉零工，到军营去当帮工。他先帮伙夫，后帮马夫，不久得到滇军炮兵大队长刘安华的赏识，补入炮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此刻，中国大地上空，正酝酿着风暴，密布着战云。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窃国，帝制自为。19日，秘密赴滇的蔡锷将军安抵昆明。25日，云南宣布独立。1916年元旦，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率护国军至昆明校场祭告天地，誓师讨袁。罗炳辉投身于护国战争的狂澜中。

护国军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军威雄壮，军纪严明，进军川、桂，再图湘、鄂、粤、赣，与曹錕部激战于泸州、纳溪、叙府间，战况惨烈，终以数千饥疲之师，击败十万凶暴之敌。云南首义，全国响应，贵州、广西相继独立。3月17日，护国军在川南发动总反攻。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取消帝制，不久便在国人唾骂中死去。三个月的护国战争，使罗炳辉受到了最初的战争锻炼。蔡锷将军爱国爱民、舍生取义的高风亮节

^①据罗炳辉《自传》。

和滇军英勇无畏的优秀传统，给了他深刻的教育和熏陶，以至影响了他的一生。

战后，罗炳辉律己更严，烟（鸦片）、赌、色诸恶习一丝不沾。他常于夜间悄悄起床练功，直至天明，终于练出了超人的臂力、精湛的武艺和百发百中的神奇枪法。在滇军每三个月举行一次的严格的晋升考核中，他以优异的成绩连连晋升，由二等兵、一等兵、上等兵、三等下士、二等下士、一等下士，直升到中士，一次没有脱过，被誉为“模范士兵”。在行伍中，他以作战勇敢、刚直无私、仗义疏财和敢打抱不平而深受士兵们拥戴。

罗炳辉在滇军中连连晋升，引起家乡土霸、劣绅的极大不安。他们加紧了对罗炳辉亲属的迫害。1918年，地主王海云等人以罗炳辉“当兵打仗，有死无回”为理由，逼李贵秀改嫁。罗母不许，被毒打致伤，气疯惨死。罗炳辉接到家信，当即痛哭昏倒。愤怒的士兵弟兄纷纷要求带枪随他回家乡报仇，被上司苦苦劝阻。罗炳辉明白，带枪离队是违反军法的。他不愿拖累滇军兄弟，便同意了营长的处置：由军队致函彝良县政府，要求严惩凶手。

公文到彝良，土霸、劣绅十分恐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指使王海云在请罗守清喝酒时拔刀自伤，反诬罗守清持刀杀人。在法庭上，罗守清责问：“王海云说我刺他三刀，请查看：为什么有六个眼？”原来，王海云怕刺伤内脏，把肚皮捏紧，拎得老高，横戳三刀，结果留下了六个眼。谁知县长早已被土霸买通，不由分辩，将罗守清逮捕下狱，抄没家产，通缉家人。土霸还派打手埋伏在昆明至彝良的半路，准备狙杀可能回乡报仇的罗炳辉。

罗炳辉的姐夫和二弟罗德生乘黑夜逃出家乡，到昆明报信，苦劝罗炳辉千万不要回去自投罗网。营长也力劝他忍耐，请上级发公文保释罗守清出狱。护国丧家，罗炳辉心中深深地埋下了对黑暗社会仇恨的种子。

1920年，营长决定推荐罗炳辉到云南讲武堂读书，后又考虑讲武堂三年所学还不及罗炳辉入伍五年来已经学到的东西多，遂改变主意，于9月间推荐罗炳辉担任唐继尧、唐继禹^①兄弟的随行军士^②。

云南督军唐继尧此时正以川、滇、黔、鄂、豫、陕、湘、闽八省靖国联军总司令的名义统治云南，控制川、黔。唐继禹后来曾任贵州督军。二唐召见罗炳辉，见他体格魁伟，武艺超人，谈吐诚恳，十分欢喜，遂留在身边，出入均给马骑。11月，罗炳辉向唐报告家事，唐说：“你们营长已经报告过，我已命彝良释放你的父亲。”当即又命参谋长再去公文，严令不得继续迫害罗父。然而，罗炳辉家中早已是母死家破，一片凄凉了。罗炳辉的三弟罗德银，也在贫病中悲惨死去^③。

(三)

护国战争以后，以“西南王”自命的唐继尧，在护法、靖国等役中，掣肘孙中山先生，并乘南北军阀对峙之机，扩张自己的实力，内施暴政，外侵邻省，连年用兵，致使民怨沸腾，上下离心。1921年2月7日，滇军第1军军长顾品珍和第8

①唐继禹，又名继虞。

②随行军士相当于警卫员。

③据罗炳辉《祭先父文》和《自传》。

军军长叶荃倒戈反唐。唐继尧被迫通电辞职，并于8日^①仓皇率亲信和卫队共百余人，乘滇越铁路火车南下安南（今越南），流落香港。罗炳辉随行。

到香港后，罗炳辉被委为随从副官，掌管财务，负责采买唐公馆一切用物。香港各大公司都视他为财神，奉为上宾。他经手巨款，一文不沾，并深深陷入痛苦思索之中。

在河口界桥，他看到，中国人带一盒火柴或一根针入安南境，要罚洋10元，带小刀则是违“法”。而法帝国主义着带枪械大刀入中国境都是合“法”的。在海防海关，他看见一个云南商人带一只水烟袋过境，价格仅4.6元，却要上6元关税，商人宁可不要，把水烟袋扔进海里。法国人敲榨不成，把这个商人毒打一顿，捆绑而去。罗炳辉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他从沦为殖民地的越南，想到祖国的民族危亡，心中充满了焦灼和痛苦^②。

在香港，罗炳辉痛苦地看到自己衷心爱戴的护国元勋唐继尧骄奢淫佚，挥霍无度。法帝国主义者操纵中法银行封存唐继尧4千万元存款，唐闻讯昏厥，半个多小时才醒。而唐继尧在香港、日本等地银行存款，少则几千万元，多的达亿元，这都是唐继尧喝“民血、兵血”的证明！罗炳辉如梦方醒，决意归国，数次向唐继尧告假。唐执意挽留，恩宠有加。

这时，同行来港的一个滇军师长的小老婆，爱上了罗炳辉。她不愿作军阀玩物，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恳求罗炳辉同

^①当事人俱忆作7日。本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版。

^②据罗炳辉《自传》。

她一起去上海。参谋副官也竭力怂恿。罗炳辉以献身报国为志，拒绝了。那女子十分伤心，不久带70万元巨款，孤身去沪。同僚们都嘲笑罗炳辉愚蠢^①。

唐继尧在港期间，孙中山为了扩大革命势力，诚恳团结唐继尧。罗炳辉对中山先生的人品学说极为仰慕。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职。唐继尧却出尔反尔，公然拆台，并暗中支持陈炯明反对孙中山^②。罗炳辉对唐继尧彻底失望了。他留下一信，交清所有帐目，决然取道越南归国。同僚们见罗炳辉来去清白，分文未沾，纷纷议论：“罗副官果然不爱钱！他携带几十万本易如反掌呢。”唐继尧也叹为奇人^③。

9月，罗炳辉返滇。云南边防督办从他的行李中搜出一本写有“继尧”二字的书，当即将他逮捕，以重兵押送昆明。投入总司令部军法处狱中。罗炳辉在狱中又目睹了许多罪恶和黑暗。军法处长秦兆瑞多次审讯，确信罗炳辉不是唐继尧派遣的秘密使者。又经刘安华奔走营救，向顾品珍保释，始获释放。

出狱后，罗炳辉协助刘安华操办滇军旅长鲁子材葬仪。此时，他在香港轻财拒色的操守已在昆明传开。滇军将领刮目相看，有的邀他任职，有的为他提亲。但是罗炳辉已对军阀生活深恶痛绝，决心去投奔孙中山先生了。

^{①③}据罗炳辉《自传》。

^②据《唐继尧》，东南编译社编，民国14年1月版；参见当事人龚师曾：《孙中山先生与唐继尧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

(四)

1921年11月，罗炳辉到达桂林，被编入军官将校队。12月4日，孙中山抵达桂林，设北伐军大本营于桂王府。7日，孙中山在军政学各界欢迎大会上发表《三民主义为造成世界之工具》讲演。罗炳辉听后深受鼓舞。

1922年4月8日，北伐军大本营迁粤。5月4日，孙中山下令北伐。8日，发布总攻击令。北伐军分三路进攻江西。

军官将校队一千余军官，分为交通、设营、侦察、给养、运输、作战等组，每组有军官百余人。罗炳辉任交通组副组长，因组长李鑫祥出发时病倒，罗炳辉代组长职。由于组内百余名军官大多军阶比罗炳辉高，极难领导，北伐军滇军总司令朱培德当众宣布必须听从罗炳辉指挥。交通组在韶关征雇挑夫百余，挑着器材，由南雄越大庾岭入赣南。罗炳辉对民夫不打不骂，食宿、烟茶都安排得很好。民夫们对他很亲热，一个开小差的也没有。军官们却嘲笑他“穷气未脱”。

北伐军6月13日攻克赣州，前锋进至万安、吉安，南昌指日可下。民夫到赣州便该回家了，罗炳辉去军需处领民夫恤钱和路费，军官们乘机造谣说：“罗组长去领钱是假，他要你们继续送到南昌呢！”民夫们一逃而光。军官们要求瓜分这1.5万元，遭到罗炳辉的痛斥。他们威胁说：“你若不允，小心狗命！”朋友劝他：“民夫已逃散，你退回去，还不是落入军需处私人腰包。你我不分这缺德钱，落个心安吧。”罗炳辉深感悲愤：“我怎么逃不脱黑暗环境呢？”

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乱，炮轰观音山粤秀楼孙中山

住所。孙避登宝璧舰。19日，孙电令北伐军回师讨逆。27日，北伐军返粤，以朱培德为前敌总指挥。7月2日，朱培德部在韶关城北帽子峰、许崇智和李福林部在曲江周田，与叛军阵战。战斗呈胶着状态。

帽子峰战场与周田战场相距百余里，朱培德担心许部与叛军同为广东人，恐许部有变，便特任罗炳辉等五人为参军官，去许部视察。罗炳辉等到周田战场，见北伐军虽斗志高昂，但给养困难，菜根都已挖光，阵地上遍地便溺，加之天热，臭气熏人，断难持久；而叛军有铁路运输之便，给养、兵员源源运来。罗炳辉向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建议，应求速胜。许深以为然。当时军中没有无线电，亦无传令的骑乘，罗炳辉夜行70里返回滇军司令部，次日又步行返周田传达命令：湘军陈嘉祐部29日至周田增援粤军，北伐军同日在周田、帽子峰发动总攻。

29日，湘军进抵周田，尚未进入战场。粤军就乱哄哄后撤。叛军乘乱发起攻击，湘、粤军混杂一处，军无建制，山崩一般溃败下来，一溃百杀，无隙收拾。粤军第1师梁鸿楷、陈修爵部投降叛军。当夜，罗炳辉在乱军中找到许崇智，建议退到脱离叛军时再集结部队反攻。不料，第二天叛军追至，湘、粤军兵无斗志，一触即溃，四散奔逃。罗炳辉等五人也被乱军冲散^①。

在韶关被北帽子峰战场的滇军不知道周田战场的惨败，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中。

罗炳辉自知：滇军的存亡已经系于自己一身了！他从乱军中冲出，邀一随军做生意的云南商人，乘黑夜偷渡珠江，绕道

^①据罗炳辉《自传》，参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仁化，向帽子峰疾跑。他机警地用军衣包着弯把雨伞，冒充机关枪，三过匪区。疾行一夜，商人累倒，不能动弹。罗炳辉草鞋走碎，也难支持了。但他以惊人的毅力，踉跄飞奔。在总计不到20小时的时间里，罗炳辉两涉江河，翻山越岭，经韶石、凉墩、浮岳、皇冈等九座大山，奔跑200多华里，下午3时到滇军司令部时已不能说话，昏晕倒地，抢救两小时才苏醒^①。朱培德闻报大惊失色，急速北撤，与迂回包抄的叛军先头团遭遇，将敌击溃，退往湖南。倘再延误一小时，滇军就陷入叛军重围中了。全军将士莫不咋舌呼险。朱培德流泪说：“是罗炳辉救了滇军！”他把自己的坐骑让给罗炳辉骑，派专人将罗护送到湖南道州。

讨陈失败，孙中山8月9日退走上海。9月5日，孙函令朱培德攻取桂林。朱培德为培养罗炳辉，让他带兵。

桂林城高濠阔，防御坚固，广西自治军梁华堂率10万众守城，以逸待劳。滇军只有3000人。10月1日攻城，罗炳辉身先士卒，冒着如蝗弹雨，冲过漓江上的永济桥，至东江门下^②，放火烧城门，乘浓烟搭云梯爬城。正鏖战间，城门烧倒，罗炳辉率队穿烈火冲进城内，衣服燃着，成了火人，勇猛冲杀，守敌仓皇溃退，经一夜巷战，占领全城。罗炳辉以战功获得滇军的“勇敢奖状”。

1923年1月4日，孙中山通电讨伐陈炯明。滇粤桂联军奉

^①据罗炳辉《自传》，笔者1980年4月在广东省韶关、仁化、周田的实地考察访问，参见《韶州府志》（光绪本）。

^②罗炳辉《自传》：“我们从东门迫近城门”。《临桂县志》（光绪本）：“东城高二丈五尺”，“其池东曰东江”，“永济桥在东江门外”。

命出广西沿西江东下，9日占肇庆，10日克三水，16日收复广州。陈炯明逃往惠州。2月21日，孙中山返回广州建立政权，被推举为陆海军大元帅，重新成立了大元帅府。4月3日，孙中山将滇军朱培德部改编为拱卫军，罗炳辉任连长，护卫中山先生。不久，调任孝平兵工厂少校护厂队长，辖四个连。他把自己的7000元积蓄全数捐出，加强了所部装备，并施以严格的军事训练。“罗炳辉不爱钱、不惜死”的声誉在滇军中广为传播。

4月16日，桂军将领沈鸿英叛变，由白云山进窥广州城。孙中山亲自督师进剿。沈部北退。30日，北洋军阀吴佩孚电令驻赣南的方本仁部入粤援沈，进攻英德县城。战事吃紧，罗炳辉奉调任代理营长进抵英德击敌。激战一周，双方伤亡俱极惨重，罗炳辉部伤亡过半，罗炳辉受轻伤两处，坚持不下火线。5月8日，孙中山亲赴英德劳军，加上援军赶到，士气大振。上级新拨一营让罗炳辉指挥。他率部三面包围一支敌军，发动猛攻。敌不支，挂白旗乞降。罗炳辉只带一名护兵进入敌营受降，晓以国家民族之大义，指出中国人不应该自相残杀，应把枪口一致对向帝国主义。正在这时，敌军接到方本仁的不准投降、准予撤退的命令，遂扣押罗炳辉作人质，退回赣南。在英德战场受到罗炳辉部重创的敌指挥官，要枪杀罗炳辉以泄恨，被敌军中钦佩罗炳辉勇敢正直的军官们制止^①。

在赣州狱中，罗炳辉被囚禁了9个月，颈部和手部的两处创伤发炎，苦不堪言。1924年2月，原滇军将领、后依附吴佩孚

^①据罗炳辉《自传》，参见《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78年第5期载《孙中山年谱》（续四）。

孚的杨如轩到江西活动。罗炳辉在狱中给杨如轩写信求助。杨素来敬重罗炳辉的为人，专电方本仁保释获准，待为上宾，委为营副兼连长，驻扎吉安，后移驻赣州。在出狱后的一年半中，罗炳辉已经看清了北洋军阀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认定唯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才是中国的希望。他遇到许多北伐失败后流落在江西的滇军官兵，都晓以大义，一一给予川资，设法送他们返回广东，先后花完2000余元的薪饷所得。罗炳辉的举动被北洋军阀爪牙们侦知，在1925年8月再次被捕。他乘乱逃脱，去见杨如轩，杨暗示他迅速离开。于是，罗炳辉化装成商人，逃离赣州，返回广东^①。

当身无分文、衣衫褴褛的罗炳辉出现在刚于7月8日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的朱培德面前时，朱培德又惊又喜，说：“我们都以为你死了呢，前年就为你开了追悼会。”立即委罗炳辉为少校副官，信赖如初。10月，改任罗炳辉为征兵主任。不久，又任他为警卫营营长，视为心腹。此期间，罗炳辉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

(五)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国民革命军共八个军，约10万人。而面对的军阀势力却有盘踞河南、湖北、湖南和直隶南部的吴佩孚部20万人，据

^①据罗炳辉《自传》和海伦·福斯特·斯诺《访罗炳辉》，江山碧译，载四川省图书馆《集萃》1984年第1期。罗炳辉自述：抵广州不几天，“我同朱培德交谈时，接到报告说廖仲恺已被暗杀”。按廖被刺为1925年8月20日，可证罗炳辉系8月中旬到广州。

守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的孙传芳部 20 万人，据有东北和山东、直隶、热河、察哈尔的张作霖部 35 万人。北伐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先取两湖。第 3 军由衡州乘船到株洲，再转乘株萍铁路火车到醴陵集中，监视江西，策应两湖战场。罗炳辉任第 3 军第 9 师第 25 团第 2 营营长。这个营是由军部朱培德警卫营改编的，装备好，战斗力强，是主力营。北伐军所到之处，受到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和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使罗炳辉思想上受到很大鼓舞。

两湖战场频频告捷，北伐军 9 月 7 日克汉口、合围武昌，吴佩孚逃往郑州。至此，北伐战争的重心移到江西战场。孙传芳 9 月初到九江部署，倾苏、皖、浙三省兵力的大半，计有 8 个师、12 个混成旅、4 个混成团、1 个炮兵旅，共 14 万人，号称 20 万，集南浔铁路，作困兽斗。孙传芳 7 日发表通电，狂妄地限令北伐军在 24 小时内全部退回广东。

9 月 3 日，北伐军以第 3 军军长朱培德为前敌总指挥，分三路进攻江西，第 3 军为中路。敌江西总司令邓如琢凶悍善战，以唐福山师据守莲花、萍乡、万载为第一道防线，以谢文炳部据守安福、袁州、上高为第二道防线，以蒋镇臣师据守吉安，主力据守新喻、高安为第三道防线，层层拱卫南昌。

罗炳辉营所在的第 25 团，4 日由湖南醴陵罗家塘出发，经大义口、高洩里，迫江西萍乡敌之右侧背，6 日上午 10 时一举占领萍乡。10 日午后，25 团进至距宜春 30 里的孟子桥，与敌接战两小时，敌主动撤退，是晚克宜春。14 日，北伐军挺进新喻。不料邓如琢早已在新喻构筑坚固阵地，作好决战准备。从 14 日到 16 日，北伐军与邓部激战三昼夜，双方均伤亡惨重，敌终不

支，退清江、樟树、高安。北伐军乘胜勇猛出击，18日克高安，19日克清江，第19师（属程潜为军长、林伯渠为党代表的第6军）于19日攻入南昌。因第7师及第1师未及时赶到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坐使敌人得交通运输之便，第19师于21日被迫退出南昌。当日又乘敌立足未稳，再次攻入。因第1师王柏龄部（属以何应钦为军长的第1军）覆灭，北伐军于24日退出南昌，全线失利，退至生米街一带。

30日晨6时半，敌郑俊彦之第10师及第5、第6两混成旅并独立第2团共万余人，向北伐军第3军进犯，激战于凤凰山、筒山间。朱培德至抬山督战，战至午12时，敌攻势被扼制。午后3时，敌再度猛攻，北伐军以密集炮火反击，敌不支退向万寿宫。朱培德派三个团追击，敌亦有增援，双方入夜仍肉搏不止。

10月1日，“敌人殊死战，至下午5时许并以密集部队向我突击，经将预备队25团及26团之一部加入正面与敌彻夜肉搏，并将控制左翼之19团绕攻敌之右侧，进步甚速，其时正面之敌已有动摇模样。”^①罗炳辉营作为25团的主力，在夜战、近战、拚刺上杀出了威风。2日，第3军第8师猛攻大庙上，截断万寿宫守敌的退路，同时以第25团、21团、26团向万寿宫突击，恶战两小时，至午后5时占领万寿宫，敌全线溃败。北伐军向南昌城逼近，揭开了血战牛行的战幕。

4日，孙传芳五省联军8万人向北伐军进犯，谢鸿勋部攻铜鼓、修水，卢香亭部犯高安、奉新，陈调元部由武穴出动。战

^①据北伐军右翼军总指挥兼第3军军长朱培德1926年10月2日午后致蒋介石的电报。

场局势，瞬息万变。同日，北伐军总司令行营于上午9时电令：“第3军着留一部在赣江左岸对南昌之敌监视外，其主力于10月5日由现在地开始运动攻击南昌车站至乐化（乐化车站在内）间之敌。”^①同日，孙传芳由九江派两列火车运兵2000人至南昌牛行车站构筑坚固工事。8日，牛行车站聚集敌军达6000人，坚守在有掩盖的战壕内，且正面为平坦的水田，给步兵进攻造成极大不利。与牛行车站隔赣江相望的南昌城，四门紧闭，敌在章江门设大炮四门，给牛行守敌以支援。10日，朱培德闻报：敌三列火车，每列十二节，已开到乐化，将开往牛行增援。军情紧急，朱培德下令总攻。11日至13日，罗炳辉率部首攻牛行，战斗空前惨烈，炮弹落处，血肉纷飞，经三昼夜浴血鏖战，终于攻入牛行。但因协攻的20团团团长万人敌不敢到火线，躲在后方吸鸦片；21团团团长彭武扬称病后撤；20团三营营长在敌炮火最猛烈时掉头逃跑，再加上奉新方面第1军军长何应钦所部首先溃退，牵动全局，致使牛行车站得而复失。战斗中，罗炳辉负伤，遍体浸透了自己的和敌人的鲜血，成了血人。他以惊人的勇敢，怒吼着再次冲入敌阵，攻击部队大受鼓舞，人人奋勇，终于再克牛行。正在罗炳辉率部准备向残敌发起最后攻击之时，13日午后1时，蒋介石应南昌美国传教士之请，称“徇民众之请，决心变更战略，撤南昌之围”^②，并在南昌南门外下训令撤围。北伐军将士付出惨重牺牲才换来的胜利，竟成了蒋介石向帝国主义分子献媚的礼品，使罗炳辉恨恨不已！但军令难违，罗炳辉营撤出牛行时，400人只剩下不足80人了。

^{①②}转引自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2，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北伐军经短时间休整，再次围攻南昌。罗炳辉也基本恢复健康。11月2日下午1时，第3军经激战占领朝天岭、狗子山，3日进攻蛟桥。第2军、第3军、第6军各选300人组成敢死队，“以百人为一队，三百人为一大队，置大队长一员统率之，组合夜袭。同时俾以相当部队跟进。以一次奋斗突破其阵线，占领其工事地区”，“乘其混乱之际，通过浮桥，占领牛行车站及冲入南昌。”^①罗炳辉再次建立功勋。8日，北伐军攻克南昌，孙传芳潜逃南京。在入城式上，原有万余人的第3军只剩下3000多人了。

1927年1月，北伐军分三路进取浙江、上海、安徽、江苏、豫南。中路军由蒋介石兼总指挥，辖程潜的江右军和李宗仁的江左军，沿江东下，追击孙传芳。罗炳辉所在的第3军第9师暂划归程潜指挥，出江西入安徽境，连克芜湖、采石矶，直迫南京。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南京打下后，罗炳辉部开回安庆驻防^②。

北伐军出师不到10个月，就以破竹之势消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从广州打到武汉、南京、上海，席卷了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但是，北伐战争在它胜利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孕育着导致革命失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③。象罗炳辉这样的有良好品质和强烈正义感的军官，却没有受到党的多大影响或教育。蒋介石和其他军事首领迅速护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

①朱培德1926年11月2日致蒋介石的电报。

②据罗炳辉《自传》。

③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

戎马13载，转战千万里，罗炳辉在军事上已经相当成熟。大革命的胜利前景使他欢欣鼓舞。然而，他到安庆不几天，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罗炳辉对中国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军队保国安民的理想与热望，在血海中破灭了。

(六)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汉国民政府很快向右转。5月29日，朱培德在江西“礼送”中共党员140余人出境。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罗炳辉深深陷入迷惘、矛盾和痛苦的思索中。他对共产党员的英勇无私是敬佩的，对土豪劣绅也深恶痛绝，但是，他对共产主义却无了解，而且还恪守着“军人不问政治”、“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信条。因此，当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他所在的第9军（军长金汉鼎）第27师（师长杨如轩）第79团（团长刘安华）在南昌城外小营盘驻地被贺龙指挥的20军缴械，原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找他谈话，要他参加革命时，他对自我标榜为“中山信徒”的朱培德仍然深信不疑，表示愿留在滇军，没有参加起义军^①。这一错误的抉择，使罗炳辉在黑暗中又挣扎了两年之久，并且险些断送了生命。

罗炳辉“不问政治”，政治却要问他。他在防区内主持公道，为贫苦农民说话，遭到了土豪劣绅们的仇视。他向士兵们

^①据罗炳辉《自传》和海伦·福斯特·斯诺：《访罗炳辉》。

演说：“当兵的薪饷是在枪林弹雨中冒死挣来的。只有士兵的父母和妻子儿女才能用这些钱。长官若吞吃兵饷，就是喝兵血，吃兵肉！用这种昧良心钱盖房子要着火烧，买田要着水冲，讨老婆生儿子不长屁眼！”^①士兵们拍掌欢呼，可是军官们对他恨之入骨。他军纪严明，枪毙了两个奸淫掳掠的军官，引起了军官们更大的仇恨。他凭着自己的天良和正义感扶贫济危、抑压豪强，军官们却据此控告他是“共产党嫌疑”。这一切，反倒唤醒了他先前对共产党的好感。

1928年11月，在蒋介石集团新军阀以吞并、削弱异己为目的的“陆军编遣运动”中，平日就嫉恨罗炳辉的79团团副（副团长）李文彬^②，纠合中级军官，编织了“罗炳辉通共十大罪状”，联名上报南京国民政府、江西省政府、第五路军司令部，欲置罗炳辉于死地。已经爬上江西省主席兼第五路军总指挥高位的朱培德，见事已闹大，就设计把罗炳辉骗上停靠在吉安的小火轮，船到南昌，才宣布罗炳辉已被遣散了^③。

罗炳辉愤怒至极，去见朱培德。朱培德说：“你有很大战功，为人也忠诚坦白，就是火气太盛，难与同事相处。此次裁撤，五路军六个师裁掉四个，撤了总指挥部、两个军部、四个师部、八个团部，遣散官兵一万多人。被裁军官两千多位，都不肯走，我不能为你一人而得罪大家呀！”^④罗炳辉激愤地说：“我来见省主席，一不是要官做，二不是要钱花，炳辉也决不做

①③据罗炳辉《自传》。

②李文彬，反动军官。《彭德怀自述》记载李后任旅长，在“剿共”中有很大罪恶。

④据罗炳辉《自传》，参见1928年12月11日上海《民国日报》载《朱培德报告赣省裁兵经过》。

害民的官。只要人格在，挑葱卖菜也是一生，何必军马大刀！”^①

朱培德总算还念旧情，写一亲笔信给广东省主东陈铭枢，介绍罗炳辉去广州谋职^②。12月底，罗炳辉和300多名被遣散的滇军弟兄乘船由九江到达上海。不几天就是1929年元旦，上海到处是一片庆祝“编遣胜利”的喧嚣。罗炳辉等穷困潦倒，忧愤感伤，觉得是受了新军阀的欺骗。特别是在北伐中负伤致残的弟兄，更觉前途绝望。罗炳辉拿出多年积蓄周济他们，也属杯水车薪。春节临近了，他们买好轮船招商局新华号快轮1月10日开广州的船票，除罗炳辉一人去广州外，其余都拟在香港下船，然后取道安南（今越南）回云南去^③。

1月10日，新华轮因故未开，延至11日开船。11日，罗炳辉正要上船，突遇故友，强行挽留，他只好退票，与滇军弟兄洒泪而别。17日，罗炳辉正在旅馆中闷坐，那位朋友一路嚷着闯了进来，说：“你要给我救命钱了！”原来，新华轮16日凌晨4时在距香港12英里的洋面上触礁沉没了^④！罗炳辉以侥幸幸免遇难。六天后查明，除18名水手船员和3名乘客逃生外，共淹死400多人，300多名滇军弟兄全部惨死海底^⑤。

①据罗炳辉《自传》。

②参见海伦·福斯特·斯诺，《访罗炳辉》。

③1929年1月8日、9日、10日上海《民国日报》、《申报》载《招商局船期》：“新华快轮准于一月十日晚（阴历十一月三十日，星期四）开往汕头、香港、广东。”

④1929年1月17日上海《民国日报》载《招商局新华轮触礁全部覆没》，同日《申报》也发表此消息。

⑤1929年1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载《新华轮保险三十万》：“闻搭客中退伍兵返粤桂者亦颇不少。”1月22日又载《新华轮调查员明日启程，总商会请彻底严查》，消息说，罹难者“除少数苏浙籍外，仍以滇籍为多……”

罗炳辉沉浸在悲痛和愤懑中。这些和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袍泽和弟兄，有的在讨袁护国中流过血，有的在北伐战争中立过功，这些国民革命的功臣，被蒋介石新军阀一脚踢开，最终竟悲惨地葬身海底，而且“淹死之尸体多在船内一时无法可以捞出”^①，云南的荒村茅舍中又添了多少孤儿寡母！与此同时，江西方面又不断传来朱培德、王均、金汉鼎率滇军“剿共”的消息^②。这一切，都给罗炳辉以巨大的精神刺激。他逐渐看清了该走的人生道路。半年后，他就义无反顾地把“拣来的一条命”献给了无产阶级。

2月，罗炳辉到广州，受到广东省主席陈铭枢的款待。一军界朋友推荐他任黄埔分校中校区队长，罗炳辉婉言谢绝了，不久便决意离粤赴赣。

3月，罗炳辉取道上海返回南昌，偕妻子杨厚珍^③到高安县居住，办硝磺矿失败。有人推荐他任高安县公安局局长。高安县县长刘振群北伐时是罗炳辉部下的连指导员，现在见罗炳辉落魄，态度十分踞傲，官气十足，罗炳辉当众吐了他一脸唾沫，怒骂：“老子革命是替你们这些人革的么！”原公安局局长毛正先是个反动军人，曾于1927年3月制造残杀共产党员的“高安惨案”，也不肯向罗炳辉交职，被罗炳辉打了一耳

①1929年1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

②1929年1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载《湘赣会剿朱毛大捷》。

③杨厚珍，江西省瑞金县城关人，1901年出生于米商家庭，父杨成萱，母詹氏，家境富裕。1929年10月罗炳辉领导吉安起义后，她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是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30位女同志之一，与邓颖超、蔡畅、贺子贞、康克清、刘英、刘群先、廖施光并称“八大姐”（见杨成武《忆长征》）。1936年与罗炳辉离婚，1976年底病逝于江西九江。

光^①。罗炳辉回江西后，就不断听到朱德、毛泽东转战闽、粤、赣的消息，还见到过红军张贴的标语，便萌发了拉队伍、投朱毛的念头。这时，他决定策动县政府的老兵，杀掉县长和劣绅，拖枪上山当红军。事为刘振群侦知，打电话向省政府告急，说罗炳辉要暴动。罗炳辉来不及组织，星夜避走南昌，托人疏通，才使事态平息。

至此，罗炳辉已经决心先掌握一支武装，然后再图大举了。

(七)

1929年6月1日，江西省吉安县富田、新安、新墟、陂头、值夏、白沙、永和、水东八市^②联防县靖卫大队成立。时任江西省“剿匪”副总指挥兼陆军第12师师长的滇军故旧金汉鼎，电召罗炳辉就任大队长^③。

吉安，是赣中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旧设州、路、府，辖永丰、吉水、泰和、万安、永新、宁冈、安福、峡江等八县。地势险要，“南揖赣江，北键玉峡，东西控临川、长沙，神冈前峙，螺山后踞，江流东走其下，青原、瑞华诸山夹立而拥护。江西诸郡，独称雄奇。”^④吉安县靖卫大队对八县靖卫队起指导作用。

①据罗炳辉《自传》、海伦·福斯特·斯诺：《访罗炳辉》和笔者1979年在高安县的调查。

②这里的市相当于乡。

③据《吉安县志》（民国30年）卷13。

④引自《吉安府志》（清同治十年）。

罗炳辉就职后，首先将各区、乡靖卫团队的枪械全数收缴，接着补充进滇军旧部，把成立时的1000多人清除掉500多，凡是地主豪绅的爪牙、打手，统统清除，再编为三个中队，九个分队^①，进行严格的纪律约束和正规化军事训练。队员中有欺压群众的，定予严惩。这些措施，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极大不满。他们抱怨说：“这哪里还象靖卫队，简直是搞赤化！”

吉安县县长冷照升^②讥讽罗炳辉不会做官，他当县长才9个月，已经搜刮五六万元。他和罗炳辉拉大同乡关系，罗炳辉说：“象你这样的贪官污吏，应该打倒。”冷照升见罗炳辉不开窍，就拿自己的做官经验来开导罗炳辉：“做县长一要会做公婆，二要会做阎王老虎，三要会做小媳妇。对地方商绅财主是公公婆婆，对无知百姓是阎王老虎，对上司和军队是小媳妇。”^③罗炳辉说：“做这样害民的官，我看还不如死掉干净！”^④冷照升见拉拢不成，冷笑着说：“你老弟脾气不改，恐怕日后会有好戏看的！”^⑤

整训后，靖卫大队奉命到东固“剿匪”，所到之处，人民逃避一空，与三年前人民群众扶老携幼、夹道欢迎北伐军的情景，形成强烈对比，使罗炳辉感慨万千^⑥。吉安城乡墙壁上书写的红军标语，一条条重扣着罗炳辉的心弦。抓来的穷苦农民，地主豪绅们说他们是“匪”，可是他们都有和罗炳辉少年时代相同的苦难经历。在审讯他们时都说：“当顺民就要饿死，当

①据《吉安县志》（民国30年）卷13。

②冷照升，四川人，1928年10月至1929年10月任吉安县县长；1929年1月起兼财政局长。

③④⑤⑥据罗炳辉《自传》。

红军才有饭吃”。罗炳辉下令：给他们饭吃，统统发钱释放^①。

吉安县轰动，豪绅地主们纷纷抗议。罗炳辉回答他们的责难说：“没有饭吃的人是杀不完的。吉安县有30多万农民，绅士不足两万。把他们杀完了，诸位靠谁来养活？”^②豪绅们无奈，又生出一计：分组随军，监督罗炳辉。罗炳辉根本不予理睬。

7月，中共派赵醒吾^③到吉安找罗炳辉，晓以大义，畅谈三日^④。罗炳辉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尽情倾吐了自己的苦难家世和艰难摸索，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几天后，刘士奇^⑤、蔡升熙^⑥两同志潜赴吉安，与赵醒吾一起跟罗炳辉谈话，并主持了罗炳辉的入党仪式^⑦。为了有利于罗炳辉继续在靖卫大队隐蔽，罗炳辉在党内使用化名：罗南煌^⑧。

罗炳辉秘密加入中共后，遵照党的“保持灰色，发展武装，待机而动”的指示^⑨，安排人打进永新、泰和、万安、吉水、峡江、永丰等县靖卫大队，控制武装；还利用权力，营救被捕同志，保护党的组织^⑩，成为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钢刀。

此期间，朱培德、王钧、曾万钟等人不断写信给罗炳辉，邀他回军队任职，并许以高位^⑪。已是共产党员的罗炳辉当然一一拒绝了。

①②④⑧⑨⑩⑪据罗炳辉《自传》和罗炳辉1944年9月30日日记。

③赵醒吾，原名必馨，字维香，云南省宾川县人。1897年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朱培德部参谋、杨池生部上校副官长。吉安起义后被捕，1930年2月中旬英勇就义。

⑤刘士奇，时任中共赣西特委书记。

⑥蔡升熙，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

⑦据1933年6月29日填写的罗炳辉《党证》。

7月底，罗炳辉“通共”的风声渐起。为防不测，罗炳辉于8月间率靖卫大队离开吉安城，到值夏镇驻扎^①。值夏镇位于吉安东南40华里，东面不远就是红色区域东固山区。罗炳辉把1中队安置在水北罗家村渊泉堂，2中队驻增纓堂，亲率3中队驻扼守向北大路的竹山村^②，赶走了随队监视的反动军官，半公开地向士兵们宣传起革命道理来。“罗大队长已经赤化！”数百名豪绅地主联名上书吉安驻军湘军第50师成光耀旅长，告发罗炳辉有“通匪纵匪之罪”。再加上罗炳辉已很警觉，轻易不进吉安城^③，更加深了敌人的疑心。

9月底至10月初，中共江西省委开会，讨论决定了全省的政治、组织、军事的总布置，期望发展全省的武装斗争，响应一二省政权的夺取，以推进全国总暴动的到来。省委决定：

“特别是立即发动和扩大吉安与湖口两处的地方暴动”^④。中共赣西特委坚决执行了这一决定^⑤，并同意了罗炳辉提出的在11月7日“十月革命节”举行赣西几县总暴动的建议^⑥。

10月10日，中共赣西、赣南两特委同时被国民党反动派破获，赣南特委损失惨重，特委团的负责人被捕三四人^⑦，罗

①参见《吉安县志》（民国30年）卷13。

②据笔者1980年1月26日至27日在值夏地区的实地考察和访问当地亲见起义的罗先会等老人记录，以及对罗炳辉当年住处张定荣家老宅的考察和张定荣堂弟张定楷的回忆。

③④据罗炳辉《自传》和笔者1980年1月在吉安的调查、访问记录。

④《江西省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11月4日）。

⑤《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

⑦《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1930年4月5日于上海）。

炳辉的身分暴露了。此时，原县长冷照升已被解职，更加反动的彭学游^①继任县长。彭学游知道罗炳辉有异志，马上设下圈套，以调靖卫大队回县点验、发饷、领取军械和冬衣为借口，急令罗炳辉率部回城，藉便逮捕^②。

罗炳辉从一道道急迫得异乎寻常的返城命令中，察觉到了形势的严重。正在此时，他收到了曾山代表省委写来的一封信，信中告诉他赣西、南特委有许多机关被破获，已从北路撤退，党命令罗炳辉率部起义^③。罗炳辉下令封锁消息、检查邮件。10月11日，罗炳辉截获吉安豪绅地主唆使第2中队哗变的密信^④。2中队中残留的反动分子较多，而且中队长张慕良率20余人枪去宣化、永福两乡催收丁漕，逾期不归^⑤。10月14日晚，2中队队副邓世斌借深夜查岗为名，潜逃吉安^⑥。情况十分危急，原定11月7日的数县总暴动只得提前，在信夏一处发起了。

10月15日凌晨4时，巍巍天梁山下，滔滔萧昌河畔，信夏镇北水北罗家村里，响起了激越的军号声。罗炳辉在增纓堂前集合全队，宣布起义，士兵们一片欢腾^⑦。罗炳辉全副武装，骑着白马，走过萧昌河上的福星桥，率队向东嶽山区进发^⑧。日出时分，进抵新墟^⑨。刘士奇、蔡升熙、曾山、曾炳

①彭学游，安福人，1929年10月继任吉安县长。

②《吉安县志》（民国30年）卷1：“嗣彭学游继长吉安县，察罗有异志，此时罗部驻信夏市，乃檄调来城点验发饷，藉便撤换。借机事不密，为罗侦知，遂裹胁部属叛降红军。”

③④⑥据罗炳辉《自传》。

⑤据《吉安县志》（民国30年）卷13。

⑦⑧笔者在信夏的调查访问记录。

⑨笔者1980年1月28日在新墟的调查。

春等负责同志在街口迎接，红区群众敲锣打鼓，送茶送饭，热烈欢迎起义军。罗炳辉命令列队，激动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了！”他带头摘下军帽，撕下青天白日帽徽，踩在脚下，激动得哭了起来^①。

10月16日，起义部队回到值夏镇，在青云台^②召开了有近万名群众参加的暴动大会^③。罗炳辉在大会上说：“三天前我们是来‘剿匪’，‘剿’谁呢？‘剿’我们的农民弟兄、劳苦大众。三天后，我们扛着红旗回来了，也来当‘匪’了。谁才是真正的匪呢？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反动新军阀，是吃民肉、喝民血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他们才是真正的匪类！我们要暴动起来，打倒他们！”^④起义部队宣布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5团，罗炳辉任团长，匡一心任政委^⑤。会上提出斗争口号：1. 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2. 废除苛捐杂税；3. 打倒土豪劣绅；4. 烧毁契据借约；5. 实行分配土地^⑥。群众大会后，在陂头万寿宫成立了暴动指挥机关：纯化区革命委员会。群众的革命热情象火山爆发一样迸发出来，暴动歌声响彻云霄：“我们大家来暴动，消灭恶霸地主，农村大革命！杀土豪、斩劣绅，一个不留情。建立苏维埃，工农来专政。实行共产制，人类庆大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最后的成功。中国国民党，反动大本营，新军阀，反革命，屠杀我工农。仍用旧官僚，苛捐更加重，勾结美日，卖国卖人民，大家起来，努力打倒这个死敌人！”^⑦

①参见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

②青云台，位值夏镇头，为旧时戏台。

③⑤⑥⑦据《吉安县、市革命斗争史稿》（1960年6月2日）。

④据笔者在值夏的调查访问。

吉安起义的爆发，振奋了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江西人民，发展了红军，扩大了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给国民党反动新军阀以沉重的打击。吉安城内，一片惊慌。

11月，成光耀率部渡赣江进犯。罗炳辉指挥反击，经三日纠缠激战，迫使敌人向白沙、吉安收缩^①。12月15日，罗炳辉率部乘着漫天大雪，奔袭与吉安城隔江相望的水东，重创从南昌来援的江西省保安第3团第1中队，缴枪百余支，震慑了吉安守敌^②。仅两个月，罗炳辉部就由400余人猛增到近2000人^③。

12月，罗炳辉与彭德怀、黄公略会师于遂川^④。年底，以东固、延福为中心的赣西红色区域和以兴国、宁都、雩都为中心的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1930年1月，红6军组建，黄公略任军长，罗炳辉任第2旅旅长。2月，罗炳辉与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4军会合于东固山区。2月7日至9日，罗炳辉出席了在陂头召开的红4军前委，红5军、红6军军委与中共赣西特委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⑤。在毛泽东主持下，会议研究了武装群众、扩大红军、建立红色政权、分配土地等重大问题，使罗炳辉深受教育、极为振奋^⑥。会间，罗炳辉与毛泽东首次见面，畅谈彻夜，相见恨晚。罗炳辉见毛泽东、朱德棉衣又薄又破，设法买了几匹斜纹布送给他们缝制新衣。毛泽东说：“战士们衣裳更单，先给

①② 《吉安县、市革命斗争史稿》。

③ 罗炳辉1944年10月12日日记。

④ 据罗炳辉1946年3月5日题辞。

⑤⑥ 笔者1980年1月27日在陂头二七会议纪念馆的调查。

战士做吧。”使罗炳辉又一次受到教育^①。

2月中旬，红军摆开阵势，围困吉安。2月23日，号称“铁军”的敌唐云山独立第15旅汹涌来犯。毛泽东、朱德倾听了罗炳辉对敌情、地形的详细分析^②，决定分兵两路，由毛泽东、朱德率一路由水南向施家边、吉卢；由罗炳辉率一路自三星桥向茶家山、值夏阻敌。经24日战水南、26日战施家边，红军大败唐云山旅，缴枪2000余支，机枪18挺，迫击炮10余门，子弹五六十担，获空前大捷^③。

2月底，罗炳辉率部配合彭德怀部攻吉水，未能成功^④。红4、红6军移师南下，攻赣州未克，遂分兵开展游击战争。3月至5月，罗炳辉率部征战于赣江以东、武夷山以西的广大区域，在万安、赣县、雩都、兴国、宁都、广昌、石城等县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党的组织和各级政权，配合红军主力，为创造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基础^⑤。5月，红6军改为红3军，罗炳辉任红3军第2纵队司令员。

(八)

1930年6月“汀州整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红3、4、12、20

①笔者1980年在江西的调查。

②参见《吉安县、市革命斗争史稿》。

③参见《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1930年4月5日），笔者在陂头的调查。

④参见《红军第四军状况》（1929年7月—1930年4月）。

⑤据《红四、五、六军前委通告第三号》（1930年3月18日）、《赣西南特委致毛泽东同志和前委的信》（1930年5月22日）。

军。罗炳辉任红12军副军长，代军长职。7月，第1路军改红1军团，下辖红3、4、12军，以黄公略、林彪、罗炳辉分任军长。

6月11日，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命令红1军团攻取南昌。6月23日，红1军团离长汀^①，经兴国，7月24日克樟树^②，并西渡赣江，27日克高安。为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罗炳辉率部于8月1日进抵南昌城对岸的牛行车站，向南昌鸣枪示威，赣敌一片惊慌^③。8月23日，红1、3军团会合于浏阳永和市，成立红1方面军，攻长沙不克，回师江西，10月4日攻占吉安。罗炳辉部进至峡江、新喻、崇仁、南城一带开展工作^④。

11月，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采取“并进长追”、“分进合击”的战略，西自吉安、东至建宁，向红1方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红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放弃东固，将主力退至宁都县黄陂、小布地区隐蔽集结，仅留罗炳辉率红12军第35师担负诱敌任务^⑤。在从12月16日起的十多天里，罗炳辉率部且战且走，故意丢下一些军需品，佯作溃退，成功地把公秉藩、张辉瓒诱向富田、东固、龙冈地区^⑥。12月28日，敌前线总指挥兼第18师师长张辉瓒进入

①笔者1980年2月在长汀的调查。

②笔者1979年12月在樟树的调查。

③毛泽东：《致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1930年8月19日）和笔者1979年11月在高安县的调查。

④参见彭加伦：《老十二军出发的经过》（1931年10月6日）。

⑤⑥笔者1980年在瑞金等地调查访问。

龙冈地区。29日夜，红军分两路秘密西进，包围龙冈之敌^①。30日，红军发动猛攻。红12军任左翼，占领万公山，以主力切断通南龙之大道^②。龙冈一战，全歼敌18师师部和两个整旅，俘张辉瓒以下9000余人。红军龙冈大捷，蒋军全线动摇。敌18师残部和敌24师、28师、50师分向富田、头陂、东固、东韶逃跑。

1931年1月2日，毛泽东、朱德在宁都小布发布《进攻东韶之敌的命令》，命罗炳辉率红12军担任正面攻击任务，经南田、林池，直抵东韶。1月3日上午7时，红12军乘晨雾迷濛，从西面直扑东韶。彭德怀率红3军团亦发起强攻。激战至午，敌据黄泥寨高地顽抗，红军受阻。罗炳辉奉总部命令，以一部抢占比黄泥寨高的雪崖埕，居高临下，猛烈射击；以另一部配以梭镖队连续发起仰攻，经激战全歼守敌。红军各部，冲进东韶。东韶一战，歼敌第50师一半，毙、俘6000余名。还缴获了一架无线电台，从此创建了红1方面军的第一个无线电大队。

红军在五天里打了两个大胜仗，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围剿”。战后，毛泽东表扬了红12军成功诱敌的功绩，称赞罗炳辉是“牵牛鼻子的能手”^③。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转入训练，原地分散筹款，发动农民分田。罗炳辉率红12军南北转战，2月27日克石城，3月26日解放瑞金。

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

①② 《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字十二号命令》（1930年12月29日午后8时于君埠街总司令部）。

③ 笔者1980年在瑞金、宁都、兴国等地的调查访问记录。

令，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敌军西自赣江，东至建宁，构成700里弧形阵线，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分四路向红军进攻。4月19日，毛泽东、朱德在宁都县青塘签署《战前部队集中的命令》，红军向东固山区隐蔽集结。

5月14日，红军总部电台截获敌王金钰部将于15日沿观音崖、九寸岭犯东固，敌公秉藩部亦经中洞犯东固的电报。16日，罗炳辉部红12军64师会同林彪部红4军，与王金钰部激战观音崖、九寸岭，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个胜利^①。红12军余部15日占领大山垸，牵制了上坊、罗坊、潭头三个方向之敌^②，保证了18日至19日水南、白沙战斗胜利的取得，歼敌郭宗华部第43师大部和上官云相第47师一部，还缴获了两门七五山炮和160多发炮弹^③。22日，罗炳辉率红12军为总预备队，支援主力在中村歼灭敌高树勋第27师近一个旅，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三个胜利^④。敌朱绍良部第6路军各师23日向广昌、南丰逃窜。26日晚，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罗炳辉在苦竹召开总前委第二次会议，决定攻取广昌城。27日，红军三路进攻广昌，罗炳辉率红12军为右路，经头陂、新安，从城南攻城，反复冲锋，牺牲甚重，被迫停止进攻。当晚，朱绍良带毛炳文师和许克祥师潜逃南丰，敌军心浮动。晚9时，红军发动猛攻，终克广昌。28日，总前委决定以一部佯攻南丰，麻痹敌人，以彭德怀率红3军团和罗炳

①② 《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1931年5月14日午后于总司令部）。

③ 参见徐松林：《横扫七百里》。

④ 《攻击南团高树勋部队的命令》（1931年5月21日午后7时50分于尧坊总司令部）。

辉率红 12 军（欠 34 师），突袭福建建宁^①。建宁城三面环濰溪河、一面依龙堡山，地势雄险，城高濠阔，易守难攻^②。敌刘和鼎第 56 师以全副德国装备的 7000 人守城，气焰十分嚣张。红军以惊人的速度飞越武夷山，29 日拂晓，彭德怀部为左翼，取溪口街，占青云岭，直扑建宁北门；罗炳辉部为右翼，过沙板桥，越雷钵岭，直迫建宁南门。敌顽强抵抗，红军伤亡甚重。罗炳辉纵观全局，当机立断，不惜牺牲，强渡濰溪河，占领与南门隔河对峙的水南高地，俯射南门之敌；并分兵绕马房村北取东山，控制万安桥，攻击东门。此时，红 3 军团击溃龙堡山守敌，完成了对建宁的四面合围，城中守敌大乱。毛泽东、朱德登上龙堡山指挥，红军更加英勇。罗炳辉部攻击东门部队占领敌东山炮台，以猛烈火力扫射敌军。红 3 军团也突破北门城墙。罗炳辉呐喊着率部攻入南门，穿南门广场，直捣刘和鼎师部。南门广场上停着许多马匹，马背上都驮着麻袋，战士用刺刀一捅，哗哗流出的全是洋钱。当罗炳辉冲入敌师部时，敌刚刚逃遁，连桌上的电报、公文也没来得及收，残部挂白旗投诚。此役歼刘和鼎师三个多团，刘和鼎穿便服乘谷桶渡河逃命^③。

红军“七百里驱十五日”，五战五捷，歼敌 3 万余人，缴枪 2 万余支，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罗炳辉以行军神速，被群众称为“罗炳飞”^④。

①《总前委第三次会议记录》（1931 年 5 月 28 日午前 10 时于广昌城休息中）。

②笔者 1980 年 2 月在建宁的实地考察。

③笔者 1984 年 2 月在建宁县革命纪念馆所得资料和调查访问记录。

④笔者 1980 年 2 月在建宁、长汀、瑞金、宁都等县的调查访问。

建宁大捷后，红军乘胜转入进攻。罗炳辉率红12军一部和红3军团第8军第6师彭雪枫部向泰宁、将乐追击残敌，连克泰宁、将乐、顺昌，直迫邵武、光泽，开辟了广大地区^①。

6月2日，总前委决定红12军在建宁、宁化、汀州、瑞金、石城、广昌等县开展土地革命，筹集款项，扩大红军，加紧部队训练。6月28日至7月1日，毛泽东连续给红12军军委写了三封信，进行具体指导^②。

7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随带德、日、英国军事顾问，统兵30万，采取“长驱直入，三路合击”的战略，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分散在闽西各地的红军，未及休整，匆匆千里回师赣南。7月31日，当红军由兴国向富田开进时，被敌发觉。敌陈诚率第2路进击军两个师直趋富田。红军不得不变更计划，转进兴国县高兴圩，然后从中间突破。8月7日，红军战莲塘，歼敌上官云相第47师一个多旅；8日战良村，歼敌郝梦龄第54师两个团；11日战黄陂，歼敌毛炳文第8师四个多团。红军三战三胜，缴枪万余支，移君埠休整。

蒋介石气急败坏，自8月9日起，以密集包围压缩红军于君埠以东狭小地区。形势十分危急。11日半夜，毛泽东向罗炳辉交待任务，要红12军伪装主力向东北突围，掩护主力南移兴国^③。12日晨，罗炳辉率部扬旗鸣号，大张声势，伪装主力突围^④。蒋介石举棋不定，派飞机侦察。罗炳辉命令拉长队

①参见《建宁革命史》（初稿）（1961年1月1日）。

②兴国县革命纪念馆提供的毛泽东1931年6月28日、30日、7月1日三封信打印件。

③④笔者1980年1月在兴国的调查访问，参见曹丹辉1931年8月12日日记。

形，摆出排拉成连、连拉成营的架势，在干燥的大路上拖着树枝，扬起漫天灰尘，浩荡北进。敌机从空中看下去，只见红旗无数、烟尘滚滚，足有三万红军全数北上的气势。蒋介石上当了，挥师追来。为了使蒋介石把钩子咬得更紧，罗炳辉发动全军，大摆迷魂阵：在岔路口，写“三军团由此向北”、“四军向东前进”……；宿营时，多设土灶，多号房子，在门板上大写留言：“某某同志速到前面找我”，署名都写红军将领名字。待敌人把钩咬死后，罗炳辉命令哪座山高爬哪座山，哪条路险走哪条路。这对于装备笨重，缺乏素养的蒋军来说，无异是一种酷刑^①。罗炳辉牵着蒋军，经白沙、藤田，到乐安的大、小金竹，在崎岖山道上游行了半个月，蒋军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劳师辗转，处处扑空。等到蒋介石发现上当，红军主力已休整半个月，而蒋军已被拖得疲惫不堪，丧失进攻能力了。9月初，蒋军开始总退却。红军乘势反击，9月7日战老营盘，歼敌蒋鼎文第9师一个旅；15日战方石岭、张家背，歼敌韩德勤第52师及蒋鼎文第9师一部，韩德勤被俘后佯称伙夫逃脱。至此，红军在75天中，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②。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罗炳辉获得了“神行太保”的美誉，罗部则被称为“双脚骑兵”。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苏区和红军有了很大发展，苏区发展到21个县，人口达250万，红1方面军也增至4万余人。通过三次反“围剿”战争，“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

^①参见杨至成：《巧使敌人就范》，《星火燎原》第2集。

^②参见红军第1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第三期战争胜利捷报》（1931年9月21日）。

了”^①。依靠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把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作为主要作战形式；实行战略的持久和战斗、战役的速决，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和战役、战术上的外线作战，战略上的以少胜多和战役、战术上的以多胜少，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歼敌；这些战略战术原则，丰富了马列主义军事学说。其间，罗炳辉为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1月7日至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罗炳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②。

1932年2月1日，江西军区、福建军区同时成立，陈毅、罗炳辉分任和兼任司令员。10月，罗炳辉任红22军军长。他率部纵横驰骋于赣南、闽西、粤北，4月克永定、漳平，7月战水口，8月战乐安、宜黄，11月战龙岩、南城，12月战连城^③，战功卓著。

第四次反“围剿”中，蒋介石采用“分进合击”战术，1933年2月犯广昌、南丰。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灵活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经验，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法，一战黄陂，歼敌两个师；二战草台冈，歼敌一个多师，粉碎了敌人“围剿”。周恩来誉罗炳辉部为“战略骑兵”^④。

1933年9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以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进攻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9页。

②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布告（第一号）》原件。

③《一九三二年春至一九三三年十月底中央苏区红军历次战役胜利表》，《红星报》第14期。

④笔者在江西的调查。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达50万人。10月2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成立红9军团，以罗炳辉任军团长，蔡树藩任政委。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领导下，红军奋勇搏杀，虽在硝石战役、高虎埕战役、广昌战役中取得一些局部胜利，却扭转不了全局的被动和节节败退。罗炳辉等高级将领忧愤填膺。

1934年7月8日，罗炳辉在石城接中革军委电令，护送由红7军团改组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东进。罗炳辉率红9军团经禾口、宁化、清流、嵩口，7月19日强渡九龙溪，22日包围永安城，27日到尤溪掩护先遣队渡过闽江，并袭占樟湖板，牵制敌军，保证了先遣队安全北进。完成任务后，红9军团将缴获的大批苏区奇缺的火药、食盐、药品，运回中央苏区，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表扬^①。在数百里艰苦行军中，罗炳辉带头挑着重担，冒着酷暑，翻山越岭，使战士们受到极大鼓舞^②。

10月7日上午10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电令罗炳辉率部于9日晨到达古城、瑞金间^③。21日，红1方面军所属第1、3、5、8、9军团，护卫中央机关，开始了长征。

(九)

长征开始后，红1、8军团为左翼，红3、9军团为右翼，

①②参见涂通今：《红九军团护送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载《革命回忆录》第4辑。

③参见牛桂云、韩泰华：《关于党中央决定长征的时间和长征出发前有无准备的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4期。

红5军团为后卫，掩护庞大的中央纵队转移。10月21日至23日，红军在古陂、新田间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红9军团在大庾黄龙阻敌，付出了很大伤亡。11月3日至5日，红军从汝城、仁化间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红9军团在文明阻敌，激战6小时。在夜过九峰山时，红1军团第2师第4团团长沙和政委杨成武赠马给罗炳辉^①。11月13日到15日，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罗炳辉率红9军团21日克湖南江华县城，开仓济贫，扩大红军150多名^②。江华是红1方面军长征中攻克的第一个县城，全军振奋。25日，罗炳辉率红9军团克永明，打开当铺和粮仓，把财物、粮食分给当地和跟随红军从道县、江华而来的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26日，罗炳辉以一部佯攻湘桂边界上的龙虎关，迫使桂敌李宗仁、白崇禧放弃兴安、灌阳湘江防线，调恭城、富川防堵^③。调敌成功后，罗炳辉命令前锋为后卫，连夜折回永明，复大踏步北上，克永安关，越都庞岭入桂，造成了桂敌更大慌乱。29日，红军掩护中央机关在界首等地强渡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12月1日，红军经浴血奋战，渡过湘江。至此，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人。

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改向贵州进军。黎平会议后，罗炳辉率红9军团和林彪率红1军团为右路，21日占剑河，25日克镇远，26日取施秉，29日下余庆；红9军团1935年1月2日在回龙场渡过乌江，连克涪潭、凤冈、绥阳，构成了遵义的东北屏障。

^①见杨成武：《忆长征》，解放军文艺社1982年5月版。

^{②③}参见《红军长征在湖南纪略》，湘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版。

遵义会议后，红军1月29日在土城、猿猴等处一渡赤水河，图渡长江北上。罗炳辉率部北占习水，南下土城，掩护主力渡河，进入川南叙永、古蔺地区。蒋介石察觉了红军意图，急令川敌刘湘部以12个旅36个团严密封锁长江，并电令其余各部向川南合围。红军向北渡江已不可能，2月3日，中革军委命令各部西进云南扎西地区。为鼓起士气，蒋介石9日“重行悬示匪军各匪首擒斩赏格”^①，其中，以“生擒者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奖五万元”来收买罗炳辉的生命。云南之敌以为罗炳辉将引红军入滇，惊恐万状^②。

渡江不可能，川南一隅亦不可守，红军于18日至20日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返回黔北。罗炳辉部参加娄山关激战，歼敌潘文华部两个团^③。红军25日克桐梓，27日再占遵义。蒋介石急切寻找红军决战，红军却出敌不意，于3月16、17两日在茅台三渡赤水，再入川南，摆出仍要北渡长江的姿态。蒋介石命各部向川南合围，并将兵站、医院、建碉堡用的

①1935年2月15日云南《民国日报》载，“赏格”为：“（一）朱德、毛泽东、徐向前，生擒者各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二）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生擒者各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三）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王稼祥、陈昌浩，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四）王宏坤、王树声、何畏、孙玉清、余天云、王维舟、刘伯承、叶剑英、倪志亮、暨伪中央政委、伪军团政委、伪军长等匪首，生擒者各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

②1935年2月13日云南《民匪日报》载：“赤匪通过叙永后，意欲窜逃筠连渡江，被高、珙两县之川军防堵甚严，匪计不得逞。适匪内有滇人罗炳辉，因熟习本省地情，乃献计趁我军未到达前，拟由威信小道偷过盐津，再窜绥江，企图渡江入川。朱、毛各匪首乃亲率万余人，依计而行。”

③参见涂通今，《红九军团四渡赤水》，载《革命回忆录》第3辑。

建筑材料源源运往川南。红军却虚晃一枪，突然东折，于21、22两日在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四渡赤水，向南疾进。在红9军团掩护下^①，红1、3、5军团护卫中央纵队，于29至31日抢渡乌江，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把敌人甩在川南、黔北，复兵临贵阳，调出滇敌，西进云南，北渡金沙江，就此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然而，红9军团却因无法按指定时间赶到乌江渡口，浮桥被拆，被阻困在乌江北岸^②。这里南横天险，北、西、东三面是敌，加上与中央的电讯联系又告中断^③，红9军团陷入绝境中。

军团长罗炳辉和军团政委何长工，严厉批评了个别领导的绝望情绪，稳定了军心，毅然掉头向西北挺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单独行军。红9军团的掉队，在客观上，却形成了红1方面军夹江而阵的态势。这就制造了蒋介石判断的错误，不敢在北线防堵上稍懈，徒耗大批兵力。再加上红军主力佯作东进入湘，这样一来，当红军分兵进逼贵阳时，蒋介石不能从北线、东线调兵救驾，唯一可行的就只能是调云南敌军驰援贵阳了。毛泽东当时就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④调出滇敌，滇境空虚，红军才得以大踏步西进，巧渡金沙江。

①朱德1935年3月27日、28日致罗炳辉、何长工的电报（抄件）。

②笔者1980年5月在遵义地区的调查访问，参见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

③赵榕：《长征途中红九军团在黔滇川的战斗历程》，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6辑。

④刘伯承：《回顾长征》，载《回顾长征》，解放军文艺社1975年11月版。

4月1日，罗炳辉率红9军团从沙土西进狗场（今金沙县中心乡）。3日，在老木孔以东20余华里的菜子坳，伏击黔军魏金镛部两个团，并猛追残敌，切断了尾巴。5日，9军团翻越倒压大山，经泮水、石桥、里毛（今名农里）、石倬佬（今名石场），于7日伪装蒋军，不费一枪一弹，袭占大定县长石。8日，仍伪装蒋军奇袭并占领瓢儿井，在此休整三天，扩红300多人，同时打开官绅盐仓，把食盐分给穷人。16日，部队进抵毕节海子街、毛基场^①；再急行军南下大定县猫场，被敌偷袭。复经大兔场（今纳雍），渡纳雍河，抵水城县茨冲。在当地群众帮助下，9军团于21日渡北盘江，经普古、苏座、鸡场坪、断江，25日进入云南平彝（今富源）^②。

进入云南后，中革军委电令红9军团继续单独行军，以迷惑和牵制敌人。罗炳辉命部队离开羊肠小道，踏上滇黔公路，佯设红军番号，伪装主力北上，26日克板桥，27日占领滇东北重镇宣威，查抄县政府，打开监狱，把官绅财产分给穷人，还缴获了大批火腿。蒋介石唯恐红9军团北上，急派两师兵力往威宁防堵。罗炳辉却率部大踏步西进，于5月2日克会泽^③。在会泽，红军公审并枪决了敌县长杨茂章和唐继尧的舅舅、豪绅刘善初，分发官绅财产，扩大红军1500多人，还缴获了大批枪枝弹药、几十匹骡马和6万多银元。红9军团离宣威西进会泽时，罗炳辉示敌以南下板桥，给蒋介石摆下迷魂阵，

①参见1935年5月16日云南《民国日报》。

②笔者1980年5月在贵阳、遵义、金沙、大方、毕节等县的调查访问和实地考察。参见薛岳：《黔滇川南追剿》。

③参见1935年5月16日云南《民国日报》《赤匪窜扰东川之惨状》、17日《共匪窜扰会泽之又一通讯》及薛岳：《黔滇川南追剿》。

蒋介石再次作出错误判断：“罗匪感（二十七）日窜宣威，当晚仍回甯板桥。”^① 蒋介石 29 日电令李韞珩师：“限艳（29）日到松韶关，30 日以一旅守备威宁，以一旅守备宣威，并搜剿罗匪”^②。松韶关在宣威之南近 200 华里。当蒋军向该地猛扑时，罗炳辉却率部在 200 多华里外勇猛西进，这不能说不是一出极富滑稽意味的活剧。5 月 1 日，红 9 军团已迫近会泽，蒋介石下达的命令却是一团迷茫的“详侦罗匪行踪，痛剿并电告。”^③ 5 月 6 日，红 9 军团已经胜利地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蒋介石还在电令：“第 53 师限删（15）日在（云南）会（泽）巧（家）间地区歼灭罗匪。”^④ 直到 5 月 10 日，国民党报纸才颓丧地宣布：“罗炳辉匪部，已于 5 日午后在会泽西方之树节（距会泽约百七十里）附近，利用多数盐船，渡过长江。”^⑤

红 9 军团入川后，沿金沙江北上，至云南巧家县城对岸，与敌隔江相峙，以牵制敌军，配合红军主力自 5 月 8 日至 16 日对会理的 7 日围攻。5 月 16 日，红 9 军团北上^⑥，穿越彝族区，于 5 月 21 日在西昌正北礼州与彭德怀红 3 军团会师。至此，罗炳辉率领红 9 军团结束了历时 52 天，穿越黔、滇、川 3 省 17 个县^⑦、行程 3000 多华里的单独行军，在长征史上写

①②③④引自薛岳：《黔滇川南追剿》。

⑤1935 年 5 月 10 日云南《民国日报》。

⑥何长工：《难忘的岁月》，参见 1935 年 5 月 19 日云南《民国日报》。

⑦笔者考订，17 县为金沙、遵义、大方、毕节、纳雍、水城、盘县、富源、沾益、宣威、会泽、会东、宁南、普格、布拖、昭觉、西昌。

下了光辉的一页。

会合主力后，红9军团与川敌刘文辉部三个团激战泸沽梳妆台，将敌击溃^①；复北穿冕宁彝族区，进抵大渡河畔安顺场，与渡到对岸的红1师夹江北上；夺取泸定桥后，奉军委命令坚守泸定桥^②。罗炳辉在泸定桥即大病不能饮食，几乎死去^③。他以顽强的毅力，率部直插天全河上游，连夺两座铁索桥，进占紫石关。6月4日到紫石关当晚，罗炳辉病势愈重，呼吸困难。深夜，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联名给罗炳辉发来“万万火急”电报，命他不借任何牺牲，星夜夺取天全县城，以挽救危局^④。崇高的革命责任感，使罗炳辉从病床上撑起，立即率队出发，经激战，击溃守敌杨杰生部，5日中午攻入城内，冒着敌机轰炸，找船接渡红1、3军团先头部队，接着又猛击天全两个旅逃敌，直追过始阳镇到飞仙关的铁索桥。完成任务后，罗炳辉两眼一黑，昏倒在地，抢救三小时才苏醒^⑤。第三天深夜，周恩来要参谋接通了飞仙关电话，向罗炳辉表示亲切慰问^⑥。

红1方面军翻越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14日与红4方面军会师于懋功。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沙窝开会，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组为左、右两路军。红9军团被编入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改称红32军，罗炳辉任军长。接着，左右两路军分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穿越茫茫草地，8月下旬先后抵达阿坝和巴西地

①②沈果正等：《红军长征在四川的战斗历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何长工：《难忘的岁月》和笔者调查访问。

③④⑤罗炳辉1944年9月28日日记。

⑥何长工：《难忘的岁月》。

区。

9月，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央和右路军南下。中央决定率原属红1方面军的1、3军团继续北上。张国焘强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4军、30军南下，并于10月5日另立中央。在张国焘的错误指挥下，经“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百丈关战斗、“康（定）道（孚）炉（霍）战役”，与敌拚消耗，虽红军将士浴血苦战，处境仍越来越恶劣。在以上诸役中，罗炳辉率红32军，10月自大金以东攻崇化、懋功，激战七日，部队伤亡很大；10月24日沿大渡河南下，占金汤，克紫石关，11月10日再占天全；随即东向，迁回芦山；19日血战百丈关，战七昼夜，伤亡甚重；罗炳辉部渡青衣江，25日克荣经，继占汉源；终因强敌西犯，12月被迫撤出荣、汉地区。至此，张国焘南下路线失败显见。1936年2月，罗炳辉部掩护红军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西康东北部转移，3月跟进道孚、炉霍。在红32军于王家山击敌后主动撤退时，侦察排长黄金山被子弹击中，弹从后脑下部进，从下巴出，满头血污，战士们见他呼吸都没有了，就地挖坑掩埋。土已填平，罗炳辉率殿后部队从这里路过。他听战士们说黄金山牺牲了，头部穿了两个洞，不是“开花”，就命令：“扒出来，我看看。”这时，追敌已迫近，子弹呼啸着从头顶飞过。战士们劝罗炳辉赶快离开，罗炳辉流泪说：“黄金山是江西宁都人，多好的一个同志！只要有一线希望，我罗炳辉就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四川。”他蹲下身，解开黄金山鲜血流遍的胸衣，把耳朵贴到胸口上，听到还有微弱的心跳。他命令战士把黄金山扒出来，抬到后方抢救。

在场战士无不动容^①。

1936年5月，罗炳辉率红32军出道孚，经雅江南下，牵制敌李抱冰部，策应红2军团（贺龙、关向应部）、红6军团（肖克、王震部）北上。6月3日，与红6军团会师于理化以南甲洼寺。罗炳辉发动全军为6军团战友筹集粮食、牛羊，还赶制了御寒的毛衣毛袜。

7月1日，中共中央命令组建红2方面军，红32军列入第2方面军序列。8月，罗炳辉率部三过草地，进入甘肃南部，经腊子口、哈达铺，攻克成县，复经两当、凤县、天水至会宁。继1、4方面军10月10日会师于会宁之后，10月20日，1、2方面军会师于会宁城北将台堡，结束了伟大的长征。

长征结束后，罗炳辉部经环县之允城镇、庆阳，进至陕西三原之云阳，积极配合张学良、杨虎城对亲日派的斗争。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移驻富平之庄里镇和流曲地区。

1937年1月，罗炳辉进入红军大学第2大队学习。

（十）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把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②，属第2战区序列。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改编令，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罗炳辉部红32军编入120师359旅。

^① 笔者1980年2月24日在江西宁都访问黄金山笔录。黄老舌根被子弹打断，说话含糊，由钟连生翻译。

^② 同年9月11日改称第18集团军。

12月，罗炳辉任八路军副参谋长^①，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做军事统战工作，并和董必武共同负责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在中南地区的招生工作。他还以八路军代表的身分，出席各种会议、参加武汉各界民众的抗日救亡活动^②。

1938年元旦，由云南部队改编的第60军奉调抵达武昌，2月，调孝感、花园、武胜关一带整训。蒋介石竭力拉拢，向他们灌输“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三一主义”法西斯思想。罗炳辉遵照周恩来指示，以云南同乡和滇军故旧的身分，成功地进行了对卢汉军长、184师张冲师长和1081团团团长潘朔端及广大中下级军官的统一战线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③。这年2月间，罗炳辉曾赴信阳县邢集，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动员由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东进^④。

罗炳辉在60军的工作，使蒋介石十分不安。蒋介石特地召见卢汉，说：“听说共产党有人在你们部队活动，是真的吗？他们是有政治中心的，你看得无所谓，他们会把你的部队拉跑的，这很危险！以后要多加注意。”卢汉知道自己和罗炳辉的频繁来往，已经引起蒋介石的疑惧，就找张冲商量，改为隐蔽地与罗炳辉往来^⑤。4月，蒋介石变更了留60军守卫武汉

①此任职据罗炳辉1941年、1944年、1945年三次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及罗炳辉夫人张明秀的回忆。

②据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纪念馆提供的资料，参见笔者调查访问记录。

③卢汉1949年12月率部起义。张冲1946年去延安，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潘朔端1946年5月30日在辽阳海城率184师起义时，罗炳辉曾在山东临沂专电致贺。

④参见《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1985年11月）。

⑤引自卢汉：《第六十军血战台儿庄》，载《文史资料选辑》第90辑。

的决定，突然调60军去鲁南参加台儿庄会战。连陈诚都觉得为难。蒋介石的自私、专横和奸险，使60军将士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4月6日，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中取得了歼敌2万余人，全歼日军板垣师团和矶谷师团主力的重大胜利。7日，消息传到武汉，武汉三镇一片欢腾，几十万人上街游行。罗炳辉全副戎装，引导着“第八路军”大旗，行进在武汉街头^①。他以八路军代表身分，在祝捷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说：“今天虽然胜利，但我们要更加紧团结，而不能自骄。我们要把代表团的盛意，带到前线指战员中去与民众中去，让他们知道后方的力量是这样的雄厚，认识抗日必定胜利。这样，一定能增加他们的抗战力量和决心，更英勇地用热血和头颅来争取中国独立自由！”^②罗炳辉的慷慨演说，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5月19日，中国空军远征轰炸日本本土。轰炸队回武汉后，22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王明和八路军代表吴玉章、罗炳辉亲往慰问。蒋介石唯恐空军受共产党影响，派航委会总政训处主任蒋坚忍出面周旋：“远征的将士们很高兴见见中共的领导人 and 八路军的同志。可是因为半小时前接到了命令，有任务出去，不能来参与这茶会的盛况，非常抱歉，并委兄弟代致意兴与表示谢忱。”^③为了表示团结抗战的诚意，周恩来、王明代表中共中央赠锦旗，上绣“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吴玉章、罗炳辉代表八路军赠锦旗，上绣“气吞三岛，威震九州”^④。

①见1938年4月8日《新华日报》照片。

②1938年4月8日《新华日报》。

③④据1938年5月23日《新华日报》所刊报导及照片。

5月，世界学联代表团访问中国。25日，周恩来、王明、博古、吴玉章、罗炳辉举行茶会欢迎。罗炳辉欣然挥毫，为代表团题辞：“中国是只狮子，前曾睡着，现在怒吼了！日本军阀这只野兽是在走向灭亡。中国抗战得到全世界爱护真理、正义的一切人民的援助，全国一心一德在争取最后的胜利。自力更生，同时也力求外援，民族解放的光辉是在面前闪烁着！”^①

6月起，罗炳辉倾注全部精力忙于为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和陕北公学的招生工作，不分昼夜地接待追求真理的革命青年。一批又一批经过考察、谈话的革命青年，怀揣着有“董、罗”^②签姓的介绍信，奔赴延安^③。

7月8日，继蒋介石致祭抗战死难烈士之后，叶剑英、罗炳辉代表八路军前往致祭^④。

在由《新华日报》社发起的“三十万封慰劳信运动”中，8月19日，罗炳辉写了致前敌将士的信。在信中，罗炳辉热情赞颂了中国人民“头可断，身可杀，而志不可屈，国不可亡的民族精神”。他呼吁：“我们要真正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迅速完成军事工业，迅速训练技术精良的机械化部队，切实将日寇占领区域变成前线，把真正抗日的游击队大量发展起来，有计划的来配合我主力坚守支点，达到我主力大量的运动战来消灭敌人。”他激情满怀地写道：“亲爱的将士们！挺起胸来，尽量地杀敌吧！我们冲上前去，把敌人赶出国土之外！对呵，我们

①题词照片载1938年5月26日《新华日报》。

②董：董必武。

③笔者1979年4月22日访问张明秀记录，参见1938年6月《新华日报》。

④1938年7月9日《新华日报》。

把日军杀到鸭绿江边，用鸭绿江的水来清洗我战士们鏖战过的脸！啊！亲爱的前线杀敌将士们，愿你们珍重身体，努力杀敌！到取得胜利，重整山河的时候，我们大家来痛饮一杯民族解放自由万岁的酒①！”

在武汉的十个月中，罗炳辉或周旋于军政界上层人物中间，出席各种会议、集会和宴会；或奔走于武汉三镇，参加各民众团体的抗日救亡活动。他艰苦朴素，一身正气，总是着一身旧灰布军装，打着绑腿，穿着布鞋或布筋草鞋。罗炳辉的严谨作风，与国民党官场腐败形成鲜明对比。在一次军政界宴会上，一个国民党军官嘲弄地说：“堂堂红军军团长、八路军副参谋长，这么寒酸。”罗炳辉正色答道：“如今国难当头，沦陷区父老水深火热，前敌将士缺衣少饷，我罗炳辉这一身够阔气了。我们共产党人可不兴吞兵饷、喝兵血哟！”说得那个军官面红耳赤②。

在八路军办事处接待来访的青年学生时，罗炳辉总是和蔼可亲，诙谐幽默，深入浅出地讲述革命道理，使青年们听得入了迷。有一个东北籍的国民党军青年军官，穿着便衣多次来听讲，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民族的希望所在，他找罗炳辉讲明自己身分，恳求批准他到延安去。罗炳辉考虑到与友军的统战关系，没有同意，这个军官哭诉了国民党军队的黑暗。他说：“我来听先生讲话已是多次了，我决定舍命跟共产党走。”他赖在办事处，不肯离开。结果罗炳辉和董必武商量，破例批准他去了延安③。到办事处来的也有的是国民党特务。

①1938年8月27日《新华日报》。

②③笔者1979年4月22日访问张明秀记录。

对特务的挑衅，罗炳辉坚决予以反击，笑容可掬的“罗汉”，又成了令特务畏惧的“煞神”。

在武汉期间，罗炳辉抓紧一切空闲时间，大量阅读政治理论、军事理论书籍。他虽然读过三年私塾，但因教法陈腐和土霸儿子每日捣乱，“认不得搬家的字”^①。参加革命后才学了一些文化。他在办事处几乎手不释卷。遇到疑难，他就去请教住在隔壁的董必武。董老也乐于跟他研讨。武汉的夏天，闷热犹如火炉，罗炳辉每夜光着上身坐在房间地板上刻苦攻读，身下汪着一片汗水^②。他在一幅题辞中写道：“学习再学习，每日均要抽出时间来看书，如果不继续发愤努力，马上就会成为落后者。”^③

罗炳辉的爱人张明秀，四川省昭化县（今属广元县）人，1934年秋带着13岁的小妹妹明莲从地主家庭出走，参加红军。长征中，张明莲在过草地时牺牲，年仅15岁。张明秀1937年9月在延安和罗炳辉结婚，1938年2月从抗大第3期提前毕业，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任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兼长江局机要收发。9月13日晚，周恩来获悉国民党当局要于拂晓前在武汉清查户口，情况紧，时间急，办事处通讯人员又全部出外执行任务，便在征得罗炳辉同意后，派张明秀连夜通知中共湖北省委和有关机关：“一，能烧的党内文件、通知、信件，一律烧掉；不能焚烧的，立即送办事处保存。二，外地来的同志，能返回的，立即返回；不能返回的，搬到办事处来住。”

①罗炳辉《自传》。

②笔者1979年4月22日访问张明秀记录。

③罗炳辉题辞手迹。

张明秀在武汉三镇跑了一夜，拂晓前完成任务返回办事处，见周恩来彻夜未睡，在坐等她平安归来，十分感动^①。

罗炳辉和前妻杨厚珍生的一个女儿，长征前秘密寄养在南昌一岳姓行伍挚友家中，改名岳冰玉。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安排下，党组织在南昌找到岳家，把小冰玉接到武汉。罗炳辉对女儿说：“你受了不少苦，还要准备在一生中压倒大风大浪，爸爸给你取名：罗镇涛。”在罗炳辉撤离武汉时，决定把女儿托黄洛峰带到重庆去，并赠黄洛峰一支手枪，说：“如果万一遇到鬼子，你就把她打死，无论如何不能落在鬼子手里。”周恩来闻讯后，认为黄洛峰年轻，不会带孩子，就亲自出面把小镇涛托付给云南巨商李岳崧，还亲自办酒席酬谢李^②。

9月底，罗炳辉去延安列席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第1支队副司令员^③。

(十一)

1938年12月，罗炳辉和张明秀，偕姬鹏飞、王雨田，乘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出的卡车南下，经豫、鄂、湘、赣，月底经景德镇抵达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④。

1939年1月，罗炳辉抵达江苏省南部茅山地区，与第1支

①据笔者1979年4月22日访问张明秀记录，参见1938年9月14日《新华日报》。

②笔者1981年11月19日访问罗镇涛记录。

③罗炳辉《干部履历表》。

④罗炳辉1941年5月25日题辞，1939年元旦项英和罗炳辉等在云岭合影的照片。

队司令员陈毅会合。

第1支队1938年5月在皖南奉命东进，6月14日到达茅山^①，经韦岗、新丰、句容、珥陵、高淳、仓头诸次战斗，初创了局面^②。茅山地区，地处京、沪、杭三角地带，城镇集中，交通发达，敌人据点如蜂巢密布。加上敌人以公路线把该地区分割成棋盘式小块，新四军第1支队与日、伪军肩背纠缠^③。而且，名为“抗日”、实为扰民的各种旗号、各种名堂的武装蜂拥而起，国民党溃退时丢下的枪枝弹药大量散失于民间，土匪如毛^④，斗争形势十分复杂。

罗炳辉抵达茅山之时，日本侵略者已经基本学会了新四军的游击战法和夜战战法，并且采取“攻防并用”的战术，密筑碉堡以填满空隙地带，企图聚歼新四军，或者迫使新四军退出京、镇地区^⑤。新四军处境极其不利，1支队被迫南移。

陈毅和罗炳辉经过仔细斟酌、周密谋划，决心粉碎日军的企图，把茅山地区变成近逼南京、镇江，北控京沪铁路的稳固的游击根据地。这两位红军时代的老战友，配合默契，成功地指挥了2月7日东湾战斗、14日延陵战斗和3月20日后对淳化、高资等地的袭击，皆予敌重创，摧毁了日、伪军一批据点，逼迫日军由攻势转入守势。日军这才明白小据点易被新四军消灭，不得不变更战略，放弃延陵、茅麓、丁庄、导墅桥等

①②⑤陈毅：《茅山一年》，（1939年6月21日），载《群众周刊》1939年第3卷第22期。

③参见陈毅：《论茅山战局》（1939年元旦），载《时论丛刊》1939年第3辑。

④参见陈毅：《坚持江南抗战的诸问题》，载《抗敌》杂志创刊号，1939年4月15日。

据点，向铁路和公路交通线上收缩。茅山战局，大为改观^①。

罗炳辉在苏南期间，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于2月23日至3月14日到新四军云岭军部视察工作，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根据这一方针，陈毅、罗炳辉以第2团主力和丹阳游击纵队向北挺进，至4月，控制了扬中和江北大桥地区，为新四军向苏北发展创造了条件。

4月，罗炳辉奉调返回云岭军部。

(十二)

1939年5月3日，罗炳辉随叶挺军长北渡长江，进抵庐江县东汤池。5月5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6月“反高（敬亭）斗争”^②结束后，原第4支队整编为第4、第5两个支队。

7月1日，第5支队在定远县藕塘地区正式成立，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治委员，周骏鸣任副司令员，赵启民任参谋长，方毅任政治部主任（后由张劲夫继任）。经一个月的紧张训练，于8月越过津浦铁路，向东挺进。

津浦路东的扬州、仪征、天长、高邮、盱眙、嘉山、来安、六合等八县市，地处苏皖边境，北依淮河，南控长江，东濒运河、高宝湖，西扼津浦铁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经济上，西北山区资源丰富，东南平原向称膏腴；军事上，有山峦之险可守，有河湖之隔可据，有丘陵可作周旋，有港汊可资隐

①陈毅：《茅山一年》（1939年6月21日）。

②高敬亭，1938年1月任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1939年6月24日在安徽省肥东县青龙厂被错误枪杀。1977年4月22日平反。

蔽，具备了创建根据地的良好的客观条件。自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本侵略者迅速渡长江北上，至1938年2月，该地区全部沦入敌手。日寇肆虐，汉奸猖獗，土匪蜂起，地主武装一哄而起，残害群众，人民生活痛苦万状。

早在1939年5月，中共苏皖省委就派遣方毅、朱绍清等组成津浦路东临时前委，率领由8团2营扩编的挺进纵队和第4支队战地服务团，进入津浦路东，开展战略侦察和发动群众。方毅、朱绍清分别到天长县铜城和汭涧向国民党县长和军官进行统战工作。8月，罗炳辉率5支队进入路东后，以15团守备六合县竹镇，以10团开辟盱眙、嘉山，以8团1、3营在来安活动，以8团2营直插扬州附近^①，在广大的区域里，勇猛穿插，打击日伪，宣传党的主张，发动民众抗日。

罗炳辉部进军路东，使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为不安，那些畏日寇如虎、却坚决反共的国民党政府流亡县长们，勾结反动乡、保长，多方掣肘，到处造谣：“新四军不是真抗日，是来抢地盘”，“罗炳辉这样胖，是因为每天要吃两个小孩”。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慌乱，群众莫辨真假。驻滁县日军为防范罗炳辉部进袭津浦铁路，乘5支队立足未稳，分兵侵占来安城。

面对这种复杂纷乱局势，罗炳辉决心攻打来安城，以实际行动粉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无耻谰言，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以激励皖东人民的抗日热情。9月3日，罗炳辉部署和指挥了一打来安城，经三昼夜激战，毙敌百余名，9月5日收复来安。这一仗，使新四军军威大振，受到皖东人民的热烈拥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军司令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七四师抗战史料》。

护。至10月，打开了路东局面，开辟了以来安县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

11月21日，日军以重兵再占来安城。罗炳辉指挥二打来安。他巧妙地避开敌人伏兵，派小部队乘黑夜拆城墙入城，然后内外夹攻。日军不支，在付出了伤亡200余名的惨重代价后，狼狈逃回滁县。5支队23日再次收归来安，万众欢腾。罗炳辉在群众大会上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一天要吃两个小孩，我到此三个月，该吃掉一百七十八了，请问哪位乡亲家丢了孩子？”此后，罗炳辉以喜欢孩子出了名。每到一地，他的肩上、背上、怀里都扒满了儿童。根据地人民称他为“福将”。他的爱子1943年12月25日在来安境内大刘郢出生时，他以“新四军时期生于来安”之意，为儿子取名“新安”。

11月，中共中央作出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同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等抵定远，传达中央指示，提出“东进，东进，再东进”的口号。同月，陶勇率苏皖支队由扬中渡长江北上。1940年1月，5支队一部与苏皖支队会合于六合县竹镇。至此，路东地区，除日寇占扬州和除盱眙外的六座县城，并在天长至来安一线以南遍布据点；国民党韩德勤部独立6旅和秦庆霖部占盱眙，控制天长、来安以北地区外，罗炳辉率5支队纵横穿插在广大农村，如蛟龙入海，应付裕如，连战皆捷。在苏皖支队配合下，5支队于1月中旬连续击溃了六合日伪军向西、西北的两次“扫荡”，一举攻克了天（长）扬（州）公路上秦栏镇敌据点，伏击了由天长向南出动的日伪军；1月29日，在天长、六合边境的横山反击日伪军的合击，毙伤日军100余人、伪军200余人，俘获日军2人。战后，罗炳辉隔着布帷，听取了对日俘的审问。

进入路东仅五个月，5支队便由3000人增加至5000余人，三个团扩大为四个团。10团由4个连发展到11个连^①；根据地建设初具规模。罗炳辉那魁伟的身材、威严的军人风度、神奇的枪法、带有浓郁传奇色彩的经历和爱民、爱兵的感人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群众说他是“下凡拯救百姓的天兵天将”，是“罗青天”。

第一次反共高潮掀起后，2月，华中国民党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共军事进攻。蒋介石企图把新四军第4、第5支队赶出皖东。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西线，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以桂系军队138、171师越过淮南铁路东逼，其先头部队配合据守全椒县古河镇的李本一第10游击纵队和据守定远的颜仁毅第12游击纵队，围攻新四军驻合肥青龙厂和定远县藕塘的第4支队，进逼驻定远县大桥地区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东线，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调集117师、独立6旅、江苏省常备第10旅和各县常备队，准备进攻来安县半塔新四军第5支队。这一东西夹击的形势，严重地威胁着皖东新四军的生存和发展。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坚决自卫，集中主力先反击桂顽，后反击韩顽。3月4日，津浦路西反摩擦战役打响。是日，4支队袭取定远城，迫使倾巢南犯的颜仁毅部回援，6日高塘铺一战，将其歼灭大部，颜逃寿县。10日，再战松树刘，击溃正在吃饭的敌军^②。但路西局势，仍未缓解。罗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军司令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七四师抗战史料》。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军司令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七四师抗战史料》；新四军第2师司令部编：《新四军第二师战斗详报汇集》（1939—1942年）。

炳辉率领的第5支队主力（8团、新8团、10团一个营、15团两个营）于7日从来安县屯仓出发西援，9日在李山头越过津浦铁路，11日夜强攻滁县施集^①，全歼顽敌，使敌全线震撼。接着，5支队一鼓作气，向西横扫。顽敌见大势已去，望风披靡。12日，罗炳辉率部与第4支队、苏皖支队协同作战，在大桥地区重创顽敌，并乘胜取定远。13日，罗炳辉在史家围子与刘少奇、张云逸会合^②。路西反顽大捷，共歼敌2000余人。为争取桂系，新四军乘胜收兵，提议和谈^③。

正当新四军在路西作战时，韩德勤乘路东空虚，驱117师、独立第6旅、秦庆霖常备旅共十个团1万余人，由汭涧、马集、东王庙、盱眙、马坝等地，向半塔进犯。新四军留守半塔的仅有5支队后方机关、教导队和两个连的兵力，共1000余人。敌我兵力，十倍悬殊。经七昼夜激战，半塔守军守住了阵地，但形势仍十分危急。罗炳辉急速挥戈东指，率5支队、苏皖支队、4支队第7团，星夜兼程东援，27日再越津浦铁路，前锋进抵来安县张山集。同日，由苏中赶来的挺进纵队在叶飞率领下，进至六合县马集，歼顽独立6旅一个营，击敌侧背。韩德勤见新四军东、西援军驰至，恐遭覆灭，于28日晚下令后撤^④。

29日，新四军分四路追击。罗炳辉率5支队8团、新8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军司令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七四师抗战史料》；新四军第2师司令部编：《新四军第二师战斗详报汇集》（1939—1942年）。

②罗炳辉1944年8月30日日记。

③新四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室编：《新四军抗日战争史》（1963年12月）。

④《新四军抗日战争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七四师抗战史料》。

团、特务营和陶勇率苏皖支队为中路，直插王店、莲塘、张公铺。在莲塘至岗村一线与掩护半塔后撤之敌——顽军常备第10旅仓猝相遇^①。敌众我寡，不能强攻，罗炳辉巧用疑兵，派司令部六名通讯员在马尾巴上捆上树枝，于树林中纵马疾驰，拖得烟尘滚滚。敌见新四军骑兵“大部队”从天而降，四散惊逃^②。罗炳辉挥师猛追，直抵三河，4月9日在马坝歼敌千余人。至此，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在皖东战场的军事进攻。

4月上旬，刘少奇率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移驻皖东半塔地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蓬勃开展。至6月，来安、嘉山、天长、盱眙、六合、高邮、宝应、仪征、定远、滁县、凤阳、全椒、定（远）合（肥）等县抗日民主政府先后成立，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委派了各县县长，并成立了区、乡一级政府^③。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制订了减租减息、惩治汉奸、组织农会、组织各级人民抗日自卫队等规章草案，公布了财政、贸易、征收公粮等法令，发动优秀青年参军。

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迅猛发展，使日本侵略者和3月29日在南京粉墨登场的汪精卫汉奸政府极为不安。5月下旬，津浦铁路沿线和淮河沿岸的日伪军，开始“扫荡”皖东。5月27日，日伪军2000余人由滁县出犯，再次占领来安县城。罗炳辉总结了前两次打来安的经验，对三打来安城作了周密的部署：以8团1营自北门，2营自东门，10团1营自城南，三面

①《新四军第二师战斗详报汇集》。

②笔者1982年6至7月在青岛访问周骏鸣、赵启民、周原冰记录。

③参见蚌埠专区档案资料馆：《淮南地区抗日战争史》（1959年5月8日）。

围攻；以8团3营及特务连在西门埋伏和准备打援。30日午夜1时，8团1营秘密从城东北角下水道潜入城内。罗炳辉下令发动总攻，迅速突入城内。日伪军据高屋和据点顽抗。罗炳辉下令火攻，战士们在炸药包中多放硫磺，使之易燃，还将这种炸药装进竹筒，外包浸泡了桐油的破布、稻草，引燃后投入敌阵。一时间，来安城里，火光烛天，日本侵略者在熊熊大火中被烧得狼奔豕突。巷战达两小时，歼敌200余人。天亮时，罗炳辉下令撤出战斗。这就是著名的“火烧来安城”^①。

31日上午，滁县日军以七辆汽车增兵来安，闭门不出，入夜以鸣枪炮壮胆。罗炳辉却乘敌不备，分兵多路，夜袭滁县城、乌衣镇、担子街、沙河集、张八岭、嘉山集一线敌伪据点，百里铁路沿线，彻夜枪炮声不断，火光绵延几十华里，声势十分浩大，新四军军威大振^②。

6月初，桂顽乘日军“扫荡”之机，进犯古城、青龙厂，企图占据津浦路西。李品仙特从大别山区调138师来参加摩擦。罗炳辉派出5支队主力西援，和4支队并肩作战，会战古城。此役因协同不好，各团单独作战，致敌我双方伤亡俱重，未能歼敌，仅将敌赶走^③。从此，津浦路西进入顽、我拉锯作战的胶着状态。

路西刚趋平静，韩德勤又在路东唆使天长县大通镇、来安县屯仓、盱眙县马坝等地反动地主举行武装暴乱，并派出两团兵力偷渡三河以为策应。刘少奇、罗炳辉指挥部队，首先击溃

①②《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七四师抗战史料》。

③《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七四师抗战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61师司令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一师军史》（1978年1月）。

了顽军两个团，继而迅速扑灭了地主反革命暴乱，清理了基层组织，纯洁了内部^①。

7月上旬，新四军第4、5支队分别召开党代会，提出了“党军化”、“正规化”、“群众化”的口号和发展地方武装的要求。会后，各部队进入了紧张的军、政训练，补充了新兵6000余名。至8月底，皖东脱产的县、区武装达9000余人；不脱产的人民自卫军发展到近10万人。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更加巩固^②。

(十三)

为了彻底粉碎韩德勤、李品仙东西夹击4、5支队，进而摧毁皖东根据地的罪恶计划，并配合新四军进军苏北黄桥，第5支队决定北出三河，开辟淮宝地区。

淮宝地区位于苏皖边境，西临茫茫洪泽湖，东至千里古运河，北倚苏北重镇淮阴，南控淮河入江水道的三河，境内水网密布、芦苇丛生、物产丰富，素有“苏北粮仓”之誉。时为韩德勤部第33师和秦庆霖常备旅盘踞。淮宝地区的封建迷信兼自卫组织小刀会，有十数万之众，散则为农，聚则成军，在当地势力极大。韩德勤用收买手段，控制了小刀会，广为散布“共产党共产共妻”、“罗炳辉生吃小孩”等谣言，煽动小刀会群众仇恨共产党、仇恨新四军的情绪。这样，小刀会就由原来的封建性自卫组织，蜕变成封建的反革命武装，也成了韩德勤手中的一张王牌。

^{①②} 《新四军抗日战争史》。

7月下旬，罗炳辉率主力集结于黎城（今江苏省金湖县城），开展战前大练兵。8月1日，罗炳辉主持了阅兵典礼。8月2日夜，宽阔的三河上夜雾迷漫，北岸守河刀会不时吹起凄厉的牛角号。罗炳辉指挥8团、10团强渡三河。10团以三艘钢板划子^①和三艘双篷大船，一举抢渡成功。8团渡河后夺取衡阳滩，为顽敌火力所阻，战至拂晓才将敌击溃，全团渡过河去。在金沟、银集向东警戒的7团亦随后渡河。3日，占领新集。

3日正午，小刀会集数千之众，在吞服了“神咒”、“佛沙”等麻醉品后，袒胸露腹，斜挎黄色符带，挥舞大刀、长矛，呐喊着“老祖保佑！刀枪不入！”冲向新集。罗炳辉不忍心伤害这些上当受骗的群众，命令发动政治攻势，喊话劝其返回。谁知刀会象鬼迷心窍一样，嗷嗷叫着“老祖保佑！刀枪不入！”冲将过来，杀伤新四军战士多人。罗炳辉不得已下令射击，“刀枪不入”的亡命之徒当场伤亡数十，其余会众纷纷后逃。气愤的机枪射手还要扫射，罗炳辉用身体挡着枪口，厉声喝令：“不准伤害受骗的群众！”

罗炳辉针对该地区水网交叉、地形复杂、刀会人多势众的特点，把部队收缩在新集、高集、仁和集，构筑工事。罗炳辉派人送信给刀会首领，晓以大义，但没有结果。八路军5纵队1支队先头部队开进淮宝，在高良涧附近大堤上露宿时，深夜被小刀会摸掉岗哨，被砍杀牺牲几十人。消息传来，战士们气愤难平。

6日上午，数千刀会再犯新集。他们拍着胸脯，狂叫着“打不死！打不死！刀枪不入！”罗炳辉下令射击，刀会又留

^①在船头垒起沙包、挂上防弹钢板的木船。

下几十具尸体。部分群众刚刚有一点醒悟，刀会头目又欺骗说：“新四军里，既有‘活佛’（刘少奇化名胡服的谐音），又有‘罗汉’（指罗炳辉），我们的神咒才一时失灵的。”刀会气焰，仍极嚣张。韩德勤则在一旁坐山观虎斗，准备坐收渔人之利。

罗炳辉见刀会执迷不悟，恶战在所难免，便决心使用武力平复刀会。他指挥了痛击韩德勤部 33 师和秦庆霖残部，又指挥了 14 日战南甸，16 日战双沟、万集、仁和镇，21 日战马棚庄，22 日战大楚庄，23 日战黄集，28 日战龙王庙，用血的事实，彻底粉碎了“刀枪不入”的鬼话，同时又广泛展开宣传攻势，迅速地瓦解和平息了刀会骚乱，胜利地与黄克诚会师于岔河^①。

在岔河，罗炳辉召开了万人大会，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发动群众抗日。开会前，罗炳辉命令把一个血债累累、十恶不赦的刀会头目押到会场。罗炳辉说：“你不是欺骗群众说刀枪不入吗？今天我们来试一试，果真打不死你，我们新四军就拜你为师。”这个家伙傲慢地说：“好吧。”就装神弄鬼地练起了“神功”，说：“开枪吧！”结果只一枪就把他击毙了。刀会群众这才恍然大悟。为了抚慰受骗送死的刀会家属，罗炳辉下令：准许收尸；确有生活困难的，给予救济；受伤的，帮其治疗；对刀会家属不得歧视；军中禁止传唱战士自编的挖苦刀会的歌谣。广大人民群众齐称新四军是“王者之师”，拥军热潮迅速掀起。

在罗炳辉的关怀下，很快就组建了中共淮宝县委，召开了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七四师抗战史料》。

县参议会，成立了县联防办事处、独立团和区级政权。中共领导的各界抗日民众团体，纷纷成立。淮宝的开辟，把淮北、淮南、淮海、苏中、盐阜等几块抗日民主根据地联系在一起，使华中战局，为之改观。罗炳辉战后曾著《淮泗半月记》一书，铅印发行，今佚。

日本侵略者为消除肘腋之患，保障伪都南京和津浦铁路的安全，经过长期准备和周密策划，乘罗炳辉率主力北出淮宝、后方空虚之机，向津浦路东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

8月下旬，天长、六合等据点开始封锁消息，禁止商人往来；各伪组织、绥靖队紧张备战；日军网罗了皖东的大批汉奸、土匪、叛徒、逃亡地主作其耳目；日伪还昼夜赶印了大批反动宣传品。8月27日，天长、来安、六合等据点开始增兵。同日，日本侵略者从苏州、武进、南京、镇江等地抽调了熊谷师团、岩松师团、铃木部队和伪江浙皖绥靖司令任援道部一部，共万余人，向皖东合围。9月5日，日伪军以来安、六合、天长、高邮、明光、五河、张八岭共七个据点为依托，分兵七路，向津浦路东地区猛攻。

罗炳辉在淮宝地区闻报后，留张劲夫率第10团巩固淮宝，亲带主力急速南下。日军发现了罗炳辉的意图，9日，出动飞机轰炸正在渡三河南下的新四军，未能遏止。罗炳辉部返回皖东。

日伪军七路进军后，南线，沿六（合）马（集）公路北犯，与新四军交战于马鞍山，6日晨陷竹镇；西南，日伪军一部带军犬40条，迂回雷官，进抵竹镇；两路合股后向半塔进犯。东线，日伪军出天长后分两路，经十八集、石梁、新街，进犯汉涧，6日拂晓与江北军政干校1队激战整日，形成对

時；黃昏向半塔進犯，與江北軍政干校增援部隊混戰一夜。六合日偽軍向汜澗增援，7日與新四軍在釜山激戰整日。6日，敵陷半塔、大田鄆。北線，五河之敵占雙溝後，向自來橋進犯。西線，來安之敵先隱蔽集結於舜山集，6日經屯倉，進占自來橋。至此，日寇基本順利地實現了第一期戰略部署。

從9月6日起，日本侵略軍在數十架飛機的配合下，以十幾路，在根據地內往返穿梭，縱橫“掃蕩”，尋找新四軍主力決戰。日偽軍高度機動，各路相距只20華里左右，只要其中一路發現新四軍，就立即各路合圍，造成決戰態勢。高郵湖上，則有30多艘汽艇游弋，向蘇中陳毅部戒備。日軍的謀劃，不可謂不嚴密、周詳。然而，在人民戰爭和游擊專家羅炳輝的面前，日偽軍卻處處撲空，連新四軍的影子都找不到。

在根據地人民的支持下，羅炳輝率主力，時分時合，時伏時動，迂回穿據，巧妙周旋，有時幾乎是與日偽軍並肩而行，而敵全然不覺。

羅炳輝命令部隊發動群眾，嚴懲漢奸，以堵塞敵人耳目；堅壁清野，以製造敵軍困難；小部出擊，以主力猛擊其側後；速戰速退，以避開敵人合圍；時而奔襲，時而隱伏；共作戰65次，斃敵600餘人。日本侵略者勞師輾轉，處處挨打，結果，由日軍軍事專家們苦心設計的“掃蕩”計劃，只得告吹。預定一個月的“掃蕩”，只撐了12天，便匆匆收場。根據地人民經受了殘酷戰爭的嚴峻考驗和鍛煉。日軍在汜澗虐殺持鴉片煙歡迎他們的順民^①，使人民更加認識了日軍的殘暴和滅絕人性，更堅定了抗戰到底的決心。

^①筆者在汜澗的調查。

9月，罗炳辉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4、第5支队司令员。

10月中旬，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0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发出《对华中部队行动方针指示》，指示皖东部队应加速部署向西防御，坚持皖东根据地。10月，桂顽越淮南铁路东犯，连占大马厂、复兴集、周家岗。4、5支队坚决反击，经11月11日激战界牌集、陈集、王山头，守住了皖东根据地的西方门户。

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斗争中发展。12月，路东开展扩军运动，主力部队扩大了1900多人，地方武装扩大了1500人。到1940年年底，仅津浦路东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商抗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就拥有会员17万多人。

(十四)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17日，蒋介石悍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同日，新四军将领通电全国，愤怒声讨亲日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20日，中共中央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28日，新的军部在盐城成立，全军共9万余人^①。由第4、第5两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及地方武装组建的第2师，有2.5万人^②，由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兼师长，罗炳辉任副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周骏鸣任参谋长，郭述申和张劲夫分任政

^①此数字据《新四军抗日战争史》。

^②此数字据笔者访问原二师参谋长周骏鸣记录，参见《新四军各师组织概况》（新四军军部1941年6月对中央的报告）。

治部正副主任。第2师下辖第4、第5、第6旅、独立旅兼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师部驻盱眙县黄花塘。在整编的同时，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向2师布置的任务是：巩固津浦路东，坚持津浦路西，加强向西防御，准备随时粉碎反共军的进攻。3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向2师提出了独立坚持津浦路东、西抗日根据地的各项任务。

3月18日至25日，2师经凤阳山、朱家湾、瓦屋刘战斗，粉碎了日伪军3000余人对津浦路西的“扫荡”。路东各部在莲塘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练兵，使部队素质、战术水平、战斗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此时，日本侵略军积极南进，从华中调走几个师团，失去了举行大规模“扫荡”的能力，变而采取了以各据点为“点”，逐步以公路连成“线”的战略措施，企图达到扩大伪化区、提食根据地的目的。为粉碎日军阴谋，罗炳辉指挥了“天（长）仪（征）扬（州）地区反点线连续作战”，在广阔的区域里同时出击，曾经4月10日至11日初战谢家集；14日起袭扰天长城，破坏天（长）芦（龙）公路，激战芦龙，夜袭谢家集、陈家集、刘家集、铁牌店、蚂蚁山，伏敌于十二里岔；17日大战金牛山，皆大获全胜^①。特别是在金牛山战斗中，罗炳辉初试了他创造的“梅花桩点式纠缠战术”，打得日本侵略者首尾不能相顾，晕头转向。战后，新四军文艺战士许平填词、黄灿谱曲的《金牛山上打胜仗》在皖东迅速传唱开了：“新四军，真正强，抗战建国的好榜样，金牛山上又打了大胜仗，布下了天罗

^① 《新四军第二师战斗详报汇集》。

和地网，杀得鬼子汉奸没处藏。杀伤他四五百，活捉他几十双，胜利品也挑他几十筐。扬州的鬼子泪汪汪，汪精卫也大着慌。全国的军队要是都这样，准叫敌人个个滚进鸭绿江！”^①

反“点”“线”作战的胜利，极大地震动和刺激了日本侵略军。5月下旬，日伪军5000余人“扫荡”津浦路东，以为报复。5月28日，敌军第11师团的步、骑、炮兵和伪军2000余人，四路合击驻来安的第4旅第11团，经两日激战，打退了敌之进攻，毙伤日伪军300余人。6月3日，4旅10团在车棚抗敌，毙伤其50余人。日军在受创后，退回各据点，从此再也不敢“扫荡”路东了。路东根据地成为华中最为稳固的根据地。5月6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地方党问题》的报告中，热情洋溢地说：“皖东，特别路东根据地的工作，与华中其他根据地的工作比较，是最好的，最正规的！”1941年度，2师被评为新四军的“全军建军模范”^②。

此后，罗炳辉威名远播，成为华中家喻户晓的抗日名将；使日、伪、顽闻风丧胆。他或运筹于帷幄之中，或奔驰于各战场之间，或亲临于火线之上，经6月谢家圩子战斗；7月宝应县林家码头伏击战；8月攻击泗阳城；10月配合3师会攻陈道口；11月津浦路西反顽，战大桥，战新张家，战赫郎庙；12月开辟江全，建立2、7师五条秘密交通线；1942年1月定（远）凤（阳）怀（远）地区反“扫荡”；4月战高庄，战杞

① 《建军五十周年歌曲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9月版。

② 《一九四一年新四军作战概略总结》（新四军军部1941年年终对中央军委的作战总结报告）。

岗；7月破袭铁路交通线；9月淮泗反“扫荡”；10月战藕塘，反击桂系顽军；11月到12月津浦路西反“扫荡”；1943年3月分兵北上配合4师反顽；6月攻克谢家集，收复扬州、仪征20余乡；8月攻击日军61师团于八百桥、雷官，血战六合桂子山等役，2师都打出了威风。

因为淮南根据地在华中最为稳固，1943年初，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从苏北迁到2师师部所在地黄花塘，直到抗战胜利。军部到达后，2师师部移驻来安县大刘郢。

1943年2月，淮南根据地精简机构，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由第2师兼淮南军区。罗炳辉任2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

自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中共为了争取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加强团结，作了多方努力。1942年12月，日军进攻大别山李品仙部和豫南汤恩伯部，新四军主动声援：2师罗炳辉部和7师傅秋涛部在淮南铁路两侧及巢湖、桐城之线击敌之后路；5师李先念部在黄冈、黄梅及平汉铁路线上发动游击战和破击战，以为支援；在国民党军和新四军的夹攻下，日军虽连占英山、潢川、罗山、商城、固始、立煌（金寨）等地，但不能支撑，只20余日便被迫撤退^①。1943年2月，日军围攻韩德勤部，新四军以民族大义为重，不念旧恶。1师粟裕部、2师罗炳辉部、3师黄克诚部、4师彭雪枫部都主动击敌以援，罗炳辉部以奇袭攻入淮阴城，使日军全线震撼^②。但是，蒋介石却于1943年5月，调黄河河防大军闪击陕甘宁边区，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淮南，则有李品仙以172师的两个团

^{①②}陈毅：《新四军在华中》，1943年7月7日《盐阜大众》。

“清剿”寿县地区；以桂系主力8月起犯津浦路西根据地，9月17日抢占路西门户界牌集。

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淮南地区的军事进攻，罗炳辉亲率野战司令部赴路西指挥自卫。战前，罗炳辉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指导军训，以村落攻击、野战出击的战术教育为主，以技术教育为辅，加强全军的学习和研究，以掌握桂顽的作战特点。10月27日，罗炳辉以14团的两个营，一举拔除定远外围陈圩子据点，全歼顽化伪军徐郁堂部200多人，扭转了路西局面，掌握了战争主动权。

10月29日、30日，桂顽主力171师以猛烈的进攻，犯五尖山阵地。罗炳辉亲临火线指挥，命令示敌以守、示敌以弱，教育指战员要“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吸引顽军主力。桂顽在国民党军队中，向以能征善战著称，山地战尤为擅长。顽军见五尖山阵地枪声稀落，愈加猖狂，轮番发起猛冲。罗炳辉命令不要打急了，以守住阵地为度，尽可能多地射杀敌人。指挥所里，罗炳辉手举望远镜，站在观察口，一个多小时不言、不动。他敏锐地察觉到顽军在一次次强攻中已锋芒锐减。当他看到敌人后方有人开始运伤员时，便炸雷似地大喝一声：“敌人要跑！”遂下令总反攻。桂顽做梦也想不到新四军有这样多的兵力和这样猛烈的火器配置。结果，桂顽全线溃逃，死伤无数。罗炳辉命令全线追击，除打垮桂顽主力外，11月3日重创陶庄王华锦部，11月下旬重创谢家圩子牛登峰部，给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以沉重打击。此役后，桂顽一年多不敢进犯。在桂顽军中，称五尖山一带是攻不破的“罗炳辉防线”^①。

^①笔者1979年11月访问魏尚友、陈慕诚、尤希林笔录，参见军史资料。

其实，“罗炳辉防线”又岂止五尖山一处！在此之后的1944年11月占鸡岗战斗，1945年4月黄疃庙战斗，7月白龙厂、林家庙战斗中，桂顽的每一次反共军事进攻，都在2师兼淮南军区军民联防的铜墙铁壁前撞得粉碎。

（十五）

千百次征战和顽强的学习，把罗炳辉锤炼成了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

罗炳辉治军极严。他常说：“战场乃立尸之地。平时宽容，战时就要付出血的代价。”2师组建之初，罗炳辉就发动了大规模的练兵运动。他提出：“只有平时多流汗，才能战时少流血”、“有三发子弹，就要拿出一发来打靶”、“要练得胳膊上立得起人，练得眼珠子淌汗（指累得流泪）”。根据在淮南地区作战的特点，罗炳辉制订了一整套练兵方法。野外操练，他设置了五大障碍：独木桥、短墙、铁丝网、水沟、壕堑。演练时，罗炳辉拎着一袋碎泥块，站在障碍边，干部战士在障碍前稍一犹豫，稍一胆怯，罗炳辉就把小泥块砸到他身上，说：“你被子弹打中了！”“你挂花了！快隐蔽！”“敌人机枪扫过来了，你怎么办？”“勇者生，怯者死！”练习得十分逼真。罗炳辉和战士们一起演练，摸爬滚打，亲做示范。新战士惊异地发现：罗师长虽然身躯胖大，但却动作矫健，疾步如飞。在个人技术上，罗炳辉要求每一个指战员必须熟练掌握五大技术：射击、投弹、拚刺、劈刀、土工作业。练劈刀，不但要掌握传统武术的基本套路，还要勇猛有力，劈出风声，一刀下去，能把十枚叠成一堆的铜板齐刷刷劈成两半。有一

次，他要战士们到根据地边缘地带群众大会上表演劈刀，只听得一阵铮铮响亮，半截铜板漫天飞舞。罗炳辉笑着问道：“乡亲们，是铜板硬呢，还是日本鬼子的脑壳硬？”答案不言而喻，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罗炳辉的大刀队在战场上杀出了威风。有一次，一队日本兵窜犯根据地，推进到新四军阵地前，抬头一看，阵地上不见一个人影，只见齐刷刷倒插着一排大刀，足有百十把，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只听见刀柄上拴的红布在大风中哗哗地飘，日本侵略军吓得魂飞魄散，扭头就逃。

罗炳辉是位著名的神枪手。百米之外打鸡蛋，四五十米打麻雀，百发百中。头顶上有苍鹰飞过，他瞄也不瞄，一仰脸，一抖腕，枪响鹰落，更是他特有的一手绝技。枪法好必须臂力强，马克辛重机枪他可以连续提举几十次，平端起来能瞄20分钟，脸不红，气不喘。轻机枪，他平端着一练就是一个多小时，纹丝不动。在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曾经广泛流传过“罗师长一枪打死三个半鬼子”的故事：有一次，一小队日军侵犯根据地，排着纵队过小桥，罗炳辉在桥头伏击点迎头就是一枪，那么巧，子弹穿透了前两个日本兵的咽喉，又掀掉了第三个矮个日本兵的天灵盖，钻进第四个日本兵的胳膊里，三死一伤。故事的真假已无法考订，但罗炳辉的神奇枪法却是事实。

大比武、大会操，是罗炳辉推动练兵运动开展中常常使用的形式。他在各旅、各团、各营之间，频繁组织竞赛演练。得胜的一方，由团（营）长和政委（教导员）上台领纸扎的紅紅綠綠的大飞机。输了的，只能抬回去一只灰不溜秋的大乌龟。谁都不肯要乌龟，于是，各部队练兵场上，龙腾虎跃，热气腾腾，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练兵热潮。

罗炳辉对指挥员的要求更加严格。他要求他们勤奋学习，

善于谋略，敢于决断，要“待敌静如山，杀敌猛如虎”、“不动如山，动则山崩地裂”，要熟练掌握麻雀战、回旋打圈、地雷战术、狙击战术、化零为整和化整为零、布毒和断绝粮食水源、破坏桥梁道路、改造地形、埋伏袭击、截尾子巧捉敌落伍人员、摸哨、围攻、诱敌、打援等游击战术。每次新任命一个基层指挥员，罗炳辉都要把他带在身边，一起行军、打仗，在实践中考察干部。有时行军走出了几十里地，罗炳辉会突然考问：“过了几条河？几座桥？经过了哪些村庄？现在处在什么位置？这里的敌情、民情、地方政权情形如何？如果现在遇敌伏击，给你一个营，你怎么打？给你一个连，你怎么打？如何利用现有地形？怎样配置火力？怎样安全撤出战斗？”罗炳辉喜欢用这种方法考核干部，而不光听你说得怎样好听。他讨厌那种只会夸夸其谈、满口新名词，却没有真本领、会说不会打的人。他还要求全体指战员，心里装着根据地的山川形势、岗圩沟渠、民俗民情，不看地图、不找向导也能耳聪目明。淮南根据地日趋稳固后，部分干部滋长了和平麻痹思想，有一次召开师干部会，会议正开到半途，突然，会场外“枪声”大作，“是敌人偷袭！”情况猝然发生，有不少干部愣在那里，不知所措。这时，罗炳辉宣布，这是警卫连制造的“敌情”。他表扬了反应敏捷，迅速进入实战状态的干部，严厉批评了不知所措的同志。他说：“作为一个军事干部，胸中应该时刻装着敌情。敌人来打你，不会预先下通知。以后同志们每到一处，比如来开会，就应该首先观察会场四周的地形地物，万一被敌包围，应该怎样打，怎样分散，怎样反击，怎样突围，心里就有数了。”

在新四军中，“2师出干部”是颇有名气的。这与罗炳辉

的严格要求、言传身教，有因果的关系。1941年5月4日，为了适应2师和淮南根据地对军政干部的迫切需求，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在天长县张公铺正式成立。罗炳辉兼任副校长，经常给学员们讲课。抗大8分校后迁天长县龙岗、葛家巷，1943年又缩编为2师教导团。到抗战胜利，抗大8分校和教导团共培养了2500名军政干部，其中大部分后来成长为优秀的军政人才。罗炳辉曾经带着毕业班学员，走遍了战云迷漫的根据地边缘地区，让他们在实际战争中进一步完成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罗炳辉实战经验十分丰富。从子弹的呼啸声中，他能分辨出敌人是盲目射击还是瞄准射击，敌人射手距自己多少米。从炮弹呼啸声中，他能判断出弹着点，常常是他刚命令同志们跑开，原来站的地方就落下了炮弹。战士们说：“打仗有罗师长在前面，有官部长（指卫生部长官乃权）在后面，我们什么也不怕！”群众称罗炳辉是“子弹不敢碰的军神”。

罗炳辉十分重视军事理论的建设。他亲笔撰写了《指挥员熟用手册》、《碉堡作战》、《民兵战术》、《关于三角式据点构筑和守备之要领》、《几打几不打》等著作，创造了“梅花桩点式纠缠战术”，出色指挥了千百次战斗，丰富了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

（十六）

罗炳辉爱民如父母，和群众亲如家人。他常说：“人民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儿子，我们应该为人民尽孝，为革命尽忠。”

每逢农忙季节、水旱灾荒，或冬天大雪封门，罗炳辉就集合指战员，说：“大家知道，人民群众是革命军队的母亲。现在，母亲有了困难，需要我们的帮助。我请同志们立刻到母亲那里去，去尽孝道！一边劳动，一边了解他们有什么问题要我们解决。”他每到一地，就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拉家常，谈生产，谈各项政策的落实情况，了解基层干部的作风，一旦发现有不合理的事情，立即予以解决，绝不姑息拖延。他说：“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求解放的，解决群众疾苦是共产党的份内事。不打拖不平，不是共产党！”根据地人民称他是“罗青天”。

1939年2月，罗炳辉的父亲罗守清，于贫病孤苦中，在故乡悲惨逝世。由于身后萧条，靠彝良县邮政局局长温国楨先生资助，才得安葬。罗炳辉十分悲痛。他在1939年10月托同志代笔的《祭先父文》中写道：“不孝自十七岁恻然背亲离家，远走从戎，迄今二十有三年未尝回籍定省。中虽率师道出滇池、经梓里，顾以戎机急迫，即欲一面惨别十九年之老父亦不可得！遂后，转战北上，抗日军兴，不孝以国难当前，民族危机，存亡绝续，在此一举，挽救民族，改进社会，大义凛然，责无旁贷，乃驰驱全国，转战江淮，了平生之宿愿，雪百年之国耻，固知此亦吾父所最属望于不孝者。然而，一念及少小一别即为儿与吾父永诀之时，能不椎心泣血乎！使不孝有父若无父，使吾父有儿为无儿，伶仃孤苦，受尽磨折，生不能养，死不能葬，此皆不孝之罪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罔极之恩未报，终身之恨无穷！大别昆明，永致思亲之泪，天涯地角，长驰膝下之魂。灵其有知，曷览儿心！”^①罗炳辉还请同志代撰了挽

^①笔者1980年6月在云南省彝良县的调查访问。《祭先父文》和挽联，系摄自罗守清和罗黄氏墓前石碑。

联：“痛吾父幼小困穷厄，尝备炎凉，劬劳七十又六龄，到来只剩一身孤苦，易箠呼儿难瞑目；感不孝早岁事戎机，历尽艰危，转战二万五千里，看今日挥戈大江南北，誓歼倭寇奠先灵。”^①罗炳辉把对父母的思念，化作了旧社会的刻骨仇恨。同时，把对父母的孝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

1943年是八年抗战中最艰苦的一年。5月20日到28日，淮南苏皖边区第一次财政经济扩大会议召开，罗炳辉到会讲话。他号召党政军民各界增加生产，繁荣根据地经济，改善军民生活，军民携手共度难关。他身体力行，和警卫战士一起开荒种地，挖塘种藕、养鱼。他种的蔬菜地，品种多，产量高，全军有名。在他的带领下，2师成了新四军全军的生产模范。1943年度，2师和淮南军区对敌作战2109次^②，2师的生产总额，达2000万元^③，大大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

1944年春，淮南根据地军民合作重修了高邮湖西岸大圩数百华里，共用人工76.415万个，挑土方44.4万多方^④。这一工程的竣工，避免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五年一沉圩的惨剧的发生，保护了7万人民和30万亩良田。

1944年9月，罗炳辉在天长县铜城主持民兵万人大会检阅和百团文艺大会演的同时，还召开了劳动模范大会，举办了“生产大展览”。

①笔者1980年6月在云南省彝良县的调查访问。《祭先父文》和挽联系摘自罗守清和罗黄氏墓前石碑。

②③张云逸：《实行拥政爱民的办法——在军直属队干部会上的讲话》，载《先锋》周刊1944年复刊第9期。

④参见淮南苏皖边区党史领导小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大事记》（1985年7月）。

军队爱人民，人民也全力支持子弟兵。1941年春，2师供给部在天长县铜城创办了飞马烟厂；9月，新四军军工部副部长吴师孟和军工模范吴运铎等由盐阜区到达淮南，在高邮县金沟区（今属江苏省金湖县）白手起家创办兵工厂，都得到了根据地人民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

罗炳辉爱兵事迹更多。至今有许多老同志忆起他，常至热泪盈眶。他爱护战士，体谅战士，切实帮助战士解决困难。他下到连队，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同一个锅吃饭，围在一起谈心，活脱脱一个老兵。他叫得清每一个勇敢战士的名字，知道他们的家乡籍贯、家庭情况和本人特点、爱好。战士们有什么心里话，都愿对他说。有一次，罗炳辉下到一个连队，听说当夜是一个原先胆子很小的新兵站岗，就约了连长半夜去摸哨。谁知那个新兵早已锻炼得十分勇敢、机警。当他发现暗夜中有两个人行动诡秘地向岗哨摸来时，瞄准前面一个高大的黑影就是一枪。子弹把罗炳辉的裤腿穿了一个洞。事后，新兵知道是误打了罗师长，十分难过，也十分紧张。罗炳辉只指出了他没有先喊口令的欠缺，在全连大会上大大表扬了这个战士，还奖给他一条毛巾和一双草鞋。后来，这个新战士成长为战斗骨干。

罗炳辉十分尊重知识分子，爱护人才。2师中从事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艺宣传的学生兵，都是他的好朋友，在一起无所不谈。罗炳辉常常感慨：“我敬重有知识有文化的同志，也羡慕你们。等到革命成功了，我真想去读几年书。”他对2师中学有专长的同志关怀备至。1941年9月，吴运铎来到2师，罗炳辉在大会上向大家介绍吴运铎：“这是我们的军工专家，大学毕业的。”吴运铎连忙更正：“我是工人出身，没上

过大学。”罗炳辉爽朗地大笑着，说：“社会大学么，革命大学么，同志们，吴运铎同志有技术，懂洋文，算不算大学毕业呀？”“算！”台下一片掌声。吴运铎因工致残，罗炳辉在生活上十分体贴他。逢到师部来了胜利品，他总忘不了叮嘱警卫员挑一堆最好的，给吴运铎送去。罗炳辉还特地托从事地下交通的同志，从上海买回来一本美国出版的英文版《机械工艺》，赠送给吴运铎。他在扉页上题写道：“只有把无产阶级利益和科学结合起来，才能算真正的科学家。”^①

罗炳辉在淮南根据地的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以至军部迁来黄花塘后，罗炳辉有一次在汉涧见到陈毅，立即翻身下马，向陈毅行军礼时，路边群众不胜惊诧之至：“啊呀，还有比罗司令更大的呀！”罗炳辉每到一地，总会有许多群众赶来，想一睹他的丰采。罗炳辉谦虚地说：“我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一将成名万骨枯’，真正了不起的，是战士！”

罗炳辉曾说：“在淮南路东，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样我们都占着。”^②

罗炳辉的爱人张明秀，是一位温和持重、正义感强烈的红军老战士。1939年2月周恩来来到云岭军部时，张明秀在新四军教导总队第8队（女生队）当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8队有一位女同志在长征中掉队被俘，与党组织断了联系，她去找周恩来，要求准予恢复党籍。周恩来十分关心这件事，专门找来了张明秀，说：“我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办。你看这位同志党籍能不能恢复啊？”张明秀说：“周副主席，这个事我可办

^①笔者1982年4月22日访问吴运铎记录。

^②笔者1981年11月12日访问周原冰记录。

不了。在未弄清她在狱中的表现之前，只能重新入党，不能恢复党籍。”周恩来说：“在入的问题上要慎重。她是长征的老同志了，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要爱护每一个干部；尽快把她在狱中的表现查清。”事情过了好几天，周恩来到中村看望教导队学员，特地又找来张明秀，说：“前几天跟你谈的问题，要按照你们支部的意见办，因为支部的意见是正确的。你千万不要认为我周恩来说过了，不办不好。我也是一个普通党员嘛。我们共产党的规矩是按原则办事，服从真理，不能谁的官大谁说了算。”^①事后，张明秀把这件事告诉了罗炳辉，罗炳辉十分同意张明秀坚持原则、不随风转舵的做法，对周恩来关心同志、服从真理的精神也非常钦佩^②。

罗炳辉喜欢小孩，也盼望自己能有孩子。1941年底，张明秀生了一个女儿，十分健壮，但由于医生器械消毒不严，脐带感染，几天后就夭亡了。医生知道罗师长盼孩子心切，又悔又怕，紧张得直掉眼泪。罗炳辉从前线赶回来，张明秀强忍着悲伤，哄他说：“孩子生下来就是死的。医生同志抢救了很长时间，吃了许多辛苦……”直到1943年12月25日，罗炳辉的爱子罗新安出生，张明秀才把长女夭亡的事告诉罗炳辉，说：“我怕你发脾气，伤了同志的心。瞒了你两年，请原谅我。”罗炳辉深情地凝望着爱人，感动地说：“当时你做得对。我脾气不好，知道了真情也许会伤医生同志的心。我得感谢你。”^③

罗炳辉性格刚强，治军极严，有时也不讲方法，脾气不好。长期的军旅生活造就了他性格中粗犷、强悍的一面。有一

^{①②}笔者1979年4月22日访问张明秀记录。

^③笔者1979年5月1日访问何培、胡醒记录。

次，教导队学员们正在谈论罗炳辉的神奇枪法，正巧罗炳辉散步从这里路过。学员们要求罗师长表演打鸟，罗炳辉正在思考问题，笑着摆手说：“下次再打吧。”学员马登奎开玩笑地说了一句风凉话：“哪有那么神？我就不信。果真一枪一个，我马登奎生吃了它！”罗炳辉很生气，掏出左轮手枪，四面看看，一甩手叭叭两枪，天上栽下来一只麻雀和一只灰喜鹊。罗炳辉板着脸，命令：“马登奎！出列！”他指着地下血淋淋的两只鸟，喝道：“吃掉！”马登奎从来没见过师长发这样大的火，脸都吓白了^①。还有一次，一位旅长因为天气太热，没有扣风纪扣，被罗炳辉撞见了。罗炳辉喊这个旅长的名字，“检查一下军风纪！”这位旅长赶紧扣好风纪扣。罗炳辉严厉地说：“稀稀拉拉，象个军人吗？要记得自己是旅长！”这位旅长涨红着脸，张嘴想检讨几句，罗炳辉一挥手：“别说了！以后要改！回去吧！”罗炳辉是个胸襟坦荡的人，批评归批评，爱护归爱护，说过就算，只记人善，不记人恶。批评过火了，事后他会主动道歉：“枪伤好治，心伤难医。我向你检讨。意见正确，但态度不好。”^②每逢他态度不好，张明秀就严肃地说：“炳辉同志，别以为你是师长，我就批评你不得。你是共产党员，我是司令部机关党支部书记，你得接受我们支部的监督！”罗炳辉组织观念很强，话说到这个份上，他主动做自我批评^③。

（十七）

1944年5月，日军第61师团和伪军共2500余人，“扫

^{①②③}笔者1979年5月1日访问何培、胡醒记录。

荡”津浦路西定远地区，合击路西根据地中心区藕塘，被2师击退。11月，日伪军纠集7000兵力再次“扫荡”，激战一周，又被击溃。1945年2月14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山本旅团主力和伪军由扬州出发，向北进犯，企图打通淮河运输线。罗炳辉指挥2师一部和地方武装，与日伪军作战24次，把敌人打回扬州、高邮。至此，日本侵略军的攻势已如强弩之末了。

艰苦的革命战争和忘我的工作，损坏了罗炳辉的健康。他患有胃病和高血压症，长期大量便血，有几次竟至生命垂危^①。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军出兵东北。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消息传来，罗炳辉振奋不已。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10日夜间，电报发至2师司令部时，罗炳辉正在病榻上呻吟。他毅然抱病上阵，指挥战斗。

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发布进军命令。同日，罗炳辉指挥2师各部，分别向津浦铁路和淮南铁路沿线的日伪军据点以及蚌埠、合肥等城市进攻，并命令独立旅向长江沿岸进击，各支队则向所在县的日伪军据点进攻。罗炳辉日夜操劳，指挥淮南全局反攻，全然忘记了病痛。

战争态势瞬息万变。10日，日本陆相阿南惟几，宣称要将“圣战”进行到底。11日，蒋介石下达三条命令，要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由他来独吞抗战胜利果实。同日，朱德连下六道命令，命令人民军队收缴日伪军武器装备，接受日军投降。同日，新四军军部命令华中日伪军立即投降，一切武装物资交新四军处理。14日，日本天

^①罗炳辉1944年、1945年日记。

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日，蒋介石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15日，朱德命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华东的日军，应由你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天长地区，接受陈毅将军的命令。”^①

罗炳辉坚决地执行了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挥师全线总反攻。8月13日，罗炳辉部促成了伪警卫第3师师长钟剑魂在六合县钟家集率部起义。14日，2师5旅猛攻蚌埠及其外围据点，是日解放定远县城。16日，2师解放盱眙、来安两县城。17日，2师4旅攻击滁县，同日收复嘉山三界，6旅收复朱巷、下塘集车站。20日，罗炳辉亲临指挥武力解放六合县城，同日解放天长县城。在短短的十多天里，迅速收复了广大地区，解放区人口达330多万人，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

为了挽救和平，避免或推迟战争，揭露美蒋阴谋，团结和教育全国人民，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为了表示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诚意，中共代表主动提出撤出南方八个省区的人民军队。9月9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10月3日，罗炳辉率部离开淮南根据地北上^②，经泗阳、宿迁，10月20日下午于炮车、赵墩间强越陇海铁路，进入山东。此时，罗炳辉部改称新四军第2纵队，罗炳辉任纵队司令员^③。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17个军约40万人，在日伪军的接应下，分批向华东解放区推进，企图打通津浦铁路，进入华北、

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45页。

②③《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七四师抗战史料》。

东北。为了阻止国民党军北进，争取时间发展东北，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和山东部队，在济南至徐州间组织津浦路战役。10月19日，我军攻克邹县、大汶口。11月3日，罗炳辉和陈毅共同组织并指挥了“界河战役”，成功地实现了由抗日游击战争到大规模的兵团配合作战的历史性转变，歼敌吴化文部5000余人，严密控制了津浦铁路。24日，又发起了“临（城）韩（庄）战役”，迅速开辟了鲁南地区，控制了徐州至济南间铁路130公里，粉碎了蒋介石打通津浦铁路的阴谋^①。1946年1月停战实现后，罗炳辉倾注了极大精力于部队的“百日练兵”运动。

过度的操劳，又使他病倒了。医生们联名给军部打报告，陈毅要罗炳辉休息治疗。他这才度过了在他戎马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休养生活。他于2月26日游览曲阜^②。3月5日登泰山极顶^③。下山后，不顾医生的劝阻，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4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向苏、皖、鲁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已经组织批准去苏联疗养的罗炳辉，毅然决定放弃出国治疗的机会，留下来协助陈毅军长，转战山东战场^④。是月，山东军区成立，由新四军军长陈毅兼任司令员，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

6月初，枣庄前线吃紧。6月5日晚，罗炳辉告别爱人张

①军委一局：《津浦路徐济段战役总结》，新四军第2纵队司令部，
《临城韩庄附近战斗部署》（1945年12月20日由罗炳辉等签章发
布）。

②罗炳辉在孔庙留影旁题字。

③罗炳辉在泰山玉皇顶留影旁题字。

④张明秀的回忆。

明秀和两岁半的儿子新安、七个月的女儿鲁安，乘车驰奔峰县前线指挥所^①。这是他与家人的最后诀别。临行前，他已自知身体不支，决心贡献生命于党和人民革命战争。幼儿的牵衣相送，和幼女的呀呀学语，使他柔情满怀。6月7日，枣庄战役开始，战况十分激烈。16日，胜利解放枣庄。

6月13日，罗炳辉在峰县前线指挥所里，给张明秀写了最后一封家信^②。在信中，他详细地谈了对刚从延安来的长女镇涛的教育问题，希望她能“真正做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女，女革命家”。他惦念着幼子、幼女，“新安这一向怎样？讲了什么话？鲁安更好玩了，我均很想念”。他在信的最后，无限深情地写道：“秀，你对我是特别照料、关心，可是对〔你〕母亲的安慰信写得太少。详情再谈。”

16日，罗炳辉在枣庄解放的捷报传来后，在峰县前线指挥所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作新的战斗部署。深夜散会后，突然发烧，至于昏迷。

17日黎明，医生确诊为急性肠胃炎。

18日，病势转重。

19日，陈毅闻讯后，自临沂赶来，守护在病榻边。陈毅带来了毛泽东5月20日致罗炳辉的亲笔信和朱德6月5日以自己 and 康克清两人名义致罗炳辉的亲笔信。罗炳辉在病床上向陈毅叙述了自己一生的曲折经历。

20日，病势趋于稳定，医生建议送回临沂后方医疗。

21日晨，韦国清、詹化雨、宋时轮和医护人员，护送罗

①罗炳辉1946年6月5日日记。

②张明秀提供的原件。

炳辉离峰县，经张家庄、望夫台、古林村东行^①。因道路崎岖，车极颠簸，天气酷热，正午到兰陵镇时，罗炳辉因出汗过多，严重脱水，出现虚脱症候。韦国清令移兰陵酒厂后院大屋内，施行抢救。延至下午5时许，罗炳辉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十八)

将星殒落，举国震悼。

6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唁电，称：“罗炳辉同志的病故，是我党我军与我国人民的重大损失。……中共中央谨以悲痛的心情，哀悼他的逝世。”^②同日下午，新四军军部暨山东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10万人，在临沂隆重举行罗副军长葬殓典礼。陈毅把一面绣着“中共”两个金黄色大字的红旗，亲手盖在罗炳辉的灵枢上^③。他流着热泪，在罗炳辉墓前发表了长篇演说^④。是夜，陈毅送葬归来，整夜不眠。他泪湿衣襟，感慨于“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何其如此不幸”，写下了著名长诗《罗炳辉将军追忆词》^⑤。29日，苏皖边区政府发布政令：“为纪念罗故副军长建立淮南解放区之功绩，特令将淮南路东之天长县，改名为‘炳辉县’，并于该县建立纪念碑，永志不忘。”^⑥

①笔者1980年7月在山东临沂、兰陵地区的调查访问和实地考察。

②1946年6月25日《新华日报》、1946年6月26日《人民日报》。

③1946年6月27日、7月1日《解放日报》。

④⑥1946年7月4日《人民日报》、1946年7月5日《新华日报》。

⑤载《大众日报》1175期。后经张茜同志整理，并改题为《悼罗炳辉将军》，收入《陈毅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4月版。

1947年夏，蒋军陷临沂，惨无人道地对罗炳辉的遗体横加凌辱，激起山东人民和全军将士的切齿痛恨。

1950年，在陈毅同志亲自主持下，人民政府在临沂为罗炳辉重建了陵墓，并雕刻了石像，建造了“瞻容思功亭”。陵墓为四方抹角塔型，四面嵌浮雕，十二面镶碑文，镌刻着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陈毅等罗炳辉生前战友的题词。

人民的功臣罗炳辉同志永垂不朽！

杨 昭 植

宋玮明 卢伟民

杨昭植是中共湘潭城区党组织的创始人，湘潭县第一任县委书记，湘潭县总工会委员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马日事变”后，他组织工农义勇军，在反攻长沙中，不幸兵败被捕，壮烈牺牲。

(一)

杨昭植，字君健，1902年12月8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泉塘冲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父亲杨孝皋，是清末秀才，为人正直。母亲赵氏，原系官僚地主赵湘民家的婢女，后许为孝皋侧室；她忠厚善良，勤劳俭朴，当婢作妾，饱尝封建礼教摧残迫害之苦。1902年7月，杨孝皋突然病逝。杨昭植是父亲的遗腹子，孤儿寡母，受尽了宗族歧视和欺凌。这一切不幸的遭遇，在昭植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反封建的种子。

杨昭植自幼随伯父读古文，以后被送进附近的楚山小学读新书。1916年，杨昭植14岁时，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在家从事生产劳动。1918年，杨昭植遵母命与表妹李芝任结婚。1920年，他父亲的学生刘权高出任安仁县县长时，见昭植家计艰难，就带他到安仁县衙当了名小录事（文书），挣点薪俸，养

家糊口。他在安仁作事半年，看不惯官场的腐败，愤然辞职，又回到家乡种田。

1921年秋，湘潭县立中学甲种师范班招生，杨昭植见不收学膳费用，再次萌发求学愿望，考入该校继续读书。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反帝怒潮方兴未艾，他与同学彭应钟、郭天健等人组织今社，抨击时弊，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并走上街头，积极投入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学校当局怕惹是招非，竟以“行为不轨”的罪名，强令杨昭植退学。杨昭植并不灰心，接着又考入长郡中学师范一班读插班。当时的长郡中学受省立一师的影响，校风较为开放。杨昭植广泛涉猎新文化书籍，思想更为活跃。他出了一个名叫《潭影》的油印周刊，“力抨湘潭教育腐败情形，土豪劣绅把持县政之罪恶”^①。刊物寄往湘潭散发，震动很大。由于经费短绌，《潭影》只出了四期。但是，杨昭植那超人的胆量，辛辣的文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长郡中学学习期间，杨昭植结识了彭公达、夏炯等进步同学。他们在一起合拍了一张照片，杨昭植在照片上题了“狱中寻道者”五个字。表明他把旧中国看作是一所禁锢进步思想的牢笼，并且决心要冲破这个牢笼，寻找革命真理，寻找通向光明幸福的道路。杨昭植等经常相邀一起去长沙潮宗街56号的文化书社看书，一道去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班听课，从而与在补习班任教的何叔衡、夏明翰、罗学瓚、姜梦周等一批共产党员有了较多的接触。在他们的帮助下，杨昭

^①中共党史资料丛书：《革命烈士传记资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页。

植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他的眼睛更加明亮起来，对中国的社会问题也看得更加深刻。同学们都称赞他是“时代的千里眼”。

1923年春，杨昭植加入了省学联。2月8日，他参加了长沙工人学生2万余人的大游行，抗议军阀吴佩孚制造的二七惨案。3月29日，省学联为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拒不归还租借期满的大连、旅顺港，发动长沙50余所学校举行罢课。杨昭植率领长郡中学的学生，参加了省会工人、学生6万余人的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否认二十一条”、“誓死收回旅大”等口号。接着，他与彭公达、陈赓等一批爱国青年，参加了罗学瓚、姜梦周等人领导的湖南青年救国团。该团的宗旨是“专为对付日本鬼子欺害我们中国人民而组织的”，它以“抵制日货的方法，专做抵制日货的事业”^①。杨昭植率领长郡中学的学生与工人纠察队一道，封锁码头，巡查商店，夜以继日地进行禁运、查抄和销毁日货的斗争。暑假期间，他们还组织同学，分赴长沙近郊各县，进行反帝救国的宣传教育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通过这一系列社会实际斗争的锻炼，杨昭植以“敢于任事”和“能写善辩”而赢得同学们的拥戴。大家推选他担任长郡中学学生会的负责人兼学生会出版部主任。他“喜作辩论文章”，经常在宿舍的走廊上，昏暗的路灯光下，撰稿到深夜还不休息。1923年底，青年救国团进行改组时，大家又一致协定“杨君昭植、陈君赓为继续负责办事人”^②，领导广大青年学

①1923年4月8日湖南《大公报》。

②民国12年12月25日《湖南通俗报》。

生进一步开展反帝爱国斗争。

1924年夏天，当时担任中共湘区委员的罗学瓚到长郡中学秘密发展杨昭植入党。从此，杨昭植在中共的领导下，由一个爱国青年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二)

1924年底，杨昭植在长郡中学师范班毕业。由于他和彭公达等在长沙学生运动中都是很有影响的人物，所以1925年1月6日的湖南《大公报》还特地为他们毕业发了消息：“杨昭植等八九人已于昨寒假时毕业回潭，闻来年须谋学校服务云”。杨昭植毕业后，利用他在县城的社会关系，找到当时北五省会馆会长姜宓宸，通过姜的介绍，与彭公达等一起到十一总关圣殿内的湖湘小学任教。他们以此作为联络点，秘密从事建立中共组织和开展工农运动的工作。

他们根据中共湘区委员会关于利用“平民教育”的合法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工农运动的指示，积极筹办平民夜校。但是，这一计划遭到当时掌握湘潭财政和地方公产大权的劣绅晏容秋刁难和反对。晏容秋一面利用手中的权力阻止政府拨款，一面唆使各公堂馆所不给平民夜校捐款。杨昭植带领赵昆、周桂生等几个工人到晏容秋的家去与他进行辩论，把晏容秋气得双脚乱跳。最后，杨昭植拿着省政府批准的“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章程和活动经费”的公文，找到县长赵恒哲，迫使其批给了一部分平民教育经费；加上广大群众的支持与赞助，湘潭城区的第一所平民夜校很快就在湖湘小学成立了。

平民夜校是以提高广大平民的文化科学知识，宣讲革命道

理，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夜校设有工人班、妇女班、学生补习班。学习的内容有苏联的革命故事，人类社会产生贫富悬殊的原因，工人摆脱贫困的出路等。杨昭植自编的教材不仅明白易懂，而且读起来朗朗上口，有的课文，至今一些健在的老工人还能背诵如流。

在杨昭植等人的努力下，湖湘小学的平民夜校很快成了联系劳苦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的重要阵地。杨昭植经常忙于接待来访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校外教师，针对各人的不同特点，进行革命的启发教育。如射埠有个叫胡佑生的郎中，每次进城买药，都要到湖湘小学来请教一些问题。有一次，杨昭植笑着问他：“佑胡子，你是个好郎中，你诊得了穷人的病，诊不了穷人的命，为什么穷人生活那么苦，病根子在哪里呢？”胡佑生答不上来。杨昭植接着说：“治病要除根，要治好穷人的苦病根，只有唤起民众起来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这种深入浅出的革命道理，在胡佑生的心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①。

为了进一步推广平民教育，1925年底，杨昭植在县教育会议上提出了“责成各区在学务委员会成立平民读书处一所以上”、“创办《平民教育》周刊”、“讲演平民教育之责”等五项办法^②，受到与会教育工作者一致赞同。从此，湘潭城区其他各公、私立学校也都办起了平民夜校，为传播革命思想，提高工农觉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①胡佑生在杨昭植的启发下，于1926年参加湘潭南三区的农协活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代理县工委书记兼军事委员，1948年被捕牺牲。

^②1925年12月23日湖南《大公报》。

杨昭植在积极推广平民教育的同时，还经常深入工人群众，发动他们起来与资本家及其他剥削者进行斗争。

当时，湘潭的工人，由于受旧的行会、地域观念的影响，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如人数最多的码头工人中，就有本帮（湖南人）、西帮（江西人）之间的严重对立。有一次，江西资本家“茂记”大药材行所雇佣的西帮工人到唐家码头起运药材，与正在那里起运粮食的本帮工人发生械斗，造成了流血事件。杨昭植闻讯赶到，极力劝阻两帮工人不要同室操戈，自相残杀。面对当时尚未觉悟，手执铁叉、木杠，准备大打大斗的西帮工人，杨昭植给他们算了一笔受剥削的帐：西帮工人每天至少要替“茂记”扛七件药材，如果按本帮工人每扛一件药材要铜钱100钱计算，西帮工人每月的工资至少应有21吊，而他们每月从“茂记”领到的工资不过五六吊钱。杨昭植接着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工人不团结，资本家就会趁机敲榨勒索，如果继续械斗，打死打伤了人，家中的婆娘崽女怎么活啊！”他的话打动了工人们的心，大家一个个自动放下了手中的武器，释放了被抓的工人。在湘潭工人内部的宿怨基本解除，阶级觉悟有所提高的基础上，杨昭植开始筹划成立各行各业工人自己的工会组织，发动工人起来为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进行斗争。

杨昭植在发动、组织、教育工农群众的过程中，先后培养了廖长顺、赵卓坚、吴泽霖、王汉芸、刘斌、黄甫、陈绍情等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7月中旬，中共湘区区委派罗学瓚回潭，帮助杨昭植在湖湘小学成立了中共湘潭城区第一个党支部，由杨昭植任书记。当时，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已经建立，共产党员均以个人身分先后参加国民党，与国民党左派合作。杨昭植以国民党湘潭县党部的名义公开领导群众，开展

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上海五卅运动发生后，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强烈的民族义愤。6月2日，湖南成立了“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提出了“打倒列强，洗雪国耻”的口号。6月6日，湘潭成立了湖南雪耻会湘潭分会，推选杨昭植为负责人。7月2日，雪耻会在昭潭学校举办了募捐游艺会，许多爱国艺人都到会参加义演。义演三日，募捐达千余元。

随着反帝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省雪耻会向全省人民宣布了对日英实行经济绝交的五项办法。根据这一精神，7月14日，杨昭植又领导组织了国货维持部，号召工人不要搬运敌货，商店不要购买敌货，对被查获的敌货即盖上“敌货”字样，按公约处理，对态度恶劣的顽固分子则游街示众。7月底，杨昭植组织湘潭各界数千人在县城学坪集会，举行了抵制敌货，反对帝国主义船只在中国内河航行的示威大会。会后，杨昭植指挥工人纠察队占领了英日帝国主义在湘潭设立的怡和、太古、日清等码头，禁止敌货流通，阻止帝国主义船只在湘潭各码头靠岸卸货；英日客轮也因“无人乘坐”，“一律停驶”^①。

12月25日，日商石原洋行梳刷厂的女工因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遭到厂方的毒打，殴伤女工数人。消息传来，激起了全城人民的无比义愤。当晚，杨昭植立即召集雪耻会、学联合会负责人在湘潭报馆召开特别紧急会议，作出了“举行市民游行示威，向县议会、警察局请愿”等五项决议^②。16日下午，工、农、商、学、政各界5000余人汇集学坪，举行了大规模的示

^①1925年7月30日湖南《大公报》。

^②1925年12月19日湖南《大公报》。

威游行。游行群众向县署递交了请愿书及凶手行凶的凶器，提出了封闭洋行、惩办凶手、抚恤伤者、改良工人生活待遇等八项要求。湘潭县公署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于18日向日方交涉，提出取消“洋行”名义，抚恤受伤者200元。日商石原被迫在县公署订约签字，湘潭人民的抗议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三)

1926年3月9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联合全省各界400多个团体，向全国公开发表通电，拥护广东革命政府，驱逐军阀赵恒惕出湘。6月，驻衡阳的唐生智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赵恒惕的死党叶开鑫反攻长沙，进逼湘潭。杨昭植组织湘潭全市人民开展了反对军阀叶开鑫，欢迎北伐军的斗争。他们一面抗议叶军在湘潭筹饷、虏车、拉夫等罪行；一面组织宣传队、运输队、慰问队、交通队、侦察队等支前团体，并亲率工人自卫队配合北伐军实地作战。在杨昭植的指挥下，“工人均努力作战，并竭力巩固后方，成绩卓著”^①。

7月10日，北伐军唐生智部的三个团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中进入湘潭。杨昭植领导湘潭各界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开展了祝捷活动。第二天，国民党县党部举行升旗典礼，取消县议会，成立了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为中坚的县国民政府，结束了北洋军阀在湘潭的统治。随着湘潭革命政权的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也迅速发展起来。7月中旬，中共湘潭

^①协夫：《湖南工农直接参加北伐战争之事实》，《湖南工运史料选编》第二册。

县委（当时称湘潭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下辖10个支部，有党员500余人，由杨昭植担任第一任县委书记^①。

8月16日，在城内塔公祠召开湘潭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解散了由国民党右派勾结土豪劣绅非法组织的农协“筹委会”，正式成立了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县农民协会。全县各地的农协组织迅速发展起来，农民运动逐渐走向高潮。这时，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决定，杨昭植调往长沙，参加省总工会的筹建工作。9月1日，全省总工会宣告成立。为了配合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整顿、巩固和发展各县工会组织，省总工会委定杨昭植为特派员，“常驻湘潭境内，主持各工会会务”^②。10月21日，杨昭植在湘潭主持召开了全县泥木工会的整顿改组会议，撤销了原工会头目朱吉富等人的职务，并勒令其即日交出工会大印。此举打击了资本家及其在旧工会的代理人的威风。

10月25日，湘潭县总工会筹备处召开代表大会，杨昭植以省总工会特派员的身分在会上作了改组县总工会筹备处的动员报告。在湘潭十八罗汉集团头目晏容秋等反动势力的策划下，工贼黄又难以教职员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公然跳出来反对，胡说什么“我们工人只要团结，无须受党及省总工会的指挥”，污蔑“省党部、县党部、省总工会都是帝国主义”，并声言“省总工会特派员来潭是抢我们工会的”。对此，杨昭植义正词严地进行了严厉驳斥。黄又难恼羞成怒，竟鼓动少数不明真相的工人大打出手，顿时全场一片混乱。杨昭植镇定自若，指挥各基层工会代表退出会场。黄又难又煽动同伙把守会场出

^①1926年10月，杨昭植任省总工会驻湘潭特派员，专门从事工人运动，何资琛接任中共县委书记，杨昭植改任副书记。

^②1926年10月18日《湘潭公报》。

口，强迫部分工人代表签字，选举他为县总工会筹备员，妄图窃取县总工会的领导权。可是，会后不久，《湘潭公报》上即登出了湘潭泥木、人力车等十几个基层工会的“特别启事”，公开声明“所有十月二十五日被黄又难等威迫所签字及威迫选举之筹备员黄又难等事，一律无效”，并且坚决表示，“敝会等遵照省总工会命令办理，并绝对受党指挥”^①。教职员联合会也随即登报声明，否认了黄又难的代表资格，国民党县党部开除了黄又难的党籍。

通过这场斗争，彻底粉碎了晏容秋等反动势力操纵工贼破坏工运的罪恶阴谋，重新组织了湘潭县总工会筹备处。在杨昭植的领导下，湘潭的工人运动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旧的基层工会通过改组整顿得到了提高，新的基层工会不断涌现，到11月底，全县基层工会已达64个，会员达31248人。《湘潭民报》称赞说：“近日以来，工会成立，日必数起，游街送牌，异常热闹，工运进行之速，诚令人敬服”^②。12月2日，在城区和化潭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湘潭县总工会，选举杨昭植为县总工会委员长和出席省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上，杨昭植以227票当选为省总工会执行委员。

在这段时间里，杨昭植不辞劳苦，日夜奔忙，深入到各个行业，指导工人斗争。据当时《湘潭民报》等报纸报道，向资方提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的有泥木、靴鞋、码头、箩业、印刷和鱼花果杂等十多个基层工会，其中有八个工会是以罢工斗争形式获得胜利的。当时有一份资料对此作了生动的

^①1926年11月4日《湘潭公报》。

^②1926年11月15日《湘潭民报》。

记载：杨昭植“君领导工人与资本家、店主争斗甚剧，毅然行之。工人经济斗争日见优胜，苛规陋习因以废除，压迫阶级之威稍杀，工人在政治上之地位日见增高，全县行政非得工会、农民协会之参加，即莫能举。豪绅资产阶级疾君甚，但慑于工人阶级之力量，亦无可奈何也。”^①

随着杨昭植在社会上地位和威望的提高，请客送礼的人也一天天多起来了。例如他的亲戚欧阳剑秋、文立吾、柴晓全、周达泉等都是商店的大老板，春节前夕纷纷请他去吃春饭。杨昭植为此深感不安，经与王洪伦、李任难等几位领导同志商量，决定在《湘潭民报》上公开发表启事。这份启事的原文如下：“鄙人等服务党内，工作纷繁，对于一切应酬，诸多疏忽，殊深抱歉，惟望戚友同志，体谅苦衷。关于一切筵席，希勿拈约，而除陋习。区区之言，尚希容纳是荷。此启”^②。

杨昭植不仅以身作则，对其所辖工作人员也严格要求。如总工会一名通讯员送一份“指令”去锡箔工会，竟索酒资500文。杨昭植得知后，当即严词申斥，勒令将原款退还，开除其工作，并登报申明：“俟后敝工会如有此种行为，及有假借敝工会名义，希图诈骗者，请扭送敝会，以便依法究惩。”^③

从此，总工会与杨昭植在群众中的威信愈益增高。湘潭人民异口同声地说：“杨昭植一心为党，廉洁奉公，真是群众的贴心人！”

(四)

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猛烈地荡涤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①《革命烈士传记资料》第235页。

^{②③}1926年12月19日《湘潭民报》。

反动分子对此十分恐惧，千方百计进行破坏。省第一次农代会决议案所列举的反动分子攻击工农运动的“最显著之事实”中，就有“湘潭晏容秋，指挥十八罗汉，左右县政，把持三堂四所，吞食军饷，以饱私囊”。

为了保卫工农革命的胜利成果，12月14日，杨昭植根据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制定的《惩办土豪劣绅暂行条例》，派出工人纠察队，逮捕了晏容秋，送交县公署关押。晏容秋是湘潭土豪劣绅的总头目，在乡间有田千多亩，在城内经营“聚泰”锡泊局，开设“立成”钱庄，凭借其担任县财政科科长兼团防局局长的权力，霸管“三堂”“四所”的公产田11700多亩，贪污中饱，横行乡里。群众闻悉总工会已捕获“天字第一号的大劣绅晏容秋”，无不欢欣鼓舞，纷纷要求将晏容秋绑缚游街，就地枪决。县长田镇南以要报请省府批示为由，迟迟不作处理。杨昭植决定发动城乡人民，向县署请愿。19日这天，数万名工农群众举着红旗，高呼口号，涌进县衙。田镇南慑于群众压力，只得将晏容秋交给总工会，并急电省府：“顷民众二万余人来署，请杀劣绅晏泽昂（容秋），县长以未奉明令不许，旋即要求交与民众，直接枪毙，无法制止，不得已，将该晏泽昂就监交与民众”^①。总工会将晏容秋押往学坪。这时，学坪里早已搭起一座高大的审判台，台上挂着“湘潭人民特别法庭”的七尺横幅，由杨昭植担任审判长，按照省农代会颁布的《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组织条例》，将晏容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决。随着晏容秋的毙命，城乡反动势力相继崩溃，正如当时《湘潭公报》所述：“湘潭民众自晏容秋枪决后，一

^①1926年12月13日湖南《大公报》。

时打倒土豪劣绅之空气充满全县，当时在各堂所董事之士绅无不纷纷避去。”^①

为了避免因处决晏容秋而引起的误会，巩固国共合作，发展国民革命的大好形势，国民党县党部邀集全县士绅于12月26日开了一个联欢会，到会者80余人。杨昭植和县党部常委王洪伦在会上发表演说，希望各士绅“与党一致行动，仍旧帮助政府料理一切事宜，幸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②。士绅代表黄宗宪等人皆表示服从政府领导，协力同心，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1927年1月，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回到湘潭，在中共湘潭县委所在地塔公祠召开座谈会，杨昭植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湘潭工农运动情况。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特别是对湘潭人民镇压大土豪劣绅晏容秋，连声称赞“好得很”。后来，他在《战士》周刊上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一再指出：“湘潭晏容秋，则是农民和各界人士强迫县长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毛泽东的赞扬与肯定，对促进湘潭工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杨昭植在领导湘潭人民向地主豪绅等封建势力进行英勇斗争的同时，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也给予了狠狠的打击。

为了抗议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南京、四川万县等地大批屠杀中国人民，阻挠和破坏北伐进军的罪行，杨昭植领导雪耻会

^①1926年12月30日《湘潭公报》。

^②1926年12月26日《湘潭公报》。

开展了大规模的“对英经济绝交”运动，发表通告，颁布了五大政策：凡属英商违约私设内地之各管理处，“一并撤销”，英商经理之仇货，“悉数焚毁”，已到码头，尚未起栈之仇货，就地“实行焚毁”，华商之仇货“一律查清，限期拍卖”，“倘敢故违，实行焚毁”^①。12月18日，杨昭植率领工人纠察队查封了河东太平街英商福记公司的万担油池。1927年1月16日，雪耻会组织湘潭各界民众3万多人在学坪举行反英示威大会，杨昭植在会上宣读了由他起草的《大会宣言》，指出：“英帝国主义已临末路而揭示其凶暴……妄图镇压我民族解放运动，近又调动远东舰队来华，并勾结奉系军阀，以期南下而颠覆北伐已得之革命胜利……我们为生存计，为解放计，为达到国民革命成功全民众之自由计，应一致起来，打倒英帝国主义，扩大反英经济绝交。”会后举行了盛大示威游行，划业工人用几百只划子在湘江上架起了一座浮桥，杨昭植率数千名纠察队员横渡湘江，奔向河东太平街，火烧洋油池。顿时浓烟滚滚，烈焰腾空，英商福记公司的2181吨煤油全部化为乌有。与此同时，示威的群众将查抄来的一大批英国的洋纱布及其它洋货数万件，在河西学坪悉数焚毁。这些活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充分显示了湘潭人民反帝的决心和力量。

在大革命洪流中，杨昭植不仅领导湘潭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而且在支持妇女解放，发展文化教育，救济失业工人，以及革除封建恶习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①1926年12月18日《湘潭商报》。

杨昭植特别重视妇女解放运动。1926年11月中旬，他在湘潭女中所作的《国民革命与妇女解放》的讲演中说：“须知妇女界在国民革命中之重要，湖南三千九百万人，其中的一半便是妇女，妇女不参加国民革命，则前途堪虑。”^①湘潭县国民政府建立后，在他的倡议下，城市办了四所职业女校，农村各区也有一所，给妇女上学创造了条件。为了解决妇女的劳动就业问题，县总工会组织了劳动妇女委员会；对那些被人瞧不起的女伶、妓女，县妇联还专门设立了女联妓伶部，帮助她们谋求正当职业。

1926年底，杨昭植联合湘潭各界共同发起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大同盟。由他起草的《同盟公告》强调指出，“文化侵略为帝国主义侵略最阴险的政策，吾人于反对帝国主义武力侵略、政治侵略、经济侵略中，于文化侵略尤应力于攻击”^②。他选择圣诞节那天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示威大会，会后接管了帝国主义在湘潭办的“益智”、“三育”、“光道”等教会学校和“惠景”、“博济”等教会医院。于此同时，县党部还根据杨昭植的提议，将劝学所改为教育局，将所属的7000多亩公产田收入全部移作教育经费，在全县办起了两所中学、十所高小和无数的职校、夜校，使湘潭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1927年3月，杨昭植在《湘潭民报》上登出了《总工会设法救济失业问题》的通告。此前此后，他亲自到各基层工会调查了解失业情况，并主持成立了湘潭总工会劳动职业介绍所和

^①1926年11月15日《湘潭民报》。

^②1926年12月23日《湘潭民报》。

民食维持委员会，一方面将失业的工人名单造册登记，要求政府设法救济；一方面召开整顿粮食价格的群众大会。杨昭植在会上反复说明：“谷米不是天作价，而是人作价，粮食涨价主要是豪绅、奸商造成的。”总工会发动群众清查那些囤积居奇的粮行碓坊，阻止粮食出境，抓了那些不法奸商戴高帽子游街，迫使他们交出深藏的粮食，按平价供应群众，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

为了整顿社会秩序，革除封建恶习。杨昭植组织各公法团体，成立严禁烟赌委员会，发布公告，明文规定：“自布告日起，限一星期之内将烟具、赌具（麻将、扑克、骨牌骰子）缴毁，如愈期不戒，由委员会设立烟赌自新所，施以惩戒处分，再有执迷不悟者，除将赌场烟室一律封闭外，并将违禁犯呈请政府处决之。”^①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杨昭植组织城区建立了儿童团，配合工人纠察队在街市巡查，参加“反对封建迷信，禁烟、禁赌等活动”。^②从此，那种抽头聚赌，吞云吐雾的社会恶习，一扫而光。人们都说：“国民政府成立前后比较，湘潭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五）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驻长沙的许克祥部队，根据何键的密令，于5月21日夜晚突然包围了省总工会、省农协、国民党省党部等所有革命机关，疯狂屠杀共产

①1926年12月14日《湘潭公报》。

②1927年1月26日《湘潭公报》。

党员和革命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

事变后的第二天早晨，省农协秘书长柳直荀从长沙脱险转移到湘潭，与中共湘潭县委领导人紧急商讨应变对策。23日，在湘潭县总工会驻地化坛，召开了有湘潭、湘乡、长沙、醴陵、衡山和锡矿山等地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根据省委在事变前确定的“武装自卫”原则，决定组织湖南工农义勇军，在湘潭设立总司令部，柳直荀为总司令，杨昭植为宣传部部长。杨昭植随即集结了工农武装二三千人围攻县署，夺取了县团防局警备队的枪枝弹药，准备开到离城15公里的美仑整编训练。与此同时，国民党湘潭县党部、县农会、总工会等六个团体，向全省20多个县市发出电报，通知各地迅速组织工农武装，反攻长沙，平定许克祥叛乱。电报全文如下：

“反动派日伏省垣，乘我不备，于前晚攻击工农团体，解散省党部，惨杀工农领袖四十余人，务望各方集中一切实力，采取联合战线，于电到之时向长沙出发，以期恢复省垣原状，而资镇压。”^①

自24日到26日三天，湘潭、湘乡、宁乡的各路农军陆续开往美仑一带集结，共2万余人，组成了湖南工农义勇军中路军，杨昭植任总指挥，郭咏泉任司令，司令部设在美仑雅爱塘。5月28日，柳直荀又在株洲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浏阳的潘彊瓜、醴陵的罗学瓚、湘潭的杨昭植、株洲的谢墩山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作出了5月31日会攻长沙的军事部署。

5月下旬，许克祥的叛军进占湘潭，在湘潭反动势力的配合下，立即开始了反革命大屠杀，整个湘潭陷入一片白色恐怖

^①“漾日电报”存溆浦县档案馆。

之中。5月29日，许军分两路进逼姜畲的工农义勇军。正在这个关键时刻，长沙方面来人传达中共湖南省委的“工农武装停止进攻，等待中央调解”的命令，在陈家祠堂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决定“义勇军化整为零”，取消武装进攻长沙的计划。于是，各县农军相继退散。当许军向姜畲发起攻击时，只有杨昭植与中共韶山特委书记庞叔侃等人率领湘潭少数义勇军奋力抵抗，终因军心动摇，寡不敌众，结果为敌所败。

起义失败后，杨昭植打算潜往武汉，以便能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5月31日下午，他化装成商人模样，准备往长沙、浏阳方向转移，行至板塘铺和尚岭时，不幸被豪绅戴万富抓住。戴万富惨无人道地将他的双肩锁骨处刺穿，用铁丝穿上，解往县团防局请赏。

许克祥部营长蒋先余新任湘潭县县长，见抓到了杨昭植，欣喜若狂，立即严刑审讯，强迫他交代“潭迪”（共产党湘潭县委的代号）的名单和“潭迪”的去向。杨昭植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据资料记载：敌人“第一次用竹鞭，鞭至数千，遍体流血，他并不呼痛，反笑嘻嘻地说，‘我为工农利益而革命，是不怕打，不怕杀的’。县政府见一次无效，于是第二次用刑，叫人取一大木棍，压在他的膝盖骨上，下面塞两口砖，木棍两头各立一人，用力压迫，他的腿骨完全折断，昏死约五分钟，才抽出一口冷气，问他口供，他破口大骂。县政府见第二次办法仍旧不能使他屈服，又叫人用一铁桶，内装木炭，外面烧得通红，给他挂在背上，烧得‘哗啦’作响。这时他已经皮开肉绽，体无完肤，昏死过去了。两旁的士兵，掩着面偷偷地走开，满庭充满了残酷的空气。他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十分钟才死而复苏。他抖擞精神，又断断续续地叫着：‘工农团结起

来，打倒摧毀工农运动的军阀，杀死豪绅地主’。敌人见他慷慨激昂，不为三次酷刑所屈服，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宣布枪决。”^①

6月6日，杨昭植被刽子手架着推往刑场。他从容自若，继续向沿街群众发表演说。敌人原计划将杨昭植游街示众后，再押到仓门前去杀害，见他宣传影响太大，便改在学坪行刑。灭绝人性的敌人先砍下他的头，悬在旗杆上示众，又将他的尸体倒挂，开膛破肚，淋上煤油，放火焚烧。在场群众皆不忍睹，掩面抽泣。后来柳直荀在《马日事变回忆》一文中写道：“大革命失败后的第一个牺牲者，就是我们英勇的战士湘潭县总工会委员长杨昭植同志。杨同志的死，是在豪绅资产阶级残酷的野蛮的刑罚中死去的。”^②由毛泽东、邓演达等人署名的《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中也沉痛地指出，反动派“将湘潭县总工会委员长斩决，而以脚踢其头，更用洋油注其腹内而焚之，旁观民众，莫不愤怒万状。”^③

烈士在狱中奄奄一息之际，由难友代笔，口授遗书，托人力车工人徐富荣转交其表兄王国屏。遗书云：“我今被捕，想无活命，愿后死者继我革命精神，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杨昭植牺牲时，年仅25岁。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注明出处者外，还有：

1. 《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近百年大事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① 《革命烈士传记资料》第54页。

② 《布尔什维克》第120期，1928年5月30日。

③ 1927年6月15日汉口《民国日报》。

2. 《湖南文史资料》第6辑。
3. 《马日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 湘潭市政协编：《湘潭市文史资料》第1辑。
5. 中共湘潭县党史征集办公室编：《湘潭县党史资料》第1辑、第2辑。
6. 湘潭市总工会工运史办公室编：《湘潭工人运动大事记》（1919—1927）。
7. 《湖南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月刊》。
8. 传主的儿子杨友适、原《湘潭民报》编辑李尧阶，湖南《大公报》编辑张平子，以及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湘潭县党部常委王自申（洪伦）等人所写的回忆材料；访问曾经和杨昭植烈士共事的革命老人黄甫、陈绍清、陈绍闻、成振清（陈永清）等人的谈话记录。

袁 德 生

邓启沛 刘传政

袁德生，工人出身的优秀共产党员，安源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江西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曾任湘赣省委常委和省苏维埃主席。1934年根据地“肃反”中被诬陷致死。

(一)

袁德生，湖南省浏阳县西乡石灰嘴（今普迹乡）人，生于1894年。家庭佃农^①。幼时读书半年，成年后，辗转于湘潭、株洲、渌口、醴陵等地给地主做长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冶萍公司所属安源煤矿招工，袁德生经人介绍，到安源煤矿当了一名采煤工人。

1917年8月18日，袁德生所在的直井五段发生瓦斯爆炸，引起大火，当场烧死4名救火工人。火势蔓延到六、七、八段，洋人矿师和矿局救矿不救人，下令封闭巷道，袁德生等人冒死冲出了火海，闯出了巷道口，但来不及走出巷道的27

^①袁德生的生平和籍贯是根据他爱人张浩然写的资料，并参照1925年广州农讲所登记表、1932年湘赣省委组织部登记表确定的。

名工人被关在井下活活烧死闷死。事后矿局仅发给每个死难工人家属 40 元抚恤金，这些钱只值当时一匹马的价值的 1/5。袁德生目睹这骇人听闻的惨状，愤恨不已。

1919 年，五四爱国运动影响到了安源，袁德生心情激奋。7 月，他参加了安源工人驱逐德国矿师的斗争。可是，不久又来了几个洋教士，在工人中说教布道，企图平息工人反帝爱国怒潮。袁德生等一伙青年人，在工人周怀德的发起和带领下，夜半袭击传教士的住宅，用石块砖头砸洋人住房的玻璃、灯泡、摆设，有的洋人被砸得皮破血流。传教士在来历不明的打击下，以为安源又发生了义和团的运动，为了保命，不等通知中国地方官吏，就连夜逃往湖南去了。

1921 年，共产党人毛泽东、李立三来到安源开展工人运动。袁德生在李立三、朱少连、周怀德等的鼓动下，进入工人学校读书，参加了路矿工人俱乐部。通过工人学校的学习和参加工人俱乐部的活动，他逐步认清了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认识到只有联合起来，与资本家作斗争，才会有工人的好日子。

1922 年 9 月，安源路矿工人在李立三、刘少奇的领导下举行了大罢工。袁德生积极发动和率领直井五段工人参加了这次斗争。9 月 14 日零点，袁德生等得到罢工讯号后，立即和五段工人停止采煤，走出巷道，汇集到总平巷外面的罢工人潮中，并领着工人们迅速用煤桶和树枝堆塞巷道口，防止工贼破坏罢工。在罢工斗争的日子里，袁德生还带领五段工人粉碎了本段工头破坏罢工的阴谋活动，参加了保卫工人俱乐部、瓦解分化敌军、围困总公事房、声援李立三、刘少奇的谈判斗争。

罢工胜利后，袁德生出席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第一次

工人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当选为直井五段工人总代表，成为俱乐部 46 名总代表之一^①。1923 年初，经李立三、刘少奇介绍，袁德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

袁德生领导的直井五段工会组织有 4 个百代表，40 个十代表，338 名会员，是工人俱乐部较大的基层组织之一。他任总代表期间，重视对工人的训练和教育，规定每月 17 日为直井五段工人集会时间，届时或邀请俱乐部的领导人演讲，或组织工人学习俱乐部宗旨、章程，学习阶级斗争史，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袁德生还定期召开十人团会议，积极在工人中发展党团员。所以在俱乐部第二届工人代表大会上，袁德生继续当选为直井五段工人的总代表。以后又兼任俱乐部建筑委员会委员，分管庶务工作。还兼任过俱乐部第一届出产整理委员会委员、第三届经济委员会委员。1925 年春，党组织选拔他到中共安源地委党校学习半年，帮助他提高思想和理论水平。

1925 年 9 月 21 日，安源工人俱乐部被敌人武力封闭，工人被打死打伤 20 多名，黄静源等被捕。事件发生后，中共湘区区委书记李维汉和中央驻安源代表朱锦堂等请求中央济难会拨款救济安源工人。10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为处理安源事件作出了决议。中共湘区区委成立了“安地事件善后委员会”，善委会在安源设立了四个工作站，袁德生负责第一工作站，给受害工人家属发放救济款，安置被驱逐的工人，并组织部分工人分批去广州参加革命。10 月初，党组织亦决定送

^①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第 266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② 1932 年湘赣省委组织部制的湘赣省委成员登记表，安源工人运动纪念馆抄件。

他去广州，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二)

1925年10月，袁德生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易子义、蔡协民等安源工人一起编在甲班学习。他们学习了《中国农民》等二十多门课程，还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他学习勤奋，提高很快，为以后从事农民运动打下了良好基础。

1925年12月初，袁德生参加了彭湃率领的曲江农民运动实习队，赴韶关出席了曲江农民协会的成立大会，并就地调查农村阶级状况，学习曲江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实习结束后，农讲所第五届学员全部毕业，党组织分配袁德生等10多名学员回湖南开展铁路沿线的农民运动，为迎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做准备。

袁德生回湖南后，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运特派员，被派往株萍铁路沿线开展农民运动。袁德生沿株萍铁路由西往东，在湘潭、株洲、醴陵等县逐步恢复和建立了一批区乡农会。然后来到萍乡县境的老关火车站，同安源工人张连瑞一起，发动老关火车站周围的农民，建立了萍乡县召圣乡农民协会。3月，又从老关出发，沿着萍乡、醴陵两县边境南下，同安源工人张汝泉等人一起，在萍乡县下埠建立了萍乡县文明乡农民协会。5月建立了萍乡县排上乡农民协会。为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作了大量的发动群众工作，特别是对叶挺独立团进占攸县，取得泗汾战役和攻克醴陵等战役的胜利，起了积极的直接的配合作用。

1926年9月，北伐军从湖南进入江西。湘赣各地农民协

会相继公开活动，袁德生领导的株萍铁路沿线农村 21 个乡农民协会发展很快，到 11 月底，会员发展到 6400 多人。12 月，株萍路各农民协会一致推选袁德生和晏方贤为代表，出席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湖南省第一次农代会结束后，袁德生从长沙回到安源，被委派为萍乡农民运动特派员，同时指导萍乡党务工作。

袁德生到萍乡县后，建议开办农运讲习班，培训农运骨干力量，得到地委的支持。1927 年 1 月，他主持县第一期农讲班开学，学员 40 人，学习的课程一部分是广州农讲所的讲义，一部分是袁德生等人自编的《召圣乡农民运动》等材料。袁德生和萍乡中学的几名师生白天上课、开会，晚上编写教材，油印成册，常常工作至天明。学习期满，萍乡县委从中选拔出 18 名学员派往萍乡各区任特派员，指导开展区乡农运工作。次年 2 月，萍乡县建立了 17 个区农协会，开办了农民银行和农村消费合作社。各区乡农协还纷纷捉土豪劣绅游坵，抓贪官污吏罚款，清算祠会公堂的资产，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当时汉口《民国日报》曾热情赞扬说：“萍乡，安源党务及工农运动，极形发达，素称‘江西之冠’”^①。

1927 年 2 月，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袁德生、张连瑞等 7 人代表萍乡 8 万会员出席了大会。大会在酝酿选举省农协执行委员会时，国民党右派提出被选举人当选之后，再由蒋介石在其中进行圈定，并暗中行贿收买选票，企图将方志敏等共产党人从省农协会中排挤出去。方志敏召集袁德生等党团员商量对策，袁德生坚决反对圈定办法，主张尊重民

^①1927 年 6 月 24 日汉口《民国日报》。

主，自由选举省农协执行委员。袁德生发动萍乡代表团向大会致贺词，表示萍乡 8 万会员对省农协会方志敏及国民党左派人士万分信赖，呼吁选举他们为省农协会的领导人，从而为挫败国民党右派的阴谋起了积极作用。选举结果，方志敏、袁德生等 11 人当选为江西省农协执行委员会委员。

会后，袁德生被留在南昌工作，成为省农协委员长方志敏的得力助手。他还利用各种条件为萍乡总工会纠察队购买枪枝弹药。4 月，他参加了方志敏组织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驱逐了李烈钧，改组了国民党右派把持的省党部、南昌市党部。“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恶化。6 月，萍乡发生了反革命事变，刘昌炎、周怀德等人英勇牺牲，各级工、农会组织被破坏，农会干部遭杀害。20 多个安源工人、10 多个农会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逃到南昌，请求支援。袁德生热情接待他们，设法救济受害家属。不久，朱培德“礼送”共产党人出境，袁德生等 200 多共产党人从江西到了武汉。7 月，汪精卫在武汉反共，大革命遭到失败。此时党的临时中央决定举行南昌武装起义，中央要求江西的同志回江西工作，配合武装起义。于是袁德生又秘密回到了南昌，走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三)

1927 年 8 月 1 日，袁德生参加了南昌起义。当起义军队南下时，江西省委陈潭秋告诉袁德生，党中央计划举行湘南暴动，决定安源出来的老同志仍回安源工作。

袁德生、张明生等一批安源工人赶回安源时，党中央已开

过“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决定发动湘鄂赣粤四省的秋收暴动。8月，党派蔡以忱任中共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召集朱少连、袁德生等10多个老同志开会研究，决定在安源秘密集中市委领导下的各县革命武装力量，暗中控制萍矿矿警队，发动工人制造“洋薯古”^①等武器弹药，装备工人纠察队，做好暴动后攻打长沙的准备工作。

8月底，毛泽东巡视株洲、醴陵，听取了朱少连、袁德生等人的汇报，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制定的以长沙为中心的七县暴动计划。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后，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进攻萍乡城未克，转攻醴陵。袁德生和醴陵县委的几个同志领导醴陵南乡、东乡农民暴动，从南面进攻醴陵县城，接应第2团强渡渌水河，攻克了醴陵县城。随后又去残梅率领暴动农民去援助株洲工人暴动。株洲暴动失败后，袁德生转移到了湘潭。不久又到了老关一带，在很短的时间里，建立起萍乡县湘关区赤卫队，镇压土豪劣绅的反攻倒算。萍乡县政府成立了四个靖卫团对付赤卫队的活动。

1928年2月，湖南省委决定成立湘东特委，滕代远任书记，袁德生为特委委员。根据党中央和湖南省委的决定，特委决定发动萍醴暴动，暴动成功后同安源工人暴动队伍会合进攻长沙；如果失败就退却上山，创建湘东革命根据地。在袁德生、刘型指挥下萍乡的排上、东桥、白竺等地上万农民，攻打猎市、下埠、湘东等地的靖卫团，在小西路佛水、兔田等地实

^①“洋薯古”是工人制造的一种土手榴弹，因形状似一种叫“薯古”的蔬菜，故得名“洋薯古”。

行武装割据，焚烧契约，掘挖田膛。同时建立了一支拥有二三百支步枪和一挺机枪的武装队伍。后来敌军从醴陵出动一个师，萍乡出动两个团，加上各地靖卫团联合对萍醴地区进行“进剿”。刘型带领一部分武装和上千名干部、群众上了井冈山，袁德生等人转移到武功山麓宗里一带隐蔽游击。

袁德生在宗里恢复了党和农会组织，成立了游击小分队，并帮助建立莲花县六市党支部，设法与湘东特委恢复了联系。以后在这一带山区又陆续发展了五个党支部。这样宗里和六市便成为往返井冈山的交通联络点，后来发展成为湘东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

袁德生将在宗里、六市的工作情况报告湘东特委，希望加强这块地区的工作，建立一个新的革命基地。这时交通员送来省委紧急指示，要袁德生与朱少连去领导株洲残梅暴动。

袁德生到达残梅山区后，朱少连从衡阳出发已先期抵达，残梅暴动已基本准备就绪。浏阳、湘潭、醴陵三县交界的农民，约2000多人自带干粮和武器，以进山烧香为名，聚集在残梅山区的寺庙里。袁德生、朱少连召开会议，决定把队伍带到萍醴攸三县交界的山区去，靠拢井冈山，建立苏维埃政权。队伍出发后，前进到攸县的皇图岭时，遭遇敌军伏击，队伍被打散。袁德生突围后在安源找到了省委，向他们汇报了残梅暴动失败的情况。省委派他和袁晓祥等4人重建长沙市委，袁为市委书记，去长沙恢复党的组织。在长沙，工作刚有头绪，袁晓祥却暴露了身分，被捕叛变，供出了袁德生等人的活动情况。袁德生又回到安源。

6月，湖南省委发生了省委委员易庆和叛变事件，省委再次改组，确定廖保庭、林仲丹、袁德生、宁迪卿4人为省委常委

委，廖保庭为省委书记^①，省委机关驻安源。新省委再次确定以湖南为中心的湘鄂赣三省总暴动的战略计划。

新的湖南省委建立后开展了许多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省委派员全面巡视了湘赣边、湘东、湘南、湘西、湘西北地区；从安源选送了80名工人上井冈山当红军；还计划派出10多名学过军事的同志去红4军工作；派出二三百人到湖南各暴动区域及工业中心城市工作；其中调安源35名同志赴平江和湘南暴动区域工作^②。湖南省委与井冈山的联系也畅通了。这年初，安源市委曾派邓贞谦去井冈山联系，以后又派杜修经去井冈山，送交中央巡视员和湖南省委给毛泽东、朱德转军委的信件。信中谈到安源现有失业工人4000人，湘东特委已陆续分批派工人来井冈山当红军；省委决定井冈山为安源工人再办一个教导队，训练红军干部。同时，井冈山设在永新、宁冈的交通站，要与省委直接发生关系，至少每三日来一次安源，由湘东特委转接。杜修经下山时，带回了毛泽东给湖南省委的报告。湖南省委对于朱、毛会师后的行动计划，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并作出了有关的决议。袁德生从长沙回来后，省委即决定派他携带省委指示去井冈山，顺便巡视和帮助井冈山的工作。

袁德生在王麓水的护送下，翻山越岭，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经莲花、永新、宁冈安全抵达井冈山茨坪。毛泽东、朱德高兴地欢迎袁德生的到来，这是红4军和湘赣边界特委成立后，省委常委第一次巡视井冈山。他俩告诉袁德生，湖南省委援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人员都到了，支援的物资也收到

^① 《湖南省委最近工作状况》1928年7月3日。

^②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湖南政治军事状况及省委各特支的组织状况》（1928年7月），安源工人运动纪念馆资料。

了。袁德生面交了省委指示信，传达了省委七条决议，并指出红4军要建立一个“军事大本营”，要有补充的地区，伤病员要有医院。边界特委向省委报告的“以罗霄山脉中段为根据地的计划，省委完全同意”^①。此外还就红军作战计划，政治思想工作，对敌军的工作，根据地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工作等方面，传达了湖南省委的具体意见。这实际上为边界特委和红4军军委制定了一个工作纲领。为了确保省委决议案的贯彻执行，指示信最后明确规定袁德生“参加特委、军委工作，期限一月”^②。

袁德生在井冈山工作不到一个月。他出席了湘赣边界特委和红4军军委的一系列会议，参观了红军的营房，目睹红军指战员上下一致，餐餐红米饭、南瓜汤，夜夜睡稻草的艰苦生活。他还观看了他们严整的军事操练和五大哨口的防御工事。慰问了红军医院的伤病员，了解到医院药品奇缺，他认为有必要报告省委尽快建立交通线，长期采运药品。袁德生还访问了大小五井的贫苦农民，询问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农民赤卫队、农民暴动队的情况。他这次井冈山之行，实地考察和学习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经验。对比之下，使他认识到过去搞暴动之所以不能成功的原因，深信井冈山的道路就是今后前进的方向。

1928年7月2日，湖南省委机关再次被敌人破坏，省委书记廖保庭被捕后叛变。省委常委中只剩林仲丹一人在安源，隐居慈云寺。袁德生在这时从井冈山回到安源。他在去机关的路上感到情况异常，稍一犹疑，被敌人觉察，几个特务从机关蜂

①② 《中共湖南省委对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工作的决议案》
(1928年6月19日)。

拥而出抓捕他。袁德生打倒了前面的几个特务，越墙穿巷逃脱。在地下党同志的救应下，他不顾疲劳和危险，来到慈云寺向林仲丹汇报了工作情况。但此时湖南省委仍不承认革命低潮的形势，继续盲目冒进，于是在7月20日发出《关于目前湖南工作给湘赣边特委的补充指示信》，决定派袁德生带着信件再去井冈山，要红军向北发展，攻打萍乡、安源、浏阳，接应平江起义和湘东暴动的部队，然后会攻长沙，夺取湖南全省。从而既打破敌军对井冈山的会剿，又解除安源的燃眉之危。

这样，袁德生踏上了二上井冈山的行程。此时原省委代表杜修经、杨开明却在根据地坚持要毛泽东执行红军打湘南的计划。毛泽东召开红4军军委和边界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与会同志认为红军开往湘南危险，决定不执行省委意见。7月17日，杜、杨在酃县“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①，利用29团的乡土观念，把红军拉去攻打郴州。而江西敌人在大部红军去湘南之后，竭力进攻永新，毛泽东指挥31团的两个营，与敌人11个团周旋25天，在群众掩护下，用四面游击的方式，转战于九陇山。

8月中旬，袁德生在永新西乡找到毛泽东，面交了湖南省委7月20日信件。他代表省委要求红4军打湘东，指出：“红军的重要任务，应该将平江、湘东、湘赣边、湘南各区域的暴动力量有组织的连贯起来，使成为整个的割据。这一割据的成功，应当促进湖南省总暴动，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的联系”。要求湘赣边特委“接到此一信后，请迅速讨论执行为要”^②。同

^①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9页。

^②《中共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指示信》（1928年7月20日），安源工人运动纪念馆资料。

时信中谈到“安源工人革命情绪异常高涨，已经积聚了伟大的暴动力量，工会组织及赤卫队的组织日益发展和严密，安源总暴动正在积极准备中，很能与红军一致行动”^①。对此，毛泽东询问袁德生关于安源的工运情况，袁德生介绍说安源有500多党员，2000多工会会员，300余赤卫队队员，可以武装100多工人，但目前敌重兵压境，叛徒密探布满街头巷尾，无法活动。毛泽东又问了长沙等地工运和学运情况，袁德生只知道宁迪卿在长沙无法露面开展工作，湘西、华南安特委已被破坏，其它情况一无所知。毛泽东认为湖南工人运动没有搞起来，学生运动没有搞起来，就没有理由要搞总暴动。

晚上，毛泽东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由袁德生传达省委决定，大家讨论时认为部队北上打湘东，不但会失败，而且这里的根据地也会丢掉，所以不能执行省委指示。会议刚完，即接到湘南暴动失败和红军损失严重的急讯。毛泽东带一个营连夜出发去桂东接应战败的红28团。8月23日会合了从湘南归来的红军。8月30日湘赣敌军趁红军主力欲归未归之际猛攻井冈山，留守红军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使井冈山化险为夷。但井冈山下各县却被敌军占据，这就是打湘南造成的“边界和红军一齐失败”^②的后果。

与此同时，湖南省委设在安源的八九个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机关，均相继遭到敌人破坏。林仲丹和湘东特委书记张同泗被迫离开安源。林仲丹沿途化缘乞讨回上海找党中央。张同泗经南昌、九江、汉口回长沙后被捕牺牲。以后湘东特委派人恢复

①《中共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指示信》（1928年7月20日）。

②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安源工作，坚持了 20 多天，发展 10 多个新党员，成立了 3 个党支部，不久又被破坏。萍乡县委书记牺牲后，萍乡县委也失去了与湘东特委的联系。从此，井冈山与安源联系中断，袁德生欲归不能。

袁德生在井冈山反会剿斗争的两个多月中，大多数时间是活动于九陇山区。九陇山介于宁冈、永新、茶陵、莲花四县交界的地方，袁德生和谭思聪、龙超清、陈竞进、胡波、王怀等人恢复和建立了苏维埃区乡政权，建立四县的红军独立营、农民赤卫队、红军医院、被服厂、武器弹药修造厂等。

11 月 2 日，吉安县委给湘赣边特委和红 4 军军委送来党中央 6 月 2 日来信。毛泽东在 11 月 6 日召开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来信。袁德生以湖南省委代表的身分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根据党中央指示作出决议，决定恢复前敌委员会，由前委书记毛泽东起草一封回复党中央的信件，全面报告井冈山的详细情况和今后行动计划，要求党中央和湖南、江西两个省委继续派安源工人来“边界”工作，派 30 名党代表，30 名连排以上军官到红军中工作。考虑到“八月失败”后敌人掌握红军不少机密情况，因此，向党中央送交信件的人选非常重要。前委认为，袁德生有白区和根据地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决定派他去送信。毛泽东在信件中不但写明白由袁德生带信，而且写明“袁德生同志因为等待中央来信的讨论及答复，现在才回湖南省委。”^①

袁德生于 11 月底带着《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的重要

^① 《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 年 11 月 15 日），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资料。

函件和交通经费，回到安源，获悉湖南省委已撤至上海，于是他径直去上海找党中央。

(四)

1929年2月，湖南省委在上海调整了领导成员，准备在三四月间把机关迁至武汉。省委根据中央指示，把恢复工作的重点放在萍乡、安源等地区，尽快建立湖南省委与湘赣边特委的交通点。省委派袁德生完成这项重要的具体工作。同时，湘赣边特委在红4军转战赣南、闽西以后，决定以永新为中心，逐步向莲花、萍乡等县发展，建立更大的根据地。特委亦派人前往安源工作。春节过后，袁德生从上海回到萍乡，完成建立交通联络点的任务。

他先在安源篁箕街设立交通站，派刘炳龙负责，主要任务是传递文件和护送干部。并在城郊的五陂下设交通点进行接应，还在萍乡县城内开设布店，在旅馆设立联络点。在“春和生药店”内成立红军赣西采运处，派红军程海存回家，以药店小老板身分负责赣西采运处工作，主要任务是为红军采运物资。从武汉、长沙、株洲、醴陵等地采购西药、食盐、布匹、纸张、油墨等物资，挑运到莲花。

他还在芦溪镇设立交通站，开辟了一条武功山交通线。整个路线全在山区。这条交通线后来成为沟通上海党中央同湘赣根据地、湘赣同湘鄂赣根据地、瑞金同湘鄂赣根据地之间的主要通道。萍乡县委专门建立了一支武装交通队，有30多支枪，长期驻在茅店，保卫这条交通线，护送干部、文件、经费安全过境。袁德生常常夜半下山，亲送领导干部涉河去白区。

袁德生和谭思聪后来又从茶陵方向开辟交通线，设有三四个交通点。通过茶陵交通线，袁德生带领干部深入湘潭、长沙地区，开辟长潭区工作。通过茶陵交通线从广东购进苏区缺少的日用百货和战备物资。

在秘密交通工作中，袁德生执行党的指示，联络党员，恢复整顿党组织，铲除叛徒，派人打进敌人的党、政、军、警、宪、特机构中去，还开设商店、旅馆，使地下工作人员有公开的合法的职业掩护，并严格执行党中央特科规定的工作制度和纪律。他和交通员神出鬼没地进出苏区和白区，机智勇敢地通过敌人哨卡。有时化装成轿夫，替土豪劣绅抬轿，将黄金放在土劣的座位下面，安全过卡。有时化装成农民挑粪种地，将文件用油纸包好，再封上腊，放在粪桶里，平安过境。就这样，一批批干部、电讯人员，一份份重要文件、情报，一担担药品、物资转运到了根据地。

9月，中央决定湘赣边特委改由江西省委领导，后为赣西南特委组成部分。次年8月1日湖南省委决定正式恢复建立湘东特委，机关设在安源，实际设在萍乡的桐木乡，并确定张启龙、袁德生、石青等人为常委，张启龙任特委书记。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红军独立团。会后，袁德生、谭思聪在南面几县活动；张启龙、石青在北面几县活动，着手开展组建独立团的工作。9月，红1方面军从长沙退兵经醴陵时，毛泽东建议湘东特委建立红军独立师，并答应从红1方面军中抽一名干部当师长。湘东特委随即在萍乡宗里召开会议，决定建立湘东独立师。独立师成立后，接连打了两次胜仗，到年底，部队扩大到1500人枪，创建了武功山革命根据地，湘东独立师为后来组建湘赣红6军团奠定了基础。

不久，湘东苏维埃政府在武功山麓的大安里正式成立，袁德生任主席。10月，他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1931年2月，湘东特委改为湘东南特委，袁德生任特委常委兼湘东南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1年7月，全国各革命根据地陆续成立省委。苏区中央局决定江西北路行委、赣西南特委、湘东南特委合并，成立临时湘赣省委。并将分属行委、特委领导的湘赣边、湘东南、赣西南三大块根据地，合并统一为湘赣革命根据地。指定王首道为省委书记，袁德生、张启龙、林瑞笙、甘泗琪为常委。10月8日，湘赣省第一次党代会在莲花县花塘村召开，正式成立中共湘赣省委，袁德生当选为省委常委。同月17日，湘赣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亦在花塘召开，正式成立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袁德生当选为省政府主席，张启龙、彭德怀当选为副主席。省政府机关设永新，下辖19个县，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

新生的省苏维埃政府，积极贯彻湘赣省委关于政权、土地、军队、游击战的四项决议。在袁德生的主持下，召开了县区乡三级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和整顿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府，统一了原来三个根据地的政权机构；接着重新分配土地，建立了耕牛共耕队、生产合作社、解决土地和生产问题，还实施财政经济统一，建立各级人民财政委员会，堵截公款分散、挪用的漏洞。袁德生还签署布告在全省广招银匠、铜匠、铁匠，从红军中抽调技术工人，扩建湘赣兵工厂。兵工厂人数最多时达1500人，日产子弹12万发。另外还招收女工开办被服厂，建立医院。在苏区重要交通路口广设接待站，由乡政府派赤卫队员昼夜轮班，并备有茶水、稀饭、担架，接待过往红军，转送

伤员病号。

由于袁德生在政府工作中的出色成绩，获得党和湘赣人民的信赖，因此被选为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11月7日，全苏大会在瑞金胜利开幕，袁德生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

大会期间，袁德生、王震和各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向全苏主席毛泽东汇报了各省的工作情况。当时闽西已经发生了肃杀“社会民主党”反革命案件的扩大化错误，毛泽东对张鼎丞、郭滴人说：“这样搞，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己就会垮。”^①袁德生、王震谈到，湘赣肃杀“AB团”反革命案件也有扩大化倾向，抓了很多人。毛泽东指示，你们回去告诉王首道，要纠正扩大化简单化错误，抓错了的同志要释放。

1932年2月底，袁德生、王震回到永新。他们向省委书记王首道汇报了全苏大会的情况和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王首道在3月3日主持召开的湘赣省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了袁、王的传达汇报，决定将AB团案件中抓错了的同志释放，从而制止了正在蔓延的党内、军内、政府机关内的恐怖紧张情绪，也挽救了一大批同志。这次会议还讨论通过了三个月竞赛条约，掀起春耕和生产建设热潮。

袁德生开完省委扩大会后，和省委常委刘秉常到莲花县指导工作，贯彻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他们出席了莲花县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袁德生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1932年

^①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春季的中心任务是拥军参军，开展经济文化建设，反击敌人的经济封锁，掀起生产高潮。会后，动员了一批农民参军，并将莲花县的独立团、赤卫队升编为主力红军。释放了被当作“AB团”而抓错了的同志。他还帮助莲花县苏维埃政府开办税厂、铸炉厂、织染厂、樟油厂、硝盐厂。组织农民建造了三座塘坝。又领导设立了四个赤色贸易交换所，向白区输出粮油土产，从白区输入日用百货，使莲花县很快改善了困难处境。

1932年8月1日，湘赣省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永新召开，袁德生代表省苏维埃政府作了工作报告。大会审议通过了袁德生的政府工作报告，还通过了《劳动法执行条例》、《扩大红军和健全地方武装》等五项决议。会上，袁德生再次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启龙、谭余保当选为副主席。在11月7日召开的湘赣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袁德生再次当选为省委常委。

从1931年8月至1933年4月，此时期内，湘赣根据地已发展到25个县，拥有100多万人口，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形成以永新为中心，东起吉安、永阳，西至茶陵，南起永新的关背，北至萍乡的一片红色区域。根据地拥有武装力量13700余人，并取得粉碎敌军6万多人的第三次围剿的胜利。这是包括袁德生在内的王首道、肖克、王震、张启龙、甘泗琪、张际春、谭余保以及当时在第一线工作的胡耀邦、谭启龙、王恩茂、张平化等中国共产党一大批精英的血汗结晶。

(五)

1933年1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后，从2月

开始，各个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全面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许多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遭到打击迫害。

在湘赣苏区，则发生了总工会委员长刘士杰反对省委的严重事件。刘士杰以中央颁发的《劳动法》为依据，要求全省立即普遍地增加工资，在农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其它福利待遇。袁德生认为，政府暂时不能给工人增加工资，因为根据地大多数工人分了田，尤其是战争时期，根据地经济困难，后方要保证前方的需要，政府和私人工商业者都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改善工人的生活。同时把八小时工作制度搬到农村实行也确有困难。刘士杰却不顾事实，攻击袁德生和张启龙“忽视劳动法”，“忽视党对工人经济斗争的领导”^①，是阻碍工人经济斗争和工人积极性发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刘士杰还对袁德生、张启龙在省苏训令中，写有“苏维埃接受无产阶级领导”一句话进行曲解，诬蔑这是否认共产党在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作用，是托洛茨基派观点。接着，刘士杰等人又在肃反问题上，竭力扩大打击面，把同他们有不同意见的人统统诬为“AB团”。原赣西南特委干部被打成“AB团”之后，在湘赣第二次党代会后，又有一批党的重要干部被当做“AB团”抓了。原湘东南特委的干部，永新、莲花、萍乡县委的干部，几乎人人都成了“AB团”。刘士杰居然制造伪证，诬告袁德生向一个肃反对象翻了一下手掌，说这是示意要对方翻案。

省委书记王首道严厉批评刘士杰看问题有“偏向”，“固

^① 《政治决议案草案——湘赣全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讨论》，湘赣革命纪念馆抄件。

执”、“行为过火”，把思想认识同敌我斗争混淆起来。刘士杰拒绝省委的批评，竟向临时党中央诬告王首道、袁德生、张启龙。

“左”倾的中央保卫局根据刘士杰的诬告，1933年初命令湘赣省委立即逮捕袁德生。但王首道和省委认为，袁德生是安源工人出身，党龄很长，为革命赤胆忠心，如果有问题，1931年党中央决不会指定他任湘赣省委常委和省苏维埃主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敌斗争无私无畏，做政府工作作风正派，坚持原则，生活简朴，根本不可能与反革命案件有牵连。因此，省委没有执行中央保卫局的命令。所以11月25日，袁德生、张启龙、谭余保照旧签发了省苏维埃政府的《限期完成查田运动》的命令。1934年3月2日又签发了省政府《训令（执字第十七号）》文件，这是袁德生签发的最后一个文件。

4月，苏区中央局错误地作出了《关于湘赣省委的决议》，决议的实质是要在湘赣省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并改组了湘赣省委。刘士杰、陈洪时一时得逞，窃取了省委领导权，原省委常委袁德生第一个被逮捕。接着王首道、张启龙、甘泗琪等一批领导干部被停职反省、撤职或关押。王首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袁德生、张启龙在“右”倾之外，还当作“肃反”对象加以打击，张启龙被开除党籍，先判死刑，后改判徒刑。袁德生被长期关押，遭到反复审讯和折磨，毫无口供。1934年4月未经法庭判决，被害于泰和县境的赣江中，时年40岁。

徐 洪

曾长秋 谢发达

徐洪是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由工人成长起来的红军指挥员，历任浏阳赤6师师长、湘鄂赣独1师和红18军政委，率部转战湘东赣西，威震敌胆，被苏区人民誉为“齐天大圣”。

历尽人间苦 奋起闹暴动

徐洪，原名应生，1904年元旦（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四）诞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大洛乡集阳村。家境贫苦，其父徐波连有弹棉花的手艺，农忙在地主家作雇工，农闲则走村串户揽活干。母亲陈伴莲操持家务，还纺土纱、织夏布。他们辛勤耕织，仍不得温饱。徐洪在兄妹四人中居长。全家六口，以村头两间茅房栖身，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①。

徐洪8岁时，父母节衣缩食，送他入黄狮塘小学启蒙。不到两年，徐波连积劳成疾，一病经年，背着一身债务去世。为料理丧事，徐家将仅有的两间破房作了抵押，徐洪也辍学去做放牛娃。陈伴莲无力支撑家庭，5岁的小女因饥饿死去，7岁的大女送人作童养媳，小儿子过继给了人，自己则改嫁到外

^①1980年9月对徐洪弟徐林生的访问，未刊稿。

地。徐洪自幼饱尝家破人亡之苦，从13岁起，便离乡背井，到百里开外的山区白沙镇学造纸，开始独立谋生，一干就是十年^①。

1926年夏，北伐军攻占湖南，工农运动勃兴。白沙镇成立了纸业工会，徐洪参加了工会。由于他工作积极、斗争坚决，不久，经于生灵（纸业工会委员长）和邝昌元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随后，徐洪被派往周洛发展工会组织，带领纸工与槽东^③进行斗争，迫使槽东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10月，徐洪被推选为出席浏阳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参加了县工人纠察队。

1927年春，中共浏阳地方委员会书记潘心元领导“除唐驱肖”的斗争^④，一举收缴了县警备队和全县21个团防局的700多支枪，创建了中共领导下的新型武装——浏阳工农义勇队。为了提高这支工农武装的军事素质，徐洪被输送到县军事干部训练班，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军训。干训班由黄埔军校毕业生苏先骏任教官，对学员每天施以“三操”、“两讲”的正规训练。时间虽短，但徐洪勤学苦练，掌握了基本的军事技能。5月“马日事变”发生，浏阳农军奋起进攻长沙。徐洪等干训班学员由大队长彭兰征率领，以200条枪打前锋，从东屯渡直扑小吴门，与守敌发生激战。因寡不敌众，农军撤回永安镇休

①1980年9月对徐洪弟徐林生的访问，未刊稿。

②1958年《浏阳革命史》编写组对李芳、廖才福（当年与徐洪同在一个支部）的调查。

③当地人称造纸作坊为纸槽，称作坊老板为槽东。

④“除唐”指枪毙县警备队长唐秉忠，“驱肖”指驱逐国民党右派县长肖骧。

整。干训班学员提前毕业，徐洪被调到工农义勇队第3大队（相当于营）^①担任排长。

9月，浏阳工农义勇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3团，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徐洪在白沙作战负伤，又染上疟疾，行动十分不便，东门战役受挫，他不愿被战友们抬着撤退，便主动要求离队，寄居平江县庐洞的堂姐夫家休养。不久，他参加了罗纳川领导的平江游击总队，转战在连云山麓。这期间，徐洪曾指派女党员廖惠兰打入浏阳周洛联防队，给联防队长朱可奎做佣人，暗中收集情报，并在联防队中发展中共党员。联防队的班长肖子桂、士兵戴仲宝入党后，曾多次向徐洪提供武器、药品，还协助游击队救出被捕的同志。

1928年3月，徐洪参加平江农军扑城斗争。他利用赶庙会之机，混入城内，与攻城农军里应外合，一度占领县城。不久，平江起义发生，平江、浏阳两县游击队在北风洞编为红5军第2纵队（纵队长黄公略、党代表张启龙），徐洪担任第5大队（大队长李实行、党代表吴溉芝）3中队的中队长^①。红2纵队活动在湘赣边界的崇山峻岭中。开辟了浏东双洞（大光洞、仁和洞）根据地（刘建中任苏区主席）。

这时，国民党在苏区门户沿溪桥驻有周翰团一个连，连长姓侯，外号“猴子”，专门检查和封锁进出苏区的物资。11月15日，纵队首长把拔掉这颗“毒钉”的任务交给徐洪。他受命后，率第3中队连夜下山，拂晓前趁大雾攻入肖家祠堂敌连部，毙敌30余名，缴白马1匹、枪29支。当地群众放鞭炮祝

^①《浏阳革命斗争大事记》，未刊稿，1984年印。纵队、大队、中队分别相当于团、营、连。

捷，编歌谣唱道：

天光枪声响，
“猴子”着了慌，
丢了二十九根枪，
失去一只白绵羊。^①

为了扩大新区，黄公略派徐洪率一支武装，去他做工多年的白沙打游击。徐洪在黄经岭召集30余名党员成立湘赣边特别区委（戴炳生任书记），又组织纸工、农民恢复了工会和农会。他贯彻县委关于“建立工农武装、实行抗租抗债”的指示，很快在大围山上燃起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火炬。不久，县委调徐洪到地方做军事工作，以县委特派员的身份，去浏北开展武装斗争。

统率赤六师 威震浏河畔

1929年2月，徐洪与妻子李英（平江安定桥人，在平江游击队时结婚）化装成织袜工匠，挑着一副手艺担子，寻找失散的同志。当时，北区地主民团残酷“清乡”，留下坚持地下斗争的县委负责人郭起、邹振维、彭兰征等牺牲，工作处于停顿状态。徐洪来到地处深山密林的向坪洞，吸收邢显吾等七人入党，建立了中共香谷支部。接着，他又在砖门楼恢复了罗梓

^①《浏阳县工运史》，未刊稿。“天光”是拂晓的方言，“白绵羊”指白马。

铭等 20 余人的党籍，并发展王忠昌等入党，建立了中共淳口支部。尔后，他还从人烟罕至的炉烟洞，找回失散的中共党员张正坤、苏芳、周基德、彭庚山等，恢复了北盛、蕉溪的赤色农会，重新播下革命的种子。随着北区革命力量的复兴，县委决定在砰山设立第 18 区区委，由徐洪任书记（后罗梓铭接任），还派苏芳、彭庚山在芦渚湾开设“民生”药店，作为地下联络站。

5 月下旬，中共浏阳县第二次代表会在平江小漕泥湾秘密召开，黄公略、张启龙、刘建中等 40 人与会，中共湘鄂赣特委派王首道出席指导。在这次会议上，徐洪当选为县委委员^①。县委把发展游击队作为工作重点，派徐洪组建浏北游击队。

游击队没有武器。“没有枪怎么打仗？”有些人感到发愁。徐洪眨眨眼，笑着说：“还是老办法，向敌人要嘛！”隔了几天，易俊向徐洪报告，说路口易爱能饭店有四个逃兵，喝得酩酊大醉。徐洪立即带十几个队员赶去，夺得 4 支步枪，武装了游击队。

接着，徐洪决定打击淳口镇。淳口有数十户商家，是恶霸地主朱侗人的老窝，由联防队长陈怀中带 100 多人枪守护。一年前，潘心元率农军三打朱家庄，均未得手。这次，徐洪利用陈怀中宴请乡间豪绅的机会，带 30 多名游击队员潜入镇内中共地下党员家里，区委还动员了数百名农会骨干在镇外设伏。深夜，游击队员手操大刀杀出，火烧朱氏祠堂。镇外农民呐喊助威，在煤油桶里放鞭炮。敌人从梦中惊醒，以为是红军大队打来了，争相逃命。游击队缴到 36 支步枪，以及朱侗人商号的

^① 《浏阳革命斗争大事记》未刊稿。

一些布匹、银元后，迅速撤出战斗。不久，游击队又袭击蕉溪镇，击溃守敌一个排，缴枪 10 余支、子弹一担。接二连三的胜利，震动了北区。陈怀中向县团防总局告急求援，朱倜人远逃长沙惊魂不定。上层人士、维新志士谭嗣同的堂侄谭襄泉，则主动将守家护院的 9 支步枪、1 支手枪、1 门铜炮和 1 部印刷机送给了游击队。

1930 年 2 月 8 日，浏阳游击总队第 1 支队在炉烟洞古桑成立，徐洪代表中共浏阳县委宣布：张正坤为支队长、苏芳为党代表、王震为党支部书记。这支游击队，后来一部分由王震带领参加主力红军，留下来的成为浏阳赤卫军骨干。

4 月 10 日，徐洪参加了在豆田狮子山仙人庙召开的全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当选为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部长和赤卫委员会主任^①。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决定猛烈扩大赤卫军，规定每乡一个连，三乡一个营，每区一个团，全县 24 个区，组建六个赤卫师，担负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和维护苏区治安的任务。徐洪任赤卫军副总指挥兼赤 6 师师长^②。不久，他率部投入了两打长沙、三克浏阳的战斗。

当时，浏阳除县城及几个集镇外，广大农村均为革命武装收复，成为湘鄂赣苏区的主要县。6 月，红 6 军（后改红 3 军）在军长黄公略、政委潘心元指挥下，从江西过来攻打浏阳县城。张启龙、徐洪指挥赤卫军参战，一举破城，营救出 200 多名被捕的同志，还将富商屯积的食盐，满载两船，运往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高坪。7 月下旬，红 3 军团进攻长沙，徐洪带领

①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 3 辑），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19 页。

② 《浏阳革命斗争大事记》，未刊稿。

数万浏阳农民支前。赤6师配合红8军作战，从东屯渡突破城防阵地，胜利攻占长沙。彭德怀、何长工等红军将领，高度赞扬了浏阳农军。红3军团撤出长沙后，徐洪率赤6师血战蕉溪岭，再克浏阳县城，为红1、3军团会师扫清了道路。8月下旬，徐洪所部配合红1军团作战，取得了文家市大捷，在高升岭歼敌戴斗垣旅，缴枪逾千，子弹十余万发，乘胜第三次打下浏阳县城。红1、3军团在永和镇合编红1方面军时，徐洪从赤卫军中挑选了数千名精壮兵员，输入主力红军。

毛泽东率红1方面军返江西后，何键坐镇浏阳“督剿”，企图全歼徐洪所部，根据地受到很大损失。徐洪骑着一匹小黄马，带领县总队和赤6师特务营（全师枪枝都集中此营）四处转战。不久，敌主力去江西“围剿”中央红军，守敌在淳口玉皇殿筑有一个大炮楼，扼守在平浏通道上。特务营三次攻击，前两次都没有成功。守敌居高临下，在炮楼里得意地叫着：“有本事就打进来！”徐洪命战士们搬来百多担柴草，采用火攻。炮楼被烧塌了，两个排的守军全部葬身火海。

三打玉皇殿的胜利，吓坏了浏北民团头子张忍、周首生，他们赶紧去县城搬兵。徐洪得知此事，命特务营营长张正坤率一个排，在蕉溪岭设伏，击毙周首生。张忍绕道赶到县城，纠集了八个乡的联防队，会同国民党第88团，寻找徐洪决战。徐洪所部只有500人枪，县委书记左之前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讨论对策。徐洪说：“敌人十倍于我，硬拼不行，必须避实就虚，采用引母狼入陷阱的办法，单打张忍麻子一部。”^①10月5日，特务营冒雨奔袭泮春，午夜包围了张忍民团。徐洪三发

^①熊晃：《浏阳河情思》，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信号枪响过，战士们杀入敌营，俘敌56名，仅张忍一入漏网。消息传到长沙，何键大骂部下无用。何键的女婿、第19师师长李觉不服气，说徐洪“既非讲武堂出身，也非黄埔系毕业，没有了不起的本领”，愿出兵将他“活捉到案”^①。徐洪侦知李觉派先头团从平江开赴周洛，决定趁其立足未稳，连夜偷袭。10月14日晚，徐洪挑选了60名精壮战士，手执大刀，腰揣炸弹，摸进敌团部。敌团长见营地着火、杀声震天，带领少数人逃脱。当各营敌军赶来援救团部时，徐洪已与战友们带着战利品远走高飞了。

李觉出师受挫，大失体面，将师部移至洋春，命先头团加紧推进。徐洪获得敌人将从周洛开往关山，决定利用有利地形，沿途设伏。12月3日，敌先头团的三个营陆续沿大路走来，特务营兵力不够，只能断其一臂，徐洪遂决定打敌一部。可是，当敌先头部队出现，有些人急于要打。徐洪严厉命令：“没有命令不许开枪！”直至敌主力过完，后卫营出现时，他对准骑白马的军官发了第一枪。霎时，枪声大作，号音震荡，敌军丢盔弃甲，死伤惨重。待前卫部队掉头回援时，特务营又无影无踪了。

连战皆输，何键只得将李觉调回长沙，又派刘建绪任平（江）浏（阳）绥靖处主任，继续“进剿”。可是，刘建绪对徐洪同样无可奈何。

运筹独一师 湘东敌胆寒

1931年3月1日，中共湘鄂赣省委作出决定，将各县枪

^①熊晃：《浏阳河情思》。

枝集中起来，统一编为3个独立师。浏阳、宜春、万载、萍乡的警卫营和特务营合编为湘鄂赣独立第1师，辖两团共1000余人，师长邱金生、政委徐洪。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徐洪向湘鄂赣省军区提出了“打到外线去，飞袭永安镇”的作战方案。永安距长沙仅60里，驻有敌彭位仁师一个营，沿途设有重兵。徐洪率张正坤团从江西万载的高村出发，绕开大路，翻山越岭，两天赶到芦渚湾，隐蔽休息。5月2日拂晓发起攻击，部队从南北两端打进永安镇。敌营长没想到红军会象天兵天将一样降落在省城附近，慌忙打电话求援。可是，电话线早被剪断，他只得带着少数残兵突围，此役，独1师从敌人仓库里缴到万元军饷和大量军装，满载而归。撤退时，徐洪派一个营佯攻长沙，何键不知虚实，急忙抽兵加强省城守备。徐洪却命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大摇大摆走大路返回根据地。独1师这个军事行动，震惊了长沙守敌。第二天，省城《国民日报》惊呼：“平浏赤匪昨由北盛仓窜入永安，省城戒严。”湘鄂赣省军区举行了祝捷大会，首长表扬说：“独1师象架飞机，一下飞到长沙城外，吓得何键丢魂落魄，害怕再次丢掉长沙。”^①

6月上旬，何键令陈光中师“进剿”浏阳，独1师又胜利地进行了官渡之战。官渡是浏东重镇，有一个营敌军驻守，士兵的枪托上都刻着“陈光中师长谕：消灭共匪，不成功则成仁！”^②入夜，独1师悄悄运动到官渡镇外，徐洪派人摸掉桥头哨兵，挥舞白毛巾招呼部队进镇。战斗打响后，敌军措手不及，顾不上穿衣服，满街乱窜，有的慌不择路，跳入浏阳河

^{①②}熊晃：《浏阳河情思》。

中。敌营长既没成功，也没成仁，而是乖乖做了俘虏。

9月初，徐洪率独1师参加黄坊战役，当时，驻修水之敌第32旅进犯查津，独1、2师设伏于黄坊山区，歼敌两个团及一个保安营，缴枪400多支、俘虏300余人。湘鄂赣省军区政治部为此印发了胜利捷报，徐洪及独1师指战员受到通令嘉奖。

9月23日，徐洪满载胜利硕果，赴平江长寿街参加湘鄂赣省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选出了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湘鄂赣苏区代表团，由刘建中任团长、徐洪任副团长。代表团由张正坤率武装护送至湘赣苏区，与湘赣代表团（袁德生任团长、王震任副团长）一道抵达红色首都瑞金。次年初返回，徐洪被增选为中共湘鄂赣省委委员^①。

1932年春，独1师排埠作战，抓了几十个俘虏。徐洪和葛地问了他们的家庭情况和当兵经历，向他们宣传了红军的俘虏政策，要他们各领七块光洋回家去。有个叫李浩的和另一个叫陈琳的俘虏，还以为听错了，根本不敢相信，当徐洪把光洋放到他们手里时，都感动得泪流满面。可是，事隔不久，他们又被俘虏，躲在俘虏群里不敢与徐洪见面。徐洪知他们是开释后又被国民党军抓回去的，便安慰地说：“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是红军的一贯政策，你们放下了武器，这次想回去照发路费。”过了一段时间，独1师与敌军接火，敌人阵营不战自乱，有十几个士兵拖枪投诚，为首的正是李浩和陈琳。他们当红军后，作战勇敢，先后被提拔为连长。原来有些轻视俘虏政策

^①湘鄂赣临时省委给中央的第一号简报（1932年7月20日）。

的指战员，看到徐政委的“菩萨心肠”起了作用，也改变了自己的错误看法。后来，李浩在保卫浏东苏区的战斗中牺牲，徐洪命令抢回遗体，举行了葬礼。陈琳在江西奉新县作战阵亡，徐洪十分悲恸，派人给他的家属送去抚恤费^①。

3月上旬，中共中央“左”倾错误领导者来信，批评中共湘鄂赣省委右倾，并派林瑞笙率代表团来改造湘鄂赣省委，并在红军中大搞“肃反”。徐洪是临时省委成员，不赞成“肃反”扩大化。当时，红16军在排埠打了一个大胜仗（独1师参加），可是，军长孔荷宠却在河洲上集合队伍，拉出一批所谓的“AB团”分子枪毙。徐洪劝阻无效，对他说：“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生活这么苦，很少有怨言。部队日夜行军，一走就是几百里，也很少有人开小差、当逃兵。打起仗来，个个冲锋向前，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照样冲。如果我们内部有这么多‘AB团’，能做得到吗？”^②由于徐洪的抵制，“肃反”期间，除省军区和保卫局指名要走了师政治部主任陶然、宣传部部长陈韶两人外，独1师未杀一个官兵。当年独1师的干部李信、熊晃、黎东汉等忆及此事，都满怀深情地说：“我们的命是徐洪保出来的。”^③

徐洪十分重视军民关系。他常对指战员说：“红军脱离了群众，就寸步难行。”这年秋，部队从赣返湘，前卫在枫林铺打坏农民一口水缸，没有赔钱，徐洪立即传令全师引以为戒。他发现这里被白军抢过，要求部队每日两粥一饭，节约粮食送给当地群众。徐洪对部属亦十分爱护，官兵关系融洽。师部传命

^①熊晃：《浏阳河情思》。

^{②③}1981年11月李信对徐洪的回忆。

兵陈鑫患病，徐洪给他买药；少年先锋营政委徐晃得了疟疾，徐洪为他请医生。这种新型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是独1师克敌制胜的重要原因。

创建十八军 转战湘赣边

1933年初，湘鄂赣省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努力扩大红军，发出《关于成立红六军团告全省工农劳苦群众书》^①。浏阳县中共党团组织积极响应，也发出《为拥护红六军团庆祝成立十八军告全县工农劳苦群众书》^②，明确提出：要“以红独立一、二师编为十八军”。2月10日，湘鄂赣省在浏东小河乡田心墩，召开了红18军成立大会。会场布置在清溪湾牛形下的山坳上，搭了一个台子，两边挂着“扩大百万铁的红军”和“庆祝红十八军成立”的大标语。台上坐着中共湘鄂赣省委和军区的负责人，3000名着灰布军衣的战士列在台下。当地群众敲锣打鼓，热烈祝贺。红18军辖三个团，由湘鄂赣省军区副总指挥严图阁兼任军长，徐洪被任命为政委^③。因严图阁常在军区，徐洪亦随军代行军长之职。

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湘鄂赣军区集中红军主力打阵地战和攻坚战。3月19日，红16军、红18军和鄂东南红3师汇集高村，开始四面出击。徐洪认为红18军刚由地方武装升编，只擅长游击战，要求留平浏边界活动，但遭到军区司令

^{①②}原件存湖南省档案馆。

^③《湖南近百年斗争大事记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66页；《湘鄂赣苏区史稿》第110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页。

员孔荷宠的拒绝。徐洪率部进入江西后，避实就虚，打下上高县城，杀掉县长，又挥师攻破奉新县城，歼灭民团武装。可是，军区认为敌第77师罗霖部对苏区威胁大，调红18军强攻宜丰县港口。守敌一个团，布防严密，使红18军打得相当艰苦。发起总攻后，第154团团长沙益霜即阵亡。徐洪命机枪压住敌人火力，攻破阵地一角，厮杀到夜幕降临，敌军害怕短兵相接的夜战，被迫撤走。

红军在苏区的东南部虽然初有小胜，但并没有解除敌军对苏区腹地的威胁。当时，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省军区都在万载县小源。国民党军队向小源发动重点进攻。红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保卫着苏区的每一寸土地。4月间，敌第16师彭位仁部一个旅（旅长陈铁侠）进至小源15里外的株木桥筑构阵地，形势十分严重。红16、18军和红3师接到省军区命令，星夜驰援，三军会战于株木桥。双方鏖战两天一夜，敌人援兵即至。红18军奉命打援，阻挡住敌军进攻，使主力红军取得了歼敌千名的胜利。这次战斗虽然拔除了敌军在株木桥的据点，但附近还有敌第62师陶广部一个营，控制着出入小源的交通要道小洞。于是，徐洪立即命张正坤率第156团冒雨奔袭。完成包围部署后，他挑选百名精壮战士，组成夜袭队，每人一把大刀一支枪，还有四个手榴弹，绕过碉堡，趁黑摸进敌营部。敌人没有料到红军来得这么快，很多人做了刀下之鬼，小洞据点被拔除。

6月12日，徐洪率红18军转入苏区东线，协同红16军进攻铜鼓。这一带原是独1师的游击区，徐洪熟悉地形。他建议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先佯攻排埠，调动铜鼓援敌出城。军长严图阁极力支持徐洪的建议。军区前线指挥部决定红16军

打援，红 18 军进攻排埠。徐洪率部先克守备较弱的丰田，歼敌一个营又一个连，接着又将兵力向排埠展开，终于调动了铜鼓之敌闯入红 16 军设伏的鹅公山阵地，受到痛歼。

此时，中共湘鄂赣省委根据中央指示，正在小源召开第三次常委扩大会议，改造省委领导；会议还决定遵照中革军委电令，分别将红 16、18 军改为红 6 军团的第 16、18 师，并将红 18 师由湘鄂赣调湘赣，协同肖克、王震领导的红 17 师作战，以配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因严图阁留湘鄂赣省军区任参谋长，徐洪身兼红 18 师师长、政委等职，于 10 月底率部抵井冈山麓，在永新县城与红 17 师会合。

11 月初，湘敌刘建绪部大举进犯湘赣苏区。红 17、18 师迂回敌后，在茶陵梅花山歼敌千名，又乘隙赶到潞田地区，重创敌第 77 师罗霖部一个团，俘团长以下 600 余人。从湘鄂赣到湘赣，红 18 师作战经年，损耗很大，仅有兵员千人，压缩为第 52 团，此后，又在茶陵将地方武装升编，补充了第 53 团。湘赣省军区（当时未成立红 6 军团指挥机关）为加强红 18 师的领导，调甘泗淇担任师政委，徐洪仍为师长。

1934 年初，由于红 17 师奉命远征赣西北，红 18 师留下保卫湘赣苏区，与来犯永新（中共湘赣省委所在地）的敌第 15 师王东原部展开激战，在柞源山和葡萄岭给敌以很大杀伤。由于敌众我寡，2 月 7 日，永新县城失守，省委机关由红军学校和军区警卫部队掩护，退入象形山区，徐洪率部继续与敌周旋，在花溪、黄江、龙源口等地打击敌人。

4 月 4 日，红 18 师在沙市、里田击溃敌一个团，追至永新城郊东瓜岭。敌第 15 师师长王东原的悍将侯鹏飞，指挥一个旅突然杀出，将徐洪所部包围。敌我兵力悬殊，师政委甘泗

洪又负重伤，形势十分严重。徐洪指挥部队相持到天黑，打算突围。恰逢红 17 师返回根据地，两师配合，里外夹击。侯鹏飞压不住阵脚，欲逃不及，跳下水塘，被红军战士生俘。红军一鼓作气，乘胜收复永新。

疆场洒热血 献身苏维埃

永新战役后，执行“左”倾错误的领导人认为丢失永新的主要原因，是徐洪的“游击习气”，违反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应送红军学校接受“正规训练”。1934 年 5 月，徐洪独自背着背包，默默告别部队，东渡赣江，到瑞金红军学校，名为学习提高，实为反复检讨。尽管前方战事频繁，他要求重上战场，但被“左”倾错误的执行者视为“思想右倾”者，不予安排。10 月上旬，中央红军准备突围长征，红军学校师生编为干部团随军出发。此时，徐洪才得以解脱，留在根据地降级使用。

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共中央分局，徐洪被分配去独 3 团担任团长^①，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斗争。

1935 年 1 月，中共中央分局要求各部分散突围，到粤赣、闽赣和湘赣边境开辟游击区。3 月上旬，周建屏率红 24 师从于都向南突围，进入信丰、安远地区，沿途遭敌攻击，伤亡严重，随军行动的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也中弹牺牲。徐洪接到中央分局的电令，与团政委张凯率独 3 团北上接应。行至赣江上

^①1981 年 11 月张凯对徐洪的回忆。

游的信丰江口，独3团与敌遭遇，徐洪当机立断，与张凯分兵，自己率少量兵力留下来狙击敌军，掩护张凯部突围，去完成接应红24师的任务。

两军接火后，附近的国民党警备队、挨户团闻讯赶来。徐洪为了拖住敌人，向相反的方向撤退。从早晨打到中午，徐洪等子弹耗尽，仍无法甩开追兵。身边的战士都倒下去了，徐洪知无法走脱，恐被俘受辱，用最后一颗子弹打进自己的头部，壮烈牺牲^①。

王震忆及徐洪，感慨地说：“写红6军团战史，要把徐洪写进去。在湘鄂赣，他的威信很高。后来到湘赣，他仍是红18师的师长，打侯鹏飞时还是师长，红18师的领导人应该写徐洪。”^②徐洪牺牲时才31岁。他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生前的诺言：“战争是要死人的，我们准备用千千万万个同志的生命去换取胜利。我们这一代人，就要随时准备牺牲。”徐洪的爱人李英，留在湘鄂赣苏区红军被服厂工作，在反“围剿”的战斗中牺牲。他们有三个孩子，因战斗繁忙无暇照看，留给老乡寄养，后也下落不明。徐洪和他的一家，为中国革命事业贡献了一切，将永远为人民所铭记。

作者附记：

本文承蒙王震、张启龙、张凯、李信、熊晃、黎东汉、徐晃、陈鑫、罗正坤、龚长富、周基德、赖永材、赵振湘、陈凤翔、廖惠兰、王忠昌、朱长寿、钟仕华、谭襄泉、罗湘、易武、田晃等老同志及徐洪烈士的弟弟徐林生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①1981年11月张凯对浏阳县党史工作者的谈话，存中共浏阳县委党史办公室。

^②1977年5月王震对湘赣根据地纪念馆工作人员的谈话，存永新县纪念馆。

乔国桢

宋新勇 陈德仁

乔国桢是陕西渭北农民运动和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历任中共华县县委委员、唐山市委和顺直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曾七次被捕入狱，1945年7月31日，病逝于国民党新疆第四监狱。

(一)

乔国桢，乳名虎儿，原名乔如桢，曾化名王拯民、高鹤令、乔干卿、乔胶治、贺凝、蒙子学、焦复生、高成、高子香，1907年3月15日，出生在陕西省佳县店镇乔家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乔兴斌，清末秀才。母亲勤劳贤淑。国桢兄弟三人，他排行为三。

乔国桢幼年随父读古书，1918年入私塾，1920年入店镇小学读书，1922年升入佳县单级师范，后转到山西汾阳教会学校——民义中学，1924年夏考入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三班。在绥师，乔国桢在校长李子洲（共产党员）、教务主任杨明轩、国文教员王懋廷等师辈的关怀和引导下，孜孜不倦地学习，并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同年冬，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

寒假前夕，乔国桢因抗议思想顽固保守的算术老师王汉斌而带头抵制考试，被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威迫而离开学校。他受团组织派遣赴北京，与陕籍学生刘天章接上关系。不久，刘天章根据李大钊的指示，到开封国民军第二军办学兵队，乔国桢赴开封入学兵队学习，后任班长、排长。学兵队成立中共支部，刘天章任书记，国桢先后任党小组长、党支部干事。1926年3月，国民二军与直奉军阀作战失利败退豫西，乔国桢赴北京向党组织汇报。为了培训陕西农民运动骨干，中共北方区委派乔国桢等十几名陕西籍青年到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同年九、十月农讲所第六期结业，乔国桢被派回陕西从事农民运动。那时，西安、三原等城正处在直系军阀刘镇华的重兵包围之中。冯玉祥率领国民军联军在五原誓师分兵两路援救西安，于10月12日先解三原之围。乔国桢随着在广州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驻陕办事处，就落脚在三原县的渭北中学。

乔国桢先在富平县庄里镇，后又去三原县武字区，搞农民运动。他身穿半截大衣，走村串寨，给娃娃们唱《打倒列强》歌。遇到农民，铜铃一摇，等农民围上来看热闹时，他往土堆子上一站，便开始宣传讲演。他从农民缺吃少穿，讲到土豪劣绅压迫剥削；从反动官府横征暴敛，讲到成立农民协会的好处；从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讲到自己在广州和海陆丰地区的见闻。他大声疾呼：“工人有工会，商人有商会，农民要生存，就要成立农会。”农民听后，都感到新鲜，知道了农会是庄稼汉的组织，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于是奔走相告，跃跃欲试。乔国桢见农民已发动起来，便吩咐积极分子刻公章，制红旗，筹备建立农民协会。

1926年12月14日，雪花飞舞，三原县武字区的农民手持梭镖、铁叉、木锨，打着旗帜，从四面八方涌向大寨南汉圣母庙。乔国桢站在一张桌子上，宣布农民协会成立。他抡着胳膊说：“农民协会是咱们农民自己的组织，是为地方群众办事的，要想不再受军阀的欺压，不遭土匪抢劫，保护地方，我们就得组织起来，扭成一股劲，起来斗争。”^①大会选举乔国桢为农会主席。

在这次大会上，乔国桢还代表农会宣布解散当地的民团，撤销王厚庵的团总职务，成立了农民自卫队。后来，国民军联军旅长、共产党员史可轩，派人送来十支马拐子步枪，以示祝贺。从此，农民扬眉吐气，土豪劣绅闻风丧胆，要求加入农会的人越来越多。

1927年初，陕西革命运动处于高潮。乔国桢十分注意在农会骨干中发展党员。一天，他把肖德印叫到村外，讲党的性质与纲领。当肖德印表示愿意入党时，他又说：“参加了共产党闹革命，可不能三心二意，就是敌人把刀搁在脖子上也不能动摇。”肖德印入党后，当了农民协会武装委员，斗争很坚决。乔国桢先后发展了农民党员17人，组成三个党小组，后成立了党支部。

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报告决议案》，接着成立了省党部农民运动委员会，乔国桢被任命为省党部农委渭北区办事处负责人。1927年1月24日，渭北地区农民运动办事处召集会议，乔国桢报告了武字区农民运动的情况和经验。随后，他还为三原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由于乔国

^①肖德印：《红旗初举》，《延河》1958年第10期。

桢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出色的组织才能，在渭北地区享有很高威望。农民亲切地称他为“农运大王”、“办好事的乔国老”。①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原国民军联军改称）总司令冯玉祥也称赞说：“人们还说我的兵多，我的兵到场的还不及乔先生领导的农民的百分之一。”②

（二）

乔国桢领导农民运动的事迹家喻户晓。土豪劣绅恨之人骨。几个豪绅密谋派人在楼底坡地暗杀乔国桢，捣毁农会，但没能得逞。

1927年6月，三原驻军奉命实行“清党”，到武字区包围农民协会，击伤肖德印，逼问乔国桢的去向。肖德印守口如瓶。乔国桢闻讯后，和唐亦民看望受伤的肖德印，不幸被捕，关押在三原县城驻军田玉洁部的军法处。

武字区农民获悉乔国桢被捕，纷纷到县城探监。有的带上自己家里打的“干馍饼”，有的带上在街上买的西瓜，有的写信抗议，有的联名写保状，每天有近百人。看守的士兵深受感动地说：“象乔国桢这样的人，过去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敌人见乔国桢在老百姓中影响很大，感到惊慌，连忙把乔、唐两人单独关在狱神庙，支了床板，换了干净衣服，不敢怠慢，甚至开始尊称他“先生”。

不久，许权中③率部路经三原，得知乔、唐二人被押狱

①刘护平：《悼烈士乔国桢同志》，1951年7月1日《新疆日报》。

②赵通儒：《乔国桢烈士略传》，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③许权中，陕西省临潼人，中共早期党员，时任旅长，1943年12月被害。

中，几经努力，始将乔、唐二人营救出狱。

11月，乔国桢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后，被派到长安县负责军事斗争。12月，他奉命去华县高塘，化名王拯民，公开职务是高塘民团教练，党内任中共华县县委委员。

在高塘，乔国桢和民团团长、共产党员赵锡琰（即赵和民）一起严格地抓军事操练，还派人到许权中旅带回一些子弹和手榴弹。这期间，他带领民团镇压土匪头子，打击土豪劣绅，缴获不少枪枝弹药，还为省委筹集了部分资金。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到高塘检查工作时，表扬了乔国桢等同志。

国民党当局对高塘农民武装的蓬勃发展十分仇视。1928年2月，华县县长段紫光和县公安局局长李镇山撤销了赵锡琰的团长职务，委任恶绅王文凤、姬捷三为高塘民团正副团长，企图夺取民团的领导权。

3月7日，乔国桢巧施妙计，召集了四五百名武装农民与六七百名徒手农民、二百余名学生集会，欢迎“新团总”。大会开始后，乔国桢突然命令将王、姬两人捆绑，押上台斗争。群众质问：“花了多少钱当上团长？”王文凤装死，姬捷三被吓呆，群众纷纷要求枪毙这两个恶绅。乔国桢见目的已经达到，劝住群众，把王、姬押送县城处置。

段紫光恼羞成怒，立即电告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3月8日，师长田金凯奉命率兵一营突然包围高塘小学、谷堆小学和高塘民团。由于民团早有防备，敌人扑了个空；乔国桢携带手枪，亦机智脱险，来到种金耀（即钟师统）家中隐蔽。当晚，他和县委负责人陈述善、赵锡琰商量对策，决定以种金耀家为临时指挥部，继续开展斗争。

一天，乔国桢前往县委驻地，路经南堡庞家园附近时再次被捕。不久被释放。中共陕西省委改派他去中共洛南县特支，负责宣传、农运和军运工作。

1928年7月，渭华起义失败后，乔国桢化装脱险到达天津，找到党组织，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平汉、平绥铁路秘密交通，不久被中共顺直省委任命为井陘县县委书记，后又任唐山市委委员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乔国桢到林西矿开展工运工作，化名高成，住在工人杨永福家中，白天下矿劳动，晚上与工人促膝谈心。一天，他从矿井刚上来，听说工人正在与黄色工会头子辩论，脸也顾不得洗，马上赶到现场，挺身而出，驳得对方哑口无言。他用大量事实揭露黄色工会每月收工人千元会费、不给工人办事的骗人把戏，提出应由工人查帐、进而改组黄色工会的主张，得到工人人们的拥护。这场斗争的胜利使林西矿工人更加团结一致，向矿主要求提高工资待遇。乔国桢注意在斗争中培养工运骨干，从工人中发展了20多名党员，建立了中共林西矿支部。

1929年12月，乔国桢在工人贾永发家中召开会议，被敌人发觉，第三次被捕，押送唐山，监禁在国民党市党部。乔国桢化名焦复生，据理坚持斗争，七天后的一个深夜，乘敌人警戒松弛，机智翻墙脱险，但双腿跌伤，忍痛拄着棍子离开唐山，回到天津。党组织安排他隐蔽养伤，半个月后被派到下边区任区委书记，不久又调任中共顺直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天津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河东、河北、租界和下边四个区委，都归中共顺直省委直接领导。下边区工人比较集中，党的秘密机关设在河东，乔国桢则住在租界，不论去机关

开会还是到工厂巡视，往返都有 30 里路程。他有时坐人力车，有时手中没钱便拄着拐杖步行，从未因自己腿伤而耽误工作。经费奇缺，他常常一天只能吃上两个烧饼或一个窝窝头，有时身无分文，饿着肚子奔忙。工作做完了，才找到周铁忠^①，请她熬点稀饭喝。战友们关心他，他说：“我饿点不要紧，我的工作比你们轻，你们要下车间干活，饿了是不行的啊！”

乔国桢派周铁忠到宝成纱厂工作，并通过周铁忠指导工人运动。有天晚上，他在下边区工作到深夜，无法回市区，在叫纱厂工人张玉的门时，被警察发觉。一刹时，警笛直鸣，情况危险。乔国桢急中生智，打开周铁忠的家门，躲避追捕，才化险为夷。第二天早晨，周铁忠下班后见乔国桢在屋内，觉得奇怪。乔国桢说明了夜间的险情，周铁忠深为感动，决定与国桢结为革命伴侣。他们结婚后，在郑庄子海河对面小刘庄找了一间房子，既是秘密住处，也是党的秘密联络点。

三星期后，周铁忠不幸被捕。乔国桢一边通过组织积极营救，一边坚持斗争，利用小刘庄秘密住处达半年之久。

1930 年 4 月 29 日，乔国桢在天津杨庄子 32 号开会时，因叛徒出卖第四次被捕，关押在天津警察局。

他化名高子香，一身农民打扮，用关中话巧妙地回答敌人说：“我是从陕西乡下来找亲友谋生的。”敌人严刑拷问，他始终不改口供。敌人无奈，按政治嫌疑犯，判他有期徒刑一年，囚禁在天津小西关河北省第三监狱。

当时，三监内已有中共秘密支部，书记是傅茂公(彭真)，

^①周铁忠，中共党员，乔国桢的爱人。早年加入北伐军，参加过南昌起义、海陆丰暴动。在天津，参加工人运动，不幸被捕入狱，表现坚强不屈。现已离休。

委员有郭宗鉴、詹大权、叶玉文、卢福坦(狱中名韩振明)。乔国桢入狱后，担任了支部的组织工作。狱中难友的思想比较混乱，有人提出“夺取武装，暴动出狱”的冒险主张，有人则消极地提出停止活动，等“刑满出狱后再讲斗争”。乔国桢积极协助傅茂公等狱中党的领导人，作难友们的思想工作。他利用放风的机会，对那些持冒险主张的同志说：“监狱外边还有垛高墙，暴动出狱一定会造成严重损失。我们党员是战斗员，要抓紧一切时机进行合法斗争”；对个别思想消极的难友，则鼓励他们提高斗争勇气，使党支部制定的监狱斗争任务和策略，得以贯彻，落实。

5月30日，政治犯提出改善伙食、去掉脚镣、白天放风、改善医疗条件、允许购书购报等八项书面要求，催促狱方答复。中共三监支部提出：这些合法要求如果遭拒绝，就进行绝食斗争，并强调了绝食后的三条纪律：不许单独复食，不许超出规定范围砸门毁物和乱喊乱闹，不许向监狱泄露政治犯内部情况和斗争计划。接着，党支部通过写密信和亲属探监两条渠道，将狱中斗争计划上报省委，争取社会舆论和各界力量的声援。

6月中旬，狱中难友魏振华因患重病得不到治疗而逝世。噩耗传开，同志们异常气愤。党支部因势利导，一面向狱方要求开追悼会，尽快答应八项要求；一面向难友做思想工作，使全体政治犯认识到只有团结斗争，才能生存下去；并决定绝食一餐，以示哀悼和向狱方示威。十多天过去了，监狱方面对政治犯的要求拒不答复，监狱党支部遂决定7月2日开始绝食。乔国桢组织孙振武等书写了80多封信分寄中外通讯社、报馆和部分大学，呼吁社会各界声援第三监狱的绝食斗争。

绝食的第一天，监狱长把一部分政治犯关入单人牢房，将傅茂公、叶玉文、李运昌、李光汉等20多人转往陆军监狱，妄图用分散转移的办法达到破坏绝食斗争的目的。党支部要求留在第三监狱各监房的负责人做好难友思想工作，击破敌人的阴谋。乔国桢利用上厕所、打水等机会，向大家传达支部要求，鼓励大家坚持斗争。

敌人的阴谋被挫败，绝食斗争坚持进行。第五天，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曾延毅害怕事态扩大，急忙带随从到第三监狱同政治犯谈判，表示答应政治犯提出的八条要求。乔国桢等提出要派代表到陆军监狱看望傅茂公等人，并征求他们的意见。经过争执，乔国桢等终于坐上汽车来到陆军监狱。傅茂公等听了汇报，认为八项要求警方基本答应，可以复食。随之，第一次绝食宣告结束。由于绝食斗争的胜利，政治犯去掉了脚镣，吃到细粮和蔬菜；白天牢门不关，政治犯可以互访交谈，做操，跑步；家属探望次数增加，报刊、书籍检查放宽。

因傅茂公等仍关押在陆军监狱，三监的中共支部改选，乔国桢任书记，张明远（高子林）、金城、刘慎之（刘振邦）等为委员。党支部总结了绝食斗争胜利的经验，同时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敌人反扑。

9月初，典狱长更换，敌人果然寻找机会报复。16日，共产党员张宗信，因患肺病得不到治疗，惨死狱中。政治犯悲愤交加，推举代表同狱方交涉，要求向死者遗体告别，尽快实现许诺的要求。狱方竟悍然宣布取消各种待遇，把代表关入单人牢房。17日晨，牢房门不开，政治犯重新带上脚镣，饮食也恢复到极坏水平。

乔国桢和张明远商议后，决定即日起开始第二次绝食斗争，提出：“反对监狱虐待”、“恢复被取消的生活待遇”等要求；同时将这一决定秘密上报省委，还投稿《大公报》，揭露狱方虐待政治犯的罪行。敌人阴谋败露，被迫于第四天重新打开牢房，送回单独监禁的同志，恢复了上次绝食斗争后得到的各项待遇。

党支部十分重视狱中难友的学习，设立了政治理论、文化、外文班组，个人根据自己的水平和爱好，选读马列著作，学习文化知识；请懂军事的同志讲解军事常识和作战要领。乔国桢还带领大家做早操，进行简易操练。党支部先后发展了几名新党员和几名新团员，还培养了几名积极分子。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罗章龙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中共河北省委也有人跟着成立“第三省委”，并通知第三监狱党支部归他们领导。乔国桢立即召开支委扩大会议，作出坚决不承认“第二省委”、要求立即解散“第二省委”的决议。乔国桢密写了一份报告，交给高子林出狱后带给中共河北省委。省委批转了这一报告，表扬三监党支部做得好。

在狱中，乔国桢饥病交加，瘦得皮包骨头，还染上了肺病。但他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和身体好坏，经常乐呵呵地指着牢房墙壁上那幅用铅笔画的列宁像说：“你们看，列宁活啦！他要下来指导咱们斗争啦！”

乔国桢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着每一个难友。大家看他个子高，脸黑，又有一双炯炯发光的大眼睛，便亲切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大黑瞎。他的斗争精神和艺术，给难友们以很大的鼓舞。

(三)

1931年5月15日，乔国桢刑满出狱，到北平向中共河北省委汇报监狱斗争情况并要求分配工作。河北省委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指导，派他以省委特派员的身分去内蒙古工作。正当乔国桢筹集路费、准备出发时，党内出现叛徒，使省委、省军委、团省委三个系统和北平市委遭到极大破坏，省委书记殷鉴和薄一波、乔国桢、刘澜涛、杨献珍、张友清、赵铸等200多同志被敌逮捕。

乔国桢被关押在奉系军阀管辖的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地点在北平鼓楼后门桥北的帽儿胡同。

敌人妄图彻底破坏中共的北方组织，审讯时，让李天明等老叛徒主审，廖化平（曾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等新叛徒在旁作证；并施用“指以劝降”、“严刑拷打”、“枪毙恐吓”三项法西斯手段，折磨摧残被捕的共产党人。乔国桢在敌人的法庭上大义凛然，怒斥叛徒。刽子手们将他的手脚捆绑，用杠子压腿肚子。他仍坚贞不屈。当无计可施的敌人用枪毙威胁他时，他视死如归，面不改色，始终坚不吐实。

不久，宪兵司令部对60多人判了重刑，有的甚至判了死刑。乔国桢被押上卡车，送到设在府右街南口的国民党海陆空副总司令行营军法处，与薄一波、刘澜涛、张友清等40多名政治犯关在一起。在这里，乔国桢与薄一波等利用行营军法处和宪兵司令部的矛盾，乘叛徒留在宪兵司令部还没有到军法处对质的机会，便在审讯中把问题全推到叛徒身上；凡是因叛徒指认暴露了党员身分，但敌人还没有搞到证据的人，全部翻

供；被敌人抓到证据的人，判了重刑的争取减轻；被判死刑的争取改为有期徒刑。经过机智的“翻供”斗争，不少同志减了刑。乔国桢改判八年徒刑，被送到草岚子监狱。

草岚子监狱牢房阴森潮湿，卫生条件极差，饮食极坏。乔国桢戴着几斤重的脚镣，被折磨得肺病复发，由于得不到医治，病情一天天加重。监狱长怕肺病传染，怕乔国桢病死了不好向上司交差，只好批准他保外就医，条件是随传随到。

在陕西同乡的帮助下，乔国桢先到北平德国人办的医院诊治。他的肺病已是晚期，医院拒绝收留；后在党组织的关怀下，去北平西山卧床休养。养病期间，他情绪乐观，时刻不忘党的工作，利用他的病人身分和条件，为党组织接转各种重要关系和文件，并为培养党的青年干部尽心竭力。1933年，当他得知杨虎城将军有意让南汉宸从日本回国的情况后，曾让赵和民致函南汉宸，催其迅速回国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南汉宸回国后，乔国桢专程拜访，商讨如何在西北军中开展工作等问题。

1934年5月22日，北平市委又遭破坏。宪兵在香山四府南鲍家窑丁家花园五号养病处搜捕到乔国桢和蒙仲穆，将他们囚禁在北平市公安局。6月20日，警方又将乔国桢和蒙仲穆押回西山养病处派一名巡官和两名警察日夜看守。

7月26日深夜12时左右，两名警察正在酣睡，乔国桢在病友的协助下，吃力地从后纱窗钻出逃走。他身体虚弱，三个小时才艰难地走了五里路，到玉泉山已经精疲力尽，躺在地里休息了一会，直到凌晨5时才艰难地走到万寿山南窑后村。他在村子里雇了一头驴，骑到清华大学找党的关系，正值学校放暑假，没能找到相识的同志，又坐人力车绕德胜门进入市区，新

市委的关系也没有接上。他心急如焚，手中五元钱花完了，向友人段泽生老太太借了五块大洋，坐火车赶到天津找省委接头。但省委已经搬迁，暗语变更，仍未如愿，只好返回北平。

北平不能久留。乔国桢考虑再三，决定回陕西寻找党组织。他向朋友冯素梅借了25块钱，乘火车到西安，经同乡知己辗转介绍，终于在杨虎城宪兵营找到中共地下组织。他喜出望外，将被捕和脱险情况写成密信，向上海军委留沪办事处作了汇报，并要求重新分配工作。在等待上级党组织指示期间，他曾在西安郊区南五台山休养。

11月，上海来信，派乔国桢赴天津执行联络任务。不料，抵天津刚下火车，因疲劳过度，肺病再次复发，大口吐血，昏迷一整夜不醒。党组织立即派人送他到一家私立医院治疗，后转往北平西郊罗道庄休养。

1937年6月，乔国桢的妻子周铁忠来北平，要求留在丈夫身边照料。乔国桢说：“你应该到党的工作岗位上去。我患肺病，会传染的，你不能留在我的身边。”他看到周铁忠时常流泪，便嗔怪道：“革命人掉泪不怕羞”。他十分思念寄养在湖南的小女儿，但每当周铁忠提起家庭和孩子时，却总是说：“革命胜利再谈吧！”

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乔国桢于7月9日移居北平市区，抱病投入救亡运动。北平沦陷后，日本警察于9月25日突然搜查了乔国桢夫妇的住处，党组织决定他们撤离北平。他们绕道天津、青岛、济南、徐州，于10月抵达西安。接上组织关系后，乔国桢仍去南五台休养。夫妻分离时，乔国桢对妻子说：“共产党员，就是烧成了灰，也仍然是共产党员。”

经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安排，乔国桢于1938年3月5日到达延安。3月24日，他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书面报告，汇报自己的经历和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同时要求党组织送他到苏联医治肺病，以便“早日重返前线去工作”。

1939年8月，乔国桢乘飞机经阿拉木图抵达莫斯科，住在“苦极乐”松林别墅疗养，后在莫斯科医院作肺切除手术。躺在病床上一年，他读了不少书。1940年，乔国桢转到克里米亚的肺病疗养院休养，身体恢复较快。

1941年1月，乔国桢与马明方、张子意、李握如等从苏联回国，2月初回到迪化（即乌鲁木齐）^①。由于国民党以重兵封锁了陕甘宁边区，乔国桢等暂时难以返回延安，经陈潭秋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决定他们留在新疆，协助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为名，把陈潭秋、毛泽民等秘密软禁在邱公馆；乔国桢等也被软禁在八户梁大院的一个临时“招待所”。1943年4月11日下午，盛世才派兵闯进八户梁大院，把乔国桢等用绳子捆绑起来，推入用帆布遮盖的汽车，关进新疆第一监狱。

入狱第二天，乔国桢和杨南桂、李握如三人成立了党小组，李握如任党小组长；大家商定了监狱斗争四条原则：“坚持党性，遵守立场，保养身体，努力学习。”

乔国桢为了不使他的肺病传染给其他难友，再三要求狱方将他“隔商关押”。狱方遂将他转押到第四监狱，后又关在养病室。名曰：“养病室”，实际是摧残室。四五个病号关在一

^①方志纯：《回忆新疆监狱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起，没有医生，没有药品，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利用病号进出比较方便的机会，与一、二、三、四、五监和女监联络。为此，监狱党组织决定以养病室为联络中心，指挥监狱斗争。

乔国桢根据多年监狱斗争经验，秘密写下万余字的监狱斗争意见稿，经养病室的同志详细改阅后，用不同的方式，转递给当时可能转达到的同志，使同志们了解监狱秘密斗争和公开斗争的原则、策略和方法。他还经常对难友们说：“时间是宝贵的，我只要活着，就应当学习、战斗。”^①他还注意搜集重要新闻，将报纸剪集下来，秘密传到别的牢房，使同志们得知国内外大事，以鼓舞斗志。

1945年春，乔国桢除肺病外又患了肠胃病，食欲大减，身瘦如柴，终日咳嗽不止，说一句话都要换几口气。他对难友李宗林说：“我一生的光阴多半是在监牢里折磨过去了。在牢里一次绝食斗争后，得了肺病，现在在牢里又将因肺病而死。我只希望早一点死，少受一点罪。我反省一生，对党对事业无愧于心。然而我恨监牢和疾病剥夺了我太多的时间，使我对党不能尽什么力量！”^②

5月，一同由苏联回国的李握如住进养病室，照顾乔国桢。此时，他吃饭靠人喂，大小便不能自理，已奄奄一息了。三个月后，狱方强迫李握如离开养病室，乔国桢深情地对李握如说：“我不行了，监狱生活这么长，请转告同志们：一定要坚持斗争胜利回延安。”^③分别时，乔国桢赠给李握如一把小

①《活着就应该战斗》，1983年9月27日《新疆日报》。

②李宗林：《我们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1946年8月6日《解放日报》。

③李握如：《忆乔国桢同志》，1985年第6期《革命英烈》。

剪刀留念，并托他返回延安后，打听妻子和儿女的下落。

李握如回到牢房，向监狱党组织汇报乔国桢的病情。难友刘护平听后，坚决要去照顾乔国桢。党组织同意后，刘护平装病装傻闹了几天，敌人只好把他送进养病室。

刘护平走进养病室，看到乔国桢蓬头散发，眼珠凸出，躺在床上动也不动，高烧39度，满屋是屎尿的惨状，禁不住大哭了一场。接着，他将房间打扫干净，用大家捐赠的钱买来牛奶、鸡蛋，为乔国桢补养身体。乔国桢说：“大家那样苦，我特殊吃好的，心里难受吃不下去了。”^①

病重期间，乔国桢给监狱党组织负责人张子意、马明方写了一封信：“我在病中正深刻反省，一生中虽无愧于党和人民，但大部分时间，消磨于反动派狱中，不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深为遗憾。唯望牢内全体同志必须团结一致对敌，坚持斗争。”^②谁知，这封信竟成了他的遗言。

1945年7月31日，在敌人的残酷迫害和肺病折磨下，共产主义战士乔国桢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39岁。

1956年7月1日，新疆人民政府将乔国桢的遗骨和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吴茂林等人的遗骨安葬在乌鲁木齐烈士陵园。1986年2月，彭真为佳县“国桢图书馆”题写了馆名。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1938年3月24日乔国桢给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原件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①刘护平：《悼烈士乔国桢同志》，1951年7月1日《新疆日报》。

^②1946年8月《解放日报》。

2. 《乔国桢烈士革命事略》，存陕西省档案馆。
3. 赵通儒：《乔国桢烈士略传》，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大革命时期的陕西地区农民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 天津市委党史办公室：《共产党人在天津监狱中战斗生活纪实》，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6. 熊怀庆：《天地有正气》，北京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
7. 方志纯：《回忆新疆监狱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
8. 薄一波、杨献珍、胡锡奎、张明远、李握如、蔡子伟、刘护平、周铁忠、李锦春、肖德印、李宗林、孙振武、杜松寿、赵和民、邢予洪等的回忆文章和赵通儒、高长直、杨文福、蒙仲穆、郭立三、李宏儒、尚贤、何求安的回忆材料。
9. 访问钟师统、周铁忠、赵和民、蔡子伟、高长直、米哲沉、王帝南、庞志杰、陈云樵、高登榜、乔克功、乔莎、乔石和白家驹亲属等的记录。

写作中还得到李运昌、张友渔、高克林、张达志、吴成方、孙振武、陈熙、张汉武、彭德等的关怀和指导；得到中共天津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榆林地委，中共佳县、三原、华县县委党史办公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烈士传编委会等单位和孙启蒙、高中哲、张守宪、王少民、张培林、李世勋、杜根成、乔石等大力支持和帮助。

张学思

刘永路 吴国良 胡序文

张学思是人民军队的优秀将领、中国人民海军的创建者之一，爱国名将张学良之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冀中军区参谋处长、平西军分区副司令员，辽宁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新中国诞生后，先后担任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等职。1970年5月29日在林彪、“四人帮”迫害下含恨病逝。

走出大帅府

张学思字述卿，曾用名张昉，辽宁海城县人。1916年1月6日出生于奉天（今沈阳）“大帅府”，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第四个儿子。

张学思从记事时起，穷兵黩武的父亲就经常带着他们兄弟参观奉军的阅兵演习，以便从小熏陶其掌握“兵权”的思想。6岁时，张作霖便把他接到北平顺承王府，为他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订婚仪式”。尚不懂事的小学思，一朝成了直系军阀首领曹錕的“驸马”。这是直、奉两大军阀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而攀上的“亲家”。但是，张曹联姻不出半载，亲家变成了冤

家。1922年和1924年，接连爆发了两次规模巨大的直奉战争。张作霖在第二次战争中获胜，他的势力不仅囊括东北，而且称霸中原。在张学思幼小的心灵中，父亲是个传奇般的英雄。他幻想“自己长大了，也应带兵打仗，当大官，有威势”^①。

然而，张学思儿时的这一幻想，却在母亲的影响下破灭了。他的生母许澍场，出身于河北省宛平县的一户乡村铁匠之家。许澍场早年因家乡遭灾，父亲病亡，母亲带她随着移民流落辽西新民县，靠给人缝补浆洗为生。勤劳健美的许姑娘，一日在井台打水，被过路的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张作霖看中，遂强娶为四姨太。不久，张作霖升官发迹，又续娶新人，许氏失宠被弃。然而她刚正不阿，严格教育子女，经常讲起辛酸的往事，教育张学思和他的三哥张学曾：“你们不要忘了穷人的苦，不要摆豪门公子的架子，要平民化，千万别染上纨绔之气，没出息。你们兄弟俩成人后谁要是吃喝嫖赌，我就去自尽！”^②许氏还经常给子女讲古书，告诫他们：“权势和富贵不是好东西，你们长大要自立，好好念书做学问，不要靠张家的势力吃饭！”^③

张学思后来回忆道：“如果说，父亲的愿望是把我培养成军阀的继承人，那么，母亲的教育和影响，则使我认识到家庭的丑恶，逐渐放弃了继承家业去做官的思想。”^④

在许氏的支持下，张学思8岁入省立第四小学读书，打破了大帅府“不入学堂”的禁律。在这所平民小学里，张学思不坐小汽车，不穿绫罗衣，和普通同学一起学习、劳动和娱乐。

①②③④ 《张学思自传》，存海军司令部档案室。

一次，张学思踢球误伤了一位同学，受到朱焕阶老师的批评。开晚饭时，学校突然接到大帅府的电话，老师们都为朱老师捏把汗。出乎大家的意料，原来，许夫人怕老师有顾虑，不肯管教她的孩子，特意打电话嘱咐：“张学思有错就打，不要姑息！”^①老师们感慨地议论：真是一位贤慧开明的母亲啊！

当时，东北民众的反日情绪异常高涨。小学时期的张学思，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声援“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学唱过流行的反日歌曲，听老师讲过左宝贵、邓世昌英勇杀敌的故事，在幼小的心田里埋下了反日爱国的种子。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帝国主义谋害。张学良继位执政，在东北进行了学习欧美，旨在反日的改革。张学思从大哥的身上看到了青年一代的希望。但是，这一改革只不过昙花一现。张学思失望了，更加坚定“自谋出路”的决心。

同年，张学思考入张学良主办的沈阳同泽中学，结识进步同学王金镜，共同办起进学会。可是，刚开展活动，就被当局勒令解散了。

不久，王金镜介绍王西征做张学思的家庭教师。王西征是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的好友，谈吐风格与众不同。他不讲诗云子曰，头一堂课教给张学思的是两件事：一是天天读报，给他订了《大公报》、《东三省民报》等报纸；二是广读课外书，给他购买了鲁迅的《呐喊》、《彷徨》，丁玲的《在黑暗中》等进步小说。这两件事使得在大帅府里长大的张学思感到非常新鲜。他后来回忆说：“通过看报、阅读进步小说，我的

^①朱焕阶：《张学思少年时代回忆片断》，《沈阳文史资料》第1辑。

眼界被打开了，第一次知道在大帅府外，世界上每天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除我家之外，人间尚有更辛酸不合理的事。”^①

王西征是张学思走上进步道路的启蒙老师。每次上课，他均以谈论报纸和小说为题，旁征博引，讲解时事和当时中国的弊政；介绍晓庄师范师生共同劳动共同学习的生活，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民主，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热潮，大革命的失败和蒋介石新军阀的独裁，最后还谈到社会主义苏联。这些讲述对张学思影响很大。他后来回忆说：“王先生的教育使我认识了军阀父亲的反动，打破了家庭的圈子，看到了社会的问题，从而引起我对社会的不满，认为社会应当变革。”^②在张学思的要求下，王先生为其更名为张昉。昉字意为光明和起始，以此表达张学思从新自立、追求光明的意愿。

1930年端午节，平静的大帅府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张学思书房中的进步书籍被人发现，各院都传说着：“四爷赤化了，学共产共妻哩！”张学良勃然大怒，下令把这些“共产党的书”烧掉！书虽然烧了，但张学思心中燃起的争民主、求真理的火焰却更旺了。他决心跳出令人窒息的家庭圈子，到广阔的天地去领略世间人情。1931年2月，张学思追随王西征来到北平。从此，他永远离开了大帅府。

北平入党

张学思到北平后，在王西征的帮助下，进入私立汇文中学

^{①②}《张学思自传》。

就读，吃公共食堂，住学生宿舍，决心彻底自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张学思痛感于“国恨家仇”，奋然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洪流之中。然而，由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拱手让出东三省，被全国人民骂为“不抵抗将军”，是丢失东三省的“罪魁祸首”。人们痛恨张学良，也迁怒于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因而受到同学们的鄙视和指责。张学思感到冤枉、耻辱和羞愤。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思想感情，闯进顺承王府，声泪俱下地对大哥慷慨陈词，劝他力戒毒瘾，振作精神，率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可是，张学良有难言的苦衷，身不由己。

11月初，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准备赴上海、南京向国民党最高当局请愿，要求出兵抗日。张学思满怀希望到北平火车站为请愿团送行。在请愿团的队伍中，他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好友王金镜。

不久，王金镜回到北平。他告诉张学思，这次请愿不仅一无所获，还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戏谑，令人心寒。他认为“‘九一八’是国民党卖国、不抵抗政策的结果，必须改变这个卖国政权，否则就不能抗日救国。”^①于是，张学思和王金镜开始寻找新的救国途径。他们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大革命史》、《国家与革命》等革命书籍。张学思后来回忆道：“通过阅读这些社会主义革命的书籍，知道社会有阶级与阶级斗争，中国必然走向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道路，从而有了马列主义的初步知识。”^②

1932年，张学思一边在汇文中学学习，一边主动担任汇

①② 《张学思自传》。

文民众学校的教师，为劳苦民众子弟义务教学。这期间，王金镜离开北平，去上海参加轰轰烈烈的“一二八”抗战，后又去东北组织义勇军。当他再次回到北平与张学思见面时，已是一名中共党员了。

1933年3月，立志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的张学思，经王金镜介绍，加入了中共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沙滩支部。他积极参加贴标语、散传单、飞行演讲等活动，表现得勇敢机智。当时担任反帝大同盟沙滩支部书记的关成章，也是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亲眼看到张学思在斗争中的出色表现。于是，由王金镜作为介绍人，关成章批准，张学思于4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彻底背叛了封建军阀的家庭，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斗争的光辉道路。

张学思入党伊始，就接受一项特殊任务：为了扩大武装力量，党组织决定派他和王金镜等打入东北军67军特务队做“兵运”工作，待时机成熟，把队伍拉出来，组建华北工农红军。

几天后，张学思化名黄树藩，到廊坊上下庄头特务队12大队当兵，王金镜等人亦改名下到各大队当兵。对于少爷出身的张学思来说，当兵是一道难关。开始，他连生火做饭都不会，士兵们怀疑他是上面派下来监视他们的“奸细”，对他敬而远之，称他“黄先生”，有些话也不敢当他的面说。张学思为了和士兵打成一片，努力学会干各种活。他还用讲故事的方法宣传革命道理，很快打开了局面，士兵们亲切地叫他“老黄”。

这时，中共党组织正准备筹款购买一批武器，派张学思回家想办法。张学思的母亲住在天津英租界香港路31号，此前曾派人到汇文中学找张学思，发现他“突然失踪”。母亲正为

此焦急不安，看到学思回来，就再也不肯放他出门了。张学思只好把自己的私蓄——一把德式手枪和 100 块光洋，秘密托人转交组织。

这期间，特务队的“兵运”工作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条件尚不成熟，就仓卒向外开拔，结果遭到数倍敌人的包抄，特务队被打散，很多同志被捕或失踪。

不久，张学思设法从家出走，不期遇见了死里逃生的王金镜，始得知“兵运”失数的消息。由于中共组织已遭破坏，他俩失掉了组织关系。在严重的挫折面前，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张学思没有消沉。他和王金镜研究认为，不懂得军事就无法掌握部队，必须先学会军事，将来时机成熟即可利用家庭关系，拉起一支党的武装。

西安事变前后

1934年初，张学思动员母亲资助王金镜 3000 元钱，赴东京士官学校留学。7月，张学思经张学良保荐，入南京中央军校第 10 期第 2 总队步兵科学习。在军校，他一心苦学苦练军事技术，成为全校出类拔萃的高材生。张治中教育长对张学思的军事才干称赞不绝。张学良也欣慰地说：“在七个弟弟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老四，他有志气有头脑，勤奋好学，没有一点纨绔之气。”^①

1936年春天，王金镜从东京委托张怡回国与张学思接头，并带来了中共的“八一宣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

^①访问王岳石记录（王岳石即王金镜，原旅大警备区副参谋长，现已离休）。

策略，使张学思深受鼓舞。他和王金镜约定，毕业后同去东北军工作，将其改造成为人民的抗日武装。

同年夏天，张学良从西安派特务营营长孙铭久来看望张学思。孙铭久告诉张学思：“张学良思想发生了转变，决心同共产党联合，逼蒋抗日。他在王曲镇办了军官训练团，正积极着手改革东北军。”^①张学良还嘱托张学思“在军校物色东北籍和外省的爱国进步学员，毕业后一同到东北军去，准备抗日复土。”^②

12月11日，西安金家巷2号张公馆给南京军校的张学思发来一封加急电报，要他速返西安。可是，由于张学思正在宣城野外基地参加毕业大演习，未接到这封急电。

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为了民族抗日的需要，毅然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当天夜晚，南京军校根据何应钦的手谕，在宣城野外基地秘密逮捕张学思，连夜押往军校的练习营软禁起来。

25日，张学思突然获释。他这时才得知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张学良亲陪蒋介石飞回南京。次日，张学思赶到宋子文公馆面见大哥。这一天，探望张学良将军的人络绎不绝，张学良抱歉地对张学思说：“今天我很忙，两三天后我即准备回西安，你明天再来，我有话与你详谈。”翌日，张学思如约而来，不料晴天一声霹雳：张学良被军事法庭秘密拘押审判！

1937年1月，21岁的张学思以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中央军校。蒋介石的嫡系将领胡宗南、桂永清等都来拉他到中央军工作，张学思以回东北军为由拒绝了，最后，校方决

^{①②} 《张学思自传》。

定将他留校，这实际是要把张学思控制起来。张学思去找张治中教育长，表示同意留校，但要先请一段假，回天津探望母亲。张治中同意了。于是，张学思乘上北去的列车，摆脱了国民党当局的控制，千里迢迢去寻找中国共产党。

百折不挠跟党走

1937年2月，王金镜应张学思之约专程回国。不久，在王金镜的帮助下，张学思与在北平东北大学工作的共产党员冯静安会面。冯静安答应设法帮助张学思寻找原组织关系，在未找到之前，张学思暂同他进行联系。

根据党的安排，2月底，张学思前往保定，在东北军53军130师任见习排长（后任军部上尉参谋）。从此，他在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积极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并协助冯静安创办《黑白导报》，进行抗日爱国宣传。

“七七事变”爆发后，社会上风传张学良将出来继续领导东北军。张学思受中共之托，设法打探此传虚实。8月，他到上海，见到嫂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当时，两位女眷每周轮流去溪口陪伴张学良。在她们的帮助下，国民党当局批准了张学思去探望大哥的申请。几天后，张学思和赵四小姐结伴赴奉化溪口，同行者还有一个姓黄的蒋介石的代表。

那时，张学良被软禁于溪口镇西北处的风景区雪窦山上。张学思在山上逗留四天，每日陪大哥到处游逛，但因特务们紧随左右，不便交谈正事。临别的前一天，趁着大雨滂沱之机，张学良与张学思在书房里佯作看书，躲过特务们的监视，用纸

笔进行无声的交谈（防被窃听）。据张学思后来忆述，张学良告诉他：“我曾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去抗日，他回信不允，叫我好好读书。这次他派姓黄的来，要我写信给东北军各军军长，嘱他们服从蒋的指挥，不可乱闹。”张学良嘱托张学思：“你回去找东北军各军军长，告诉他们，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他希望四弟“多看进步书，回东北军去，抗战到底！”张学思回答：“您的话我一定办到！”^①

同月，张学思在济南东北大学联络处找到冯静安。冯静安听了张学思的汇报，指示他：要充分利用抗战的大好形势和张将军所讲的那番真心话，在东北军中上层广泛联系，实现团结抗战。冯静安还告诉张学思：由于你原来的组织关系一直未找到，所以不能恢复党籍，只能重新入党。翌日，由冯静安和王仁忱介绍，张学思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为一年^②。

张学思重新入党后，由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党团书记刘澜波直接领导。刘澜波向他转达周恩来的指示，要他广泛联络东北军上层人物，做争取释放张学良的工作。

张学思积极执行党的指示，在刘澜波的具体领导下，在黄显声、高崇民等东北知名人士的协助下，历尽千难万险，奔波于济南、沧州、河间、南京、庐山、安庆、武汉、上海之间，分别找到吴克仁、万福麟、于学忠、何柱国、刘多荃等东北军各军军长和刘尚清、莫德惠、王树翰等政界元老，向他们转达张学良的嘱托。在张学思的动员下，他们每人写了一封请蒋介石

^① 《张学思自传》。

^② 张学思逝世后，1980年初，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张学思的党龄应从第一次入党的时间，即1933年4月正式算起。

石释放张学良的信。为了便于“释张”工作的开展，张学思还奉党组织之命，分别面见了戴笠、宋子文等国民党要员。戴笠仅答应：“张将军的安全无问题。”宋子文则积极表示：“汉卿不放出来，我也不再做事！”^①但是，蒋介石阴谋在“不杀不放”中收买、瓦解东北军，因此，始终没有释放张学良。

1938年1月，周恩来在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接见张学思，鼓励他说：“‘释张’工作虽未如愿，但它暴露了蒋介石的阴谋，教育了东北军广大爱国官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胜利者，蒋介石是失败者。”^②张学思在挫折面前，鼓起了更大的勇气和斗志。他向周恩来申请，要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建立一支敌后抗日武装。周恩来表示赞同，并指示道：“或回53军，或是自己搞均可，尽量发展，搞起来即向八路军靠拢。”还嘱咐他“要大胆、谨慎。”^③

这时，王金镜从东京学成回国，刘澜波派他协助张学思一起搞武装。他俩分头奔走，广泛联络东北籍的同学、旧友和志士仁人，在河南鄆城办起了近百人的东北抗日先锋游击训练班。张学思计划把这批人培养成抗日骨干，然后带回53军，发展力量，把53军变成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可是不久，53军在河间与日军交战，惨遭失败，残部溃退太行山一带。刘澜波指示张学思放弃原计划，速与新四军留守处主任彭雪枫联系，把队伍拉到确山竹沟镇，组建新四军张学思支队。张学思一面派人去确山与彭雪枫接头，一面让王金镜去武汉在黄显声处取200支步枪。但华北局势迅速恶化，国

①③《张学思自传》。

②访问解方记录。

国民党亦加紧破坏抗日武装，确山无法立足，黄显声又突遭国民党秘密逮捕，使组建敌后抗日武装的计划无法实现。

在接踵而至的挫折面前，张学思百折不挠，意志弥坚。他态度鲜明地对随从者说：“要抗日，就得跟定共产党，海枯石烂，此心不变。”^①

投入延安的怀抱

1938年4月，中共组织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将鄆城训练班人员送往延安学习。因考虑到张学良能否获释尚无最终结果，故安排张学思暂去香港待命。

在香港，张学思与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廖承志将自己珍爱的一本《论持久战》赠送给他。张学思如饥似渴地读完之后，感慨地说：“毛主席真是伟大，我多想去延安见见他啊！”^②

当时，张学思的全家都办好了出国手续。母亲特意留在香港，要说服最心爱的小儿子与她一起去美国。然而，深明大义的母亲更为儿子对祖国的赤诚之心所感动，把生离死别的痛苦埋藏心中，亲自把儿子送上飞往武汉的飞机。张学思望着机窗外伫倚而立的老母，暗暗洒下了泪水。

10月下旬，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张学思从武汉经西安抵达延安。

在杨家岭，张学思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关切地

^①访宁志远记录。

^②访王岳石记录。

说：“延安生活条件很艰苦，你能不能过得了生活关？要不要钱花？”张学思表示：延安能革命能抗日，再苦我也不怕！^①

张学思牢记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教诲，在延安马列学院勤奋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地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革命意志。他每天很早起床，把大家的洗脸水打好，把地扫干净，把火盆里的木炭火燃旺，然后跑到野外锻炼身体。他总是保持着标准的军人姿态和风度，身躯笔挺，服装整洁，情绪饱满。他以前连锄头也不曾摸过，可在开荒种地的时候，竟以惊人的毅力，每天比别人多开三分地。在马列学院总结生产的大会上，张学思受到嘉奖。同志们称赞他是模范学员。

1939年9月，23岁的张学思在马列学院毕业，担任抗大三分校东干队（即东北干部队）队长。

东干队驻扎在宝塔山上，共80多人，大都是东北籍的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为了提高队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增强实际斗争经验，张学思请吴玉章、王若飞、杨松、张鼎丞、宋时轮、孙志远等同志到队里讲课。为了改善队里的生活，他领导队员开荒种菜，喂猪养羊，自做豆腐。冬天，他带领队员进山，砍柴背柴，修窑烧炭。年底，东干队被评为抗大三分校的模范队，张学思被大家誉为模范队长。

1940年初春的一天，张学思到延安女子大学听报告，结识了女大的广东姑娘谢雪萍。共同的理想和情操，使他俩心心相印，真诚相爱了。有人感到不理解，曾为众多“名门闺秀”和女大学生追求的张学思，怎么却偏偏爱上女工出身的谢雪萍？也有人表示担心：“你们出身迥然不同，能生活在一块儿吗？”

^①访问刘惠农的记录。

张学思非常坦率地说：“我是少爷出身，恰恰不愿意找个小姐，不利于我改造世界观哪！谢雪萍纯洁朴素，我很中意。我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可以永远互相帮助，这是最令人高兴和自豪的。”^①

在东干队奔赴敌后战场的前夕，张学思和谢雪萍，还有东干队的其他几对新郎新娘一起，在宝塔山上举行了集体婚礼。在以后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中，张学思和谢雪萍甘苦与共，互敬互爱，被大家誉为“模范夫妻”。

转战华北平原

1940年9月14日，张学思率东干队告别延安，奔赴晋察冀敌后抗日战场。

10月10日，东干队抵达山西省兴县八路军120师驻地。在这里稍事休整后，贺龙师长派120师6团护送他们穿过敌人封锁线同蒲路。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东干队强行军30多小时，连续走230华里，张学思始终把坐骑让给体弱的同志，他和谢雪萍坚持徒步行军。

在河北省平山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聂荣臻司令员亲切接见了张学思。他阅读张学思带来的毛泽东的亲笔介绍信，信中夸奖了张学思，叮嘱聂荣臻酌定东干队何时挺进东北的问题。聂荣臻和张学思研究认为，目前东北还严密地控制在敌人手中，东干队尚无插足的可能。因此，电请中央将东干队留在冀中军区分配工作。

^①访张学思在延安马列学院的同班同学杨拯民的记录。

1941年1月，张学思担任了冀中军区参谋处长，下辖作战、侦察、通讯、机要、管理、警备等八个科。从此，他在华北抗日斗争最艰苦、最残酷的冀中平原，经受了战火锻炼和生死考验，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干，成为吕正操司令员的得力助手。

冀中平原几乎每天都有战斗，部队要经常行军转移。由于参谋处的情报与作战工作搞得非常出色，部队每次行动都成竹在胸，敌人刚一出动，我军即迅速转移，使敌人一次次扑空。整个抗战时期，冀中军区机关，在日伪军点线稠密、敌情复杂多变的平原上转战，曾遇到无数次险恶情况，均化险为夷。

1942年，日军为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对冀中平原实行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冀中军区根据参谋处提供的情况和建议，决定向外线转移。张学思随吕正操，率领军区27团和两个特务连，掩护冀中党、政、军、群机关2000余干部，历尽艰险，终于冲破敌人的铁臂合围，安全转移至冀南。

6月11日拂晓，在威县掌史村，军区警戒部队突然与敌接火。张学思亲去前沿侦察，迅速判明情况：敌人只是小股部队与我军突然遭遇，尚不知村中隐蔽着冀中的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据此，军区司令部决定：要隐蔽实力，麻痹敌人，拖到夜晚，设法突围。吕正操命令部队：只准用步枪、手榴弹与敌人打“蘑菇战”，不准使用重武器。就这样，我军连续打垮了敌人七八次冲锋，敌人摸不清我军实力，越输越恼，不断补充兵力，由最初的一二百人增加到二三千人，但始终未能越我战线一步。丧心病狂的日军竟使用了毒气。张学思冒着枪林弹雨，亲自到前沿部署部队防毒。

晚9时，我军分三路突围。张学思和军区政治部主任卓雄率

领一路，从村东南角突了出去，日军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小小的村子里，竟会杀出千军万马！他们惊恐万状，只顾四散逃命。

8月，转战至冀鲁豫根据地的冀中军区接到八路军总部的指示，要他们乘青纱帐茂密的时节，向太行山转移。去太行山要西跃平汉路，通过130多华里纵深的日伪封锁线。为此，张学思两次派出侦察小组化装侦察，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主持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行动方案。

按照计划，冀中军区5000人的队伍从内黄出发，渡过卫河，直插民团武装天门会的领地。天门会势力横贯浚、滑、汤（阴）三县，掌握一万多条枪，中共地下党员胡紫青担任着这支武装的参谋长。胡紫青根据事先的安排，派人给浚县日、伪政权送去情报，谎称：“夜里突然来了上万的八路军，扬言要光复失地！”愚蠢的敌人信以为真，立即紧闭城门，龟缩在碉堡内，不敢走出半步。这样，我军白天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养精蓄锐，夜晚隐蔽急行军，一枪未发，安全通过了敌人重点把守的平汉路及其两侧密集设防的地段，在太行山下，与129师胜利会师。

在八路军总部举行的欢迎冀中军区的军民联欢大会上，彭德怀副司令员当众表扬了张学思。

1943年4月，张学思任冀中军区副参谋长兼作战科科长；8月，调任晋察冀军区参谋处处长；1944年2月，又调任平西军分区参谋长。

1945年2月，张学思升任平西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在他和肖文玖司令员部署下，3月打响了扩大解放区的战役。张学思亲自带领侦察员化装侦察，率领一个团到妙峰山拔据点，又深入桃花川一带开展游击战。这次共拔除敌人十多个据

点，使解放区扩大一倍多，八路军的势力发展至北平附近。

在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里，张学思染上了疟疾，每年都要发几次。但他从不因此影响工作和战斗。有时由于“打摆子”骑不了马，他干脆让警卫员把他捆在马上。敌后战场的条件极端困难，张学思的两个孩子，都被战争和疾病夺去了幼小的生命。

驰骋白山黑水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11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第二号命令：命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等部挺进东北，协同苏军肃清日、伪、满残余，解放东北全境^①。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获悉《中苏条约》即将签字，故又发出党内指示：除李运昌部外，其余的部队可做开往东北的准备，如何行动要看形势发展而定^②。

9月中旬，中共中央根据抗战胜利后全国形势的新变化，及时作出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英明战略决策，派遣20多名中央委员率13万大军、2万名干部开辟东北根据地。张学思奉命率警卫连日夜兼程，奔赴辽宁。

1945年10月12日，29岁的张学思出任辽宁省主席。他和副主席朱其文一道，正式接收伪奉天省公署，成立了辽宁省政府。

张学思出任辽宁省主席，深得民心。东北人民在他的身

^①命令原文见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590页。

^②《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2期。

上，寄托着对张学良将军的尊敬和爱戴。每当张学思在公开场合露面，都不禁出现“万头攒动”、“翘首相望”的情景^①。张学思上任伊始，便发表《告东北同胞书》，召开各界群众大会，接见各方代表，发表广播讲话，广泛深入地宣传共产党和平、民主、自治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抢夺东北的阴谋。他大声疾呼：“东北是东北人民的东北，难道还叫下不抵抗命令的人把我们作第二次奴隶吗？难道他们早已不要了的东北被我们自己自治是不应该的吗？国民党没有任何理由向东北人民‘收复失地’！”^②

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疯狂调兵遣将，争夺东北。张学思坚决贯彻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一手抓地方，一手抓军队。他和辽宁省保安司令部政委陶铸、副司令员邓华等紧密合作，很快建立了沈阳、鞍山、抚顺、铁岭、营口、新民、辽中等八个军事领导中心。他们还以正规军20团、15团和32团为骨干，吸收了沈阳独立大队、铁西工人自卫队、总工会工人训练总队等武装，加上接收的旧军队，又招募了大批青壮年，建立了保安第1、2、3、4旅和一个训练总队，一个回民支队，大大充实了人民武装力量。

11月下旬，国民党军攻陷山海关、锦州等地。遵照毛泽东“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张学思率辽宁省政府和省军区于26日撤出沈阳，随中共中央东北局迁至本溪。

1946年3月底，《东北停战协定》签订。由美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以许光达为代表）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三人小组来到东北。张学思奉命，与中共辽东省委书记肖华和辽东省军区

^{①②}1945年11月11日《东北日报》。

司令员莫文骅一道，前往沈阳，与三人小组谈判。张学思向三人小组介绍了辽宁省民选政府的情况和群众代表的要求，义正辞严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行，坚决要求立即实行东北境内的无条件停战。

不久，正是春夏之交，东北再度燃起内战之火。张学思率辽宁省省级机关乘火车向长春转移。当列车行至梅河口车站时，突遭敌机轰炸。张学思对保护他的警卫员大声命令道：“不要管我，快去保护车向忱、高崇民！”他孤身冒着硝烟炮火，冲上火车头，欲把火车开到安全地带。这时，一颗炸弹落在车头前，路基被炸了一个大坑，列车无法开动，而敌机却仍在高空盘旋、俯冲、扫射。在万分危急之际，人民军队的高射炮怒吼了，敌机仓皇而逃。省主席亲自驾驶火车抢险，使在场的目击者无不感动。当张学思平安走出火车头时，激动的人们欢声雷动^①。

6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和辽宁省政府由长春转移至哈尔滨。8月7日，由张学思负责筹备的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议在哈尔滨隆重开幕。大会通过东北各省市民主政府施政纲领，选举产生了东北各省市行政联合办事处（后改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张学思当选为这个东北最高行政机构的副主席。

会议闭幕后，张学思率领部分机关干部和一个警卫营，冒着风雪严寒，长途跋涉奔赴南满根据地。

当时，蒋介石炮制了一个“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妄图集中兵力先消灭南满我军，然后再进攻北满，独占全东北。为此，他调集八个整编师、十余万精锐部队，分三路向南满根据

^①访当时担任张学思警卫员的汪文江的谈话记录。

地进逼。年底，整个南满解放区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濛江、抚松、长白四个县。辽宁、安东和辽南三省的党政军机关部队以及第3纵队、第4纵队的主力部队，都被压迫在这不足25万人口、荒凉贫瘠的山沟沟里。

在敌情异常严重的关头，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了以陈云、肖华为正副书记的辽东分局和以肖劲光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的辽东军区，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了以张学思、刘澜波为正副主任的辽东办事处，加强对辽东党、政、军的领导。

12月11日，陈云在临江主持召开中共辽东分局会议（即临江会议）。与此同时，肖劲光在七道江召开辽东军区会议（即七道江会议）。两个会议研究一个主题：是坚持南满斗争，还是放弃南满北撤？

张学思、刘澜波、白坚等主管地方工作的同志参加了临江会议。陈云充分发扬民主，与会者各抒己见，形成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放弃南满，撤到北满去集中力量；一是主张坚持南满斗争，反对北撤。张学思是持后一种意见的代表者。他说，从整个东北战场来看，南满和北满相当于两个拳头。蒋介石战略方针的险恶用心，就是先消灭我一个拳头，然后再消灭我另一个拳头。如果南满我军五个师撤向北满，敌人在南满就无后顾之忧，就会有十个师跟进北满。就算我3纵和4纵主力部队都到北满，顶多能对付敌人一个军，但留在南满就可以牵制敌人四个军。因此，我们必须两个拳头同时挥动，钳制蒋军力量，粉碎其“先南后北”的阴谋。他还情绪激动地说：“长白山区连土匪都能呆，我们人民军队为什么就不能坚持？！”^①

^①访问肖劲光记录。

由于前线军情紧急，临江会议在第二天傍晚中途散会。肖劲光派警卫员连夜请陈云赴七道江最后定夺。七道江会议也在是否坚持南满斗争的问题上争论不休。陈云在充分听取各种意见后，果断地说：“我们都留在南满，一个也不走！要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①

张学思听到这个英明决策，感到欢欣鼓舞。他对同志们说：“有这样一位善于集中群众正确意见的好领导，还怕我们不能打胜仗吗！”^②他恳求陈云让他去主力部队参加战斗。陈云鼓励他抓好地方部队和支前工作，并说：“没有地方工作，我们保卫临江，坚持南满斗争就没有群众基础。”^③张学思坚决贯彻中共辽东分局的指示，亲自动员和率领辽东各级地方干部下去做群众工作。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保证了主力部队的吃粮、穿衣和兵员补充、运输的需要。与此同时，张学思还指挥地方部队，破袭敌人的铁路运输线，阻止敌人向通化、临江运送兵员和物资。在火石岭战斗中，辽宁省军区警卫团1营，一举击溃了敌新1军88师的一个骑兵团，有力地配合主力部队进行四保临江的战役。

1947年春，蒋介石的“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已彻底破产，我军在东北战场上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张学思率领辽宁军区独立师、警卫团和李洪光支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反攻。在攻打辉南镇时，辽宁军区部队遇到守敌的拚死抵抗。我军攻了一天一夜没有攻进城关。张学思和参谋长解方研究了一个“渗透突击”的打法。拂晓，集中兵力，先炸毁敌人一座炮

①转引自彭嘉庆：《七道江会议与四保临江》，《星火燎原》选编之八第325页。

②③访问刘惠农记录。

楼，张学思指挥突击队，不等扫清外围即突入城关，中午全歼守敌 1000 人，解放了辉南镇。

1947 年秋，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各级人民政府，利用人民解放军反攻的大好形势，深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巩固扩大已取得的胜利成果。张学思和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白坚，率辽宁土改工作团到清原县新立屯蹲点。他们深入群众之中，调查研究，针对辽宁土改工作中出现的某些“左”倾偏差，及时进行纠正，保证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

1948 年 11 月 2 日，伟大的辽沈战役接近胜利的尾声。张学思随陈云率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从哈尔滨赶到沈阳。在沈阳的战斗尚未最终结束的时候，张学思便和伍修权一道，开始了接收沈阳的繁忙工作。

创建海军学校

1949 年初，正当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接连告捷之际，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传来：国民党最大的王牌军舰——重庆号光荣起义，开赴解放区！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自己的军舰。中共中央决定，筹建人民海军。

创建人民海军，首要任务是培养干部。周恩来建议，由张学思负责这项工作。4 月，张学思赴北平中央组织部报到，领受创建人民海军学校的任务。

9 月 21 日，张学思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海军代表的身份，出席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并作大会发言，他激动地说，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今天虽未能亲身参加这个盛典，但是他们会得到最大的欣慰。在谈到人民海军的组建时，

他说：“中国人民海军以一个幼年的资格，列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我们一定在实际行动中贯彻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号召，为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人民海军而奋斗”。^①会议休息的时候，毛泽东高兴地对张学思说：“你干海军好哇！中国的领海需要海军来保卫，沿海的岛屿也需要海军去解放，好好干吧！”^②

此后，张学思把整个身心投入到创建人民海军的神圣事业之中。他奔波于沈阳、安东（今丹东）、大连、葫芦岛之间，组织力量做打捞重庆号的准备工作。为了了解先进国家创办海军学校的情况，他与刘亚楼、张爱萍等共赴苏联访问考察。为选定一个理想的校址，他亲自跋涉，沿渤海和黄海岸勘察，最后选定大连老虎滩海湾西侧地域建校。那里依山傍海，又有现存的建筑群。可是，当时驻着苏军炮兵团团部和一营士兵，要办成交涉，需要很长时间，随同者都感到为难。张学思认为既然校址选定了，就要加快进度。他亲自奔波了两个星期，最终告诉筹建组，校址已经腾出来了。大家颇感惊奇。原来，他一面通过中共中央军委、外交部与苏方交涉，一面请大连政府物色好苏军炮兵团的新址。这样圆满而迅速地解决了校址问题。

1950年2月，大连海校正式开学。肖劲光任校长兼政委，张学思任副校长兼副政委。学校政治部主任李东野赴沈阳动员张学思妻子谢雪萍搬家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意想不到的局面。谢雪萍以为李东野在开玩笑，不相信张学思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竟为海军干了这么多的大事情。原来，十个月以前，这对

^①转引自1949年9月29日《东北日报》。

^②访问解方记录。

夫妻曾商量准备申请去农场工作，后来，张学思赴北平接受周恩来的召见，夫妻俩这段时间没照过面，也没有通过信。张学思曾七次因公出差路过沈阳，都忙得没顾上回家看一眼。李东野感慨地说：“当年大禹治水只是三过家门而不入，我们的老张已超过大禹一倍多了！”^①

建国之初，军内高级知识分子极少，办海军学校师资力量奇缺。张学思决定从地方院校招聘教师。这件事在50年代初的中国不免引起异议。有人指出，这岂不是违背以工农为骨干、以陆军为基础的建军路线？张学思认为，海军是一个技术复杂的军种，要求有高度文化、高度专业技术的人才。建军路线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所以它还应当包括吸收大量知识分子和团结、教育旧海军人员，要全面的理解和贯彻。张学思办大学本科制的正规化海军学校的计划，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肯定和批准。张学思从清华、北大及其他地方院校聘请到慈云桂、余潜修、曹修懋等著名教授来校任教。每逢新教员来校，他都要宴请，亲自把盏斟酒，问寒问暖。他遇人便讲：“古人尚懂重金礼聘，礼贤下士，共产党难道不如古人？”^②

要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环境气氛，绝非一日之功。张学思听到各种各样的反映：“知识分子抖起来啦，学校资产阶级化了！”“工农分子打天下，知识分子坐天下！”张学思深知这股错误思潮并非偶然。他顶住压力，在各种场合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团结的重要性，并现身说法，以自己出身军阀家庭，投身革命后受党的教育迅速成长的经历，宣传党的知

^①访问李东野记录。

^②大连海军学校历史档案，现存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识分子政策。几经风浪，几经捶打，海校从此成为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团结的典范。

1951年初夏，周恩来和邓颖超乘大连海校炮艇，巡视大连海湾。周恩来高兴地表扬张学思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你不仅办起了海军学校，而且已学会亲自操船，能带领学员海上实习，干得很好嘛！张学思谦虚地说：我对海军业务还不熟悉，有许多东西自己不懂。周恩来微笑着勉励他：“知难而进，边干边学。”^①

周恩来的教诲，成为张学思的座右铭，激励他更加勤奋刻苦地钻研海军专业技术。他熟悉英、德两国语言，又决心攻下俄语关，和学校聘请的苏联首席专家订了一个互教互学合同，每回见面，都要互相教给对方几句本国语。就这样，他又掌握了俄语，到他去苏联留学时，已能熟练地听俄语讲课和记笔记了。他无论多忙，每周还总要挤出两个半天和几个晚上，请教员给他讲专业课。一般需要一二年才能学完的课程，他利用工作之余，二三个月就学完了。他听完苏联专家的战术课后，便和中国教员一同研究探讨，亲自主持编写出我国第一部海军战术教材。

作为一校之长，张学思对学员关怀备至。他叫得出每个学员的名字，熟悉每个学员的情况。他十分注意从实战出发，培养学员爱舰、爱海洋的思想，给学员提出了“海上为家，岸上作客”的口号，每次学员出海实习，他都亲自加以指导。他要求学员们，要不怕晕船，不怕寒冷，不怕困难，不怕艰苦。他这种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思想，成为大连海校的校风。

1951年秋，张学思再次带领大连海校学员，代表人民海

^①访问张学思当时的警卫员赫喜春的记录。

军，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式。在先农坛体育场，他顶烈日，迎风沙，指挥学员刻苦操练，使得大连海校所代表的海军方队受到好评。

在张学思的辛勤培育下，我国的第一所海军学校，有良好的校风和优秀的教学成绩，被誉为海军军官的摇篮。一批批优秀的海军军官从这所学校毕业，驰骋祖国的海疆。

海军的好参谋长

1953年3月，张学思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带职赴朝鲜战场见习。他奔波在朝鲜海岸，考察了解朝鲜海岸防御和海上作战情况；参加了西海岸防御指挥部的海军办事处的工作，与其他指挥员一起探讨海岸防御和抗登陆作战的方案。他还在执行朝鲜西海岸防御任务的志愿军某军里，担任了代理军长的职务。由于中朝军队加强了海岸防御，粉碎了美军发动第二次登陆作战的企图；保证了朝鲜战争的最后胜利。

1954年底，为巩固海防，中央军委命令华东军区部队攻占一江山岛。这是人民解放军陆、海、空诸兵种首次联合渡海登陆作战。张学思作为海军方面负责人被派往联合指挥部，协助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指挥这场战斗。11月14日凌晨，我雷达观测站发现蒋军太平号护卫舰目标，张学思亲临岸上指挥所指挥，我鱼雷快艇奉命出击，在夜幕掩护下占领最佳攻击阵位，在太平号尚未察觉时，“轰”的一声巨响，我鱼雷已命中舰首，国民党那艘1400多吨的护卫舰葬身海底。这是人民海军史上第一次由鱼雷快艇击沉敌舰。同时也为解放一江山岛战斗

夺取制海权创造了条件。

1955年1月18日晨，张学思和张爱萍在联合指挥部再次检查潮汐、水文、气象等情况，与轰炸机、岸炮、舰艇部队不时紧张联络。总攻时间到了。顿时，在浙东辽阔的海域上，织成了海、陆、空立体战网，一江山岛在我三军协同作战下很快被攻克。战后，美国合众社不得不发布消息承认：“中国的第一次陆海空联合作战是经过周密策划而且执行得很好。”^①张学思为这个作战方案的制订和战斗的组织，倾注了心血。

1956年8月，党选派张学思去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外国系速成班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张学思非常勤奋刻苦，几乎未休过一个星期天，终于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学完了本科三年的课程，而且成绩优秀，插班进入本科四年级学习。他还利用学院图书资料丰富的有利条件，广泛查阅了大量海军资料。当时，苏美等国海军刚刚装备导弹，张学思敏锐地认识到它在未来海军作战中的重要作用，便在给海军首长的信中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60年代初，我军也装备了导弹快艇。张学思利用他留学时精心收集的海军导弹武器的数据和资料，主持编写出我军第一部《导弹艇战斗条例》。

1958年8月，张学思获得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本科毕业文凭，学成回国。他以第一副参谋长职务，主持海军司令部日常工作。人们形容他上任后，打响了三枪。

第一枪，是建立起一套司令部工作的正规化制度。在他主持下，编写出第一部《海军司令部工作条例》，经党委讨论后在海军各级司令部试行，推进了人民海军的正规化建设。”

^① 《解放一江山战斗》，载《海军战例选编》。

第二枪，明确了司令部工作方向和重心。他强调指出：司令部工作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不能并列齐抓，要重点抓三大口，即作战指挥、军事训练和组织管理，核心是作战。在他的建议下，司令部首长进行了明确分工，上下通气，大大提高了司令部的工作效率。

第三枪，带出了一个好作风。张学思集中群众的智慧，把司令部的作风归纳为五个字：“紧张、快、准确。”他以身作则，工作严谨、细致，井井有条。他的案头，有一张自订的工作计划表，每日一记载，每月一小结，十几年如一日。海军部队团以上主管干部的姓名，他都记得住、叫得出。外国海军每一细小的情况变化，他都了如指掌，他可以随口说出每一国的几乎所有军港、主力战舰的名称。在他的带动影响下，一个认真负责、雷厉风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在海军各级司令部中逐步建树起来。

1961年3月，张学思升任海军司令部参谋长。作为海军的一名杰出将领，他不仅在制订战略规划上有雄伟气概，而且身先士卒，经常亲临第一线。他首先参加了国产潜艇远航训练，取得了对国产潜艇的战术、技术性能全面鉴定的第一手资料，为各舰队领导干部在作战、训练中亲自随舰出海作业起了表率作用。

1961年9月，张学思随由一艘护卫舰、三艘猎潜艇组成的巡逻编队到西沙群岛考察。在接近西沙之际，就遇上了突然转向袭来的台风。凶猛的风浪，把二号艇上碗口粗的钢铁桅杆都折断了，舰艇摇摆倾斜36度。岸上指挥部急电编队返航，但舰艇在风浪包围中返航危险性更大。张学思毅然决定编队继续前进，到永兴岛锚地停泊。编队到达永兴岛，岸上指挥部又

来急电，告知台风中心将经过西沙群岛，中心风力将达12级，西沙没有避风良港，因此命令编队立即返航。北京首长也十分关心编队安全，来电命令返航。张学思面临着异常严峻的抉择：执行命令，自己不是编队直接领导，可以留在岛上视察，编队自己返航危险性极大；机断行事，把编队留在西沙，自己则要负完全责任，也是十分担风险的事情。经过反复思考，他又深入了解了当地气象情况和海岛四周形势，果断地下定决心，以平时少有的庄严语调向报务员口授电文：“海司并报总参，根据西沙海面的实际情况，巡逻编队不宜返航，决定留岛避风。我对此承担完全责任！”^①张学思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保证了巡逻编队的安全。几天后，台风过去了，大家对张参谋长有胆有识、果敢决策的精神十分钦佩。

1963年5月1日，我国自行建造的第一艘万吨货轮“跃进号”沉没事件震动了全球，世界各通讯社迅速作出了报道，纷纷猜测可能是遭到了水中武器的攻击，是一个政治事件。

北京也在紧急行动。罗瑞卿总参谋长向海军司令部下令尽快收集情报，作出准确判断。

各种情报资料汇集起来了，整个通宵海军司令部情报室内发生了一次又一次争论。相当一部分同志坚持认为“跃进号”是遇到了水中武器的攻击。张学思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核实，提出了疑问。凌晨4时，他与交通部等部门的领导同志到周恩来的办公室汇报。张学思根据情报分析，认为近期内并未发现潜艇在出事海区活动，也未发现布雷舰布雷，因此，触礁的可能性比较大。“跃进号”事件国际影响大，在没有充分把握的

^①访问王祖尧记录。

情况下，不宜早下结论。周恩来赞赏张学思的科学态度，采纳了他的合理建议。决定先发布“跃进号”出事的公报，事故原因待进一步调查，并委派张学思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负责组织调查工作。经过海军官兵的艰苦努力，终于在苏岩礁附近找到了沉船，经水下探测，“跃进号”确系触礁沉没，事件真相得以澄清。在汇报这次调查工作情况的会议上，周恩来高度赞扬了海军的工作，特别提到张学思是一个精通业务、有能力、有水平的好参谋长。

然而，正当海军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张学思为之竭力奋斗做出贡献的时候，前进的航道上骤起狂澜。在一次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上，担任国防部长的林彪突然发难，批评海军没有把“四个第一”摆在第一，而是变成了“四个第二”，对海军工作予以全盘否定。接着，他又派其亲信李作鹏等人到海军，拉帮结伙，扩充势力。为了树立林彪在海军中的地位，李作鹏一伙对海军建军以来的各项工作进行全面否定，如“不突出政治”，“技术第一”，“单纯军事观点”等等。张学思历来不愿把精力花在无谓争吵与辩论上，但在李作鹏一伙的攻击面前，他是非分明，曾愤慨地说：“海军是在党中央、毛主席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虽然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怎能把海军工作说得一团漆黑呢！”^①李作鹏等又把矛头指向大连海校，企图通过大连海校，进而否定海军建设的成就。一次，林彪到大连养病，看到大连海校一份“整风”材料，便借题发挥，说军事院校，都是搬的国民党旧军队、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的一套封、资、修的东西，这些资料和教材应

^①摘自张学思一次在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该统统烧掉。于是，我国海军第一所正规化院校多年积累的中外图书资料被焚一空，开了全军院校“焚书”的先例。在林彪一伙亲信罗织罪名、恶毒攻击之下，张学思和海军的主要领导被搞得无法正常工作。张学思气愤地说：“他们要搞乱海军，太不象话了！”^①他不愿再在这种黑白颠倒，自己又无法改变的局面上工作下去，便提出离开海军到六机部去工作的要求。周恩来从革命事业的全局考虑，指示海军党委：“张学思这样的人才，不能离开海军。”^②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李作鹏就窃据了海军党委第一书记、海军政治委员的要职。张学思预感到灾祸将要来临。他对妻子说：“这场运动，我们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但风暴既然来了，不用怕，也不用躲，迎上去。我们是坦然的。”^③

1967年7月21日，叶群电话向李作鹏打招呼：“张学思在东北时是反对林彪的，以前他和国民党有勾结。”李作鹏两天后搞出一份《关于张学思的严重问题》的材料，罗织了两条“罪状”：一是张学思在东北工作时，与彭真、林枫等关系很好，来海军后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二是张学思有特嫌。9月11日凌晨4时，张学思接到参加“紧急会议”的电话，到海军第一招待所时被逮捕。他面对镣铐，轻蔑地质问：“你们也太不光明正大了！既然是上级决定，那完全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宣布我的罪状，然后把我逮捕起来，为什么还要用欺骗的手段把我骗来？”^④

①②访问刘道生记录。

③访问谢雪萍记录。

④访问范朝富记录，参见范朝富：《怀念张学思同志》，1978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张学思被捕后，关在北京北郊某营区的一间阴暗、潮湿、不通风，只有十平方米的房子。他内心充满了屈辱和愤怒。入牢的第二天，他写了一封短信质问李作鹏，没有回音。再两天又质问，仍不答复。10月5日，他写信向周恩来申诉，但信被扣压，根本没有向总理呈交。一个月后，他被提审时，察觉到林彪一伙要借诬陷他达到诬陷、攻击周恩来的目的。为了挫败林彪一伙的阴谋，张学思不说假话，不出假证。他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给林彪一伙的“供词”竟是响铮铮的誓言：“为了案徇情编造事与实违，愿身殉共产主义万死如归。”^①

张学思不屈的斗争，使“专案组”一筹莫展。李作鹏气急败坏地说：“你们搞不出问题来，是不是还要把张学思请回来当参谋长！”从此，张学思遭受到更残酷的摧残。1970年2月18日晚，他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为全身血行播散性结核；肺原性心脏病；重度营养不良。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即指示抢救，但已病入膏肓。5月29日，张学思含恨离世，享年54岁。临终前，他愤然疾书“恶魔缠身”^②四个大字，表达他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深仇大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学思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昭雪，他的业绩和英名永远彪炳青史。

作者附记：

本文资料除部分参阅了正式出版的报刊图书外，主要来源于查阅内部档案和访问有关同志：

1. 海军司令部保存的张学思档案，内有张学思1951年写的自传；张

^{①②}张学思专案复查档案。

学思在海军司令部工作期间有关他的文电、信件、会议发言等文字资料；“文革”中张学思的专案和复查平反材料。

2.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解放战争时期辽宁省党政组织机构的变迁和张学思任职的委任状；张学思筹备召开的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议文件和图片；清原县土改情况等资料。
3.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国民党中央军校有关资料。
4. 大连海军学校（现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校史档案。
5. 访问肖劲光、吕正操、解方、吕东、高存信、肖文玖、杨拯民、王岳石、刘惠农、马洪、刘道生、杜义德、范朝富、李东野、王西征、朱焕阶、王振乾、宁致远、原星、王祖尧等 200 余位同志的谈话记录。张学思夫人谢雪萍为资料收集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帮助。访问记录现均存作者处。

何 伟

罗英甫 向庆祥 徐永昭
孔令清 周圣亮

何伟，1934年大学毕业，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投身革命近40年中，担任过党、政、军、民、学、文教、外交等各个战线上的领导工作。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殚尽全力，成绩卓著。他的一生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一生。

(一)

何伟，原名霍恒德，1910年4月20日出生于河南省汝南县一个偏僻的农村——刘庄。

何伟的父亲霍久乐，读过几年私塾，受家传医道，在村里开了个中药铺，行医于乡里。他经年操持，颇有积累，遂购置田产，雇工经营，逐渐跻身于地主阶级行列。他信奉基督教，并带领全家加入了基督教会。辛亥革命时期，他受到孙中山倡导的“打倒清朝”、“推翻专制”、“自由平等”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后来，他不断将这些思想讲给年幼的何伟听。

何伟9岁时，入本村私塾受启蒙教育。13岁转入基督教

在汝南县城办的信义高小读书。1926年冬，北伐军占领武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正在信义中学读书的何伟，因传教士逃跑，学校停办而辍学在家。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汝南的活动发展迅速，建立了县委，并在农村发展党员建立支部。何伟的二哥霍德轩，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加入了共产党，霍家也就成了共产党人、革命者活动的集中场所。1927年5月，北伐军进入汝南，何伟在他二哥和其他同志的带领下，积极参加了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农民与北伐军联欢等活动。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何伟的二哥和其他同志被迫转入秘密活动。这些大的变化，引起了何伟的深思，也给他以很大的启迪，正如他以后在回忆这段情况时说的：“大革命给我留下深刻的影响，认为革命是对的，万恶的军阀和土豪劣绅是应该打倒的，痛恨老蒋破坏革命。……这些思想对于我以后走向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①

1928年春，湖南益阳信义大学招收新生，汝南的基督教信义会举荐何伟去报考。结果被录取并免费进入该校预科一年级。1930年益阳信义大学与武汉教会学校文华大学合并，改名为华中大学，何伟随学校来到武汉。

武汉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华中大学又是一所条件较好，书籍较多的学校，这对何伟探索救国真理极为有利。他一头扎进图书馆，开始接触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后又阅读了列宁的《帝国

^①《何伟自传》，未刊稿，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主义论》等书，“深感所论极对”^①。他还到国立湖北省图书馆研读《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通俗资本论》和《自然辩证法》等马列著作，并和他的同窗好友黄心学、成庆生等组织读书会，秘密联络进步师生，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据当时华大蔡尚思教授回忆：“他常到房中来密谈，既志同道合，便大买马克思主义理论新书，暗地互相借阅约百种。”^②此外，他们还翻译一些进步文章，介绍苏联作品，送到进步的刊物上发表。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使何伟的思想起了大变化。一天，他居然以撕毁大主教像的行为，表示他同基督教的决裂。从此，他由一个教徒变成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

1934年秋，何伟大学毕业。他怀着希望和忧虑的复杂心情，踏入了社会。

毕业后，何伟受聘到一所教会学校——汉口圣罗以女中任教，教国文、历史和地理三门课程。在国文课中，他满怀激情地讲授《林觉民绝命书》，讲述黄花岗72烈士的英雄事迹。他启发学生说：“旧中国视人民如草芥，能为革命而死，以一己之死求中国之新生，则是豪迈光荣的事。”他讲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引导学生用这个观点观察周围的人和事，开拓视野，追求光明和进步。

在国民党反革命派统治下的武汉，白色恐怖严重。何伟认识到只有唤起民众，才能冲破精神的牢笼。他以汉口生活书店为阵地，团结了武汉各界进步人士，如孔罗荪、黄心学、成庆生、史略、顾一凡、李汝俊、梁妮琳、何功伟、韩大镛等人，

^①《何伟自传》。

^②蔡尚思：《青年时期求师治学论》，载《人物》1983年第3期。

并组织了读书会。在何伟的带领下，读书会不仅结合中国社会实际研究马克思主义，探讨救国的真理，而且把进步书籍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平心的《中国近代史》和邹韬奋的《萍踪寄语》以及进步刊物《大众生活》、《世界知识》等，公开或秘密地介绍、传递给要求进步的武汉各方人士。

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很快传到武汉，江城怒吼了。三镇进步学生自动串联成立了武汉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领导了为期四天、有数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何伟和读书会的成员以及由他“细心培养的学生们，同武昌其他学校的优秀青年一起积极参加，成为武汉学生青年运动的骨干力量。”^①何伟联络各界进步人士筹建抗日救国会；通过《大光报》办了《新女性》、《新文学》，作为抗日宣传的刊物；还组织了新文学研究会，以团结爱国青年和文化界人士，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武汉文化界抗日救国会。

1936年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准备成立全国性的抗日救亡组织。中共派李家栋（董毓华）来武汉找到了何伟，并向他介绍了抗日形势以及准备成立全国救国会的意见。何伟立即将此消息转告了武汉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和一些秘密救亡组织的负责人。大家一致推选何伟作为武汉代表，去上海参加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的筹备会。

5月31日，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在上海成立，何伟被选为执行委员（常委）。在这段时间里，他阅读了中共“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不久，经李家栋介绍，

^①范元甄：《白色恐怖下的播火人》，未刊稿，存作者处。

何伟到了天津。1936年夏，经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铁夫等介绍，由中共北方局批准，何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名字霍恒德改为何伟，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二)

何伟入党不久，便带着天津中共组织和“全救”交给的任务，去武汉恢复和发展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救亡活动。

何伟到武汉后，用何立人的名字和上海“全救”保持联系，经汉口生活书店顾一凡传递信件和会刊《救亡情报》。他又以汉口生活书店读书会的成员为骨干，武汉文化界救国会为基础，开始筹备武汉各界救国会。在何伟的领导下，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武汉各界救国会于1936年底秘密成立。

何伟在建立救国会的同时，积极恢复武汉的中共组织。他按照党的指示，先后找到地下党员习东光和陈约珥（王锡珍），由他们三人建立了中共武汉临时工委。随后，发展了史鑫山（史略）、陈颀宇（陈岱）、黄心学等一批党员，建立了一批支部，从而使被国民党反革命派破坏了多年的武汉党组织得以恢复，并为中共湖北省委的建立打下了初步基础。

11月23日，“全救”领导人沈钧儒等7人被国民党逮捕，“全救”工作无人主持，而青年党、国社党以及一些流氓文人和托派都想趁机夺取“全救”的领导权。因此，“全救”数次打电报给何伟，要他速去上海主持一切。

何伟来到上海，以常务理事的身分主持了“全救”的工作。他把“全救”的三大秘书石不烂、徐雪寒和吴大琨以及胡子婴等组织起来，在宋庆龄领导下，开展了一场公开营救

“七君子”的活动。这期间，何伟曾赴南京向国民政府行政院递交请愿书，呼吁团结抗日；还到苏州法院要求释放“七君子”。在“全救”的推动下，营救“七君子”的活动，变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何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根据中共中央“逼蒋抗日”的精神，统一了“全救”对西安事变的认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答应的六项条件并未完全兑现，“释放上海爱国领袖”成了一纸空文，激起了“全救”成员的强烈不满。1937年1月，“全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决定由宋庆龄出面发动一场全国性的营救爱国领袖出狱运动，以推动当局立即表示抗日，实现诺言。何伟亲自到北平、天津、太原、济南各地部署这一行动，同时向天津中共组织作了请示汇报。

何伟在完成北方工作任务返回上海路经南京时，去找南京学联负责人李庚。因不知道李已于前一天被捕，家中有特务看守，当何伟到李家时，遭敌逮捕。

在狱中，特务们使出了卑鄙伎俩，对何伟一再进行拷问、诈骗，何伟立场坚定，严守党的机密，义正词严地宣传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直到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和沈钧儒先生等人的营救，何伟才在同年8月出狱。

何伟出狱后，来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会见叶剑英、博古，汇报了被捕入狱经过，并要求电告北方局恢复组织关系。经组织审查后，不久，他恢复了党的关系。

9月底，何伟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博古介绍回武汉工作。

他到武汉后，找董必武接上关系。10月，中共湖北临时工委成立，何伟“参加工委，并负责临时工委下设的文委，领导文化和青年工作。”^①他根据中共武汉临时工委时期所掌握的情况，对武汉大学的中共武汉临时支部和青年工人组成的硃口工人临时支部的成员，逐个进行审查，并严格按照党员条件个别吸收入党。他又和陶铸对武汉大学的青年救国团和学生救国会等群众抗日救国团体的领导骨干进行考查，并发展郭佩珊等加入中共，于1938年初成立了中共武汉大学支部。在文化界，何伟先后发展了顾一凡、张光年、徐步新、胡绳等入党，并亲自领导由邵公文、杨修范和顾一凡等组成的党小组。此外，他又带领陈约珥“先后建立了湖北一中、省师、省女中、女高中、乡村师范等校支部”^②，在两三个月内，使武汉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

正当日军陷落平津、进逼京沪的严峻时刻，何伟接受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湖北临委交给的，以中共党员组织的华北流亡同学会和武汉秘密学联为基础，筹建青年救亡团体的任务。他深入青年之中，多次在战斗书店和武汉大学召开抗日青年组织的负责人会议，传达党的意图，阐明建立各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的重要意义，统一了大家的思想。不久，青年救国团正式成立；何伟是“青救”的奠基人之一。

抗日战争开始以来，国民党政府拒不执行抗战的教育方针，大肆兜售“读书救国论”的滥调，反对教育界从事抗战活动，一些思想过左的同志又提出暂停办学、一齐抗日的错误主张。中共湖北临委针对上述情况，决定发动教育界爱国人士，开

^①《何伟自传》。

^②《陈约珥自传》，未发稿，存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展抗战教育，并派何伟与刘季平一起筹建抗战教育研究会。他俩根据董必武的指示，争取湖北上层人物孔庚和陈时的支持，由他们牵头作为发起人，“经过不到一个月的筹备工作，于1937年10月21日召开了抗战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选举孔庚、陈时、季平、何伟等11人为理事。”^①1938年2月，刘季平走后，何伟就是抗战教育研究会的党内联系人和领导者。由于他长期在武汉教育界工作的影响，该会很快成为团结武汉广大师生开展抗战教育活动的著名救亡团体之一。

1938年5月，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成立，何伟任常委、宣传部部长。此前，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的第三厅成立，为中共开展工作提供了公开的合法场所。何伟受中共中央长江局派遣与三厅主任秘书阳翰笙联系，协助三厅厅长郭沫若工作。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代表中共长江局对阳说，长江局“决定由湖北省委一位负责同志和你联系，一起进行工作，内外一致，互相配合，这个人叫何伟，是省委宣传部长”，“你以后要经常和他建立联系，一些大的活动要和他一起讨论，共同商量，部署工作，上下联合，内外结合。”^②何伟与阳翰笙正是按照上述指示，在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把抗日的宣传工作深入到三厅的各个角落。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想借新成立的政治部，为他增加一点光彩，决定搞一个宣传局。中共认为这是个好机会，“要借此把抗战的意义拼命地高扬一下”^③。阳翰笙立即

①刘季平：《抗战教育救国会始末》，载《武汉党史资料》1983年第2期。

②阳翰笙：《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和1981年第1期。

③郭沫若：《洪波曲》。

找到何伟，具体商量了如何发动武汉三镇的工人和广大群众参加扩大宣传周的问题，然后分头发动。何伟发动了青年救国团、青年救亡协会、蚂蚁社、民先等组织和各校学生，甚至难民、伤兵，积极参加歌咏、壁报、戏剧、漫画、标语等宣传活动。他以极大的热情“跑街、接头、开会”，使被铁和血镇压多年的武汉人民又活跃起来了。在以后纪念抗战一周年的各项活动中，何伟都是组织者之一。

徐州失守后，武汉危在旦夕。周恩来指示把集中在武汉的工人、学生、革命分子输送到敌后和乡村开展游击战。根据这个指示，何伟、阳翰笙积极组织推荐文化界和知识界广大青年到三厅组织的九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和四个电影队中去；又介绍中共党员刘季平到三厅参加中共特别临时支部（书记冯乃超、组委刘季平、宣委张光年），以保证党对三厅活动的领导。

这个时期，何伟的足迹几乎跑遍了武汉三镇的每个角落、每个抗日团体。他为湖北地区抗日战争形势的顺利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

1938年10月，何伟接受周恩来的指示，从武汉去安徽，传达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大别山工作的部署。离汉前，周恩来同何伟谈了话，指出武汉失守前后大别山地区党的任务，主要是加强同国民党桂系在安徽的抗日统一战线，避免摩擦，在敌后有利的条件下，大量建立党的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①。

^①《何伟自传》。

何伟以《新华日报》记者的身分，经湖北黄安（今红安），到达皖西的立煌（今金寨）县中共安徽省工委驻地。1939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统一领导大别山地区敌后抗日斗争。郑位三任区党委书记，何伟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兼管区党委机关和后来成立的新四军驻立煌办事处的工作。

徐州、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桂系军队控制了大别山地区，掌握了安徽省地方政权，以皖西立煌为中心，不断巩固扩大其政治统治。中共的力量在这一地区比较薄弱，处于地下状态。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别山地区工作“是发动群众，争取抗日爱国力量，发展党组织”^①的指示，何伟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桂系统治区内，他利用《新华日报》记者的合法身分，广泛接触各界各阶层人民群众，公开宣传中共的主张。在立煌、霍山等地，他应安徽省民众动员委员会和抗日工作团的邀请，参加工作团团团长联席会议，以及工作团召开的群众大会，向人民讲抗战形势，宣传动员群众、坚持持久战的思想。他善于联系开明士绅和社会名流，经常与当时在安徽的民主人士朱蕴山、章乃器等人接触，利用他们去促进桂系当局抗战。他还把统战工作直接做到安徽国民党军政上层人物中去。1939年7月初，新四军军长叶挺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到立煌，为解决新四军和桂系合作抗日问题，同安徽省政府主席兼第21集团军司令廖磊举行谈判。为了保证谈判的顺利进行，何伟作了周密的安排。谈判结束后，何伟以新四军参议的名义，代表新四军公开与国民党桂系当局打交道。当顽固派企图

^①张劲夫：《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安徽形成的基本过程和概况》，载《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版。

限制人民军队发展，停发江北新四军经费时，何伟义正词严地指出：“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新四军江北部队的经费应由安徽省政府拨给。可你们却借故拖延，这是破坏国共合作协议，破坏抗日的行为。”^①迫使桂系当局不得不按协议拨给江北新四军每月3万元经费。

何伟和区党委常委、民运部部长张劲夫等，利用省动委会和工作团的合法形式，进行了大量的公开和秘密的斗争，争取了进步力量，孤立和打击了反共顽固派，恢复和发展了中共组织。中共在省动委会及所属70多个工作团中，普遍建立了组织，不仅实际掌握了大别山地区民众工作的领导权，而且通过各种训练班、抗日团体，培养了凡千名优秀青年干部，为后来扩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准备了骨干力量。

1939年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事前，根据中共中央电示，中共鄂豫皖区委将党的部分机关和进步人士分批转移到皖东和皖东北新四军活动地区内，区党委主要成员郑位三、张劲夫等，也转移到庐江东汤池江北指挥部驻地，何伟暂时留在立煌，部署其余同志转移。在何伟、李丰平（转移时成立的中共立煌市委书记）的直接领导下，中共立煌市委借抗日宣传、调动工作和外出巡视等合法名义，组织党员和进步青年，分批分路迅速转移。在国民党军政机关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广西学生军里的中共地下党支部，充分发挥作用，巧妙地取得了印章，印刷了通行证和路条等，为安全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在政治上展开反击，发动动委会和工作团党员、进步青年，在各地召开群众大会，发表宣言、通电、告民

^①孙以瑾：《闪光的片断》。

众书等，揭露顽固派在大别山地区破坏民众动员，制造白色恐怖，反共限共等倒行逆施的行为，打击了顽固派的反共气焰。

1940年1月，何伟被任命为无为地区江北游击纵队军政委员会书记。这时，何伟一方面在这一地区进行发动群众，争取大刀会组织抗日和扩大江北游击纵队的工作；另一方面，继续领导大别山干部的转移、培训和接送工作。他遵照刘少奇“这次转移工作要以政治进攻作掩护的方针，和在公开的干部转移后，大别山的党转入绝对秘密状态，长期潜伏，保存力量，等待时局变化”^①的指示，机智灵活地将3000余名党的干部和进步青年安全转移到新四军中去。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曾给予这次行动以高度的赞扬。

1940年5月，何伟被任命为新四军第4支队政治部主任。当时，津浦路西条件十分艰苦，战斗相当频繁，何伟协助罗炳辉司令员等领导同志，为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出极大努力。他经常在战斗间隙，深入基层，召开政治工作干部会议，抓紧部队的思想教育工作。他以普通一兵的身分，和战士们一道练投弹，学射击；休息时，与战士亲切谈心，鼓舞和激发指战员的斗志。

6月，新四军接连取得了反顽自卫战的胜利，迫使顽固派坐到谈判桌上谈判。何伟作为新四军代表，简装轻骑，深入顽区，到国民党第5战区第12游击纵队司令部驻地寿县下塘集，与桂系代表张节谈判。他大义凛然，历数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残害新四军人员，制造武装摩擦等使亲者痛仇者快的罪恶行为，庄严申明：“本党本军之一贯团结抗战的主张”和“人

^①《何伟自传》。

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立场^①。在谈判过程中，何伟不畏强暴，挫败了顽固派李品仙阴谋暗害谈判代表，破坏谈判的诡计，终于达成了“划各友军驻地暂以淮南路为界”^②等项协议，并迫使顽固派释放被扣留的张云逸指挥的妻儿，取得了谈判的胜利。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何伟被任命为新四军第7师政治部主任兼军政委员会副书记。3月，何伟到达无为白茆洲，投入了建设7师、创建皖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第7师初创伊始，就处在地域狭小，四面受敌的险恶环境里。当时，军部指示第7师：“在无为应大大加强地方工作，改善群众生活，建立地方武装，以便成为我之根据地。”^③于是，7师在无为东乡长霸吴和巢南山区，分别召开了党政军会议。会上，何伟传达中共中央和军部指示，统一了对皖中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战略意义的认识。同时，针对皖南事变后部分同志产生的消沉情绪，进行了耐心说服教育，从而提高了广大干部和战士的思想觉悟，增强了在皖中坚持斗争，建立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

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1941年正式成立了中共皖中区党委，何伟任书记，李步新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皖中、皖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区党委和第7师军政委员会认真执行中央规定的“发展皖中，坚持皖南敌后游击战争，积极打通与第2、第5、第6师的联系”^④的任务，在东起江浦、宣城，西至鄂皖边，

①②《新四军四支队何主任谈团结抗战问题》，1940年10月《新民主报》。

③《皖江抗日根据地综述》，未刊稿，存中共巢湖地委党史办公室。

④《新四军抗日战争史》第54页。

南临青阳、绩溪，北迄合肥、全椒等广大地区内，领导军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敌后游击战争。何伟同曾希圣、傅秋涛、李步新等一起，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使皖中抗日根据地在政权建设、减租减息、壮大抗日武装、发展党的组织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大成就。1943年，皖中先后建立了三个军分区和三个地委（和含、沿江、皖南）。第7师活动的地区，由0.4万平方公里扩展到2.025万平方公里；皖中已建立16个县委、58个区委、867个支部，地方党员总数达11244人^①。第7师从初建时的1900余人，猛增到万余人，驰骋大江南北，英勇抗击日伪，并打通了与第2、5师的联系，大大加强了华中抗日斗争。皖中根据地的开创和发展，何伟作为区党委书记，起了重要作用。

1943年8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何伟参加党的七大。1944年2月，何伟与傅秋涛等到达延安，被分配在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通过整风学习，使何伟思想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高。1945年4月，何伟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代表资格，参加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四）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统观全局，英明地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决策。

刚参加过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何伟，奉命去东北，

^①蒋克祚等：《皖中抗日根据地概述》，载《安徽史学》1985年第3期。

迎接新的战斗。他带领同志们日夜兼程，风餐露宿，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长途跋涉，行程2000余里，历时六个月，于1946年3月到达黑龙江省的通河县，同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接上了关系。分局书记陈云立即派何伟到哈尔滨市开展工作，并担任市委书记。

1946年6月，蒋介石挑起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内战，东北形势十分严重。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派何伟到关系北满局势的战略重地牡丹江去，任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1947年10月，牡丹江升格为省级建制，何伟任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为把牡丹江建成巩固的根据地，他付出了巨大精力。

何伟初到牡丹江时，还兼任宁安土改工作团团长，在给工作人员的讲话中多次指出：“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是建立巩固根据地的首要条件。他不仅强调队员要深入群众而且身体力行，带头到土匪头子马锡山的老巢——宁安县东京城，与城郊的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艰苦细致的发动工作。在土改过程中，有些地方表面上轰轰烈烈，但没有真正发动贫雇农。结果，工作队一走就冷落下来，坏分子又乘机活动起来。何伟把这种情况形象地比喻成“没烧透的砖”，“半生不熟的夹生饭”^①。他连续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写报告，全面地反映上述情况，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意见。他认为要解决“夹生饭”问题，干部至关重要，“干部思想通了，阶级立场也稳定了，生活上也就容易与穷人打成一片，对穷人也就会进行阶级教育。这样，工作一定会作好，而且一定会深入。”^②

^①何伟给高岗的信（1946年10月9日），未刊。

^②何伟在宁安工作团队长会议上的总结，载1946年12月11日《牡丹江日报》。

他还说，要教育积极分子，培养贫雇农骨干，发展党的组织，工作队不能包办代替，等等。何伟的意见得到了东北局的肯定。陈云在检查牡丹江工作时给予赞扬。

1946年12月14日，土改工作进行两个月后，何伟主持召开宁安工作团各队队长联席会议。他在报告中详细地说明了“半生不熟”的表现，分析了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决定在干部中开展“查思想、查工作、查作风”的活动，为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土改过程中，何伟非常注意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当时，有些地方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向贫雇农交权”，不去团结中农，甚至侵犯中农利益，把中农当成地主富农去斗，拒绝中农参加农会，其结果使贫雇农处于孤立状态，给地主拉拢中农提供了机会。个别地方，提所谓“扫堂子”，将地主扫地出门。这种做法，不仅贫雇农不能得到多少利益，还会迫使地主走向极端反革命。何伟得知此情况后，立即赶到这些村屯，和工作队员交谈，决定立即停止上述违反政策的做法。不久，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亲自到牡丹江作调查，肯定了何伟的意见，从而使土地改革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地向前发展。

这期间，何伟非常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剿匪工作。他曾经反复讲：“没有土地改革就不能发动群众，军队就站不住脚。而没有人民的军队，不荡平匪患，就无法进行土地改革，即使搞了土改，不武装自己，胜利果实，就得丧失。”^①

1946年11月，牡丹江和合江两军区配合消灭了国民党15

^①孙以瑾：《闪光的片断》。

集团军上将总司令谢文东部，受到东北联军总司令的嘉奖。到年底，牡丹江地区数万土匪军，已基本被我主力部队消灭，剩下的仅是为数不多的匪首。这些家伙罪大恶极，血债累累，叫喊着“宁蹲山头看监狱，不蹲监狱望山头”，仍不断偷袭正在土改的村屯，进行烧光杀净的罪恶活动。面对这些股匪盗寇，何伟在1947年1月召开的军区负责人会议上指出：“除匪不尽，遗祸无穷”^①，一定要坚决剿灭干净。会议决定组织小分队进山，实行小群动作，边侦边打，侦打结合，和匪寇在山里周旋，直到彻底消灭。根据会议决定和何伟的指示，军区组织的剿匪小分队，冒着-40℃的严寒，在林海雪原里追击消灭敌人。特别是牡丹江分区某团战斗英雄杨子荣等六位同志的事迹更为突出。2月2日，他们奉命赴蛤蟆塘一带侦察，不辞辛苦，以机智巧妙的方法，日夜搜索，掌握了匪情，并于2月7日勇敢深入匪巢，一举将国民党东北第2纵队第2支队司令“座山雕”张乐山以下25名匪徒全部活捉^②，创造了以少胜多歼灭股匪的战斗范例。曲波的《林海雪原》就是这次剿匪斗争的艺术再现，小说中的何政委，生活原型就是何伟。

经过一年的剿匪斗争，肃清了全境匪患，保证了土地改革的胜利进行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了牡丹江根据地。

随着土改运动和剿匪斗争的胜利开展，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何伟及时提出，各地方党委要动员土改中涌现出来的青年积极分子参军。不久，就组成了十多个完整建制的步兵团。

^①孙以瑾：《闪光的片断》。

^②《战斗模范杨子荣等活捉匪首座山雕》，载1947年2月29日《东北日报》。

何伟从1946年9月到1948年7月近两年时间，在中共牡丹江省委的集体领导下，把一个政治混乱、经济凋敝、土匪猖獗、民不聊生的牡丹江省，建设成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

1948年夏，东北人民解放军进入大反攻的前夕。为了保证军事运输的需要，经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中央军委批准，于1948年7月成立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又名铁路修复工程局）。东北局决定：何伟任铁路修复局第二副局长兼纵队政治部主任、党委副书记。9月28日，铁道纵队政治部在哈尔滨召开首届政治工作会议，何伟在会上作了《铁道部队的性质与特点》的报告。他指出：“铁道部队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既有技术工程任务，同时也有战斗任务，它的作战与修工，都是为着配合全部人民解放军作战，争取全国革命的早日胜利。”报告号召全体干部战士要努力学习技术，虚心向技术干部和职工学习，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为实现军队铁道技术化而奋斗。

全国战略决战阶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这次规模巨大的战役，将集中全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南下北宁线，要求铁道部队的紧密配合，迅速修复通往沈阳、锦州的铁路。刚建立不久的铁道部队，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抢修工程，使大郑、吉长、哈长等铁路干线迅速修复通车，有力地支援了辽沈战役的胜利作战。12月初，长春、吉林、哈尔滨、沈阳、锦州等城市，已由铁路连结起来，给11月底入关的东北百万大军和运送军用物质铺平了畅通的大道，对战后的东北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辽沈战役结束后，纵队领导机关提出了“野战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的口号。在指战员们日夜奋战，合力抢

修下，到1949年2月23日，北宁线全部通车，保证了平津战役和平、津两市解放后的运输供应。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铁道纵队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又连续作战，完成了济南北段天津至桑梓店间的接轨工程，使断绝交通达三年之久的津浦路北段于3月24日通车，受到军委铁道部特电贺勉。电文说：“这一任务的完成，使我们解放全中国，接通津浦线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和重大的军事意义。”^①铁道纵队全体人员在上级嘉奖鼓励之下，又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奋战，到4月初，火车可直达安徽的固镇，并立即分兵抢修津浦、平汉两线的南段铁路；到7月相继完成了津浦线的淮河大桥和平汉线郾城至信阳间的线路及桥涵的修复工程，使津浦和京汉铁路全线通车，为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和解放江南各省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五）

1949年5月，武汉解放，何伟调任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他和张志义、杨春甫副秘书长一起，协助谭政、陶铸等主要领导同志，沉着指挥，日夜操劳，在短短几个月内，使特务潜伏，散兵流窜，交通阻塞，社会秩序混乱的武汉，得到了初步的治理。一次，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到武汉巡视，当着陶铸的面说：“现在武汉能有这样一个好局面，应表扬何伟他们。”^②

^①中共中央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给铁道纵队的来电，载《铁军》第11期，1949年3月30日。

^②访问李文放的谈话纪录，未发稿，存作者处。

11月22日和12月4日，桂林、南宁相继解放，何伟奉调任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初入桂时，他被委为中共桂北区委书记兼桂林市市长、军管会主任。当时的桂北区，地辖桂林地、市委，柳州地、市委和平乐、宜山地委共30多个县。何伟坚决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方针和中共中央指示，着力抓了三件大事：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和春耕生产。

广西的剿匪反霸斗争，在1951年5月就取得了巨大胜利。在清匪反霸斗争中，何伟提出过一些很好的建议。起初，中共中央曾根据广东、广西的特殊情况，规定两广的民枪不缴。但这时的所谓“民枪”，实际都掌握在国民党军残余、地主武装和山林惯匪“三位一体”武装匪特手里。他们由兵转匪，又化匪为“民”，扰乱治安，截劫商旅，残民以逞，为恶殊深。更有甚者，匪徒们用游击办法袭击骚扰，工作人员被抓杀，成班、成排的解放军指战员被他们吃掉。根据这一新情况，何伟、李天佑等于1950年8月，在研究剿匪的省委高干会议上，提出要收缴民枪、凡枪都须缴的意见。他们认为：中央原规定是适应当时的情况，现在大部民枪已为匪特据有，性质已变。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陶铸遂电告中央，提出所有民枪一律收缴，有枪不缴，以匪论处的建议。中央很快复电，肯定陶电之主张正确，着即执行。这样，广西的剿匪进展很快，最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何伟是广西省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主持全省的土改运动。广西的土改是1950年下半年在桂北贺县等六县试点，1951年初在全省全面展开的。9月，何伟在中共广西省首届代表会上作了《贯彻土地改革的具体步骤与作法》的报告；10月12日在全省第一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又作了《为争

取一九五二年内基本完成全省土地改革而奋斗》的报告。这两个报告，以大量怵目惊心的事实，彻底揭露了封建地主对农民的残酷统治和无休止压榨的罪恶。他说：“这就是土地改革的正义性，也是当前广大农民迫切的要求。”报告详尽而深刻地阐述了土改的指导思想，目的意义，方针政策，具体方法和步骤，使与会同志特别是从事土改的广大干部，不仅方向明确，而且也有了具体办法。他们说：“何主任的报告是一把钥匙，使我们眼明心亮，决心大，胆子也大，心里很踏实。只要按这个要求做去，定能完成土改任务。”①

广西的土地改革，在省委的领导和何伟的精心指导下，通过广大土改干部和农村基层干部以及贫雇农的通力合作，艰苦奋斗，终于在1952年如期完成。全省1600万人口的广大农村，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使农村来了个地覆天翻的大变化，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土改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2年初，广西全省掀起了春耕生产热潮。同领导土地改革一样，何伟仍是以深入基层，掌握下情来抓农业生产的。当时，他脚有病，行路困难，每到一地，县委的同志总要给他派车，但他总是婉言谢绝：“下来是了解情况联系群众的，坐上车，带一班人，呼呼啦啦的，还不把群众吓跑了。”②有一次，他从柳州到一个50多里外的村子里去，为了不惊动地方上的干部，他坐货车前往，下车后，又步行十几里，在一个镇子上的饭店里吃了饭，就进村了。当地干部知道后，觉得很是

①访问谭流的谈话记录，未发稿，存作者处。

②徐邦文：《深切的怀念》，未刊稿。

过意不去，何伟宽慰他们说：“我又不是官老爷，难道还要给我大摆宴席，洗尘接风不成。”^①

何伟是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还要管广西宣传战线的工作。一次，他去给在“革大”学习的转业干部作报告。这些干部对革命有贡献，但少数人有功臣自居、“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何伟坐小汽车刚进“革大”，一个学员就对着小车大声叫喊：“老子打天下，你来坐天下！”同车的同志面有愠色，司机也怒冲冲地刹了车，要与那个学员论理，均被何伟制止了。那天，“革大”礼堂坐无虚席，听何伟报告。当讲到打天下坐天下的因果关系时，他顺理成章地问：“谁打天下，谁坐天下？”随即联系刚才路上发生的事情说道：“天下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党领导下大家打下来的，你们参加了，我也参加了，怎么只是你一个‘老子’打天下呢？天下也是大家坐，是无产阶级领导广大人民坐，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嘛，一个人能坐牢、坐稳这个天下吗？！”^②

何伟坚决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在论及文艺的流派、风格时，他说：文学艺术上的流派很多，自古已然。根据马列主义的观点，风格就是人。人是各各不同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共性和个性相反相成，设想文艺没有流派不可能，也不符合实际。文艺上的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会促进文艺的繁荣。在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流派就没有文艺的发展^③。

1952年10月，何伟奉调至中央直辖市广州，任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同时还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

何伟到广州时，中共广州市第三次代表会议刚刚结束。他

^①徐邦文：《深切的怀念》。

^{②③}谭流：《春风风人》，《广西文学》1983年第3期。

和市委领导一班人，坚决按照市党代会的决议，为继续完成各项社会改革、开展抗美援朝和增产节约运动、发展工业生产而奋斗。何伟特别强调：必须明确社会改革为生产建设服务的观点，使改革工作与生产工作较为密切地结合起来，并推进生产工作^①。

为了更好地贯彻党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方针，中共广州市委在民主改革和增产节约运动中，派出大批干部到基层去调查指导工作，何伟自己也深入工厂、机关、学校、街道。有一天，他来到一位老工人家里。老工人觉得这个人说话和气，就畅所欲言，讲了很多心里话。过后，当那位老工人知道他就是何市长时，又惊又喜地说：“这位共产党的市长，成了咱老百姓的管家婆了。旧社会，我在广州几十年，别说市长，连个科长什么的官，也没见过。那时也不敢见官，官是灾星，兵是祸害，我们躲还来不及呢。新社会新事多，大广州市长到我家里来作客了。”^②

1954年5月，何伟在中共广州市第四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回顾广州从解放到1953年的工作时概要地说：我们“基本上是遵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与上级的指示，进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恢复生产、增产节约、‘三反’、‘五反’、民主改革和其他各项社会改革等一系列工作的。”接着，他及时提出了要“在相当的时期内，逐步使广州市由消费的城市基本上改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城市”这一战略任务^③。在统一认识、步调一致的基础上，市委确定把主要力

^{①③}何伟在中共广州市第四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载1954年6月14日《广州日报》。

^②徐邦文：《深切的怀念》。

量用来搞生产建设。这一决策，得到了中共华南分局的肯定和支持。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何伟明确指出：“今后，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其他各项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宣传工作，财贸工作，政权工作，文教工作等，应是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去进行，并为这个中心工作而服务。”^①

何伟特别注意思想工作，重视干部的理论学习。他说：“很明显，一年半来，我们在各个工作战线上所以取得比较显著的成绩，首先便不能不是加强思想工作的结果，而工作中的若干缺点错误也不能不是思想工作薄弱的结果。”^②中共中央中南局很重视何伟在广州对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曾多次要何伟写成书面材料，在中南局党刊上发表。

何伟还根据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在全面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必须积极培养和发现人才，正确选拔、大胆使用干部的问题。他说：“为了保证党的政治任务的实现，就要正确地挑选人才”；“在培养、提拔干部方面，必须反对‘资格论’，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他尖锐地指出：“‘资格论’确是干部生长、提拔的重要思想障碍。”^③他要大家坚决摒弃这种门户之见，与那种置国家、人民利益于不顾，唯一己一集团利益是从的宗派主义干部路线作斗争。

正当以何伟为首的广州市委，率领全体党员和全市人民，掀起波澜壮阔的建设热潮时，参加亚非会议的周恩来总理从日

①②③何伟在中共广州市第四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内瓦回国途经广州市，与何伟作了长谈，并提出调何伟到外交部工作。

（六）

1954年10月，何伟奉调到外交部，被任命为部长助理，兼苏联东欧司司长、外交部机关党委书记。

周恩来对何伟到外交部工作寄予很大的信任和希望。他说：“何伟同志是前广州市委书记兼市长，对党、政、民工作都很熟练，我部正缺少这方面的干部。”^①

为了掌握理论和熟悉外交工作，何伟孜孜不倦地阅读《国家与革命》、《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等书，了解各国概况。他积极为外交事务出主意、想办法、提建议，与有关同志一道制定了不少思虑精到、计划周密的方案。周恩来对何伟的工作和为人曾称赞说：“外交部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他们的职务比起别部门的同志定得都偏低一些，但是他们都能够正确对待，不计较个人的地位。何伟同志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好的例子。”^②

1958年1月，何伟被委派为我国驻越南大使。到河内后，他始终坚持中越友好的方针，经常教育使馆工作人员和援越专家，要树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全心全意为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服务，努力为中越友好作出新贡献。

何伟和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的关系极为友好。胡志明经常请他到主席府作客，两人或者漫步湖边，观鱼赏

^①访外交部记录，未刊稿。

^②访问顾一凡的谈话记录，未刊稿。

花；或者在小楼上恳谈，共叙友谊。每逢春节除夕，胡志明还请他到主席府共进午餐或晚餐。他总是带一盆胡志明所喜欢的福建水仙花作为春节礼品，赠送胡志明。

1960年5月9日，周恩来和陈毅访问越南。他们飞抵河内上空时，突然雷鸣电闪，风雨交加，飞机被迫临时改在义安市降落。何伟十分担心二位首长的安全，心急如焚，不顾连日工作的疲劳，连夜驱车赶到义安市，去迎候周恩来和陈毅；第二天又陪同周、陈安全到达河内。但是，他自己却因疲劳过度，致使心脏病突发。使馆党委的同志和大夫劝他休息，提出参加中越会谈事可否派其他同志暂代。可他坚持要去，只好每天靠打针支持工作。周、陈访越圆满结束回国后，他就因病卧床不起了。他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深受驻越使馆全体同志的敬佩。

何伟经常教育使馆人员说：“共产党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不该有特殊思想，更不应该以权谋私，要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福利。”^①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嗜好抽香烟，但不论是在使馆还是外出，从不抽一支办公招待烟，而抽自己的“大前门”。何伟的孩子上学要求父亲在河内买辆自行车。他教育孩子说：“你要和同学们一样，跑跑路锻炼一下，对你的成长有好处。同时，在国外买车需要花国家的外汇，这样做是不合适的。”^②何伟在国外当大使四年多，没有购置一件高档“洋货”。回国时，就带回来两件东西：一是胡志明临别赠送并有亲笔署名的一张照片；一是另一位越南领导人赠送的一幅漆画。此外别无它物，可谓两袖清风。

^{①②}访可孙以瑾的谈话记录。

1962年4月，何伟奉调回国。

(七)

何伟回国后，住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病。这时，中共中央决定派他去河南工作，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

何伟到河南后，首先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摸清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1962年9月，他微服步行，到汝南刘庄村进行调查。第六天后，省委给汝南县委打电话，请何伟回省委开会，县委还不知道省委书记到了汝南。卢氏县地处豫西边界，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何伟亲自到该县调查。当地负责同志看到省委书记到来，赞叹地说，这是解放以来第一位到卢氏来的省委书记。何伟在河南仅两年多一点时间，就走遍全省所有专区和110个县中的96个县，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为中共河南省委从实际出发，制定计划，作出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何伟在河南工作期间，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是抓生产救灾工作，解决河南人民的吃穿问题。河南的生产在遭受1958年“大跃进”、“公社化”运动的破坏后，1962年才有些复苏。1963年夏，又遭到特大水灾，淹地49万多亩，被洪水包围村庄3万多个。何伟主持召开了省级党、政、军负责同志紧急会议，决定动员一切力量抗洪救灾。会后，他和省委领导同志连续三次坐飞机视察灾情，指挥和部署救灾工作。他亲自到受灾群众家里进行慰问，具体解决群众的各种困难。

1963年的秋天，河南又猛降暴雨，全省有一半以上的县受灾，农作物严重减产，一部分重灾区缺粮、缺钱、缺烧、缺

房、缺衣，生产上造成了很大困难。9月中旬，何伟主持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央生产救灾工作会议精神，部署当前和今后的工作。他在会议总结中指出：“生产救灾工作是我省今冬明春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灾区工作的方针是，依靠群众，依靠集体为主，以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扶助为辅，生产自救，渡过灾荒，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从各个方面为争取明年农业丰收创造条件”；并对生产救灾工作作了具体部署。1963年，全省农村人口中有2800万人要吃统销粮。为了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省委决定向全国求援。何伟不辞辛苦，亲自出马，并组织力量到全国各地，北至黑龙江、内蒙古，西到新疆、青海，南抵两广、云南求援。全国20多个省市都给河南支援了粮食和其他物资，帮助河南人民渡过了灾荒。

1963年3月，何伟在豫东各地了解情况时，看到人们成群结队扒火车外流，并听说兰考县外流人员已达数万人。这种情况引起他极大的关注，决定到兰考调查。在兰考，他听取了刚到任不久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的汇报：兰考连年遭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的袭击，人民生活极其困苦，不少干部丧失信心，要求调离兰考，有些生产队干部带头外流。何伟听完汇报后，便由焦裕禄陪同直接到受灾的社队，进行实地考察。他对焦裕禄说：“兰考的问题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沙、涝、盐碱的问题，要研究一些具体治理措施。”他深情地说：“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就没有尽到责任。”^①焦裕禄表示：“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一定要杀出一条路来，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

^①段标：《关于何伟同志是如何发现与支持焦裕禄同志的回忆情况报告》，未刊稿。

有抗灾的群众。党把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就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①何伟对焦裕禄的决心，给予坚决的支持，说：“你刚来不久，就有这样的决心，提出了前几位书记没有提出的问题，这很好，省委支持你。”临别时，何伟握着焦裕禄的手说：“要尽快把外流人口控制住，要研究一个治理沙、涝、碱的具体措施，我以后要来看效果的。”^②焦裕禄说：“我不多说了，请看行动吧！”^③此后，中共兰考县委在焦裕禄这个班长的带领下，深入调查研究，听取群众意见，提出了“除三害”的战斗口号，并带领群众同“三害”斗争。四个月后，何伟第二次来到兰考，看了县委除“三害”、全面治理沙、涝、碱的规划模型，又亲自到仪封、三义寨、张君墓、堙阳、南彰等公社察看。看到三义寨搞的作物三蓬楼（即上边是树，中间是编筐用的灌木条子，下边是花生）；仪封园艺场苹果树正果实累累；南彰公社坑坑有藕，荷花满塘；大为高兴。他在县委会上赞扬说：“你们外流人口大大减少了，干部思想稳定了，生产有了起色。兰考人民是有志气的。照这样干下去，三五年后，火车来来往往就不会拉你们的灾民，而是拉你们的木材、花生、大枣了。”^④

何伟回郑州后，向省委的各部门负责同志介绍了兰考人民在焦裕禄的带领下，战天斗地改变面貌的情景，大力推广兰考人民改造山河的经验，并说明了焦裕禄是位有理想、有干劲、有水平的好干部。此后，赵文甫等省委、省人委的领导同志都先后到兰考视察。省委又陆续拨给统销粮1400多万斤，贷款400

^{①②③④}段标：《关于何伟同志是如何发现与支持焦裕禄同志的回忆情况报告》。

余万元，还有一批拖拉机等生产工具，支援兰考人民。在何伟建议下，省委决定提升焦裕禄为中共兰考县委第一书记。

1964年春，何伟第三次到兰考，看到泡桐郁郁葱葱，沙地种上了紫穗槐，盐碱地挖了排碱沟，防治“三害”已初见成效。但没见到焦裕禄。这时，焦裕禄因劳累过度病倒正在住院治疗。何伟十分关怀焦裕禄的病情，指示要千方百计，尽最大的努力进行抢救。但是，病魔终于夺走了党的好干部、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的生命。

何伟在河南工作两年多，在省委的集体领导下，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做了大量工作，为发展河南的大好形势作出了积极贡献。

(八)

1964年，何伟调任教育部部长。

当时，正是各类学校落实毛泽东、刘少奇对教育革命的指示，教育战线开始出现新变化的时候。这一年的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北省《阳原县普及小学教育是教育战线上的一面红旗》的社论和报道，震动了整个教育战线，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何伟到教育部一个星期，就带领干部到地辖长城内外的阳原县，登上海拔2000多米的箭口山顶的玉家梁，听模范教师讲课，听农民群众对师生的评论。山梁上风大，空气稀薄，他坚持住在玉家梁，和农民群众一起吃莜面，土豆，与一位教师挤在一条土炕上，倾谈到深夜。他在阳原半个月，跑遍了阳原县的山山川川，了解到阳原县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主要经验，是各级领导重视，群众欢迎支持，因地制宜，多种形式办

学。

何伟从阳原县创办耕读小学、普及小学教育的经验中，进一步体会到毛泽东和刘少奇抓半农半读、半工半读教育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普及中小学教育的一条有效途径。他从阳原县回到北京，就主持召开了部党组会、干部会，向大家指出：在目前教育战线大好形势下，要吃透中央指示精神，依靠群众办教育，要向社会作调查，学习先进经验，要时刻不忘教育改革的任务。他说：目前教育战线最大的问题是，还有30%的学龄儿童没有入学，70%的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40%的青壮年没有摘掉文盲帽子^①。他号召全体机关干部，除少数留下坚持日常工作外，多数同志都要下去，向人民群众学习，总结办学经验，“解剖麻雀”，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何伟的动员和带动下，教育部抽出80%的干部，组成若干教育调查研究小组，分赴全国各地。

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了一批办得比较好的半农半读、半工半读中等教育学校。群众称赞这类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是“思想好，技术硬，会操作，懂理论，伸出手能干，拿起笔能算”。“半工半读好办法，一树开出两朵花，一朵育出新人才，一朵生产超计划。”^②何伟决心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半农半读、半工半读教育，有计划、有步骤地深入开展教育改革。

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1965年3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工作会议。何伟在会议总结报告中指

^①周觉、梁枫、陈传统：《疾风难摧傲霜雪——怀念何伟同志》，1981年3月20日《人民日报》。

^②陈传统：《进行调查研究，发展我国教育事业》，未刊稿。

出：今后农村教育改革的任务是，实行全日制和耕读小学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普及小学教育，扩大试办农业中学，积极试办半农半读中等技术学校，促进农村教育事业更健康更深入地发展。由于这次会议的有力推动，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新局面。

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工作会议后，何伟又集中精力抓了城市半工半读教育工作。教育部再次组织若干教育调研小组，分别深入城市、厂矿企业、交通等部门，对半工半读学校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何伟自己也到天津、山东等省市了解情况。调查发现，人民群众对这类学校的反映是“四满意”，即学生能顶班劳动，增加生产，工厂满意；理论能联系实际，提高教学质量，学校满意；子女能学到本领，不花钱或少花钱，家长满意；既读书又劳动，学以致用，学生满意。在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教育部于1965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何伟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了半工半读教育工作情况，他在会议总结中强调：“对半工半读教育，今后必须坚持‘五年试验，十年推广’的方针，坚定方向，继续试办，以便掌握它的规律，实现教育战线上的这一大改革。”

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和何伟的总结报告作了充分肯定，并且批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央批示指出：“推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是关系到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的重大问题，是全党的事业。必须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统筹规划，全面安排。各有关部门要分工负责，通力合作，切实完成这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何伟为了发展初、中等教育事业，培养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需要的中、初级技术人员，先后跑了12个省、市、自治区的30多个县和上百所中小学校。他经年累月、不辞劳苦地深入教育第一线，一心一意扑在党的教育事业上，使我国初、中等教育结构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1965年底，全国小学发展到168.19万所，学生有11.629万余人；普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学校发展到80993所，学生有1431.8万人。使我国教育朝着小学普及，中学分流，大学提高的方向发展。

在半工半读教育工作会议结束后，何伟又集中全力抓改革全日制中小学教育。他带领一个小组去四川、贵州、云南等省，爬上海拔2000米的云南攸乐山，视察佤族学校；走到边境线上，了解边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情况。

1966年春，何伟从祖国大西南回到北京，准备8月召开全国全日制中小学教育工作会议。他计划通过半农半读、半工半读、全日制中小学三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战略部署，实现教育事业的大改革、大发展。

然而，他回到北京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计划中的全日制中小学教育工作会议终成泡影。“文革”中，何伟被打成了所谓“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代表”，“刘少奇的黑干将”，被隔离在北京师范大学“专案审查”。在林彪、江青一伙操纵下，一些人逼迫何伟交待从事外交工作的“问题”与“关系”。在残酷的审讯过程中，何伟已经觉察出这是个大阴谋，其罪恶目的是妄图从中捞到“稻草”，打开缺口，进而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接着，何伟被关进教育部一个阴暗、潮湿，终日不见阳光的地下室，受尽了各种折磨。可是，在蒙冤殊深的日日夜夜里，何伟仍不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顽强地读完了《资本论》，又重读了《毛泽东选集》。后来，他被

送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无端遭受迫害长达六年之久。

在那摧残文化的荒唐年代，当他看到党和国家所蒙受的深重灾难，看到学校被抢砸，老师被批斗，学生学业荒废，曾忧心忡忡地说：“我身为教育部长，以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己任，可现在……”他愤然发出“‘文化大革命’是多此一举”的呼声^①。他深信：我们伟大的党和人民会拨开云雾，重见天日的。这就是有同志在以后悼念何伟诗中所说的“共信腊尽是春天”的全部含义。

1972年春，何伟因病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就医。但因长期受摧残折磨，他的身体已经难以康复了。他在弥留之际，仍关注着党的教育事业，对前去看望他的儿女说：“我多么希望能再看上十年，再干上十年啊！”^②然而，他宏图不遂人谢世，壮志未酬身先死。1973年3月9日，何伟在北京含冤逝世。

何伟逝世之后，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许多同志前来吊唁，何伟夫人孙以瑾收到大批唁电和悼念诗文挽联，其中有一首追念何伟的诗写得好：

牛棚寒夜忆当年，
妖雾迷漫朔风旋。
毁弃黄钟金为土，
雷鸣瓦缶鬼成仙。

^①访问孙以瑾的谈话记录。

^②周觉、梁枫、陈传统：《疾风难摧傲霜雪——怀念何伟同志》。

城狐有术盗红旗，
老牛无计逃皮鞭。
斗室细语论国是，
共信腊尽是春天。

这是对何伟和所有受迫害同志的深情怀念和哀悼，也是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愤怒声讨。

1976年10月，党和人民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充分肯定了何伟主持教育部工作，特别是他高瞻远瞩、殚竭全力为发展党的教育事业所作出的努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为何伟进行了彻底平反昭雪，并给予了公正的历史的评价：“何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是人民群众热爱的“优秀干部”，“何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杨 一 辰

齐 文 华

杨一辰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部长。他为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一生。

杨一辰原名杨翼辰，字德如，曾用名刘孟平、杨横如、黑杨、李德录等。1905年1月出生于山东省金乡县杨瓦屋村。祖父杨新民在村里教私塾。父亲杨化坤和两个叔父都在中学教书。杨一辰弟兄二人，兄杨翼张在家种田，有田60多亩，家中生活能得温饱。

1901年，杨一辰5岁入本村私塾读书，12岁随叔父到济南读高小。1919年五四运动，他被同学选为高小学生代表，参加省城学生外交后援会，成为该会的评议员。1920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①。在一师，他结识了比他高两级的同学王尽美^②，常去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外围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听讲演，并从中得到启发，学会思索一些社会问题，他读书勤奋，孜孜不倦。既攻读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又学习文史等社会科学，更注意研究中国近百年史。除听

^①这个学校创办于1901年，是山东最早的师范学校，始称师范馆、高等师范学堂，1914年，改名为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②王尽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山东党组织的发起人。

课外，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图书馆里度过的。这种好学精神，受老师的赞誉和同学们的敬佩。1925年，他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1926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给杨一辰以很大的震动。他开始对自己读书救国的抱负产生了怀疑，认识到要救国，要反对北洋军阀的卖国政府，就必须投入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

不久，杨一辰的父亲病故，家中无力继续供他读书，他于1926年秋退学回到济南，在山东一师附属小学当教员。以后，经一师的同乡张洛书的介绍，他参加了国民党，任教员区分部书记。这时，他经常有机会看到《新青年》、《向导》、《上海大学社会科学讲义》等进步书刊，使他“更多的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加之四一二蒋介石叛变之后，更为愤激，更明确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①。于是，他多次找张洛书交谈，两人都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走革命救国的道路。1927年5月，杨一辰经当时的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兼省委组织部部长丁君羊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

杨一辰入党后，一方面仍继续在一师附属小学当教员，一方面积极做党的工作，在党内任中共山东一师支部书记。这时，正是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陈韵轩、王祝晨、赵华叔等重新组织了一个左派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杨一辰在省党部任青年干事，参加中共山东国民党党团（即党组）工作，开展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右派的斗争。宁汉合流后，由于陈韵轩等投靠了蒋介石控制的以张莘村为首的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杨一

^① 《杨一辰自传》（1957年3月），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辰遂退出了国民党，专门从事共产党的工作。这年冬，他被一师附小校长辞退。第二年春，他经考试被录用为潍县坊子铁路小学教员，在中共党内任坊子铁路支部委员并负责山东省委鲁东交通站的工作。

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进行大屠杀，制造了五三惨案，激起了山东和全国人民的愤慨。杨一辰根据省委的部署，在潍县地区组织铁路工人的反日罢工斗争和茂子庄暴动。当军阀当局在全省大肆逮捕、杀戮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并发出通缉令缉捕山东省委主要领导人邓恩铭等同志时，他又接受将领导人转移到乡下的任务。杨一辰精心地选择转移地点，了解沿途情况，为保证省委领导人的安全作出了很大努力。

杨一辰在潍县地区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常有行迹可疑的人在学校周围探视。为了应付敌人的行动，他每天放学之后就不在学校里住宿。1928年10月的一个漆黑的夜晚，一群特务扑向坊子小学。他得知这一消息，连夜跑到济南，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将他留下担任省委秘书和山东省济难总会党团书记。

年底，山东的中共组织连遭破坏。在济南，敌人先后逮捕了省委负责人吴克敬、蓝志政以及来济南向省委汇报工作的青岛市委书记邓恩铭等多人。1929年1月，由于叛徒王天生告密，省委又遭破坏，杨一辰也被捕入狱，被关押在济南山东省警察厅拘留所。

在狱中，杨一辰坚贞不屈，积极参与邓恩铭领导的为改善政治犯待遇、不带脚镣、争取阅读书报权利等而进行的绝食斗争。不久，狱中党组织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决定发动难友作好越狱准备。杨一辰积极作同囚室李殿臣的工作，得到李殿臣

等人的赞同，并表示愿意带头冲锋。但这一计划为一不坚定分子得知，图谋告密，李殿臣等人遂于4月19日晚仓猝举事，打倒看守，夺下武器，鸣枪越狱。越狱出来的二十几个人，因道路不熟都往一个方向跑，只有杨一辰一人跑向另一个方向，得以脱险；其他的人皆被追捕的狱警抓了回去。

杨一辰连夜绕道奔到表亲姚三大娘家，理了发，换了衣服，拿了些钱，第二天天一黑便逃出济南，经青岛前往大连。在大连，他遇到了由山东去苏联学习的张洛书、孙兆彭等，得知中共山东省委的通讯处，急忙给省委写信报告狱中情况和四一九越狱斗争的经过，并迫切地要求组织给他分配工作。山东省委将他的报告转给中共中央，中央随即通知他到中共满洲省委工作。1929年6月，杨一辰来到中共满洲省委，任省委组织部干事。7月，他以省委巡视员身分，去抚顺巡视工作。

这时，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8月，杨一辰奉刘少奇派遣，随省委组织部部长孟坚去奉天纺纱厂（今沈阳纺织厂）开展工人运动。奉天纺纱厂是刘少奇选定的满洲省委工运重点之一。“全总”代表张昆弟在孟坚、杨一辰陪同下来到纱厂，向党团支部了解工人斗争情况和最迫切的要求。当时，工厂自7月份起，只给工人开半支（余者拖欠），而且发的是奉票。由于奉票贬值，工人损失很大，迫切要求改变这种情况。张昆弟等与党团支部研究，认为工人的要求是合理的，应该解决。经讨论决定由杨一辰起草一个传单在厂内散发，提出要八成现洋并及时开支的要求，如果厂方不答应，就在8月27日开支那天举行罢工，把以前分散的小规模的斗争汇合成大的斗争。

为组织这次罢工斗争，刘少奇决定亲自去纱厂。8月22日下午，当刘少奇和孟坚按约定的时间相继来到纱厂北大门

时，一队厂警涌出大门迎面扑来，他们躲闪不及，遂遭扣押，并准备移交给警察局。

刘少奇、孟坚被捕后，省委在中央特派员陈潭秋的帮助下，由丁君羊、任国桢、饶漱石三人组成临时常委，主持工作。临时常委把营救刘少奇、孟坚出狱的工作中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杨一辰，要他迅速了解刘少奇的下落和在狱中的情况。当他探听到刘少奇可能被关到警察局的~~消息~~，立即向省委汇报并去奉天第一监狱了解虚实。

这所监狱经营了一个酱油厂，门市部就设在狱门东侧。当时，监狱中有一个快出狱的中共党员名叫周世昌，被放到门市部卖酱油。杨一辰手提瓶子，装做买酱油的模样来到门市部找周世昌，在递瓶子时递给周一张纸条，询问有无新被捕的同志，同时用暗语问：“有香油吗？”周回答说：“没有，只剩些油底子了。你后天来看看吧。”当他第二次去时，周递给他一张条子，说狱中最近新关进来几个人，还没有最后审理。于是省委决定让他带着钱和一些水果、点心，以朋友的身分去探监，和刘少奇见了面。由于刘少奇在审讯中坚不吐实，并在狱中做了不坚定分子的工作，再加上省委积极组织营救，特别是通过杨一辰沟通内外情况，使敌人抓不到任何证据，不得不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了结此案。省委通过关系在宝兴店取了铺保，刘少奇和孟坚遂于1929年9月中旬获释出狱。

同年10月，杨一辰奉中共满洲省委派遣去奉天兵工厂工作。奉天兵工厂也是当时满洲省委工运工作重点之一。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里的工人斗争，在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中曾经指出：“奉天兵工厂是中国第一个大的兵工厂，内部有3万多工

人。这不仅是奉系军阀的武器基础，而且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基础。我们无论在破坏上与夺取敌人武器，便利将来总暴动上，都必须要在兵工厂建立工作。特别是进攻苏联战争的爆发，兵工厂更成为我们必须工作的目标。”^①但兵工厂的大门把守极严，外人很难出进，无法在厂内接触工人，开展工作很困难。杨一辰经过多次调查，在兵工厂附近的三家子，用化名杨静远的名义，办起了一所静远学校，白天教学生，晚间组织工人学习，用办夜校的办法接触工人，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到1930年初，不仅兵工厂党支部重新建立起来，而且发展了十余名赤色工会会员。在兵工厂内，反对厂方压迫工人和要求工资全部发现洋的斗争，也逐渐开展起来。

不久，杨一辰又被中共满洲省委派往北宁路工作，发动铁路工人开展年关“花红”^②斗争。1930年春节在即，当局却以“财政状况不佳”为借口，宣布当年“花红”取消，引起工人们强烈不满。中共满洲省委认为这是发动工人进行斗争的大好时机。杨一辰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先后到大虎山、沟帮子、彰武、营口、锦州等地调查了解，最后确定以沟帮子为中心搞好各站段的统一行动。经过他几天的奔波，各主要站段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这场斗争持续了20多天。1930年2月8日，路局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要求，各站段发了相当于一个半月工资的“花红”，斗争取得了胜利。

3月，杨一辰去抚顺任中共特支书记。这月下旬，刘少奇

①《中央关于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12月15日）。

②原来北宁路当局为刺激职工的积极性，从每年利润中取出很少一部分，在年关发给工人，名曰“花红”。

离开了满洲省委。由于第二次“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共满洲省委于4月5日通过了《满洲党团省委对于五一工作的决议》，要求抚顺特支“一定要号召广大的政治罢工与政治示威”。

为了贯彻这一决议，杨一辰带领特支同志到南花园、古城子等一些厂矿，发动和组织工人开展斗争。在矿坑、工人宿舍和工人住宅区等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秘密串联工人群众，召开各种会议，积极地进行动员和组织。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有的亲手把传单交给工人看，有的在工人集中的地方找人谈话，号召工人一致行动起来，参加五一政治罢工与政治示威。由于这些“左”的行动，使抚顺特支遭到破坏，除杨一辰赴奉天向省委汇报工作得以幸免外，其余党员几乎全部被捕。在此前后，中共满洲省委和哈尔滨等地党的组织也遭到了破坏。这是满洲省委成立以来所遭到的一次最大的破坏，损失是严重的。杨一辰从这次事件中受到很大的触动和教育。满洲省委被破坏后，当时正在哈尔滨的中共中央委员、省职委书记、“全总”驻满代表林仲丹（张浩），由哈回奉组织了临时省委。林仲丹任临时省委书记，杨一辰任组织部部长，赵毅敏任宣传部部长，王鹤寿负责团的工作。临时省委组成后便投入了紧张的恢复组织工作。1930年9月，省委派杨一辰组织奉天市委并任市委书记。

10月，中共抚顺特支改为抚顺县委。杨一辰又调任中共抚顺县委书记。11月初，经过短期工作，抚顺又有了党团员近40名，赤色工会会员近200名。正当抚顺工人运动又出现好势头时，由于党内出了奸细，杨一辰和正在抚顺巡视工作的林仲丹，以及县委成员张翰民、李爱民被敌逮捕，抚顺党组织又一次遭到大破坏。

杨一辰等被捕后，关押在日本警察署。敌人对他严刑拷问，每天都给他上大挂，悬在半空，以致两只胳膊全不会动了；但他严守党的机密，使敌人一无所得。后来，杨一辰被转到奉天的中国法院，又经多次审讯，他始终没有口供，法院只好让他取保释放。但由于他被捕后用的是李德录的化名，里外不通气，无法找到铺保，最后被判刑一年。1932年3月刑满出狱。

杨一辰出狱后，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分配他担任哈尔滨反日会党团书记、工会党团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和省委东满代表团书记等职。1933年4月，奉天党团特委遭到破坏，满洲省委又派他到奉天担任中共特委书记，恢复党团组织。他到奉天后，终日四出走访，寻找关系，很快把特委恢复起来。当他抓紧恢复党的基层组织时，不幸又在与一个已经叛变的人接头时被捕。这是他第三次被捕。入狱后，他接替已经出狱的杨靖宇的工作，担任监狱中共支部的负责人，领导难友开展了各种斗争。

奉天大部分党的组织，都掌握在杨一辰那里。他入狱后，就给省委写信，报告了自己被捕经过和特委被破坏的情况，并教育看守把这封信送了出去。不料省委派到奉天的张适斋（张适）与杨一辰在狱中接头后亦被捕，杨一辰又给省委写了第二次信。1934年2月，满洲省委又派夏尚志到奉天任特委书记。关于他在狱中与省委保持联系、积极恢复奉天党组织的情况，夏尚志同志有一段很精采的回忆：“我到沈阳后，首先找到狱中的杨一辰同志，通过老杨的介绍，找到监狱看守王惠凤和一个老桑，后来又介绍给我一个掌鞋的老梁头，由老梁头又介绍几个被服厂的关系，还有一个姓叶的，后又找到李北麟的妹妹

和兵工厂的刘树林、王济宽。通过杨一辰同志的介绍又找到赵毅敏同志。”“我找到这些关系以后，就开始健全和发展组织，恢复了奉天特委组织。”当时，在奉天特委领导下，市内共有兵工厂、东山嘴子留日军官候补生、沈海路和监狱共四个支部。监狱支部，就“是杨一辰同志在狱中组织领导的”^①。

杨一辰领导监狱支部，以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党员，“强调监狱就是革命战士的休养所”，组织大家学习，提高觉悟，坚定立场，接受考验，在狱中开展工作和斗争。他们积极做看守的工作，做难友的工作，甚至做有叛变行为的人的工作，叫他翻供，以减轻同志们的“罪名”，使被他咬的人得以出狱。此外，他们还发动过绝食斗争，反对“教诲师”说教，要求改善待遇，搞得监狱当局无可奈何。这次杨一辰被判了12年徒刑。

杨一辰入狱后，党组织始终与他保持着联系，并经常送钱救济。1936年，日本宪兵队再一次大肆搜捕中共人员，并将与杨一辰见过面或有过通讯关系的人都加以逮捕，使党组织又面临着严重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杨一辰为了保护党的组织，秘密通知奉天特委以后不要再和狱中联系了。就这样，他和组织失掉了联系。

1940年12月，日伪为庆祝日本纪元2600年，发布所谓“大赦令”，杨一辰得以假释出狱。但日本宪兵队对他十分不放心，在假释书中规定限期离开“满洲国”，回原籍老家。八年的铁窗生活，使杨一辰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摧残，视力大减，体质虚弱，只好先回家乡山东，一边养病，一边找党。于是，

^①夏尚志：《中共奉天特委的活动情况》（1959年5月27日），未刊稿。

他在出狱当天，便徒步南去，晓行夜宿，离开了风云沧桑十多年的东北。

杨一辰回到家乡山东省金乡县，进入了与日寇铁蹄践踏下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湖西抗日根据地。当他找到中共湖西地委后，被湖西专署派到湖西抗日中学（简称湖中）任教员，担任两个班的历史课。在战斗岁月里创办起来的湖西抗日中学，行动和游击队一样，时常行军转移，树林当课堂，背包当板凳，膝盖当课桌，学生都是十三四岁到十六七岁的小八路。由于杨一辰在这所学校教学有方，成绩显著，1942年2月，中共山东分局把他调到山东省战地工作委员会（省政府前身）教育处任科长，负责山东分局所属各抗日根据地的中小学教育工作。

在参加根据地工作的同时，杨一辰向地委申请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对此，地委向山东分局作了报告，但需有人证明。1942年5月，刘少奇从华中去延安，经过山东时，接见了阔别十几年的杨一辰，并听取他汇报有关东北党组织的发展变化和人民抗日斗争的情况，听取他有关个人的斗争经历和两次被捕入狱的经过，听取他与党失去联系的原因请求党恢复他的组织关系的要求。刘少奇热情地为他写了证明，使他先恢复了组织生活。6月，又经赵毅敏、王鹤寿证明，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恢复他的党籍。从此，杨一辰的组织关系问题全部得到解决。他又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

1942年8月，杨一辰在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参加学习和整风。从1943年8月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先后担任山东分局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城工科科长和城工部部长以及济南市委书记等职务。他担任分局城工部部长期间，积极整顿与加强城市工作。当时，山东的城市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中共中央

指示“里应外合”的思想认识不足，“放松了依靠自己独立自主夺取城市交通线的准备工作”^①。经过他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城市工作的面貌有了改观，胶东、鲁南、鲁中等地区的城市、矿山及交通要道打入和原有党员已达501人，团结群众2300余人；还由城工部直接训练了117名敌占城市、敌占区、边缘区的青年，陆续派回去工作。所有这些，都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及后来夺取城市，作积极的准备。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加紧运兵，发动内战。1946年3月，杨一辰被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城工部部长。1947年3月，当蒋介石调集60个旅、约45万人，发动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时，为了加强支援前线的工作，华东局又调杨一辰任山东省支援前线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军区副参谋长兼）兼华东野战军兵站部政治委员。支前委员会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山东省政府、山东军区直接领导下，担负着组织运输，调剂物资，计划生产，保证供应，合理使用、积蓄与调节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争取自卫战争彻底胜利的使命。杨一辰主持支前委员会后，做了大量的工作，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华东野战军，粉碎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秋，他随军南下，到陇海路南，转做地方工作。10月，任豫皖苏行署秘书长、中共豫皖苏党委委员。在淮海战役期间，他深入斗争第一线，发动群众，积极做好战争的物资供应工作。1949年3月，中共河南省委成立，他任省委组织部部长。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同山东和豫皖苏地区广大干部和人民

^①《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3辑第31、46页。

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奋斗，迎来了全中国解放的曙光。

建国初期，杨一辰先后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副书记兼城工部部长。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专业知识，勤于探索，勇于开拓。在他所从事的党政、城市等各项工作中，都积累和掌握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取得了显著成绩，并为党培养和选拔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1951年他被推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者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在莫斯科出席了十月革命节的观礼，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

1955年以后，杨一辰调北京，先后担任国务院农产品采购部部长、城市服务部部长、第二商业部部长、商业部部长。1958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财贸工作对于杨一辰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但他努力去熟悉，去探索。特别是在1958年他担任商业部部长期间，针对当时国营商业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情况，曾多次提出批评和改进的意见。他很有见地的提出：不要“凡是一样东西紧张，我们就抓起来，不去发挥地方、群众积极性”，应当“通过地方想办法解决”，国营商业不要管得过死，应该搞活。他对当时的物价问题也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曾提出物价稳定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稳定和变动是什么关系？我们考虑问题的方法是否对头等等发人深思的问题。

当然，杨一辰在当时“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在探索过程中也有过失误和挫折，影响了商业工作更好地为人民生活服务，于1958年9月受到了撤职降级的过重处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批准撤销了这一处分决定）。11月，组织上分配他到青海省任商业厅厅长。

杨一辰是一位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荣的无产阶级战士，他勇于自我批评，从不文过饰非。他的失误一经被指出，便认真做了检讨，吸取经验教训，并决心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虽然他受到了过重的处分，但毫无怨言，从严要求自己，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到青海以后，他更加忘我地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联系群众，团结干部，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农村经济，克服国民经济困难作出了艰苦的努力。

1961年5月，中共中央调杨一辰任河北省常务副省长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62年11月，又批准他为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杨一辰在主管河北省财政经济工作期间，认真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注意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杨一辰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67年，“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抓住杨一辰曾参加营救刘少奇出狱一事，竟以“刘少奇1929年被捕叛变的重要知情人”、“态度极不老实”的罪名，经康生、江青、戚本禹批准，对杨一辰实行隔离审查，日夜轮番审讯，强迫他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甚至用枪威胁搞逼供信。杨一辰不顾个人安危，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审讯陷于僵局。于是，专案组限期要他写出书面揭发材料。杨一辰利用这一个机会，详详细细地写了材料，说明刘少奇不是“叛徒”。审讯、逼供、写材料，都没有达到目的，便施用残暴的肉刑。可是，他仍然铁骨铮铮，紧闭双唇，不说半句假话，最后竟被残忍地打掉三颗门牙，压断一根筋骨。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不就此罢休，1975年5月，又将“有严重罪行”的“叛徒”的罪名加在

他的身上，将他开除出党。6月，他被送到河北汉沽农场劳动改造。由于长达八年之久的隔离审查、监护和关押，杨一辰的身心已受到严重摧残，9月，获准回保定在家养病。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杨一辰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要求继续为党工作。1979年3月20日，他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写道：

“我家居休养，多半年来，坚持读书，坚持锻炼身体，现在身心都很舒畅，我已向中央提出要求，想再去西北做些调查研究工作，尚未批回。我觉着西北潜力很大，新工矿区很多，如何发展，如何建设，如何互相联系，怎样建设才能适合于社会主义和将来的共产主义，都得详加研究。”这充分表达了杨一辰这位无产阶级战士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劫后余生，首先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社会主义事业，并且要求到条件艰苦的大西北去工作，去搞调查研究。这时，他已是74岁高龄了。

中共中央对杨一辰十分关怀。1979年1月，中央组织部将他请到北京治病。1980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了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关于杨一辰为“叛徒”的错误结论，推倒了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决定调杨一辰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工作。3月，他到郑州，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杨一辰到河南以后，不顾自己年老多病，仍然奋力工作。河南本是他所熟悉的地方，可是他一到河南还是抓紧搞调查研究，找各方面工作的同志谈情况，了解问题，研究如何在四化建设中发挥河南的优势。

1980年10月15日，杨一辰因患脑溢血病逝世。

张子意

曾长秋 吴兴强

1981年6月12日，原红2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纪委常委、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张子意的追悼会，在中央警卫局礼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致悼词，盛赞“张子意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诚战士，是农民运动优秀的领导人之一，是我党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是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严守党的纪律的模范”^①。

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列

张子意是湖南醴陵人，1904年9月3日（清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四），诞生在石亭乡塘山口村锅婆塘一户佃农家庭。父张芳风、母张满婆婆均系老实农民。子意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两弟两妹，合家共16口人。家里有茅房7间、山地8亩，另外，还租种水田22亩。全家终年勤耕苦种，省吃俭用，仍不得温饱^②。

1912年秋，张子意入附近的言公祠蒙馆就读。他知家境艰难，十分用功，用三年时间学完初小课程，插班进北乡清安

^① 《张子意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1981年6月13日《人民日报》。

^② 1985年4月3日访问张子意之妹张幼林的记录。

铺高小。他对文史、地理和自然科学常识很感兴趣，还受到了一些民主共和思想的启蒙教育。

张子意 13 岁高小毕业，到长沙考取了长郡中学，他成绩优异，在中学只读了 4 年就提前毕业了。按他的成绩，完全可以考上大学继续深造，但因家庭经济困难，只得辍学回家。1921 年至 1924 年，他先后在北二区高小和北联高小任教职，起初，有的学生年龄比他大，个子也比他高，看他不起。可是，听了他的课以后，觉得这位“小先生”有学问，都心悦诚服。

1924 年 10 月，中共安源地委书记汪泽楷到醴陵，建立了中共醴陵特别支部。翌年 10 月，安源工人俱乐部遭军阀封闭，俱乐部夜校教员刘义、旷家喜潜回家乡北二区，开展农民运动，秘密发展张子意入党，建立了北二区党支部。张子意在关王庙开办农民夜校，向农民进行革命宣传。他还奔走在鸿仙寺、斯陶坪一带，秘密吸收农会会员。

1926 年 7 月，北伐军攻占醴陵，张子意率北二区农民协助叶挺独立团作战，取得“泗汾之役”的胜利。此后，农会由秘密转为公开活动，北二区农民协会在关王庙挂起了招牌，张子意担任委员长^①。他领导当地农民开展平巢，阻运谷米出境，实行二五减租，斗争不法乡绅，使北二区的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1927 年初，毛泽东在湘源、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醴陵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孙小山通知张子意到县城，向毛泽东汇报北二区开展农民运动的情况。张子意后来回忆说：“毛委员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到醴陵，时间大约是一

^①1980 年 7 月 3 日访问当年农会骨干易升葵的记录。

月底。他是一个人来的，在县城先农坛的县农协召开调查会，有县农协负责人和少数区农协委员长参加。我当时是北二区农协委员长，区委书记告诉我，县农协通知我去开会。这次到了十几人，毛委员有调查提纲，调查的内容很广，如农民入会、减租退押、清算贪污、烧祖宗牌、查赌禁烟、修塘筑路等情况都问得很详细，一直问到大米、油盐、布匹是什么价。我们回答他的提问，毛委员没有到北二区去，情况是我汇报的。当时将伏波岭、龙凤庵打菩萨的事也汇报上去了，大家谈得很高兴。开调查会花了五六天时间，毛委员就住在先农坛内，每天上下午都开会，晚上他就整理记录，结束时还给我们讲了两个钟头的话，内容主要是讲农民是主力军和革命先锋的问题。”^①

正当国民革命深入发展、农民运动迅猛开展时，5月21日在长沙发生“马日事变”。为了粉碎国民党新军阀的进攻，中共湖南省委决定调长沙附近各县农军围攻许克祥叛军。醴陵的工农武装紧急动员起来，在中共醴陵县委书记罗学瓚、代理县长潘彊爪的带领下，分成三路，向长沙推进。张子意担任第一路指挥，立即在关王庙、晏家坡集合了醴陵北乡的农民队伍，星夜出发。次日晨，他们赶到株洲白石港，遇到许克祥部一个连的狙击。农军势众，数千人喊着“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口号，奋勇进攻，用梭镖、鸟铳打死七八个士兵，击毙一名副连长，并夺得机枪一挺，乘胜追到长（沙）潭（湘潭）株（洲）交界的易家湾，与设防之敌对垒数日。就在这时，张子意突然接到撤退命令，说是湖南问题要由武汉国民政府派人解决，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大家的热情被浇了一盆冷水，

^①1976年6月9日韶山陈列馆和1977年12月28日醴陵农运纪念馆访问张子意的记录。

只得忍痛退兵，反动军队追赶到株洲白鹤仙，将农军击溃，张子意只好走避安源。

中共八七会议召开后，毛泽东亲赴安源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张子意受安源党组织派遣，由江西返回醴陵，接替易学泳任北二区区委书记，并被增选为县委委员，准备响应起义^①。9月12日，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从安源出发，乘火车抵醴陵阳三石车站，攻占县城，成立工农革命政府。敌人三个团赶至，从三面包围县城，起义军转战浏阳。当时，张子意正在北乡发动农民群众，未能及时赶上部队，便留在当地开展游击战争。

一支游击队建立起来了，可是没有武器。张子意侦知刘孔涛（任零陵镇守使）将四条马枪留在清安铺家里，龙凤冲地主何再辉也有四支守家护院的长枪，便率北二区游击队将这些武器收缴了。于是，游击队凭着这八支枪，先后打过淥口团防局和姚家坝火车站，还枪决了向农民反攻倒算的刘西崖父子。10月初，张子意带领刘昌福等游击队员，多次截获国民党游兵散勇的长短枪20余支、机枪两挺，并将游击队扩编为游击营。不久，醴陵各区游击营奉命组建工农革命军第1团，周云甫任团长，张子意任副团长，张湘云任政治部主任（党代表暂缺，后由湘东特委书记滕代远兼）^②。

1928年初，唐生智部在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中失败，退守湖南。第8军第1师的一部分溃军经醴陵南下，不识去衡阳的路径。张子意安排一个农民故意将他们带进石马冲和喻家冲之

①醴陵农运纪念馆：《醴陵县北二区大革命时期革命斗争概述》（1958年），未刊稿。

②《醴陵革命斗争大事年表》（1984年），未刊稿，存中共醴陵县委党史办公室。

间的狭长山涧，被游击队包围。张子意还发动附近上千农民登山助威。敌人不知虚实，请求谈判。张子意派苏能震、文华楼等前去洽谈，敌人被迫交出步枪200余支、子弹数十担。这个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北二区的革命群众。于是，在清水塘挂牌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旷家喜任主席），同时设立武装指挥部，张子意任指挥。北二区苏维埃区域，方圆百十里，人口约5万。

当时，苏区内的紫云山有雷英和胡泳祥两股土匪，手下各有人枪数十。他们慑于苏维埃政权的力量，一度表示归顺。但是，在县清乡队下乡“清剿”时，他们又拖枪反水。张子意率工农革命军一部，与叛匪和清乡队展开激战，毙30多人，镇压了一批蠢蠢欲动的土豪劣绅，从而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此役，被醴陵人民称为“北二区之役”。

1928年春节期间，中共醴陵县委发动农民，组织年关暴动，张子意担任北路指挥。1月27日，四乡农民数千人，抬起松树炮，摇旗呐喊，猛扑县城。张子意手提盒子枪，在唐公祠集合起北二区四五百农民，进攻城郊黄泥坳，但是，受到姜湾一连驻军的狙击，受挫而回。2月27日，省委特派员陈恭、陈觉^①协助县委发动了第二次攻城。战斗从凌晨打到午时，张子意终于带领一部分农军战士突破凤凰山防线，从七眼塘、来龙门进城。短兵相接，敌人搬出居民的家具堆放街头巷口，设防抵抗。战斗正酣，张子意用缴到的望远镜观察，发现敌人将机枪调到巷战阵地，只得指挥撤退。醴陵两次扑城斗争，农军

^①陈恭和陈觉都是醴陵南乡泗汾镇人。陈恭毕业于黄埔军校，南昌起义时任师党代表；陈觉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们均在这次年关暴动后不久牺牲。

虽然没有打下县城，但敌人也不敢下乡“清剿”，从而打开了全县农村武装割据的局面，南二、南三、南四、西一、北二等区的35个乡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共有人口22万，土地24.5万亩。

为了扑灭醴陵苏维埃运动的火焰，湖南清乡督办署调第8军第12师和第6军第18师，对醴陵苏区实行“血洗火烧”的“清剿”。醴陵工农革命军第1团主力由刘型率领，转移到井冈山，张子意留下坚持斗争。北二区农军对进犯之敌勇敢反击，先后在鸿仙寺、敖家岭与第6军王学琳团、渌口团防局陈年登部作战。因寡不敌众，牺牲了上百人，区委决定埋藏武器，分散转移。国民党曾悬赏1000元光洋捉拿“暴动首领”张子意，他在北二区呆不住，隐蔽在东铺冲张怡台家的夹墙中。一个月过后，白色恐怖仍十分严重，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由张怡台护送，潜出醴陵，转移到江西萍乡县竹园的舅舅张佑兴家暂避^①。

卓越的红军政治工作者

1928年，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屡遭敌人破坏，秘密迁入安源。6月初，张子意通过安源地委介绍，去省委机关担任机要工作。不久，省委迁回长沙，只活动了两个月，又被叛徒告密，其主要负责人逃走上海，张子意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地下斗争。1930年10月，原省委书记宁迪卿叛变投敌，省委在

^①张子意后来回顾这段经历，说他出走后，敌人没有放过他的家庭和亲戚，房子被烧，一家老小扫地出门，大弟被惨杀，七个堂兄弟被捕。

长沙的办事机构遭破坏，恰逢张子意下乡，接到地下交通的通知，没有返回长沙，奉命去萍乡南坑，与袁德生、谭家述等组建湘东南分委（后改特委），继续活动。特委将湘东赣西各县农民武装的枪枝集中起来，成立湘东南红军独立师，开辟了一小块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

1931年7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将湘东南、湘南特委和赣西的西路、中路、北路行委合并，成立中共湘赣临时省委。10月初，张子意结束了在南坑的工作，赶赴莲花县花塘村，参加湘赣省第一次党代表会，并被选举为省委委员^①。不久，省委机关移永新县城禾川镇，张子意住肖家祠办公。为发展党组织和扩大红军队伍，他日夜奔忙在井冈山麓、禾水两岸。

1932年11月7日，为纪念十月革命25周年和庆祝湘赣省第二次党代表会召开，禾川镇张灯结彩，张子意在群众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是第二次党代表会主席团成员，与王首道、甘泗淇、刘其凡、王炳生、袁德生、肖伍仔7人被选为省委常委，王首道任书记，张子意任组织部部长，甘泗淇任宣传部部长^②。

1933年初，中共苏区中央局先后派刘士杰、陈洪时（后均叛变）进湘赣苏区，推行王明“左”倾错误，改组省委。张子意改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兼办省委机关刊物《湘赣斗争》。在此期间，他由于受“左”倾错误影响，一度参与批判过原省委的“右倾机会主义”。但是，在实践中，他很快就纠正过来，并开始与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作斗争。他不赞成撤销王首

^①张启龙：《往事与回忆》，1984年5月15日《湖南日报》。

^②《湘赣苏区省委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3年2月1日），存中央档案馆。

道、张启龙、甘泗淇等的职务，更不同意逮捕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后被杀害）。因此，遭到刘士杰、陈洪时的排斥打击。

不久，中共中央（此时已从上海迁入江西苏区）和中革军委又陆续派来任弼时、肖克、蔡会文等，加强湘赣苏区的领导。任弼时接替了刘士杰的省委书记职务，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左”倾错误，张子意才得以继续留在领导岗位上。在湘赣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他仍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兼白区工作部部长^①。

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湘赣省派王震、张子意分别出席这两个会议。张子意受湘赣省委的委托，会后向临时中央负责人汇报省委第三次党代表会情况。博古、凯丰等不等张子意说完，就开始指责任弼时代表省委所作的工作报告是“什么都讲了，什么都没有”，要求湘赣省委继续“排除阻力，大反右倾”。张子意想不到临时中央领导人会简单粗暴地否定湘赣省委的工作，起来辩解，但被置之不理，他气得浑身发颤。

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7月23日，中革军委向湘赣省发来指示电，命令湘赣红军作为长征的先遣队，转移湘鄂川黔边境去开辟新的苏区。8月7日，湘赣红17、18师的9000健儿，由永新县横山出发。张子意随军行动，踏上了西去的征途。部队日夜兼程，先后在五斗江、凼林、左安、高坪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于11日到达湖南桂东县寨前圩。在寨前圩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任弼时代表中革军委宣布红6军团正式由红17、18师编成，由肖克任军团

^①《湘赣省委五十五通知第一号》（1933年12月5日），存中央档案馆。

长，王震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①。

当时，部队频繁作战，减员过半。张子意带领政治工作人员，沿途不断地宣传动员，向指战员说明完成西征任务的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求全军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9月下旬，红6军团进入贵州苗、侗族聚居的清水江流域。张子意起草政治部文告，揭露国民党残害苗、侗族同胞的罪行，说明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解除了当地少数民族对红军的误解。他还要求部队沿途做好争取土司头人的工作，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对生活困难的居民，给予必要的救济。苗、侗族同胞消除了顾虑，帮助红军找来船只，绑结木筏，使红军顺利地渡过清水江。

10月24日，红6军团在黔东印江县木黄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会合。中共中央得知两军会师的消息后，及时发来了贺电，并批准红3军恢复红2军团的番号。两个军团在川黔边界的酉阳县南腰界举行了会师大会，会后，贺龙详细地向任弼时、张子意等红6军团负责人介绍了红2军团艰苦转战的情况，特别要求红6军团派人加强红2军团的政治工作。11月1日，任弼时、关向应、王震、张子意四人联名向中央发出电报，汇报夏曦在红2军团搞肃反扩大化，撤销了部队的各级政治部和党组织。根据中央回电，红6军团政治部完整地调给红2军团，还抽调了数十名政工干部补充红2军团的师、团两级。张子意率这些政工干部到红2军团时，受到贺龙等指战员热烈欢迎。按中央电令：红2军团由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页。

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①，并指定红2军团兼作两支部队的联合指挥机关。

11月24日，红2、6军团占领大庸和桑植县城。26日，成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选举任弼时为书记、张子意为副书记^②，省委机关设大庸县塔卧。针对肃反扩大化的问题，省委开会统一认识，张子意曾多次发言，结合湘赣省的教训，批评夏曦的错误。为了巩固和发展苏区，任弼时、王震、张子意率红6军团主力和红2军团第16团留守根据地，贺龙、关向应、肖克率红2军团主力和红6军团第56团向外发展，开辟新区，准备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在这期间，张子意协助任弼时拟草了《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条例》，并在苏区各县举办政策训练班，组织工作队下乡帮助开展土地革命。他们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保障根据地内的工商业经营稳定。还成立了扩红宣传队，到各地写标语、演戏剧，动员群众参军。

1934年冬，蒋介石调40万大军麇集湖南，迫使中央红军放弃去湘鄂川黔苏区的计划，转兵入黔，继续长征。红2、6军团承受了巨大的军事压力，担负着掩护主力红军西进的任务。1935年初，中革军委对红2、6军团的反“围剿”斗争作了重要指示，来电批准成立中革军委湘鄂川黔分会，由贺龙任主席，张子意等为委员，建立了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军分会在茨岩塘设后方办事处，张子意分管党务和群众工作，他和袁任远率红16团去三官寺一带筹集粮款，扩大红军，补充了近千名新战士，还筹到10万元现洋。根据地初创，百废待兴，省委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148页。

^② 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第215页。

决定在塔卧办一所干部训练学校，由张子意任校长，王恩茂任教务主任，先后有数百名军队和地方干部参加学习，毕业后派到各级党组织或军队的政治工作部门任职^①。

11月19日，红2、6军团跳出国民党130个团重兵的包围，放弃经营了一年的湘鄂川黔苏区，从桑植县刘家坪出发，向云贵地区转移。张子意率领政治工作人员深入新创建的黔（西）大（定）毕（节）新根据地，开展群众工作，并争取了爱国反蒋人士周素园先生，由他出面团结毕节各界人士，组建临时抗日民族联合政府。

1936年3月23日，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名义，给红2、6军团发来电报，要其北渡金沙江与红4方面军会合。张子意于3月31日率政治部人员从盘县亦资孔出发，经过20余天艰苦的行军，渡过金沙江，进入中甸藏民区。沿途，张子意反复向部队各级政治干部强调民族政策，还亲自策马走到队伍前面，和“通司”（藏语翻译）一道访问藏族群众，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并购买粮食解决部队的给养。由于西康地区人烟稀少，物资贫乏，部队分兵北上。张子意所在的红2军团为左纵队，他们经得荣、巴塘、白玉等地，于6月30日进抵甘孜县城坝岔，与李先念领导的红4方面军第30军会师。7月2日，红4方面军和红2、6军团在甘孜县城召开会师庆祝会，中共中央从陕北发来贺电，批准红2、6军团组成红2方面军，以贺龙为总指挥，肖克为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李达为参谋长，张子意为政治部主

^①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任^①（后因健康原因，张子意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职务与红6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对调）。

两大主力会师后，张国焘用送好马、赠礼品等手段，企图拉拢红2方面军的干部反对中共中央，还派了一个工作团到张子意所在的红6军团政治部，要求散发张国焘进行分裂活动的小册子。张子意只准他们向部队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不准散布反对党中央的言论，从而抵制了张国焘的阴谋活动。后来，中共中央高度评价张子意“在张国焘阴谋分裂红军的关键时刻，表现了拥护党中央的坚定精神和原则立场。”^②

7月11日，红2、4方面军由甘孜县东谷出发，继续长征。张子意曾一晚冒雨赶了90里路，到西岭寺召开先头部队红18师政治部的部务会议，指导政委晏福生制定了该师过草地的计划。他们走到草地边缘时，因连日暴雨，部队缺粮，病号增加，只好停留在阿坝县绒玉地区筹粮，但所获甚少。后张正坤率红18师在岷公寺搞到牦毛百头、粮食千斤，才使各师得到一些补充。对以上经过，张子意在长征日记中均有记叙。此时，“草地天气寒冷，虽入三伏，亦不能离皮大衣”^③。他的病情加重，却一声不吭，与王震率红17师和模范师断后。后续部队在沿途补充食物更加困难，尽食野菜、草根、尸骨（先头部队宰马剥去皮肉留下的臭骨架），部队掉队和死亡的现象比较严重。张子意心情沉重，把自己的马杀了，分给战士们充

^①《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5页。

^②王震在张子意追悼会上致的悼词，载1981年6月13日《人民日报》。

^③张子意：《长征日记》，载《党史研究资料》总第49期，1981年8月22日出版。

饥。他以惊人的毅力，拖着有病之躯，步行400里，走出了茫茫草地。

由于雪山草地恶劣气候的影响，张子意患了肺病，还染上疟疾。但他不愿让别人用担架抬，一直强打精神硬挺着。刚走出草地，他又召集各师政治部主任开会，进行政治动员，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问题。他布置各师组织部检查纪律，宣传部出墙报壁画，地方工作部召开群众大会，成立抗日救国会和民众自卫武装，并亲自带领直属队筹款扩红，忙个不停。由于昼夜连续工作，他在两当县永宁镇一度昏迷。直到这时，周围的同志才知道他病情不轻，送他到卫生队抢救，强行他卧床休息。

1936年10月22日，红1、2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县将台堡会师。24日，红2方面军举行营以上干部会议，张子意请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作了统一战线及回民问题的报告^①。11月2日，张子意去双河铺参加红军总部的会议，听取了朱德总司令关于会师后确定编制与干部问题的报告^②。会后，他协助贺龙等用两天时间，将红2、6军团分别改编为红2、6军。红6军由陈伯钧任军长，王震任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③。

11月19日，张子意在红2方面军出发长征周年纪念会上，作了题为《红二、六军团的长征经过及胜利的意义》的报告。保留下来的报告提纲这样写道：“总结长征的胜利，在整整一年内，经过二万余里长征，横扫湘、黔、滇、康、甘五省，前后冲破了敌人李（觉）、章、陶（广）、李（云杰）、

^{①②}张子意：《长征日记》。

^③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255页。

陈、樊（嵩甫）、汤（恩伯）、郭（恩演）、郝（梦龄）、万（耀煌）、孙（渡）、王等十二个纵队，二三百个团的包围、追剿，进行了大小数百战，有名的如瓦屋塘战斗、便水战斗、毕节将军山战斗、德章坝战斗、以则河战斗来宾铺战斗、普渡河及其附近几次战斗，各次攻城战斗俘获人枪各在五千以上。占领过辰（溪）、溆（浦）、新（化）、晃（县）、清（溪）（湘省）；江（口）、石（阡）、瓮（安）、平（越）、扎（佐）、修（文）、黔（西）、大（定）、毕（节）、盘（县）、赫（章）（黔省）；奎（香）、寻（甸）、盐（兴）、牟（定）、姚（安）、盐（丰）、富（民）、楚（雄）、镇（南）、普（朋）、祥（云）、宾（川）、鹤（庆）、丽（江）、巨（甸）、中（甸）（滇省）；定（乡）、稻（城）、理（塘）、得（荣）、白（玉）（康省）；徽（县）、成（县）、康（县）、两（当）（甘省）等四十余县城，扩大红军不下一万五千人。”^①张子意的报告提纲，还把红2方面军长征的全部过程，概括成八个方面，这八个方面的标题是：

1. 突击湘中，全国震动；
2. 横扫黔省，所向无敌；
3. 威震云南，龙云丧胆；
4. “追剿”之敌，叫苦连天；
5. 克服天险金江；
6. 战胜雪山草地；
7. 远出陕甘，全国红军会合；
8. 长征胜利，英雄万古流芳^②。

^{①②}张子意：《长征日记》。

新疆监狱的不屈战士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子意由于身体不好，被迫离开部队。他先主持了一段红2方面军随军学校的工作，并为团以上干部的高级班讲授世界知识课程。1937年5月，他抱病在延安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因病情继续恶化，党组织劝他留在延安治疗，后来，又送他去苏联疗养。1938年初，张子意与方志纯、马明方、蔡畅、蹇先任、贺子珍等到达莫斯科。张子意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安排，住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一面治病，一面学习，并担任学校中国部学员党的领导工作。疗养期间，他向杨之华学习俄语，接着就跟班听课。经过十年戎马生涯，他第一次坐下来认真研读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感到受益匪浅。

星移斗转，一晃三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1940年冬，中共代表团决定让一批在苏联学习的同志回国工作。在离开莫斯科的前夕，任弼时领张子意、方志纯、马明方等驱车往共产国际办公大楼，拜会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一见面就高兴地告诉他们：“根据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共产国际决定让你们这一批中国同志立即回国。”^①季米特洛夫还应大家之请，介绍了他在莱比锡法庭揭露德国法西斯制造“国会纵火案”阴谋的斗争情况，这给张子意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

^①方志纯：《回忆新疆监狱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1941年1月，张子意一行20余人，从莫斯科启程回国。他们从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阿拉木图进入新疆，八路军新疆办事处派徐明乐专程在国境线上迎接。他们在伊犁休息了两天，于2月初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住在八路军新疆办事处的羊毛湖招待所。陈潭秋、毛泽民见到大家，高兴地说：“你们学了很多马列主义，吃了洋面包，现在回来，正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呀！”张子意代表回国的同志，将在苏联学习期间节衣缩食所余剩的200卢布生活费交给办事处，并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请党组织收下。”

由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派兵封锁了陕甘宁边区，要从新疆安全地抵达延安，是比较困难的。经陈潭秋建议，去电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张子意一行暂时留下，协助新疆办事处工作。

1942年春夏之交，新疆地方军阀盛世才放出谣言，说共产党要举行“四一二阴谋暴动”。张子意凭着长期斗争的经验，在办事处对方志纯等说：“新疆不仅自然寒冷，政治气氛也是冷的。盛世才很快要对我们下毒手了，我们要作好思想准备。”他望着远处的天山积雪，意味深长地说：“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随即吟诵了一首唐诗：

五月天山雪，
无花只有寒。
笛中闻折柳，
春色未曾看。

果然不出所料，只隔了一个多月，盛世才就借口“社会秩序不安定，有人要杀共产党”，强迫将八路军新疆办事处等单

位的中共在疆工作人员，以及从苏联回国路过新疆的共产党员并家属 100 多人，全部集中到八户梁大院的临时“招待所”，“保护起来”。张子意等被软禁后，一方面抗议盛世才的非法迫害，要求恢复自由；另一方面则加紧整顿组织，进行气节教育，并且按照中共中央在延安开展整风的精神，进行整风学习。他们在“招待所”成立了以陈潭秋、毛泽民、张子意等六人组成的学习委员会，实际上是党在新疆统一的领导机构。张子意等向大家介绍龙华、雨花台烈士的事迹，讲红军长征的故事，并教大家背诵文天祥的《正气歌》。他说：“一定要作好长期坐牢的准备，不管形势多么恶劣，斗争多么残酷，都要保持共产党人的坚贞气节。”

三个月过去了，盛世才进一步下毒手，先后两次派武装将身分公开的陈潭秋、毛泽民等负责人“请走”，转到其他地方秘密关押。但是，新的学委会成员又选出来了，他们是张子意、马明方、方志纯、李何和谢良，继续领导大家斗争。张子意提出要做到“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他组织学习，每次学“一支香”的时间，还请吉合帮助他读俄文版的《资本论》。

1943 年 4 月 11 日，盛世才撕下了最后一道面纱，出动一个营的兵力，将中共在新疆的人员及家属全部逮捕入狱。当时，张子意正患肺病，瘦骨嶙峋，不断咳嗽，而且还发着高烧，也被特务强行与其他伤残同志转移到西河坝的一个旧军营里关押起来。张子意虽然没有与监狱的同志关押在一起，但他通过少数民族“工犯”（即在狱中做工的犯人）的关系，沟通了监狱内外的联系。他的威信很高，大家见到他在条子上的字迹，就说：“大哥来信了。”他通过递条子，先后三次领导反

对监狱非人待遇的绝食斗争。张子意还写了一首《狱中诗》，控诉盛世才对革命者的摧残，激发大家的斗争。这首诗被狱中同志争相传诵，诗文是：

世人谁说狱中好，
我欲颂兮颂不了。
古来苛政毒如蛇，
残害忠良知多少？

世人谁说狱中好，
你欲颂兮颂不了。
史迁下狱天祥死，
正气长存掩不了！

世上谁说狱中好，
慢性摧残受不了。
壮易衰兮病易死，
师旷失聪班失巧。

世人谁说狱中好，
只有疾苦忘不了。
呻吟暗室莫奈何，
空气阳光进不了。

世人谁说狱中好，
只有黑馍忘不了。

粗糙杂面又多砂，
嚼时牙齿也碰掉。

世人谁说狱中好，
只有生葱忘不了。
天天给你吃生葱，
看见生葱就作呕。

世人谁说狱中好，
只有臭虫忘不了。
昼伏夜出吸血多，
奸巧狡猾捉不到。

世人谁说狱中好，
只有钢筋磨不了。
石造心兮铁铸肠，
任他暴风吹不倒。

世人谁说狱中好，
只有相爱忘不了。
男女老幼一条心，
相倚相扶真正好。

世人谁说狱中好，
只有分离忘不了。
亲亲姐妹泪盈眶，

铁石心肠也动了。^①

张子意还指示狱中同志将林基路写的《囚徒歌》谱上曲，在囚室里教唱。这些诗歌成了鼓舞同志们战斗的号角。

1943年9月，盛世才秘密地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和林基路三人，监狱里的同志是半年后才得到消息的。张子意布置各个“号子”召开追悼会，集体宣誓向烈士学习。在1944年七一节，监狱里举行了纪念活动，并进行了气节教育。大家在学委会的领导下，拧成一股绳团结战斗。

1944年冬，蒋介石派吴忠信接替盛世才的新疆省政府主席，他对被押的中共人员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同时，将关押在西河坝的张子意等人也投进监狱。吴忠信曾以“清理积案”为由，给狱中每人发了一张表格，其中有“政治信仰”一栏。因当时还维系着国共合作局面，经张子意等反复研究，决定统一口径，填写“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这样，即维护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又坚持了原则，国民党顽固派也无空子可钻。

接着，国民党开始对被押同志进行普遍审问。在提审张子意时，新疆监狱的书记官记下了这样一段“供词”。张子意说：“现在我也算是残废人，由盛世才执政时就被禁，到现在什么罪都不知道。因我的出身是八路军，我就相信共产党并无不好的行为，愿为他（共产党）牺牲，决没有什么怨言。”^②当时，张子意的总负责人身分没有暴露，国民党只知道他是个

^①转引自方志纯：《回忆新疆监狱的斗争》第65至67页。

^②方志纯等：《时穷节乃现，肝胆照汗青》，1981年7月23日《人民日报》。

八路军的伤病员。他受过四次审讯，又长期受饥寒折磨和特务的拷打，身染重病，生命随时都可能终止。但是，他恪守共产主义的信念，以坚贞不屈的行动鼓舞着难友们。国民党无可奈何，哀叹“该等均仍执迷不悟，顽冥异常，受马列主义学说之麻醉太深，决非以言语之力而能冀其清醒。”^①

1945年6月，张子意等学委会负责人利用新疆监狱有让亲属给“犯人”送食物的规定，把名单秘密递出监外，通过进步青年传到在重庆的周恩来手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中共代表提出了释放“政治犯”的要求，按名单向国民党交涉放人。1946年6月，张治中就任新疆省政府主席，释放了张子意等被押的100多名中共人员，并安排车辆将他们送往延安。车队冲破胡宗南军警特务的阻挠，于7月10日抵达延安。张子意等在中央党校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林伯渠等的热情接见，还在一起合影留念。此时，张子意已41岁，他在延安与同在新疆的难友沈谷南结婚，战友们赞扬他们是“铁窗结同心”。

张子意在新疆监狱中，表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中共中央对他这段时期的评价是：“在将近四年之久的监狱斗争中，张子意同志是狱中党组织的总负责人，和方志纯、马明方等同志一起，紧密团结了一起被捕的我党在新疆的一百多位同志，组织大家对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严峻的考验证明，张子意同志不愧为具有崇高革命气节的坚贞战士和富有斗争经验的领导者。”^②

①转引自方志纯：《回忆新疆监狱的斗争》第104页。

②王震在张子意追悼会上致的悼词。

为迎接解放忘我工作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张子意请求中共中央分配工作。当时，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回到延安，便问张子意是否病愈，张子意拍拍胸脯说：“决不会拖工作的后腿。”就这样，他随贺龙一起到了山西，担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并主管《晋绥日报》的工作。不久，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调任晋绥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决定由张子意代理书记职务。

1947年7月，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夺取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黄河两岸的人民解放军统一成立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由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①。战略反攻开始后，贺龙、李井泉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在前方作战，晋绥军区的领导成员在1948年初进行了调整，中央军委决定由陈漫远任司令员，张子意任政委^②。

当时，作为老解放区的晋绥边区，正在进行土地改革，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整顿也全面铺开。不到半年时间，全区300万人口中就有270万分得了土地。但是，在土改和整党中，一度出现了“左”的偏向。张子意带领分局机关的同志，深入调查研究，连续发出了《关于改正错订成份与团结中农的指示》和《关于保护工商业的指示》，纠正了土改中侵犯中农和工商业者利益的偏向。对于整党中“搬石头”的过火做法，也给予了纠正，使全区的工作走上了正轨。这段期间，久病初愈的张子

^{①②}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565、566页。

意身兼数职，起早贪黑地奔波，有时还深入吕梁山区检查工作，但他仍嫌事情做得太少。别人劝他注意休息，他乐呵呵地说：“我在监狱里呆了四年，那时想做工作也没有，歇了一段，现在正好使劲干。”

1948年3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准备进入华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途经晋绥边区时，张子意等分局的领导同志向毛泽东汇报了边区工作。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表扬了晋绥分局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成绩。次日，张子意等又陪同毛泽东视察了《晋绥日报》。毛泽东对张子意等谈话，肯定了晋绥日报社的工作，使在场的同志受到很大的鼓励。

1949年夏，刘伯承、邓小平率第2野战军挺进川东，贺龙率第1野战军一部，也挥师进入川北。张子意带领晋绥边区南下工作团，随贺龙部千里驰骋，于11月底到达川西平原。12月27日，成都解放，张子意参加了对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起义部队的政治训练和改编工作。为了统一指挥入川的作战部队，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西南军区，由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周士第任参谋长，张际春和张子意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西南军区辖云南、贵州、西康、川西、川南、川东、川北、西藏八个军区，以及炮兵、工程兵两个司令部。张子意分管党务和地方工作，针对四川国民党势力盘根错节的情况，他依靠过去在川工作的地下党同志，查出了不少潜伏下来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同时，他以主要精力宣传和发动群众，巩固新区，工作很有成效。

解放大西南的任务完成后，张子意被留在四川，担任中共

中央西南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农村工作部部长等职^①。建国初期，工作千头万绪，张子意在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的领导下，以主要精力开展新区的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并亲自带一个工作组试点。他在主持西南局宣传工作时，一度兼任西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②，常应邀到成都的大专院校或中学，向师生作形势报告，讲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张子意在西南局工作了四年，积累了较丰富的政权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经验。他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一名出色的领导干部，也是革命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

保持共产党员的晚节

1954年，张子意被从西南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③，协助办公室主任谭震林工作。当时，国家正面临着探索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艰巨任务，张子意经常外出，调查农村和工商业厂家，为中央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根据。

1956年夏，52岁的张子意被选为中共八大代表，不久，又补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④。工资定级时，他不但自己坚持不要高待遇，对亲属也要求严格。他的爱人沈谷南担任卫生部干部司司长，卫生部给她评的工资是七级。张子意分管卫生战线，说服沈谷南主动提出降低工资等级。中宣部给张子意备有专车，但他很少乘坐，有时全家外出，司机要用车子送，他摆着手说：“正好散

①②③④ 《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第575页。

散步。”上街买了东西，他都自己提回来^①。

从1959年到1964年，他还连续被选为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张子意与陆定一等被作为中宣部“阎罗殿”的“黑阎王”，受到残酷批斗。他年过花甲，在折磨中病情加重，住进了崇文门医院，也多次被拉出来斗争。1967年初，康生无中生有地对所谓“揪叛徒”的红卫兵说：“新疆监狱叛徒集团案是个大案，这个案子不同一般，有很大罪恶，是跟国民党勾结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隐瞒下来搞内奸。”还公开点名：“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是首恶分子”^②。由于康生直接插手迫害，这些15年前坚贞不屈的老共产党员，一夜之间，竟成了所谓“叛徒”、“内奸”。张子意作为这个“叛徒集团”的头子，被关进了“自己人的监狱”。

在监狱里，张子意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肺病复发。冬天，监狱不供暖气，又不准生火，使他咳得更厉害，感冒了又不让外出就医，拖成了肺气肿和气管炎。看守人员在囚室外烧煤研石，浓烟熏得他睁不开眼，不久就患了白内障，视线模糊，以至几乎双目失明。关押期间，尽管康生派人反复逼供，张子意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讲明在新疆的经历，没有半句不负责任的话。为此，他少不了要遭“喷气式”揪斗，也挨过人家的拳头，胸口留下了一块发黑的伤疤。与此同时，全家亦遭受了一场浩劫，他的妻子沈谷南——这位参加革命多年、与张子意同在新疆监狱斗争的战友，竟在1968年3月19日被迫害致

^①1986年9月14日张幼林写给本文作者的信。

^②转引自方志纯：《回忆新疆监狱的斗争》第149页。

死^①。

其实，新疆监狱的问题，中共中央早有结论。作为延安时代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在张子意等从新疆返回延安时，他曾赶到七里铺迎接，第一个跳上汽车呼喊：“你们回来了！”^②可是，这时他故意颠倒黑白，逼张子意等交待“自首变节问题”，以及如何“出卖陈潭秋、毛泽民”，怎样“接受了国民党的潜伏任务”等，这样做分明是别有用心。张子意心中也明白：“康生要搞我们，真正的目的是想整营救我们出狱的周总理。”他们没有让康生得到半点需要的东西，被折磨得九死一生，马明方、杨之华等23人遭迫害含冤去世。除此，康生还对和平起义将领张治中进行恫吓。为此，张治中于1967年8月16日写信给毛泽东，说明张子意等的出狱，是他担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时，执行重庆谈判协议，无条件释放的，没有履行任何反共手续。信中还称赞张子意等“在党中央、毛主席教育下，觉悟高、组织好、纪律好，被反动派关在监牢里，始终坚贞不屈，经得起残酷考验。”^③

张子意在监狱受到非人待遇，已是奄奄一息。周恩来知道后很担心他的生命，提出让他出外就医。1973年初，张子意、林枫等被送到北京西城区阜城门医院接受治疗。但是，康生仍指示监护人员把他们的名字改换，不允许自由活动或与外人接触，病房门口还有哨兵把守。张子意无后嗣，他收养了老战友的几个孩子，感情很深，这些孩子要求与张子意见一面，都遭到了无情拒绝。

①1985年8月5日本文作者在北京访问刘升泉的记录。

②1946年7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

③转引自方志纯，《回忆新疆监狱的斗争》第151页。

张子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度过了八年监狱生活。但他坚信：党组织一定会把问题查得水落石出。1975年4月，他终于出狱了，“新疆监狱叛徒集团”冤案，由中共中央宣布平反。1980年6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报告，对张子意等的冤案，重新写下了这样的结论：

一九四二年九月，新疆军阀盛世才为了达到其投蒋反共的目的，捏造了所谓“四一二阴谋暴动案”，诬陷我党。将我党在新疆的全部人员拘禁，于一九四三年春天关进监狱。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同志坚贞不屈，无情揭露敌人，盛世才恼羞成怒，下令杀一儆百，三同志英勇就义。马明方、张子意等绝大多数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百子一条心”，既同敌人的毒打、监禁、饥饿等法西斯暴行作“至死不变”的斗争，驳斥了对我党的种种诬蔑；又同叛徒的拉拢、引诱作斗争，表现了无产阶级大无畏革命精神，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没有自首变节的问题。一九四六年，党中央指示周恩来同志委托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先生，把关押在新疆监狱的马明方等一百三十一人，于同年六月无条件集体释放出狱，并派专人护送回延安。这些同志回延安后，受到党中央和军民的热烈欢迎，毛主席、朱总司令亲切接见慰问了由新疆回来的同志，马明方、张子意代表狱中的同志如实向党中央作了报告，方志纯同志代表狱中的同志向中央组织部写了《在新疆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①。

^①转引自方志纯：《回忆新疆监狱的斗争》第152至153页。

张子意出狱时，已逾七旬高龄，由于两度监狱生活折磨，身体极度虚弱。他一面休养，一面学习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他感到要尽一个老战士最后的责任，主动向中央请求安排工作。他还拿出关押期间补发的工资一万元，委托中宣部干部陈道送到中组部去，补交了停止组织生活期间的党费。他对亲属说：“我的工资是人民的血汗，我不能随便花掉，要还给人民。”^①

过去，张子意长期在监察战线上工作，党性和原则性很强，周围的人敬重他，说他是铁面无私、嫉恶如仇、作风严谨、生活朴素的长者。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他当选为中纪委委员，又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常务委员。过去，他为社会主义爱国统一战线的建设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1978年3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他再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张子意在自己新的岗位上，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当时，正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他兴奋地说：“党的路线拨乱反正，实事求是，我们国家的前途是光明的。”^②同时，他对自己头脑里存在的“左”的观念，也进行了深入的清理。他联想到自己过去有两件事处理不当，一是1957年中宣部的反右斗争，因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琰等四人不同意将丁玲、陈企霞划为“右派”，被开除党籍或受到其它党纪处分。二是1959年的反“右倾”，也错误地处分了几个同志。张子意除了向负责复查工作的蹇先任说明了自己的意见外，还去信中宣部负责人检查自己的责任。不久，李之琰等人平反，张子意在病床上听

^{①②}1986年1月张子意生前秘书张镜明、刘升泉给本文作者的信。

到这个消息，还委托秘书去代他祝贺并道歉。1981年张子意病重住院，弥留之际，李之琰等去看望他，他又一次拉着李之琰的手赔礼道歉。张子意这种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的诚恳态度，使这些同志感动得流泪^①。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张子意想到的是，要尽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做好工作。他对工作很惦念，特别是中纪委正在抓的党风建设，要秘书每天到医院汇报。他的眼睛已看不见了，就让秘书念文件，并口授处理意见^②。1981年初，他还写了一个《养病要领》贴在病房，要求自己“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要在理论上无知”；“要学习理论和业务，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要当思想懒汉或甘当外行”；“要为党和人民有‘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不要停顿，更不要后退。”^③

1981年5月31日，张子意病情恶化，经医院抢救无效，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77岁。生命垂危之际，他反复告诫家属：“绝对不要提任何要求，不要给党和政府添加麻烦。”

生前，张子意给自己的一生总结了三句话：“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是一个有错误的共产党员，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④张子意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严格要求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其高贵品质闪烁着共产主义的熠熠光辉。

^①1985年8月5日本文作者在北京访问刘升泉的记录。

^②1985年4月3日访问张子意之妹张幼林的记录。

^{③④}《张子意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1981年6月13日《人民日报》。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文中注明者外，还有：

1. 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1980年第1期《近代史研究》。
2. 袁任远：《征途纪实》，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 李立：《远征万里——红二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 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写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大事记》，未刊稿，1979年印。
5. 经六军团战史编写组：《张子意关于红六军团战史的谈话记录》（1961年6月28日），未刊稿。
6. 湘赣根据地党史编写组：《湘赣革命根据地大事记》，未刊稿，1983年印。
7. 1975年—1977年，安源纪念馆、韶山纪念馆和醴陵农运纪念馆访问张子意的谈话记录。
8. 访问张幼林、张仁和、易述能、易学泳、黄海涛、苏能霞、李花楼、张世秋、姚楚俊、刘先佑、何春莲、易南钦、张芳台、张大昭、易升葵等的记录。

刘永生

刘国梁

刘永生是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从1928年参加永定暴动起，在福建、广东、江西三省边界地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20多年，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10兵团副司令员和福建省党、政、军领导工作。

从贫苦农民到红军团长

1904年5月，刘永生出生在福建省上杭县稔田乡严坑村。他5岁丧父，7岁行乞，10岁到富农家中当小长工，15岁当挑夫，小小年纪就尝尽了人间苦楚。

1927年秋天，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的张鼎丞到严坑开展革命活动，在村中办平民夜校。张鼎丞见刘永生出身贫苦，就住到他家里，向他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在张鼎丞的引导下，刘永生参加了农会和“铁血团”，192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6月底，张鼎丞等领导了闽西规模最大的永定暴动，指挥几千农民武装攻打永定县城。7月1日拂晓，参加攻城先锋队的刘永生肩背鸟铳，腰插柴刀，同“铁血团”团员扛着云梯，借助暴动队土枪、土炮的掩护，冒着城中守敌倾泻过

来的弹雨，迅速地冲到西门城墙根架起云梯，登上城牆，打开城门，将农民武装队伍迎进城里。接着，农军同敌人展开巷战，扑向县衙，砸开监狱，救出被捕的同志。后因敌人主力回救县城，暴动农军受到敌军的内外夹击。张鼎丞当机立断，指挥农军撤退。4日，在金沙金谷寺成立闽西第一个工农红军营，由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任党代表，刘永生被挑选担任军事交通员，在创建闽西第一块苏维埃区域的斗争中做出了贡献。

1929年5月25日，张鼎丞带领地方红军配合红4军解放永定县城。当红4军开进永定城时，刘永生和战友们在城关东门桥头列队欢迎。他见到毛泽东、朱德、陈毅，心情非常激动，随即护送他们到城内赖家祠。27日成立以张鼎丞为主席的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刘永生被任命为县赤卫大队大队长。同年底，红4军第九次党代表会议（古田会议）召开。会议精神传达到永定县赤卫大队（1930年3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各县赤卫大队升编为赤卫团），刘永生受到深刻的教育。此后，他十分重视部队的思想建设，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维护政治干部的威信，处处保护群众的利益。

1931年，闽西苏区发生所谓肃清“社会民主党”事件^①。

^①1930年，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贯彻到闽西，三次命令闽西刚组建起来、来不及训练、装备又差的红12军、红21军出击东江。由于离开了根据地，得不到工农群众支援，迭遭失利，人枪损失过半，出现战士、干部逃跑，群众不满的现象，反革命趁机破坏。这年冬，在闽西苏区内开始进行肃反。1931年初，红12军在永定虎冈召开纪念国际共产主义先驱、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革命导师列宁的大会，吴拙哉等几名战士呼了“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等口号，于是开始了肃清“社会民主党”的运动，错杀了数千名革命同志，现已平反昭雪。详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

永定县苏区北面的门户稔田区，因区委书记、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被错杀而陷于瘫痪，加上推行王明的“左”倾错误，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苏区的地主、富农纷纷与反革命勾结，为敌军送情报和带路，钟绍葵的“汀属武装救乡团”、陈荣光的民团等反革命武装，经常向稔田侵犯。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刘永生受命担任中共稔田区委代理书记兼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到稔田后，马上释放了被当作“社党”关押起来的邱其银等一批忠诚的共产党员，坚决制止了乱捕乱杀，保存了革命力量。经过他和同志们的努力，稔田区的各项革命工作恢复了生机，区赤卫队也重新组建起来，击退了反动武装的一次次袭扰。当年冬天，刘永生调回县里担任军事部部长兼县赤卫团团团长。

1932年3月，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汀州召开，刘永生当选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

4月10日，毛泽东率领由红1军团、红5军团3万多人组成的东路军出征漳州。刘永生遵照省苏维埃政府的命令，带领永定县赤卫团两个连和由2000余名工农群众组成的支前运输队，赶往龙岩城，肩挑着军用物资，攀越崎岖山路疾进，支援南下攻打漳州的主力红军。主力红军占领漳州后，缴获了大批战利品，刘永生又奉命将其中一部分挑运回中央苏区。返回途中，几次遭到土匪拦路抢劫。由于刘永生预先将赤卫团的战士以班为单位混编到运输队里，一遇土匪骚扰，随即予以反击，不但将战利品安全运回苏区，而且消灭了几股土匪，为闽南劳苦群众和往来客商除了祸害。

这年10月，刘永生与县苏维埃政府的妇女干部黄月英结婚。

11月间，永定县赤卫团在上杭太拔整编为永定独立团，刘永生任团长，马永昌任政治委员，归福建省军区太拔军分区领导。不久，永定独立团和红12军所属100团配合，打垮了驻扎在上杭城东水西渡的粤军一个营，缴获了不少枪枝弹药。

1933年4月，永定独立团整编为福建省军区独立第8师第8团（简称红8团），刘永生为团长，太拔军分区政委廖志清兼任政委。此前，钟绍葵投靠粤军，被广东军阀陈济棠委为少将旅长。他派出一营兵力侵占了上杭县的白砂墟，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白砂墟曾经是闽西苏维埃政府和上杭县苏维埃政府的驻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省军区曾几次派部队去攻打，但都未能获胜。红8团成立后，省军区命令刘永生率全团再次攻打白砂墟。

刘永生接到命令，立即率领红8团500多名健儿，从（上）杭永（定）边境开到白砂附近，在偏僻的山村隐蔽下来。接着，他一连几天，带着侦察员和部分营连干部，化装成砍柴的樵夫去侦察敌情，观察地形，制订了巧夺敌军炮楼的作战方案。这时，省军区派了独立第8师师长游端轩到白砂指导红8团作战。游端轩了解到刘永生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农民干部，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心中不够踏实，曾考虑取消红8团攻打白砂敌军的计划。但听了刘永生的作战方案汇报后，马上翘起大拇指叫好，并批准立即执行。

一天深夜，当驻扎在白砂老墟炮楼里的敌人正在酣睡时，刘永生率领着腰插柴刀利斧、肩扛门板长板的红8团指战员，在夜色掩护下悄悄地接近了敌军炮楼所在的山包，按计划将主力埋伏在山包的正面和两侧，另派一支佯攻队伍迂回到山包的后面。到了预定的攻击时刻，司号员在佯攻方向吹响了冲锋

号。从睡梦中惊醒的敌人，慌忙集中火力向佯攻部队射击。此时，刘永生指挥主力，从正侧三面用门板压住敌人埋设在山坡上的有毒的竹签，铺出了几条进攻的通道。战士们一拥而上，抡斧挥刀砍开铁丝网，再用长板架在堑壕上冲了过去，砍倒鹿寨，眨眼功夫就冲到了敌人的大炮楼前，把一颗颗手榴弹扔进炮楼内。敌人被炸死炸伤不少，余下的慌忙打开楼门，夺路逃命。主攻部队朝逃跑的敌人猛烈开火，而佯攻部队此刻却一枪不发，故意放敌人从后山逃出。只顾逃命的敌人纷纷踩到自己埋设的竹签上，脚底鲜血淋漓，无法挪动，只得放下武器，举手投降。钟绍葵的这个营，连同他们苦心构筑的炮楼和工事，在一个小时内就被红8团彻底解决了。

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1933年9月，蒋介石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红军迭遭失利。翌年春，蒋军东路纵队攻占了龙岩、连城等地。中革军委决定把红8团改为军委直接领导的独立团，派到漳（州）龙（岩）公路线上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的敌人。漳州、龙岩一带属闽南语系，而刘永生是客家人，不会讲闽南话。为适应敌后游击战的需要，军委派龙岩人邱金声接任红8团团长，刘永生调任福建省军区警卫营营长。8月，连城温坊（现名文坊）发生了第五次反“围剿”中南线最激烈的战斗。刘永生在这次战斗中大腿中弹，被抬到长汀四都红军医院治疗。伤愈之后已是冬天，中央主力红军已被迫离开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张鼎丞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局之

命，返回闽西（上）杭永（定）边开展游击战争，在四都红军医院找到伤愈正待出院的刘永生。刘永生立即参加张鼎丞率领的仅有十多个人的小分队，昼伏夜行，绕过敌人占领的村镇，沿途收集被打散的同志，于1935年1月到达（上）杭永（定）边。不久，张鼎丞任命刘永生为永东游击队司令员（一段时间还兼任中共永定县委书记），率领游击队在金丰、湖雷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同年3月中旬，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率领红24师一个营，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围攻，来到永定大阜村与张鼎丞会合，召集闽西南各地党政军领导人联席会议。刘永生应召赴会，刚进入大阜村，突然听得枪声大作。他跑到屋外一看，只见约莫一个营的粤军在陈荣光民团的带领下，打死了红军哨兵，夺走了一挺轻机枪，正向村子包围过来。原来红24师这个营的指战员，因几个月来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到达大阜村后一躺下便睡熟了。遭敌人突然袭击后，营长临阵逃跑，全营失去指挥，战士们扛起三挺重机枪忙向村后面的山头撤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永生挺身而出，向红军战士们喊道：“同志们，不能撤退，领导同志和机关人员都还在村里。赶快架起你的机枪，顶住敌人！”红军机枪手们不认识刘永生，只顾继续往山上撤。刘永生手握驳壳枪追了上去，横着身子挡住他们的去路，猛喝道：“谁再后退，我就枪毙谁！”刘永生接着命令道：“把机枪给我一挺！”机枪连长问：“你是什么人？”刘永生说：“我是永东游击队司令员刘永生。现在情况紧急，你们听我指挥！”说完，他夺过一挺重机枪，就近选好位置架起来，向敌群猛烈扫射。机枪手们跟着架起另外两挺机枪，一齐向敌人开火，打得敌人四散溃逃。村子里永定县委

机关人员和县区游击队战士，趁势向敌人发起反冲锋，把敌人赶出了大阜村。

战斗结束后，张鼎丞对部队指战员们说：“这次战斗，幸亏刘永生同志挺身而出，沉着应战，我们大家才得转危为安。大家要好好向刘永生同志学习！”^①

4月12日，闽西南地区党政军领导人联席会议改在西溪赤寨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为主席（后增选邓子恢、谭震林为副主席），刘永生与方方、邱金声、范乐春、廖海涛、邱织云、伍洪祥、魏金水、郭义等为委员。此时，蒋介石已派了8个正规师10多万兵力驻扎在闽西，并纠集地方民团、“铲共团”、壮丁队等反动武装，共同“围剿”红军游击队。刘永生根据毛泽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作战原则，时而把部队化整为零，组成工作组到各个小山村去宣传组织群众，使这些小山村成为打不烂，压不垮，坚决支持革命的基点；时而把部队集中起来，握成拳头，狠狠打击敌人。游击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敌人对刘永生恨之入骨。1936年冬天，刘永生的母亲何细妹被陈荣光部民团枪杀于严坑村口。刘永生闻此噩耗，心如刀绞。他化悲痛为力量，决心指挥游击队更加狠狠地打击敌人。

为了密切军民关系，刘永生经常在战斗的间隙，带领游击队员帮助革命基点村的群众搞生产，从犁田、耙田、插秧、中耕到收割，什么重活脏活他都带头做。晚上，他操起篾刀，一边为群众破篾编竹器，一边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坚定群众对革命的信心。每次攻下敌人的据点，打开敌人的粮

^①1961年邓子恢在上杭接见笔者时的谈话记录。

仓，他首先想到的是救济贫苦工农群众，常常亲自把粮食挑到鳏寡孤独老人家里。因此，不管敌人对革命人民多么残酷镇压，群众总是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千方百计保住刘永生和他领导的游击队。

隐蔽生产 武装自卫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刘永生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不记仇怨，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地方上的民主人士合作抗日。国民党稔田乡联保主任陈自强，过去“围剿”过红军游击队，迫害过革命群众，此时他对抗日救国表示支持，刘永生就派弟弟刘永辉与他接触，向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而促成了（上）杭永（定）边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新局面。

同年10月，国共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闽西南、闽粤边、闽赣边和闽中的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于1938年3月由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率领开赴苏皖前线抗日。2支队司令部本来决定由刘永生率领的第6连作为后方留守处的警备部队留在闽西，可是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却强令6连也要开赴前线。新四军个别领导人在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思想影响下，亦于5月间电令刘永生率6连北上。6连奉命到达浙江江山后，军部通知刘永生去南昌办事处报到。刘永生将连队嘱托熊兆仁、陈茂辉带去皖南，自己立即前往南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曾山考虑到日后长期复杂斗争的需要，指派刘永生秘密返回闽西。这

样，刘永生又回到闽西，投入了新的斗争。

1940年5月，中共闽西南特委在永定芹菜洋办党校，派刘永生负责保卫工作。开学前，刘永生带人到山里砍毛竹，搭起几座大竹寮供学员们居住；开学后，他又经常给大家砍柴、磨谷、舂米、买菜、煮饭，因此，有的学员就叫他“老伙夫同志”。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个“老伙夫”，竟是当年威震闽西的红军团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刘永生。

这年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翌年，闽西南特委选派刘永生保卫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安全。“南委”机关设在广东大埔县大埔角小墟镇上，“南委”书记方方化名王子华，以老板的身分开张“天成号”布店作为掩护；“南委”附属机关设在附近的墩背村。刘永生和爱人黄月英装扮成种田的长工，在那里种植水稻、蔬菜，喂猪、饲养，暗中保卫方方等人。1942年，由于叛徒出卖，“南委”机关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刘永生夫妇在掩护方方等安全转移后返回永定，在老吴子深山里和罗炳钦、江岩等一起，隐蔽下来，开荒种地，等待时机。闽西的国民党顽固派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四处侦察共产党人隐蔽生产的地点，等到秋天水稻黄熟、薯块肥大的时候，把他们的劳动果实抢个精光，企图将共产党人困死、饿死。为了生存，上级决定由刘永生负责重新组织武装，进行自卫。1943年10月，在福建平和县小芦溪大山里，宣告成立闽西南武装经济工作总队，刘永生任总队长。全体队员虽然才14人，但个个都是有武装斗争经验的老党员。他们在永定、平和、南靖边界地区，惩办了一些猖狂破坏生产、杀害革命同志和无辜群众的极端反动分子，有效地保护了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

1944年秋，中共闽粤边委决定在“经工队”的基础上建立一支人民革命武装。为了纪念1941年遭国民党福建省保安11团杀害的中共闽西特委书记王涛，部队命名为王涛支队。11月15日，王涛支队49名指战员在上杭县稔田乡楮树坪被战士们雅称为“七一公园”的深山窝里举行成立仪式，中共闽粤边委负责人魏金水前往祝贺，任命刘永生为支队长，巫先科为副支队长，范元辉为政委（因病未能随部队行动），陈仲平为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随后，刘永生等率领支队在永定汤湖、合溪消灭残杀新四军家属的反动民团头目，接着又在龙岩小池乡山狗坳打败福建省保安团一个连的进攻，缴获轻机枪等大批武器装备了自己。1943年春，国民党闽粤赣边联防指挥官陈余珊派出福建省保安团主力机枪连，尾追王涛支队到杭永边，驻扎在丰稔市的天后宫，企图寻机与王涛支队决战。为了摸清敌情，刘永生亲自到天后宫所在地枫山下村作调查，制订出利用墟期化装袭击顽军的作战方案。他挑选了22名有作战经验的老战士组成突击队，指定胆大心细、作战勇猛的短枪班班长邱锦才为突击队队长。然后亲自带邱锦才化装到天后宫附近进行实地侦察。4月13日是丰稔市墟期。这天，刘永生布置突击队队员们化装成卖柴的樵夫、进香的香客进入天后宫，仅用5分钟的时间就歼灭了顽军保安团机枪连，击毙其连长，缴获三挺重机枪和其它枪枝弹药，使支队的装备大为改观。刘永生对俘虏们进行了“要爱国抗日，切莫打内战”的教育，然后，发给路费，资遣回家。

经过丰稔市战斗，王涛支队迅速壮大，扩编为三个大队。6月，刘永生率领支队的第1、第3大队，挺进到抗日前线闽南，组成闽南人民歼日挺进队，一路打垮国民党顽军的阻

击，向沿海诏安、饶平边界进军，准备在那里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中途遭到福建省第2、第3团的重兵包围袭击，刘永生在指挥突围的作战中受重伤，离队治疗。队伍由代政委陈仲平、参谋长郑金旺率领，继续向诏饶边抗日前线挺进。

威扬闽粤赣边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疯狂地向坚持八年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发动进攻，闽粤赣边区军民被迫进行自卫反击。部队集中起来后，经济上面临很大困难。1946年2月22日，刘永生率领王涛支队、长胜支队200多名指战员，化装袭击广东大埔县高陂镇的国民党两家银行，没收了2200多万元纸币，解决了部队的供给。同年冬，中共闽西南边地委成立，刘永生担任地委书记。

1947年5月，中共闽粤赣边工委根据中共南方分局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后的部署，将原王涛支队的部分骨干和中共粤东地委特务队集中于大埔县坪沙，成立粤东支队，任命刘永生为支队长，杨建昌为政委，程严、廖启忠、徐达为副支队长，王立朝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郑金旺为参谋长。刘永生领导支队在粤东的大埔、丰顺、梅县、兴宁、蕉岭、平远等县，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征粮、征税、征兵的“反三征”斗争，摧毁国民党区、乡政权，消灭其自卫队，扩充支队武装力量。

6月，中共闽粤赣边工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组建边工委直属的人民解放军，努力开创闽粤赣边解放区，乃以粤东支队

为基础，建立边区人民解放军总队，任命刘永生为总队长，魏金水兼政委，朱曼平任副政委。10月21日，总队利用农历重阳节又是大麻墟期的机会，在刘永生亲自率领下出击大麻镇，摧毁国民党大麻区署，歼灭敌自卫中队、警察分署90余人。国民党广东省第6区保安司令部连忙指挥大埔、梅县二县的保警大队共6个中队的兵力，对总队跟踪追击。其中梅县保警大队第1中队首先窜入梅（县）（大）埔丰（顺）游击根据地的三乡（由黄沙、小都、石寮三大村组成），进驻中和学校。刘永生指挥总队围歼了这股敌人，其余各股敌人闻风而退。不久，半径几十公里内的国民党乡公所、田粮处、自卫队、便衣特务、地方恶霸，全被人民武装扫荡干净，使梅埔丰边境成了粤东第一块解放区。随后，刘永生指挥总队兵分三路，分别挺进到梅（县）兴（宁）丰（顺）（五）华、梅（县）蕉（岭）平（远）兴（宁）、饶（平）（平）和（大）埔丰（顺）三个边境，一鼓作气摧毁国民党区、乡、镇政权30多处，开辟了这三个边境的游击根据地。

1948年1月，总队根据中共闽粤赣边区工委的意图，部署攻打闽粤边境上的蕉岭县城。春节过后，刘永生率领总队离开梅埔丰根据地，向目的地出发，采取声东击西计迷惑敌人。2月23日，总队攻下永定县的峰市，歼敌一个自卫中队，同时没收了国民党保安团团长沙永图的财产，平分给贫苦百姓。刘永生故意在群众中露面，扬言要带部队打回杭永边的稔田老家去。随后，他率领部队连续几个晚上急行军，秘密挺进到蕉岭县北礞的水涨田。在听取（上）杭武（平）蕉（岭）梅（县）县委书记谢毕真汇报蕉岭县城的敌情之后，召开了有县委成员参加的作战会议，对攻城作战作了严密的部署。3月1日晚，

部队挺进到蕉岭县城北郊。敌人果然被蒙在鼓里，连县城北面30多米高的山头也没有派兵设防。刘永生把指挥所设 在山头上，于2日凌晨发出攻城命令。经过半日激战，顺利占领全城，缴获长短枪300多支，子弹2万余发，焚毁敌人军械库一座。

攻下蕉岭县城，使国民党广州行辕主任兼广东省主席宋于文十分震惊，连忙将由涂思宗任总指挥的闽粤边“剿匪”总指挥部从广州迁到梅县松口镇。涂思宗到松口后，调集了5000兵力，对边区人民军队实行所谓“重点进攻”、“十字扫荡”。刘永生掌握敌情后，集中优势兵力，在武平县象洞乡岗背对福建省保安第3团薛筱青营进行伏击，予敌重创，使涂思宗的“围剿”计划遭到失败。5月，又在梅埔半根据地的马头山，将方景韩带领的美械加强营打得溃不成军，缴获其大量美式军械。这年秋天，涂思宗因损兵折将，一败涂地而被撤职。

8月5日，中国共产党闽粤赣边区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大埔县乌子石召开，刘永生和魏金水、朱曼平、王维、林美南一起当选为区党委常委，魏金水任书记，朱曼平任副书记，王维任组织部部长，林美南任宣传部部长。刘永生继续担任边区人民解放军总队司令员，下辖兴梅第1支队，潮汕第2支队，韩江第4支队，闽西第7支队，闽南第8支队。他根据区党委确定并报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先粤东后闽西南”的作战方针，集中主力，先在粤东狠狠打击敌人。经过半年艰苦奋战，粤东地区除了几座孤立的县城和一些敌人重兵防守的大镇之外，广大乡村均为边区人民解放军所解放。

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成立闽粤赣、粤赣湘、桂滇黔三个边区纵队的命令。1月29日（农历己丑年正月初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在大埔县樟溪正式成立，刘永生任司令员，铁坚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魏金水任政治委员，朱曼平任副政治委员，林美南任政治部主任。

为了使兴梅和潮汕两个地区联成一片，刘永生和铁坚于3月11日率领边纵第1团突袭了国民党广东省第6“清剿”区驻畚坑的第2指挥所。战斗打响后，刘永生在梅江南岸指挥部队以轻重机枪扫射敌人设在江北的指挥所，用木船抢架起一座浮桥，然后亲自率领部队冲过200多米宽的梅江，一气攻下畚坑镇。25日，刘永生和铁坚率边纵第1团、第5团到达五华县坪上，与潮汕地区的第2支队第5团会合。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无线电广播同时传来了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消息。刘永生听后万分兴奋。27日，他指挥部队首先向鲤湖之敌发起进攻，次日占领鲤湖。接着，连占棉湖、葵潭、两英等重镇。随后分兵两路：一路于5月20日解放惠来县城和陆丰县的甲子镇，保证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机关从香港内迁闽粤赣边区时顺利登陆；另一路子25日解放丰顺县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刘永生指挥边纵部队在潮汕地区歼灭敌军有生力量200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32挺，长短枪1600余支。

闽粤赣边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刘永生领导的边区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又迫于解放大军行将南下的形势，受中共宽大政策的感召，纷纷起义。5月17日，国民党将领吴奇伟率领广东省第9区行政督察公署专员李洁之等人起义。随后，闽西方面由福建省第7区行政督察公署前后两任专员李汉冲、练惕生和地方民主人士傅柏翠率领省保安4团及各县县政府、县自卫队起义。兴梅、闽西两地区宣告和平解放。

正当边区人民武装斗争节节胜利的时刻，国民党从淮海战场败退下来的胡璉、刘汝明两个兵团 10 万之众，逃窜到闽粤赣边区。从南京迁到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也在调兵遣将，拼凑力量，妄图支撑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残局。广州当局命令胡、刘兵团与驻潮汕的闽粤赣边区“剿共总指挥”喻英奇配合，四出“围剿”边纵部队。在气势汹汹的敌人面前，刘永生冷静沉着，从容对付，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

7 月底，刘永生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与朱曼平、铁坚一起，率领边纵主力北上赣南，与南下解放大军会师，并护送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方方去赣州出席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召开的重要军事会议。任务完成后，刘永生立即率领边纵主力回头南下，于 9 月 27 日挥师收复梅县县城。第二天，即派出边 1 团，边 7 团第二次进攻畚坑。当时，胡璉以其主力洪都支队 800 多人据守畚坑，掩护他的大部队向潮汕撤退。刘永生与铁坚研究之后，指挥边 1 团正面进攻敌人，派边 7 团切断敌军退路，一举击毙敌人 300 多名，生俘 200 多名，再次打开通向潮汕的通道。随后，刘永生率领边纵部队日夜兼程向退到潮汕的胡璉兵团追击。到达潮汕地区后，刘永生分兵两路：一路由普宁向潮阳挺进，造成从西面包围汕头之势；一路向揭阳、潮州、澄海进击，造成从东面包围汕头之势。汕头守敌陈汉英、洪之政部 3000 多人，在人民军队包围之下，被迫放下武器。10 月 24 日，刘永生带着边纵部队胜利地开进汕头市。至此，闽粤赣边区全境 30 余县、市，除南澳岛外均告解放。边纵部队共缴获敌人轻重机枪 300 多挺，火炮 30 多门，步枪 3 万多支，手枪 2000 多支。在战斗中，边纵部队发展壮大，由建立总队之初的 140 多人发展到 22000 多人，还组织了

近3万人的民兵武装。

高风亮节 光照后人

全国解放后，刘永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副司令员。1951年，组织上送他到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学习。此时他已年近半百，记忆力、理解力都开始衰退，加上从未进过校门，基础差，所以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科学都感到吃力。但他不畏困难，学习非常勤奋，星期天和假日都在埋头攻读，终于完成了学习任务。1952年，他奉命转业到地方，任福建省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1953年夏，福建前线紧张备战。福建省军区派了一个工作组到闽南沿海漳浦县，东山岛抓战备。工作组的一些同志因很长时间不见战事发生，思想开始松懈，想撤回机关去。刘永生以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身分到漳浦县检查工作了解到上述情况之后，一面找工作组谈话，要他们提高警惕，不可随便撤回机关，一面打电话给省军区领导机关，说明战事有随时发生的可能性，请他们通知工作组不要撤走。东山岛守备团是由闽粤赣边纵队13团改编成的，刘永生便再三叮嘱团长游梅耀，要他一定作好迎击来犯蒋军的各项战备^①。过了不久，7月16日清晨5时，台湾国民党当局果然调集了10000多兵力，在飞机和兵舰的掩护下偷袭东山岛。同时在东山岛北部降落伞兵200多名，企图切断海岛与沿海陆地的联系，形势十分危急。但由于游梅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海岛守备部队早已做好各项战备，

^①访问游梅耀谈话记录。

立即围歼了着陆的蒋军伞兵。在当地民兵、群众的支援和友邻部队的配合下，经过两天一夜的英勇战斗，终于把蒋军赶下了海^①。

21日，东山岛上硝烟刚刚散去，刘永生即率领福建省慰问团登岛慰问守备部队，并传达了中共中央军委和福建前线驻军领导机关的嘉奖令^②。

东山岛战斗后的第二年，中共中央军委调刘永生回部队工作，担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授少将军衔。此时，刘永生已年逾半百，但他仍经常跋山涉水，深入海岛营房、高山哨所，检查部队的工作；遇上部队进行训练，他还脱下将军装，换上士兵服，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成了战士们的“贴心将军”。

1959年，刘永生第二次转业到地方，担任福建省副省长兼农垦厅厅长、党组书记。以后历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省政法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和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9年到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1960年3月底至4月上旬，刘永生在北京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期间，周恩来特地把他接到家里，征求他对国务院和福建省工作的意见，并建议他回福建后把农业工作抓一抓，尽快改变福建粮食和副食品紧缺的局面。刘永生开完人大会议回去后，立即深入全省各个农场，健全领导班子，加强经营管理，推广科学技术，迅速提高了各种农作物的产量；他又到闽北光泽等县去

①1953年7月21日《福建日报》。

②访问游梅耀的谈话记录。

亲自踏勘，参与筹建起新的农场。有一段时间，省委分工刘永生兼管水电建设，他每年都以 2/3 以上的时间，深入全省各地的农场和水利电力建设工地，同农场的干部工人一起耕耘，商讨增产措施；到水利电力建设现场，和工程技术干部、工人一起栉风沐雨，加快工程建设，为福建省的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永生对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老红军、老党员、老干部的罪行深恶痛绝。当“造反派”逼他证明一些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是叛徒、特务时，他斩钉截铁地予以否认和批驳。粉碎“四人帮”后，刘永生为蒙冤受屈的同志秉公直言，摆事实，写证明，使他们的冤假错案尽快得到平反昭雪。

有一段时间，福建一些地区由于十年动乱，法制遭到破坏，社会治安比较混乱，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的案件不断出现。刘永生肩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省政法委员会的重任，多次率领工作组到地、市、县去查处大案要案，还出席当地的宣判大会，使违法犯罪分子受到应得的惩处，社会治安迅速好转。

1984年1月7日，刘永生因患肺气肿病医治无效，在福州逝世，终年80岁。

附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

1. 作者多次访问刘永生的记录。
2. 访问邓子恢、魏金水、伍洪祥、张昭娣、黄月英、朱曼平、王维、陈仲平、谢毕真、卢叨、洪椰子、陈文平、饶仁珊、卓禹轮、罗炳钦、邱锦才、陈育光、刘永辉、苏美春、黄克庸、姚安、廖振、刘雪文、游梅耀谈话记录。

3. 作者在福建省上杭县丰稔、连四、白砂，永定县金沙、西溪、湖雷，龙岩市东肖、小池，广东省梅县畚坑、三乡，大埔县高陂、大麻、大埔角，蕉岭县城关等地的现场调查记录。
4. 《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闽粤赣边区党史资料选编》、《闽粤赣边纵队史》（征求意见稿）、《中国共产党福建省龙岩地区组织史资料》（上报本初稿）。

黄炎培

陈竹筠 许纪霖 陈起诚

“兴亡梦觉惊风采”

黄炎培，号任之，1878年10月1日（夏历九月初六）出生于上海沙县城一个平民家庭。父亲黄叔才初在家设塾授徒，后外出做督抚幕僚。母亲孟樾清略谙文化。黄炎培6岁时即由母亲教授识字，9岁起就学于外祖父所设私塾。1899年，黄炎培以府试第一名中取秀才，三年后又中江南乡试举人（末科），成为远近闻名的“江南才子”。1901年，上海南洋公学招考，黄炎培应考录取，得以“跳出圈子，跨上新文化教育舞台”^①。从此，黄炎培“抛弃旧文化学习，接受新文化学习”。这是他的“第一个很大的转折点”^②。

南洋公学是清末大官僚盛宣怀创办的一所训练洋务人材的学校，即今日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黄炎培所考取的特班有40余名学生，大多是秀才、举人出身，有相当的旧学根底。学校拟授以外语及经世之学，择优保送经济特科。特班的中文总教习是著名教育家、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蔡元培。蔡元培的教导方

①②黄炎培：《八十年来》第31、129页。

法一改“填鸭式”的传统陋习，让学生自由阅读书籍，每日笔记交先生批阅，然后轮流招至书房面谈讨论。蔡元培还融近代科学与爱国主义思想于一体，“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小己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拓之于世界。”^①为培养学生“唤起民众”的能力，他还组织演说会，定期举行演讲。这一切对刚刚涉世不久的黄炎培教育和启发很大。对他选择人生的道路，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02年11月，南洋公学爆发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次学潮。全校学生高呼“祖国万岁”的口号集体退学，以抗议校方开除无辜学生。黄炎培遵从蔡元培“你们出校，必须办学校来唤起民众”^②的教诲，回到家乡开始从事教育救国的实践。他与同乡张志鹤等人商量，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③，遂呈准两江总督及川沙县知事，将川沙观澜书院改为川沙小学堂，黄任义务总理（即校长），同时与其兄黄洪培合办开群女学。后来，黄炎培应浦东建筑业资本家、热心教育事业的杨斯盛的邀请，先后创办了广明小学和浦东中学。黄炎培在教学中不拘旧俗，别开新路，一时名声大噪。他本着“教育救国”的办学宗旨，于正课之外，每周还组织演讲，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卖国，抨击吸毒、赌博、缠足等社会恶习。1903年6月18日，黄炎培、张志鹤等四人应邀到南汇新场镇演说，被当地知县以“革命党”的罪名逮捕。就在两江总督魏光涛“就

①黄炎培：《敬悼吾师蔡子民先生》，1940年3月23日重庆《大公报》。

②黄炎培：《八十年来》第36页。

③黄炎培：《川沙公小學校史最初的一页》，《民国川沙县志》卷9。

地正法”的皂令到达前四小时，由杨斯盛出资、美国律师步惠廉出面营救，黄炎培等得以死里逃生，遂亡命日本。

第二年，黄炎培由日本归国后，继续在上海办学。在此之前，黄炎培曾在蔡元培领导之下的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中任董事，并在爱国学社兼课，与蔡元培过从甚密。1905年，黄炎培经蔡元培介绍参加了同盟会。不久，蔡元培赴德留学，黄炎培接替了蔡的同盟会上海干事一职，保存会员名册，接待来往会员，做了不少工作。

由于在教育界服务，黄炎培与以张謇为首的江浙上层资产阶级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05年，他与沈恩孚等人发起组织江苏学务总会（后改为江苏省教育会），推举张謇为会长，黄炎培为常务调查干事。次年，摇摇欲坠的清廷为敷衍民意，被迫宣布“预备立宪”。江浙资产阶级立宪派顿时活跃起来，组织了预备立宪公会、上海宪政研究会等立宪团体。黄炎培亦参加了这场立宪运动。1909年，他当选为江苏省咨议局议员及常驻议员，曾利用这块合法的阵地提出裁撤厘卡，弹劾大吏和整理教育等议案，对封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表示了不满。然而，清廷的“预备立宪”毕竟是一场骗局。随着立宪运动的失败，立宪派们逐渐打消了对清廷的幻想，于1911年6月成立了全国性的政党宪友会，准备应变。黄炎培被推为宪友会江苏负责人之一。不久，武昌起义爆发。上海的立宪派名流分析形势后，决定在国内拥袁（世凯），在江苏拥程（江苏巡抚程德全）。11月5日，黄炎培赴苏州劝程起义。其时，苏州各界正在酝酿起义。因此，黄到苏州立即得到程的赞同，并被邀请留下在新成立的都督府中任民政司总务科科长兼教育科科长，后又被任命为江苏省教育司司长。在他主持全省教育行政工作

期间，曾先后创建、改建及扩建了 24 所省立高等和中等学校以及许多县立小学，如东南大学等。江苏的教育事业有了显著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随着袁氏称帝野心的逐渐暴露，黄炎培由拥袁而变为反袁。1915 年 12 月，当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时，他即以江苏省教育会的名义，通电全国表示反对。次年 6 月，闻袁毙命后，他又特作《我教育界之袁世凯观》，总结了袁失败的必然性：“以诈伪尽掩天下人之耳目，终必暴露，以强力禁遏天下人之行动，终必横决。”“今后即使有人操术更上于彼，据势更雄于彼，但可深信其结果之必无异于彼。”^①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黄炎培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只有顺应时代的潮流，才能不断的前进。

二次革命失败后，张勋窃据了江苏都督职位。黄炎培目睹国事是非，认为“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国体虽定共和，政局几经嬗变，此纷纷扰扰之原因，与其归之为道德问题，不如归之于教育问题。”他认定：“教育为救国唯一方法”^②。因此，他辞去了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的行政职务，开始全力倾注于教育事业。

1914 年，黄炎培脱离官场生涯后，以《申报》记者的身分，到皖、赣、浙、鲁、冀五省考察教育，发现教育与现实的生产与生活需要严重脱节；许多学生毕业即失业，即使有业者亦不能乐业。翌年，黄炎培随同农商部游美实业团赴美考察两个多月，眼界为之大开。回到国内即发表《东西两大陆教育不同之根本谈》，极力推崇美国近代教育制度对国民生产发展的

^①《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黄序》。

^②黄炎培：《东南洋之教育·后编》第 106 页。

推动作用，并特别指出：“观其职业教育之成绩，益觉我国教育之亟宜改革。”^①他正式提出了沟通职业与教育，提倡职业教育的主张。1917年5月6日，在各地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蔡元培、蒋梦麟、聂云台、穆藕初等的支持和帮助下，黄炎培在上海建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翌年又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正规的职业学校——中华职业学校。黄炎培成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驱。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受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带有鲜明的反对传统封建教育思潮的进步印迹。他将“劳工神圣”的口号引入了职业教育理论，批判了几千年来在中国士子中形成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开卷即蓄一举人进士黜甲”^②的传统观念，提出今日读书目的在“学做人而已”，“作工自养，是人们最高尚最光明的生活。”在教育指导思想上，他主张“教育与生活、生活与教育不应脱节。”据此，他为中华职业学校规定了“手脑并用，双手万能”的教育方针。学生在课堂中念书，又在附设工厂里实习做工，通过这些学用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出具有各种专业知识的技术人材。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从成立至1949年，培养了7000余名毕业生，推动了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为职业教育在我国的普及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职业教育是黄炎培整个“教育救国”宏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旧中国政治腐败，军阀混战的政治环境中，“教育救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为了使自己的职业教育事业避免政治风暴的摧残，他曾两次谢绝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的职位。

^①转引自黄大能：《怀念吾父黄炎培》，《八十年来》第156页。

^②黄炎培：《东南洋之教育·后编》第137页。

而，超忽于现实政治之外，毕竟是一厢情愿的幻想。1927年北伐军到上海，黄炎培被南京政府宣布为“学阀”，下令通缉。他被迫避走大连，后经蔡元培、邵力子等师友在蒋介石面前说情，才被准许返回上海。此后几年中，黄炎培被迫减少了活动，但目睹国民党新军阀连年混战，广大人民依然一贫如洗的悲惨状况，他的心情却难以平静。

“家国愁肠日九回”

1931年春，黄炎培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敏感地注意到日本军国主义日盛，矛头指向中国。他忧心如焚，一回到上海，立即着手写《黄海环游记》，连日刊登在《申报》上，向读者揭露日本的侵华迹象。他还特地赶到南京，将自己的看法面告蒋介石。蒋听后默不作声，只叫他去外交部长王正廷。不料王听后却哈哈大笑，说：“如果黄任之知道日本要打我，日本还不打我哩！如果日本真要打我，黄任之不会知道的！”黄炎培强忍住心头的愤怒，说：“很好！我但希吾言不中。”^①

然而，黄炎培竟不幸而言中了，就在这一年的9月18日，日军占领了沈阳。他在申报馆获此消息，立即跑到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家报信。当时，一群人在史家打牌，正值兴头上，听了竟无动于衷。黄炎培大怒，一拳砸向牌桌，哭叫道：“你们竟甘心当亡国奴吗？”几天以后，他与一群朋友以宁波同乡会为机关，组织了一个抗日救国研究会。27日，黄炎培和江问渔代表研究会去南京要求政府出兵抗日。第二天，他在外交部与王

^①黄炎培：《八十年来》第91页。

正廷谈话时，一群爱国学生涌了进来，将这个为不抵抗主义辩护的外交部长痛打一顿。王正廷是黄炎培多年老友，私交甚深，然而此时，黄炎培的同僚却完全在学生一边。当晚，他在日记中对学生的爱国主义行动大书“应该！应该！”

深重的民族苦难使黄炎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爱国的良知驱使他以崭新的姿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政治洪流。他利用与上海工商、金融界上层人物的良好关系。多方劝说，促使他们在抗日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他与史量才一起，联络一部分上层知识分子，组织了一个壬申俱乐部，商讨救国自救的途径。他还借助同乡的关系去做杜月笙的工作，开导杜要认识国家大难当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负起救国的责任。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19路军奋起抵抗。为了支援19路军抗战，以壬申俱乐部为基础成立了上海地方维持会（后改名为上海地方协会），由史量才任会长，王晓籁（上海商会会长）、杜月笙任副会长，黄炎培任秘书长兼总务主任。实际负责维持会的具体事务工作。黄炎培动员杜月笙捐出一所大赌场作为活动经费，还通过《生活周刊》（邹韬奋主编，当时尚属职教社名下，后独立）向社会征募军需品，供应前线。他还动员全家老少连续几个夜晚赶制丝棉背心，以援助在三九严寒中浴血奋战的19路军官兵。然而，蒋介石南京政府不仅不支持19路军抗战，反而指派代表与日方谈判，出卖民族利益。黄炎培对此十分不满，多次列名于各界通电，质问政府为何不派兵增援上海抗战，坚决反对做城下之盟，表示“如有损害领土主权，及妨碍行政完整之文约，我国民誓不承认。”^①

^① 《救国通讯》第4号第53页。

在通电中，黄炎培等还进一步提出了国家生活民主化的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废除一党专政，给人民以言论、集会、出版和结社的自由，制定宪法，实行宪政。4月，黄炎培、沈钧儒、李璜、左舜生等留沪国难会议会员宣布抵制蒋、汪为欺骗民众而召集的所谓“国难会议”，要求政府从速设立国民参政会，集中全国人才，组织有力政府，并在8个月内完成宪政筹备工作。

九一八事件后，黄炎培的“教育救国”思想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冲击下开始变化。他感到，“职业教育固然很重要，但非根本问题。根本问题不解决，职业教育亦无办法”，这根本问题即“解除国难，复兴民族”^①。在黄炎培的提议下，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重心和指导方针从“矫正教育之弊，救济社会之穷”，变为“振作民心”、“为民族谋独立和繁荣”。1931年底，职教社创办了《救国通讯》^②，专门从事抗日救亡的报道和宣传。黄炎培亲自担任该刊的发行人。他还要求中华职业学校每天举行升旗仪式，以熏陶学生的报国、雪耻、民族自尊的爱国主义精神。淞沪抗战开始后，学校迁入租界。租界当局不准升中国国旗，学校仍然坚持每天早晚以摇铃为号，全体师生闻铃肃立致敬，举行“精神升旗”。

黄炎培在继续从事职业教育事业的同时，将大量的精力从事“挽救民族的工作”^③。在南京政府签订了可耻的《淞沪协定》以后，黄炎培并不就此罢休。他反对有些人提出的求助于外国的主张，认为“天下事，求人不如求己”^④，唯一的路径

①③黄炎培：《断肠集·河东记》。

②《救国通讯》自1933年以后改为《国讯》，系职教社机关刊物。

④黄炎培：《断肠集·开封公开演讲词》。

是自救。为此，他提出了团结、生产和国防三大主张。他坚决反对与日讲和，认为日寇侵华野心是无止境的，但只要大家努力，中国始终是有希望、有生命的；中国之所以遭受日本欺负，主要是人人为己，互相猜忌，一盘散沙。因此大家必须团结起来，“我相信你，你相信我”^①，提倡“铁一般的纪律”^②和“金一般的人格”^③，每个人都要把他所有的力量，完全贡献给“我所认为国家和民族生存上最需要、最迫切的工作”^④。他认为除了土地丧失这种“急性出血”之外，还有一种外资入侵、白银外流的“慢性出血”。要阻止“慢性出血”，就必须加紧生产，一方面政府采取措施，挽救濒于破产的民族工商业，另一方面，应该动员民众“用国货，穿长衫，剃光头”，以抵制外货。为了宣传团结、生产、国防三大主张，黄炎培在1934—1936年间，先后访问了浙江、江西、山东、河南、陕西、湖北、四川、绥远等地，到处发表演说，宣传爱国思想，普及文化知识，以唤起民众救国热忱。当他在实际调查中发现，问题不在于民众不肯起来，而是生活所迫，无力起来时，便一再向国民党要员陈述，甚至上书蒋介石，建议“取民之财，取其有余，用民之力，用其闲居”^④，期望这些“恶人”在他的苦口婆心之下有所“感化”。

然而，蒋介石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实行的却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忧国之情使黄炎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愤。他利用每次再版《黄海环游记》的机会，反对蒋介石的不

①黄炎培：《五六集·我的人生观》。

②黄炎培：《促成中国自力更生的九一八》。

③黄炎培：《断肠集·开封公开讲演词》。

④黄炎培：《蜀道·改造新四川管见》。

抵抗主义，赞扬抗日军民的反日斗争。淞沪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出动百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史量才、黄炎培、陶行知认为对此《申报》应有明确表示，遂由陶行知起草提纲，经送宋庆龄、杨杏佛审阅、修改，于6月30日、7月2日和4日连续发表《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三篇时评，尖锐地指出国民党政府“一面造匪，一面剿匪”，“枪口不以对外，而以之剿杀政治经济两重压迫下之人民”，是何怪良民以“匪”日众，“匪”势日益壮大，“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锋芒直指蒋介石政府之反动政策。

黄炎培在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反对内战的爱国民主立场和言行，招致了当权者的极大忌恨。1934年，蒋介石逼令黄炎培、陶行知和陈彬和离开《申报》；不久，又派刺客在沪杭路上暗杀了史量才。在白色恐怖下，黄炎培不得不更加谨慎言行，但绝不屈服。他在《人文月刊》上撰文悼念亡友，间接表达了对反动派暗杀爱国志士的抗议。1935年“一二九”运动暴发，黄炎培特地赶到车站为参加南京请愿活动的儿子送行。他叮嘱儿子在斗争时“胆要大而心要细，要勇敢而有策略。”^①1936年10月24日，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悼念鲁迅逝世的大会上，作了题为《从鲁迅之死说到中国民族性》的发言，由衷地赞扬了鲁迅“不怕恶势力，把一切怪现象毫不客气地揭穿”的“特立独行”精神；表示“我绝对相信，中华民族的生命就寄托在这一班‘特立独行’的人。”^②此后，他经常以“特立独行”精神自勉，并在复杂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外圆内

^①黄大能：《怀念吾父黄炎培》，《八十年来》第162页。

^②《国讯》第144—145期。

方”的政治性格，即斗争方式尽管委婉，而原则立场绝不妥协。

形势越来越严重了，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侵占了整个东北，而且还染指到华北。但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顽固立场，继续对红军进行军事“围剿”，在全国不断强化法西斯独裁统治。黄炎培为“团结、生产、国防”的主张宣传奔走了几年，不见任何成效。他陷入了极度苦闷矛盾之中。

“忧国心肠三合作”

七七芦沟桥事件的炮火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帷幕。在全国一派抗日杀敌、保家卫国的热烈气氛中，黄炎培的精神也为之一振。“八一三”抗战期间，他担任上海抗日救援会主席，为组织运输，支援抗战前线的物资，救护伤员，救济难民，迁移工厂，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几次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撤退到武汉以后，黄炎培仍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抗战路线。他召集中华职业学校的校友会，号召校友们勇敢地到前方去投军杀敌，或者在后方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以支援前线。这时，他对教育与改造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又进了一步，深深地感到“教育工作如其不配合于一个理想的政治主张和措施中，是不能有什么成效的。”“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它的造福人群的理想。”^①此后，黄炎培几乎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团结的政治活动中去。

^①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60—61页。

抗战初期，国民党抗战比较努力，同时政治上也有一定的松动，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先后设立了包括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黄炎培以社会知名人士身分亦被蒋介石聘请为这两个咨询机构的成员。尽管国民党的进步有限，但黄炎培对其政策的转变还是感到由衷的喜悦，对蒋介石、国民党寄予了热切的期望。同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也使他有机会结识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并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抗战的决心，坦荡的胸怀和气度，从而得出了“欲抗战到底，必须国共切实合作”^①，“抛弃相互猜忌的观念”^②，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结论。他决心竭力促成“地方和中央”、“党派和党派”、“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合作，并多次强调，这是他作为一个国民参政员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武汉失陷之后，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并在1939年冬到1940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半年一度的国民参政会每每成为国共代表短兵相接、唇枪舌战的战场，这一切都令黄炎培深感不安。他深知“问题在国民党政策不允许他党在法律上有地位”^③；但又认为抗战离不开掌握政权的国民党。为了“助成各党派间合作抗战”，他在会场上煞费苦心，居中斡旋。他在与一些主张抗日的爱国民主人士接触中，彼此都深深忧虑国共两党的摩擦将会导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断送抗战的前途，感到各中间党派有联合起来以调解国共冲突、促进团结抗战的必要。

①1937年12月28日黄炎培日记。

②1938年7月3日《新华日报》。

③1939年2月19日黄炎培日记。

1939年11月，黄炎培、左舜生、梁漱溟、罗隆基、张君勱、章伯钧、张澜等中间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代表在重庆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以“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国策，以求意见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①。

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件。黄炎培闻讯后，深感痛心和不满，他对人表示：“不论事情经过之是非，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②。1月24日，黄炎培当面向蒋介石陈述并递交了意见书，提出三点建议：“甲，希望适可而止；乙，军纪固重要，但亦要收集人心；丙，请把眼光向外。”^③与此同时，他在和各中间党派负责人的频繁磋商中，又提出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委会中要有中共负责人参加，参政会主席团必须有周恩来参加，参政会应报告新四军问题，各党派公开合法存在等建议。2月10日，黄炎培等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在周恩来召集的座谈会上，一致表示完全谅解中共在新四军问题未解决之前不出席参政会的立场；并建议中共向国民党表示：“如果国民党不谈判中共提出的十二条要求，则中共不出席”，以便他们以中共缺席，参政会召开无意义为由，共同抵制国民党利用参政会反共的阴谋^④。这次座谈会还一致商定建立各党派委员会，以讨论国共关系和民主问题。由于中国共产党联合各中间党派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并且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使得蒋介石空前孤立，被

^①转引自民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四十年（1941—1981）》第2页。

^{②③④}《皖南事件（资料选集）》第258、262页。

迫保证今后决无“剿共”军事发生，并故作姿态地表承接受黄炎培等参政员的建议，设立特种委员会，以容纳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党派参加。这时，黄炎培几乎又一次为蒋介石的伪善面目所蒙蔽。他以为国民党既以如此“优厚”的条件相许诺，这对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在过去都是“求之不得”的，因此大家都应该重新回到参政会来共商国事，团结对敌。

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不仅要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等抗日武装，也加强了对国统区民主力量的迫害。1941年2月，救国会主办的《全民抗战》杂志被迫停刊。邹韬奋的生活书店也大都被查封；一些主张民主、抗日的中间党派代表从参政会中被除名，许多人则公开受到人身攻击、威胁和恫吓，甚至失去人身自由。严酷的事实使不少善良的人清醒了头脑。在2月25日民主人士的聚会上，黄炎培对国民党主席张君勱风趣而不无深意地说：“在蒋介石看来，你是刚收编的土匪，我是即将叛变的保安队。”引起在场人们会心的大笑。国民党排斥异己打击抗日民主力量的行径，促使中间党派联合自救。在这期间，在渝的中间人士频频聚会，商谈成立新组织。黄炎培提出：“吾辈调解国共，必须有第三者明确的主张和立场。”^①并认为：“国民党是大拇指，共产党是小拇指，我们是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国共要合作非依靠我们来拉拢不成”^②。经过反复协商，大家一致认为，要调解国共，团结对敌，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有必要使分散的中间党派联合起来，形成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他们商定，不管蒋介石是否允许，一定要建立第三方面自己的政党。为了防止国民党当局的

^①1940年12月24日黄炎培日记。

^②董必武：《大后方的一般状况》。

破坏阻挠，他们决定组织暂行保密，待时机成熟后再向社会公开。

1941年3月19日，黄炎培代表职教社，与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以及乡建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章伯钧、李璜、左舜生、张君勱、罗隆基、梁漱溟、张澜等13人在重庆上清寺特园集会，正式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政团同盟），通过了同盟的政纲和简章。黄炎培被公推为同盟的主席（不久，黄因故辞去主席职务，由张澜继任）。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抗战期间，以团结、民主、抗战为基本方针。它是由不同政治倾向的党派和团体组成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党，其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左中右的政治分野，左翼倾向共产党，右翼倾国民党，黄炎培则始终主张在国共两党之间保持“超然独立”的中间立场，实行“不偏不倚”的中间路线。他提出民盟内部要“整个的求团结”，“对各政党维持友好，视情态之可能，得就某事件与之合作”；“对政府取协助之义，其有所见，为善意的劝告”^①，同时要“善意应付共（产）党”^②。

这一时期，黄炎培还在旧稿的基础上整理了《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纲要》，对调整国共的政治立场作了哲学上的论证。他认为，人的本性一在“求生”，二在“求群”，进而产生“爱”；然而如果过于“偏私”，“偏激”地“爱”我或我群，就会产生“杀人”。这样，“人类间唯一大问题，是‘全生去杀’”。如何解决呢？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互憎互杀，实在由于所“知”甚少，所“爱”过窄。因此，只要通过“启发方

^①1941年4月5日黄炎培日记。

^②1941年8月26日黄炎培日记。

式”，“把人们所爱，逐步扩大到全人类”，“使人人以群为我有，我为群有”，“把群加强团结起来”，“那么相争相杀的惨况或可减免”^①。显然，深受中国儒家传统学说和西方互助进化论影响的黄炎培，是虔诚地相信可以通过启发人的良知的教育、劝说方法去实现“全生去杀”的理想世界的。他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奔走周旋于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努力促使他们团结对敌，共赴国难。

然而，善良的心愿并未化为美好的现实。恰恰相反，在1941—1943年上半年间，国民党统治区“政治日趋黑腐”，山城的空气愈加沉闷。黄炎培面对这令人窒息的形势，处事不能不更加谨慎。但他并未随波逐流。1941年11月25日，他和张澜、张君勱、左舜生等人在二届二次参政会上再次提案，要求政府“结束训政”，“不以国库供党费”，“保障人民种种自由”，“停止特务机关活动”，“禁官吏垄断投机”^②等等。措词尖锐，引人注目。1942年春，当友人劝他停办《国讯》，减少言论文章行动以“免祸”时，他的回答是“不拟接受”。这一时期黄炎培的心情是十分压抑的。他看了郭沫若新编历史剧《屈原》之后，十分感慨地吟出了“阳春自昔寡知音，降格曾羞下里吟。别有精神难写处，令人面目古人心”^③的诗句。

“为真民主而拚命”

1943年，蒋介石在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未遂之后，迫于国

①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97—199页。

②1941年11月25日黄炎培日记。

③1942年4月8日黄炎培日记。

内外的种种压力，在9月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宣布战后国民党将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还政于民。接着又设立了所谓“宪政实施协进会”，由蒋亲任会长，黄炎培也应邀参加，并被指定为三位召集人之一。尽管国民党演的是一出“筹备宪政”的假戏，但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下，却趁此机会掀起了一场真正的民主宪政运动。

黄炎培于1944年1月在重庆创办了《宪政》月刊，邀张志让担任总编，集中刊载宣传民主政治、介绍各国宪政的文章，出版后常常很快销售一空。《宪政》月刊社还每月定期召开宪政座谈会，邀请工商、金融、文化、教育、出版各界社会名流，以讨论“宪革”、时事为名，抨击政局，申张民意。每次座谈，黄炎培都亲自主持。座谈会吸引了大批群众，开始安排在交通银行的会议室进行，以后逐步扩大，走出狭小的上层圈子，发展成为一二千人的群众大会，会场亦改在迁川工厂联合会礼堂等公共场所，成为当时重庆一个很有影响的、为国民党当局所侧目的民主论坛。同时，为了宣传民主宪政，黄炎培还以年逾花甲的高龄，不辞辛劳地奔走于各大学，向青年学生演讲。他鼓励学生要自己去争民主，而绝不要幻想民主会自动到来。他还告诫学生们民主有真假之分，一定不要被假民主所欺骗，而要为真民主而拚命。黄炎培的演讲不断激起了学生暴风雨般的掌声，他被学生们称赞为“可敬的民主战士”。《新华日报》还专门发了短评，高度评价黄炎培的这种“为真民主而拚命”的精神。

正当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之际，1944年的国民党战场却发生了空前耻辱的豫、湘、桂大溃败。与此同时，大后方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暴露无遗。

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三届三次参政会上提出了召集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国事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号召。10月10日，民盟发表声明，表示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①但蒋介石却顽固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在1945年元旦新年文告中宣布将召开国民党钦定的“国民大会”，以抵制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1月13日，民盟领导人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沈钧儒、张申府等在黄宅聚会，商定民盟对蒋介石新年文告的时局宣言，重申1944年10月10日的政治主张，明确表示：以召开如此钦定的“国民大会”来“‘还政于民’，并欲以此而成就全国的团结统一，吾人认为必将适得其反”。

由于国民党的冥顽不化，遂使进行中的国共谈判陷入僵局。2月14日晚，周恩来在特园宴请黄炎培等中间党派领导人以及国民党进步人士，以大量事实阐述了国共谈判失败的症结所在，宣布将于次日返回延安。黄炎培听了十分焦虑，深恐谈判从此破裂，当即苦劝周恩来缓归，即使归延，也勿使谈判中断。夜半，他归家后仍然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翌日清晨便直奔左舜生、李璜处商量办法，午后又将国民党的谈判代表王世杰请来，说服他与周恩来再度会晤。当晚，在黄炎培安排下，周恩来、王世杰、黄炎培和李璜在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办公室会谈，澄清了一些意见。通过这次调解国共的实践，使黄炎培进一步相信，中间力量有可能在现实政治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不久，他在《宪政》月刊发表了《致国民党诸友好公开

^①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2页。

信》，提出“至危至艰之中国前途”；应由国民党、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共同负责”的主张^①。

1945年5月，黄炎培读到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深受鼓舞，认为和平之门并未关闭。6月2日，他和褚辅成、章伯钧、冷遯、左舜生、傅斯年、王云五等七位参政员联名打电报给毛泽东、周恩来，希望早日恢复国共谈判，实现国内和平。延安中共中央很快回电，表示同意商谈，并欢迎他们一行赴延安当面交换意见。7月1日，黄炎培等一行六人（王云五临行未去）不顾多方阻拦，乘专机由重庆飞向延安。

延安，对黄炎培来说，是一块神秘而又令人神往的地方。在重庆时，他曾听过一次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室樵作的“访延安报告”，通篇是：“主义不合国情，作风不合人情”、“言论不自由”等诬蔑之词，黄炎培却坚信“百闻不如一见”。他以六十又七的高龄，担着遭遇敌机轰炸的风险亲赴延安，其意不仅在调解国共，同时也想通过实地的考察和比较，看看今后究竟“谁得国人信仰”？

黄炎培等在延安机场上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随后，毛泽东与黄炎培等进行了三个半天的会谈，交换了对时局看法，最后在融洽的气氛中达成了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的一致意见。在延安的五天中，黄炎培参观访问了许多地方。他惊喜地发现，延安“没有一寸土地是荒着的”，“没有一个游手闲荡的流氓”，“老百姓衣服都很整洁，绝对没有褴褛污秽的流浪者”，“男女都是气色红润，绝对没有见过一个面带烟容而

^① 《宪政》第14、15期合刊，1945年3月25日。

颓唐的人”。总之，给他最突出的印象是“政府好象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们的生活都是负责的”。未到延安之前，黄炎培担心的是自由被限制，因此到延安之初处处小心谨慎。但他很快就感到这里的行动是空前的自由，不仅他们一行人“要到哪里，看哪里，都绝对自由”，而且延安的全体人民，“个人得投书街头意见箱，也个个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完全不象重庆的大官们那样“飞扬拔扈”，而是“个个朴实稳重”。与他们“天天见面谈笑”，真如古人所说的“如坐春风中”。最令他难忘的是有一次与毛泽东的谈话。毛泽东问黄炎培在延安的感想如何？黄炎培坦率地提出了自己长期思考而未能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在他 60 多年的经历中，曾耳闻目睹不少团体和朝代总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都是创业之始，雄心勃勃，艰苦奋斗，待到功成之后就逐渐松懈腐化，难免“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败局。他诚恳地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即乐观而肯定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使黄炎培大受启迪。事后他回忆这段谈话时，深表赞同地写道：“我想：这话是对的……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延安之行使黄炎培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感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之前，他自称为“不偏不倚”的“自由主义者”。而现在，他内心的感情天平却明显地倾向了共产党一边。他在日记中写道：“延安五日期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

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验过。为了没有政权和军权，当然一切说不上，路线倒是相同的。”^①回到重庆后，黄炎培迫不及待地这一切新鲜的感受向自己的亲属、同事和各界友好倾吐、报告。他逢人便谈的一件事，就是他在延安一下飞机，毛泽东便对他说：“知道吗？我在二十多年前就认识你了，1919年我在上海听过你的报告。”每次讲到这里，黄炎培总是不无骄傲地哈哈大笑：想不到当初台下竟有这样一位英雄！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延安，黄炎培接受同志们的建议，决定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以访问日记的形式写成一本书。抗战以来国民党为了控制舆论，宣布图书杂志审查制度，规定书稿出版前必须送审。这类书送审肯定会通不过。他决心不管有多大的压力，也要“顺从真理”，遂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决定拒不送审，交国讯出版社突击出版。8月10日，国统区第一本拒审书《延安归来》出版了。在书中，黄炎培热情地赞颂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抗日根据地，坦然地宣布：“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这本书出版后，国民党大为震惊，将其列为禁书。但它却在整个国统区不胫而走，成为当时进步青年的必读之书。

延安之行，成为黄炎培救国救民、寻求真理曲折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①以上有关延安之行的引文均见黄炎培《延安归来》，转引自《八十年来》。

“谁仁谁暴终需问”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在一片庆祝胜利的爆竹声中，蒋介石却磨刀霍霍，准备下山抢夺胜利果实。8月13日晚，黄炎培与民盟中央常委讨论起草了《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黄炎培欣喜地去机场迎接。隔日，又应邀到曾家岩与毛泽东会见，畅谈时局。他对国共谈判寄予了很大期望。然而，“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便大举向解放区进攻，挑起了内战。黄炎培对此异常焦虑。他深感“老百姓再也不能流血了”^①，遂于10月30日致函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呼吁“立即停止冲突”，“从速组织调查团”，包括各方代表，前往冲突地点调查真相，商谈解决^②。

在此期间，黄炎培还积极筹备酝酿建立一个中间党派的新组织。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使他深切感受到组织力强的重要性。在《延安归来》一书中他总结道，中共之所以“方针定后，他们执行的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量强，人人受到训练的缘故”。由于民盟是个三党三派组成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党，不尽如意。黄炎培便在文教和实业界人士中进行串联，最后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于12月16日在重庆建立了民主建国会。黄炎培在成立大会上作了书面发言，说：抗战八年使人“发生一种新的觉悟，认为各自守住岗位，任何努力，为公为

^{①②} 《国讯》第402期，1945年10月30日。

私，总觉不够，每一个人，都须关心政治，研究政治，在可能状态下并须参与政治”，以实现“民主建国”的“理想境界”^①。民建会建立之后，便投入了促成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工作。黄炎培本人作为民盟的代表出席了政协会议。他在会议期间，驳斥了国民党“政协即分赃”的谬论，辛辣地讽刺“政府中人骂参与政治为分赃，简直自承所握政权为赃物了”^②。由于黄炎培自延安归来的一系列言行触犯国民党有关当局，政协召开期间，黄的住宅菁园遭到军警特务的非法搜查。消息传开，舆论大哗。民盟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黄炎培本人则十分冷静。他并未因此胆怯，而是向民盟同人表示，对于今后的政治活动：“如真由民众选出，决不推辞”^③！

政协经过一个月的曲折斗争，终于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统一的五项决议。但蒋介石却一意孤行，在美国的帮助下，国民党大量运兵到东北，扩大了东北的内战。黄炎培于1946年2月23日与沈钧儒、张君勱、彭一湖在上海联名发表对时局主张，要求“东北一切内部纠纷，应依政治方式协商解决”^④。黄炎培感到对调停东北内战，民盟有责任“出而尽力斡旋，恢复合作”，遂于4月5日致函张澜，建议民盟参加调停，并强调指出：“大局安危，视此一举”。然而，由于蒋介石出尔反尔，毫无诚意，民盟调停东北内战的努力一再落空，7月中旬，全国内战大规模爆发。在严酷的事实面前，黄炎培终于认识到内战的罪魁祸首在国民党，而不在共产党。但是由于几千年来

①《中国民主建国会重要史料选编》。

②1946年1月14日黄炎培日记。

③1946年1月29日黄炎培日记。

④1946年2月23日黄炎培日记。

他深深信奉的互助进化论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政”、“非攻”、“和为贵”思想的影响，虽然强烈不满国民党的独裁、卖国、内战政策，却不赞成用暴力夺取政权的“非和平”道路，虽然理解、赞同共产党的对和平和民主的主张，但在封建正统观念的支配下，却认为改良政治主要还得靠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国民党。他希望通过共产党在军事方面的让步换取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民主，以拯救“苦战八年一息仅存的老百姓”。

正当黄炎培等一腔热诚各处奔走致力于恢复国共和平谈判时，10月11日传来了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蒋介石单方面颁布召集伪“国大”的消息。这对黄炎培来说不啻是一盆冷水。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本无意涉足政海，‘九一八’以来，为了抗日，（民国）廿九年以后为了调解国共纠纷，至今未获返吾原有岗位，至今日国共破裂已达无可挽回之境地，吾决意不参加此项工作了”^①。然而，当蒋介石别有用心地派人到上海，动员第三方面人士向中共代表劝驾回南京恢复和谈时，黄炎培的心又热了，他与梁漱溟、张君勱、李璜、罗隆基等人怀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苦劝周恩来回南京与国民党重开谈判。中共代表团为了彻底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的伎俩，教育团结中间势力，遂同意与第三方面代表于10月21日同回南京。然而就在他们到达南京的当天，蒋介石却偕宋美龄飞离南京赴台湾“视察”去了，唱了一出“恕不奉陪”的空城计。黄炎培等虽受此愚弄，但仍竭力在陷于僵周中的东北停战问题上寻觅既能为国民党接受，又不伤害共产党的两全其美的方案。由于在斡旋期间国民党继续制造紧张局势，和谈随时有中

^①1946年11月12日黄炎培日记。

断的危险，梁漱溟、黄炎培和莫德惠受第三方面委托匆匆起草了一份“国共双方一律就地停战”的折衷方案。然而由于起草人对瞬息万变的军事、政治形势缺乏具体的了解，这个方案实际上是有利于国民党而不利于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同时在急于求成的气氛中，他们又疏忽了民盟曾与中共达成的有关民盟若有重要主张和行动必事先与中共协商并征得同意的默契，未及征求中共代表团的意见，便将方案一式三份分别送交国、共、美三方。周恩来收到后立即严肃地指出：这不是折衷方案，而是战争方案，是帮助国民党压迫共产党，从此东北将无宁日，这使黄炎培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痛悔莫及。为了挽回影响，黄炎培、李璜、罗隆基和莫德惠决定立即向国民党方面索回方案。当他们赶到孙科家时，国民党大员们已讨论过方案，并通过电话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孙科面带喜色地连连夸奖第三方面的提案“公正不偏，细密周到”。黄炎培这时以从容而严肃的口气对孙科说：“好是很好，可惜我们做事不细心，还抄漏了一条呢。”并要孙科将文件拿出来以便指给他看。孙科将文件交给黄炎培后，黄炎培手指着文件，口中不断地说着“诺，诺，诺”，似乎想不起来的样子。孙科不耐烦地说：“你记不清楚了，就另外抄一条送来好了。”罗隆基在一旁赶紧插话：“我记得，你给我，我来说。”他从黄炎培手中抢过文件，藏进了西装内袋中，说：“这种正式文件怎能补抄一条呢，还是赶快回家誊写一份正式的送来吧。”遂不等孙科反应过来，黄炎培等便带着文件告辞返回，连同美方代表马歇尔处的那一份，一起索回送交周恩来。由于这出“月宫盗宝”的果断措施，才避免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失误。

第三方面调停东北内战的努力终于失败了，黄炎培的内心

异常沉痛。那些天他夜不成寐，百感交集，“苍生痛哭岂无人，苦口哢哢又一句”^①。这种明知事不可为而为之的争取和平的精神，中共朋友是充分理解的。11月12日，当黄炎培和第三方面代表与中共代表会商，声泪俱下地苦劝周恩来暂勿返回延安时，周恩来在会后特与他个别进行了深谈，鼓励他为和平、民主继续努力。

当国民党单方面召集的伪“国大”开锣之后，国民党当局对黄炎培参加伪“国大”竭尽了拉拢、诱骗之能事。早在这年6月，国民党利用解放区部分地区干部在执行土改政策上的偏差，大肆造谣诬蔑共产党。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有计划地纠集苏北逃亡地主包围黄炎培，要他在共产党面前“为江苏同乡说话”。黄虽当场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但由于不了解事实真相，曾一度对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产生疑虑，担心对地主开展群众性的斗争会造成社会混乱，导致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孤立。为此，他多次与各方面人士交换意见，并写信给毛泽东，建议中共“改变政治作风”^②。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以为有机可乘，遂大喜过望，企图以此打开缺口，分化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人士，孤立共产党。从6月到11月，蒋介石亲自指派国民党党政要员一再对黄炎培进行游说，诱劝他参加伪“国大”和改组政府，并以出任教育部部长相许。然而，黄炎培长期以来虽然在国共之间坚持“不右倾，不左倾”的公允立场，强调互谅互让，留有余地，但在事关国家民主、和平、统一的大目标上，他坚守“取象于钱，外圆内方”的政治操行，决不为一己私利，而放弃自己的追求和理想。6月24日，

^①黄炎培：《红桑集·苦口》。

^②1946年6月30日黄炎培日记。

他在慰问“下关事件”受伤代表的聚餐会上出示了《吾心》诗一首，表明了自己“立身不管人推挽，铄口宁愁众是非”、“谁仁谁暴终需问，那许西山托采薇”^①的态度。7月27日，杜月笙街陈立夫之命劝说黄炎培单独参加“国大”，脱离民盟，黄当场拒绝，表示：“一，我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二，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三，欲我离民盟，我不能自毁人格。”^②11月12日，国民党原定伪“国大”召开的前夕，黄炎培彻夜不寝，伏枕为民盟起草《民盟对参加国大问题之态度》，表示民盟一切行动以政协决议为唯一依据，在国民大会未按政协决议程序完成准备之前，“决不参加”国大^③。这一声明经12日民盟总部讨论通过后，当天下午，黄炎培代表民盟向各界宣读。但他考虑到为以后的和谈留有余地，宣读时将“决不参加”国大改为“暂不参加”。这又使国民党对他产生了新的幻想。14日，国民党中统头子潘公展和杜月笙、钱新之等又蜂拥而至，轮番发动游说攻势。黄炎培为摆脱纠缠，于当天午夜乘车返沪。但立足未定，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雷震就追踪而至。伪“国大”召开期间，尽管每日说客盈门，但黄炎培都是言婉志坚，不为所动。黄炎培这种“不逐时芳品自尊”的政治气节受到人们的赞许。民建重庆分会特地打电报给黄炎培，称颂他在恶势力下有所不为的高尚品格——“高风亮节，举世盛钦，东望海云，弥增崇敬！”^④

①黄炎培《八十年来》第104页。

②1946年7月27日黄炎培日记。

③1946年11月12日黄炎培日记。

④1946年12月26日《文汇报》。

“别开蹊径为平民”

伪“国大”召开之后，蒋介石政权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继续加紧反革命内战，并彻底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于1947年2月底通知中共谈判代表限期撤退。黄炎培闻知，一年来忍辱负重奔走和平，如今皆付之东流，内心感到异常沉痛。他在为民盟起草的《为国共和谈正式破裂宣言》中写道：

“国共调解工作，虽已宣告失败，同人仍当日日怀念吾天职之所在，吾舌尚存，必发为言论，吾笔未秃，必写为文章”；

“将来之是非黑白，天下自有公评”^①；黄炎培就是怀着不达目的誓不休的顽强精神，继续呼吁和平，追求实现和平统一的途径。他为《国讯》写下了大量的短评和文章，控诉国民党的反革命内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要求国共合作。他当时认为，既然国共之间谁也消灭不了谁，那么除了合作“实在找不出其他合理方式，来解决国共问题。”^②5月23日，黄炎培与张澜、梁漱溟、章伯钧、韩兆鹗等参政员联名向四届三次参政会提出了《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建议“确定政治解决竞争的大原则，依据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及路线，重新举行和平会议”，“迅速恢复国共间的联系”，“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谈的具体方案”^③。18日，黄炎培还以提案人身分在大会上发言，历述内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提出“政协是解决内战的配

①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08页。

② 《国讯》第411期，1947年5月4日。

③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41页。

尼西林”^①。但就在当天的参政会晚宴上，他便受到蒋介石的斥问：“中共区人民还要苦，何以不向他们诉苦，而责我征兵征粮？”黄炎培的提案遂被搁置一边。7月初，国民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布了“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黄炎培在《国讯》上写下了一行沉重的文字：“从此中华民国正式地陷入于极不幸的状态里。从此，根据吾们一片爱国痴情所发出的热望，一时间感到绝望。”^②为抗议这个反动法令，他在为民盟主席张澜起草的书面谈话中，揭露了蒋介石“一面动员，一面实施宪政”的伪善面目。7月11日，当他出席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时，反动分子潘某提出“请政府厉行总动员令”的提案。黄炎培怒不可遏，当即迎头痛斥。他反对内战的坚决立场得到了许多正直人的支持，迫使潘某不得不悻悻地撤回了提案。

国民党反动派在加紧内战的同时，也强化了国统区的法西斯专制统治。6月20日，北平、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爆发了青年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游行示威，国民党当局竟出动大批军警进行残暴镇压。黄炎培闻讯后立即赶到医院慰问受伤学生，目睹爱国青年遭受如此摧残，他不禁老泪纵横。出自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他力所能及地做了许多工作，以避免当局对他们的更大规模的迫害，甚至还找了司徒雷登，希望这位美国大使能劝说蒋对学生万不可采取高压政策。但蒋介石一意孤行，竟命令各地军警继续捕人，并枪杀了三名武汉大学学生。黄炎培忍无可忍，于6月8日在《国讯》上发表《你们闻

^①1947年5月28日黄炎培日记。

^②《国讯》第421期，1947年7月13日。

得血腥臭么？》一文，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他对蒋介石已感到彻底绝望，决心重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7月26日，黄炎培与民盟部分领导人借游玄武湖为名商谈时局和出路，得出了“甫毒宁惟一暴秦，别开蹊径为平民”^①的结论。这就是说，应该推翻“暴秦”一般的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开辟实现国家民主和平的新途径。9月13日下午，一个刚刚考上清华大学的青年学生前来拜访黄炎培，痛述对国事的悲观心情，诚恳地希望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得到自己素所尊敬的前辈指教。黄炎培深有意味地劝他走“闻一多的道路”，平时“须有专门修养，但到非常时期，虽牺牲生命不恤”^②。

由于民盟坚持和平、统一、民主的立场，拒绝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1947年10月底，国民党当局以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为由，公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将按《后方共产党处置方法》“严加取缔”。在这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争取民盟的继续合法存在，黄炎培和民盟中央委员叶笃义受民盟中央的委托赶赴南京，同在京的罗隆基一起四处奔走，希望司徒雷登和某些国民党党政要员能够出面疏通。这时，一贯自称民盟忠实朋友的司徒雷登却表示爱莫能助，反过来劝说民盟自动“光荣解散”。而国民党的一些要员则以政府已宣布民盟非法为由，拒绝作任何正式谈判。在多方奔走无效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力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黄炎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个人名义与国民党代表张群进行协商，最后达成协议，以国民党当局“免除民盟盟员登记”，“对无共产党党籍的民盟盟员”不采用《后方共产党处置方法》为条件，

①1947年7月26日黄炎培日记。

②1947年9月13日黄炎培日记。

“民盟宣告自动解散”。11月4日，黄炎培、罗隆基和叶笃义在特务的监押下回到上海，向民盟总部汇报谈判结果。民盟中央迫于形势的压力，终于11月6日以主席张澜的名义宣告民盟自动解散。

民盟的被迫解散使这些手创民盟的老人们受到了巨大的感情创伤。张澜在宣告民盟解散的当晚，彻夜不眠，次日即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宣布“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①。黄炎培的心中更是充满了矛盾和悲愤。在南京与张群交涉时他曾去玄武湖畔遣愁，感慨万千地吟道：“黄花心事有谁知，傲尽风霜两鬓丝。争羨湖园秋色好，万千凉叶正辞枝。”“红黄设色补寒台，点缀秋光枉费才。毕竟冰霜谁耐得，青松圆角后雕材。”^②傲尽风霜，两鬓雪丝的黄炎培，不屑与青年党、民社党这些“点缀秋光”的无耻之尤为伍，他要让人看一看，究竟谁是“耐得冰霜”的“青松”。民盟被迫解散后一个星期，他在《国讯》上发表《我与民盟》，对国民党当局的卑劣行径公开表示抗议：“一部大历史，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者，不知凡几，民盟已矣。自我发之，自我收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我只平心静气地问一句话：请大家公正检讨民盟从创始到结束，前前后后所有文件，曾有一字一句，足以构成危害国家颠覆政府的罪行否？”^③忧愤之情跃然纸上。

强大的政府压力，连日的谈判奔波和精神上的苦闷，使黄炎培腰疾复发，卧床不起。但他不甘心就此消沉，退下阵来，

①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61页。

② 黄炎培《红桑·玄武湖秋成三绝》。

③ 《国讯》第439期，1947年11月15日。

在病榻上仍挥动寸毫，以《黄花心事有谁知》为题，借花抒志：“她的环境尽管恶劣，在萧杀的金风里，撑起了天生一般傲骨，牢守着将荒而还没有荒的三径，把短短的东篱，做她的天然堡垒，风风雨雨，百战不屈，好象凭她内心的至诚，抱着悲天悯人无限惨苦，甘心 and 恶势力奋斗。”^①

蒋介石对民主力量的残暴镇压，不仅使许多中间人士认清了国民党政权的本来面目，也加速了他们向共产党和革命力量的靠拢。自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民族利益奋斗不息的精神和崇高品格，在不知不觉中引导黄炎培在感情上和行动上一步步走向真理，走向光明。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之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和以民主党派成员身分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继续以各种方式影响和帮助黄炎培。1947年秋，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和国民党强令解散民盟，从正反两个方面促使黄炎培认识到国民党的垮台和共产党的胜利已为期不远了。1948年1月10日，他读了毛泽东在12月会议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深有感触地说：“两大局面已成过去，今后只有一件大事，我们应该依靠中共，与中共取得联系。”^②他主动将报告油印多份，分发给民建会和职教社干部阅读。这年1月，沈钧儒等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宣布重建民盟，放弃中间立场，与中共“携手合作”，“彻底消灭整个反动集团的统治”。黄炎培在沪闻讯，立即作《赠沈衡山港居》诗一首：“口纵予暗岂忍缄，心无私欲有民岩，倦劳行者怀居者，犹是张园隔枣岚。”^③黄炎培借诗言

① 《国讯》第440期，1947年11月22日。

② 社会问题研究会编：《民主建国会》。

③ 1947年1月13日黄炎培日记。

志，表示对民盟三中全会的理解和支持，尽管自己与港居的同志们相隔千山万水，但彼此的心情象重庆时期的张园（黄炎培在渝寓所）和枣岚（沈钧儒在渝寓所）一样邻近。

从此，黄炎培在从中间路线向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征途中迈出了深思熟虑的重要一步。他充满信心地投入了新的斗争。在失去公开合法斗争的条件之后，他将民建会的组织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斗争，领导骨干以聚餐会的形式分头联系会员，讨论时局，互勉斗志。黄炎培本人则利用《国讯》这块合法阵地，继续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报道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时局、战况，同时积极提供国内外民主运动的消息和解放区的情况，介绍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在这些日子里，黄炎培的笔锋特别雄健，几乎每期《国讯》都有他的文字登载。1948年4月8日，国民党内政部以“刊载为匪宣传文字”的罪名，命令《国讯》停刊，黄炎培在停刊号上坦然地宣告：《国讯》“只是为国家民族宣传，为真理宣传”^①。之后，他立即与民盟和职教社有关同志商量，决定接办《展望》周刊，坚持宣传阵地。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展望》于5月1日在上海与读者见面了。黄炎培亲自主持编务，决定编辑方针，《展望》的内容和风格犹如《国讯》，沉着而富有战斗的韧性。这年9月，黄炎培还主动向中共地下组织有关同志提出，要求共产党派人来负责刊物的编辑工作。中共党组织接受了这一请求。黄炎培对中共派来的王元化十分倚重，配合默契，使《展望》成为当时白色恐怖下的上海透漏解放战争真实情况和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唯一窗口。

^① 《国讯》停刊号，1948年4月9日。

1948年秋天，随着我中国人民革命战略决战的胜利发展，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更加疯狂地实行白色恐怖，以维持其风雨飘摇的罪恶统治。上海的许多民主人士都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公开监视，失去了行动自由。特务在黄炎培住宅的弄堂口也设下了监视哨。11月下旬，杜月笙得知黄炎培已列入黑名单，派人送信要黄炎培暂时躲避。于是黄炎培离家避至亲友处，一日数迁；以后虽经张治中等从中斡旋，情势稍有缓和，但仍终日受到特务监视。1948年底，中共地下组织转来了中共中央欢迎黄炎培到解放区去参加新政协的邀请。接着又从反动当局内部接连透出国民党特务将以绑架或暗杀对付民盟领导人、黄炎培名列案首的消息，形势越来越险恶。黄炎培决定尽快离开上海到解放区去。1949年2月下旬，在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心下，黄炎培与民建会的王良仲精心设计了声东击西的金蝉脱壳计划，先由王良仲利用上层关系向特务放出空气，声称黄将于下星期到浦东农场参观，并邀特务同去；同时黄家以准备春节宴客为名，大置年货，造成黄炎培近期内不会出走的种种假象。2月14日下午，黄炎培携夫人姚维均及女儿当当佯称出门购物乘车至南京路永安公司门口，让汽车就地等候，跟踪而至的特务信以为真，亦将汽车停下守候。黄炎培一家进入公司大门，即穿过店堂，自另一门出来跳上王良仲事先备好的汽车，直开江湾女儿学潮家中，略事化装后，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同志护送上开往香港的轮船。直到黄炎培一行安全抵达香港的消息见报，国民党特务才恍然大悟，连呼上当。

黄炎培抵达香港后不久，即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于3月14日再度乘船离港赴解放区。经过7天7夜的航行，3月21日船至天津。黄炎培受到了中共天津党政军首长的热情接待。

3月25日上午，黄炎培由专车护送达北平，入住六国饭店。当天下午，黄炎培与诸民主人士一起至西郊机场迎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进入北平。第二天晚上，毛泽东便在万机待理的繁忙之中设家宴单独邀请黄炎培晤谈，周恩来等作陪。宾主畅叙别情，纵谈时局直至午夜。黄炎培深深地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这种智睿宽广的胸怀和求贤若渴的真诚所感动。次日在叶剑英主持的欢迎晚会上，他激动地高呼：“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这发自内心的欢呼不仅表达了黄炎培对党和人民革命的拥戴和感激之情，更意味着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他决心跟定共产党，开始自己新的人生路程。

“一分精神全为国”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隆重开幕。黄炎培代表民建会在开幕式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们太兴奋了，我们这一群人，今天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要从地球几万万年来一部大历史上边，写出一篇意义最伟大最光荣的记录。它的题目，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我们要在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间，在东半个地球大陆上边，建造一所新的大厦，已题名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①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他欣然从命。在旧中国，北洋政府曾两次邀聘黄炎培为教育总长，蒋介石也曾一再拉他入“朝”

^①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29页。

做官，他都恪守“不为官吏”的立身原则，坚持不就。袁世凯曾无可奈何地送他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如今，年逾古稀的黄炎培竟欣然入政，连他的亲属亦深感惊奇。1950年，他的儿子黄大能入京公差时问他：“一生拒不做官，恁地年过70而做起官来了？”黄炎培叙述了周恩来总理向他动员的经过之后，庄重地说：“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① 72岁高龄的黄炎培虽然身兼数职，公务繁重，却总是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事必躬亲，深受同事们的好评。

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帝国主义挑起了侵朝战争。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气概作出了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全国人民保家卫国的自愿行动。黄炎培在积极拥护抗美援朝的同时，又深感出兵之事影响甚大，遂连日与诸民主党派人士商谈，批了一份意见书于10月24日送毛泽东和周恩来参考。他们担心十几年的抗战、内战，国家元气尚未恢复，而人民中间抗美援朝的热情恐不及过去抗日反日那样的强烈和普遍，尤其是国民党残余势力犹存，局部反侧尚未完全清除。因此建议强调和平，以争取人心。同时，抗美援朝不动则已，动则必须有力，使人知其后面还有更大的力量。虽然黄炎培对战争胜负不无顾虑，但他凭着以往的经历，“对主席睿智而正确的领导，总理沉着而锐敏的处理一切”，却抱有“绝对的信心”，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宣传，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10月31日，在民建中央召开的常委会上，黄炎培针

^①黄大能：《怀念吾父黄炎培》，《八十年来》第165页。

对工商业人士中一部分人存在的亲美、崇美和恐美思想，指出：“当前的时局，事实证明了美帝的野心正在进一步进逼，我们除了信任政府和毛主席的领导和决策外，各党派无党派的人士，应该负起宣传的任务来协助政府。”“对麻痹的人，要给他们刺激，唤起他们真正的同人民共一次患难，打破他们恐美疑苏的心理，说明人民的中国决不容许有人发国难财。”^①随着战线捷报不断传来，美帝“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黄炎培原先的顾虑尽消，更为钦佩中共中央的大智大勇。在抗美援朝期间，黄炎培不仅多次写信给毛泽东，献计献策，而且还通过自己在工商界的地位和影响做了大量支援前线的工作。他积极配合人民政府号召资本家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了推动工商界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民建会专门成立了捐献委员会，黄炎培在百忙之中又亲兼主任，奔走呼吁，启发广大工商界人士的爱国热情。

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中共和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广大新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深受封建剥削之苦的广大农民群众在运动中扬眉吐气，挣脱了束缚自身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沉重枷锁。然而这一切都引起了地主阶级的极大恐惧和仇视，工商界中也有一些人对中共的土改政策甚不理解，认为土改工作“偏差很大”，“斗争过火”，要求“和平土改”。在土改开始的一段时期里，黄炎培收到了许多地主的告状信，由于不明事实真相，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向中共和毛泽东转达了这些意见。毛泽东对黄炎培并未加以简单的批评、指责，而是从爱护的立场出发，耐心地让事实

^① 《民讯》第5期，1950年11月。

来修正他的认识。1950年下半年间，毛泽东多次亲笔写信，将各地的土改材料送黄炎培参阅，还介绍当时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的陈丕显与他见面交谈，黄炎培的作风一向是“理必求真，事必求是”。在他初步了解了基层情况之后，决定下乡考察。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和支持，特地致函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和陈丕显，关照黄炎培到了以后“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①。黄炎培临行前，毛泽东又邀他面谈，告他苏南已土改地区，可择好者，坏者各看一、二处考察之。

1951年1月19日，黄炎培一行离开北京，来到苏南农村。他象40多年前以《申报》记者身分考察教育一样，不辞辛劳地深入穷乡僻壤，了解第一手情况。当时苏南农村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考察团住宿的地方是一间简陋的小土房，同志们为了照顾这位德高望重的七旬老人，让他独自睡屋里唯一的一张木板床，大伙儿露宿屋檐下。黄炎培执意不肯，坚持要大家进屋一块儿睡，还亲自搬来砖块，为同志们搭铺，说要与年轻人打成一片！经过半个多月的实地调查，黄炎培的心里踏实了。回京后亲自写了《访察苏南土改报告》，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考察结果。他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即肯定“我们访察到的苏南土改，认为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好在哪儿？农民站起来了”。他还分析了土改办得好的因素在于：一是“土改之前，生产救灾”，“取得人民信仰”；二是“土改以前的准备，是充分的”。关于“和平土改”，他认为虽然“不能说是绝对做不到”，“但这样基础太脆弱，靠不住”，“土改必须发动群众，必须唤起农民自觉，建立群众力量”。接着，黄炎培又坦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91页。

率而诚恳地指出：“苏南土改不是没有问题”，由于群众在几千年专制高压下一旦解放出来，行动往往容易过火，短期内曾出现过“乱打乱杀”的现象，所幸的是政府发现后立即作了纠正。因此，“‘有领导的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应认定这是一句名言”。最后他充满希望地将苏南土改的情况概括为：“每个人都在想搞好，大体上已经搞好起来了”。黄炎培的报告呈送毛泽东和周恩来后，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黄炎培在考察土改的同时也顺便了解了镇反运动的情况。1950年10月，中共中央鉴于抗美援朝期间匪特猖狂横行，决定纠正前一时期运动中出现的“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强调镇压反革命须实行“稳、准、狠”的方针。黄炎培认为，镇压反革命这严厉的趋向，由于客观条件的要求，是合乎需要的。但需要将法令当作处理一切的根据，尤其要注意一个“准”字，并提出镇反工作已经是相当彻底了，今后不需要更严厉了。毛泽东收到黄炎培的意见后，即送去纠正宽大无边的情况两份，说明：“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同时又汲取了黄炎培的一部分正确意见说：“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①次日黄炎培即回信，表示主席的指示十分正确，并就如何实现“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和“稳、准、狠”的政策，进一步提供建设性的意见，认为“一面需重视群众的主张，一面仍需范之以法”。不久，中共中央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镇反工作中采取适当收缩和更加谨慎的方针，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3页。

纠正新出现的“左”的偏向。

1953年底，国家开始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但由于农村中千百年来自由支配粮食的习惯根深蒂固，一部分农民对这项新政策尚不习惯；加上在收购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局部性的错误，到1955年春，不少地方出现了“闹粮”风潮。黄炎培闻讯后忧心忡忡，在三四月间数度致函毛泽东，反映粮食问题非常严重，面积太广，民间大有怨声。4月26日，他又给陈云写信，转交彭一湖先生反映湖南农村粮食问题的报告。为了详察实情，黄炎培趁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常委分赴各地视察的机会，再度南下。临行前，毛泽东致函黄炎培，嘱咐，“先生此去下乡考查，望注意用全面分析方法”^①。6月2日至20日，黄炎培先后考察了无锡、苏州、镇江等地，听取了当地负责同志的汇报，并直接向农民了解情况，发现闹粮的原因远非起先估计的那么单纯，既有真正缺粮者，也有不缺叫缺的，甚至其中有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故意捣乱，而实际真正缺粮的农户只不过占5%左右。他还欣喜地看到，各地农民的生产情绪是非常的热烈，对统购统销政策都异口同声地一致称好。经过视察，黄炎培内心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自感“归时的心情比去时是增加些乐观的”。回到北京后，他亲自整理了一份《江苏视察报告》呈送毛泽东，并主动作了诚恳的检讨，说前一阶段自己对缺粮情况的看法，“今天觉得是错误的了”，“今天我必须吸取这次经验教训，努力学习全面分析，随时准备纠正过去的错误看法，但我还是知无不言，我认为是应该这样做的”。知无不言，有错必纠。黄炎培这种胸怀坦白、勇于直谏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95页。

的可贵精神，正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信任感和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的真实体现。因此中央负责同志曾一再号召党外人士学习黄炎培，做党的诤友。

“双鬓斑斑知未晚”

在怀仁堂的一次晚会上，毛泽东曾饶有兴趣地问黄炎培：北京政府有一时期要你去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后来黄炎培告诉毛泽东，他的信念是：“不看清是真理所在，是决不自盲从的”。

黄炎培的一生都在寻求着真理。他曾参加过同盟会，但后来他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非真理之所在，而国民党中更是鱼龙混杂，因此始终拒绝加入国民党。他也曾一度迷恋过中间路线，但中间路线的尝试最后也失败了。他探索了大半辈子救国救民的真理，却一直未能如愿。就在他走向生命的晚年时，却发现了真理所在！黄炎培后来回忆说：“使我认识为可能是真理所在，就是1945年延安之行。直接听到主席的指示，看到了种种的措施，从此一步步地正式接受主席教导，为人民服务，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明确地认定了真理所在了。”

一旦找到了真理，黄炎培就具有强烈的献身精神。全国解放以来，他总是紧紧跟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再由衷地表示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甚获吾心”。为了将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带入社会主义的轨道，他利用自己在工商界人士中的广泛联系和威望，配合中共中央做了许多特殊而不可缺少的工作。

1952年初，“五反”运动以后，在工商资本家中普遍存在着恐慌心理，担心以后产业会被没收。他们抱着吃光花光的

消极态度，对生产经营缺乏信心，上海出现了咖啡馆、舞厅和饭馆“三多”的现象。黄炎培将这一情况及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建议中央领导同志作一次报告，讲清政策，以消除资本家的不安心理。3月15日，毛泽东约黄炎培谈话，对民建会的工作方针以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作了重要指示。黄炎培听了十分兴奋，立即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商量如何贯彻实行。以后的几个月内，黄炎培在民建会内部层层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9月，黄炎培为出席民建会北京市分会会员大会，起草了一份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的讲话稿，送毛泽东审查。第二天，毛泽东即回信给黄炎培，充分肯定了他思想上进步的同时又诚恳地提示要准确把握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界限，指出“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①毛泽东还在百忙之中为黄的讲话稿亲笔作了多处修改和补充。黄炎培读了毛泽东的回信和毛泽东亲笔修改的讲稿，佩服万分，当晚就向毛泽东写信，说：“讲稿承亲赐斧削，对资产阶级一面照顾到多数不能接受，而一而仍拿来鼓励少数前进分子，这样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精神，不惟改正了讲稿，同时改正了我的思想，敬谨接受之下，不尽地感谢！”9月7日，黄炎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作了传达和讲话，在工商界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工商业人士纷纷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41—442页。

表示：“毛主席的指示给我们开了一条新的生路，好好干还是有出路的”，“我们听了报告，胆子大起来了，经营投资的信心也提高了！”就这样，毛泽东的指示以及黄炎培的报告，给“三反”、“五反”后的工商界带来了新的生机。

当工商界的恐惧心理开始转变、生产形势开始好转时，黄炎培根据以往经验，感到私营工商业每当繁荣之时，即容易发生舞弊之事，因此，他多次向工商界讲话，提醒他们认真学习共同纲领，以“三反”、“五反”的原则检查自己的业务、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防止重犯“五毒”的一切可能，积极改进生产和经营。与此同时，他领导民建、工商联在广泛调查研究、开座谈会的基础上，于1953年3月到6月，先后整理了《各地工商情况反映》、《工商联、民建工商问题座谈纪要》、《私营企业劳资问题现状一斑》、《私营工商业现存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的建议》等材料上报中共中央。黄炎培还向毛泽东建议，对正在趋向积极的工商界，一方面防止他们因兴奋而“毒”根复活，另一方面要利用他们的兴奋，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加速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他还提出了改进税收、加强民主改革等一系列具体建议。黄炎培和民建、工商联所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曾多次写信给黄炎培表示感谢，对其建议予以肯定。

从1953年底开始，全国开始掀起了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热潮。黄炎培在布置民建会工作时指出，在新的形势下，民建会应当担负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教育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推动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为了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教育，他于1954年3月1日和6月23日，分别在上海大光明影院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扶病作了两

次重要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朋友，认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跟共产党和毛主席走，“以自己能被国家人民所‘利用’为荣，同时严肃地接受国家法令的‘限制’，并在企业改造过程中间，不断地‘改造’自己”^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不仅是对企业的改造，也是对人的改造。但在一些工商业人士中还存有不少忧虑。有人就对黄炎培透露心事说：“说老实话吧，社会主义确实好的，但我们总有一天被开刀。”黄炎培听罢爽朗地大笑：“这就是思想问题啰，你要懂得：刀是向着阶级开的，你个人如果好好地国家和人民结合起来，而不再紧抱着原有的阶级求生活，我敢以老朋友资格保证对你人决不会开刀！”1955年11月，当黄炎培因病住入北京医院时，尚念念不忘社会主义改造的大事。他在病榻上，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我准备这副老机器活动力完全恢复以后，将发挥成新的精神，重新投入战斗部队，为光荣地执行主席又一次对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珍贵指示而努力。”不久，毛泽东回信，告诉他：“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并叮嘱“尚望注意保养，恢复健康。”^②黄炎培出院后，不顾医生的劝告，又全副身心投入工商业改造的时代潮流中。

黄炎培并没有满足于一般地对资本主义改造做一些协助推动工作，他要向更高的目标——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前进。为了提高自己的认识，实现这一崇高的理想，这个一生孜孜不倦于寻求真理的老人，古稀之年又毅然去探求“真理的源

① 《民讯》第37期，1954年6月10日。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03页。

头”。1953年夏天，他在北戴河疗养期间，仅一个半月，就先后读了《资本论》、《马克思传》、《列宁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书籍，还做了《资本论》第一卷摘要394条，共编成细目一览。他十分注意将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到日常工作去分析、观察和处理问题。

1954年5月1日晚，黄炎培出席了天安门广场的联欢晚会，看到解放几年来祖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心情十分激动。当晚，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追述了自己寻求真理的一生，充满激情地说：“主席，作为您领导下的干部，同时又是您教导下的老年学生——确还没有资格做党员，但已经接受了些，并且正在继续受着党的教育——他的思想上起了基本性变化，应当向您坦白地陈述，深信你乐为指正他的错误的。”解放前，黄炎培面对国民党高官厚禄的拉拢，始终拒绝参加国民党，如今他却坦诚地向党表露了自己决心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强烈愿望，并且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在日记中表示：“我的思想改造，最大的敌人，还是个人主义。虽在努力克服，总还克服不了多少。显著的就是八十年自己的历史总是横梗心头，中间残余的资产阶级思想，不免时与作祟（还有封建社会残余思想），慎防！慎防！慎防！”^①1961年“五一”晚会后，他感慨万千，曾写了一首诗：“千山万水我何曾，解放追随愧此生。双鬓斑斑知未晚，大群改造作新人。”^②字里行间充溢着黄炎培晚年追求进步的迫切心情。

50年代后期，黄炎培身患多种疾病，医生嘱他静养。但他

^{①②}许汉三：《黄炎培年谱》第206、295页。

却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参加各项社会工作，坚持经常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和民建会的活动。正如他在《八十初度谈》中所说的：“我年八十了。我活下去，我还要好好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就我现时体力所及——我现在身体衰退了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同时我还要好好学习，向工人阶级学习，通过思想改造，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把从几十年资产阶级社会里生长出来，养大起来的，我，彻底改造成为一个工人阶级脑力劳动者。”他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坚定不移地追随党，为把祖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走完了他一生最后的路程。

1965年12月21日4时40分，黄炎培在北京医院病逝，终年88岁，12月24日，首都各界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为黄炎培举行隆重的公祭，由朱德委员长主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等陪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刘宁一致悼词。黄炎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

作者附记：

在编写传稿的过程中，得到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央档案馆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指导和支持；叶笃义、孙起孟、孙晓村、王良仲、黄大能、李政文、张帆、王纪华、尚丁、张雪澄、梁漱溟、马荫良等同志，为我们介绍了不少有关传主的历史情况，在此一并致谢。

加 伦

周 玉 凤

加伦（Галин）[1889—1938] 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传奇式的英雄，红军的优秀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列宁近卫军著名军事政治活动家。

中国北伐战争时期，加伦曾两次奉派来华，领导和主持驻华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工作，协助孙中山及其革命政府主持军务和军校、制订北伐战争作战计划，为大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一）

加伦本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Влюхер, Васил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加伦是他在中国的化名。加伦1889年11月19日出生在俄国的雅罗斯拉夫里省巴尔欣克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其父是贫农，祖父是农奴，他毕业于当地的教会小学。

1904年，加伦为生活所迫，随父到彼得格勒，在一家布店当学徒，开始独立谋生。干了8个月后，由于忍受不了店主的欺凌，即到法俄合办的贝尔德工厂当工人。在此期间，加伦受到革命浪潮的熏陶，目睹了彼得格勒“流血星期日”，加深了

对沙皇专制制度的仇恨，在工友彼得·库兹涅佐夫的影响下，投身于革命事业。

1908年，加伦被列入反动政府的黑名单，同年12月被厂方开除。次年，他进入莫斯科梅提施车辆制造厂当钳工，同时参加罢工活动。1910年2月，当局以煽动罢工罪判处加伦徒刑两年八个月。服刑期满，他先在雷宾斯克做工，后于1913年8月转赴莫斯科，进了喀山铁路修造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伦应征入伍，分派到在奥地利战场参战的科斯特罗马第19团。1915年1月，在捷尔诺波尔战役中负了重伤，经一年零两个月治疗后，以一等残废退役。随后，加伦进莫斯科沙涅夫人民大学学习。不久，在下新城索尔莫沃车辆制造厂当钳工，复又转到喀山城奥斯特尔曼机械厂。1916年，他在该厂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7年初，因遭受警方迫害，被迫到喀山省彼得罗夫斯克城。同年2月革命消息传来，他立即前往萨马拉（现古比雪夫市）。5月，被萨马拉党组织派到112预备团。到部队后，他很快便得到广大士兵的信赖，职务不断提升。同年6月，他被卫戍部队推选为萨马拉苏维埃士兵代表，8月当选为团委员会主席和萨马拉市苏维埃军事部副部长，11月担任萨马拉革命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主席是B·B·古比雪夫），同时，还出任萨马拉卫戍部队副政委和省革命秩序卫队长。11月底，他被萨马拉革命委员会任命为红军部队政委，率领所部攻打奥伦堡哥萨克首领杜托夫，收复了切利亚宾斯克城。

1917年12月至1918年5月，加伦在切利亚宾斯克从事军队工作的同时，还大力开展在乌拉尔中部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当选为切利亚宾斯克市苏维埃主席，并出任赤卫队

参谋长。

1918年8月至9月间，加伦指挥南部游击军奇袭哥萨克白匪军的后方，接着又率领这支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匈牙利人、德国人、中国人等组成的国际队伍，历尽艰险，跨过乌拉尔南部的高山峻岭，穿越巴什基利亚茂密的森林和泥泞的沼泽地，与红军第3集团军在孔古尔地域胜利会师。为表彰这次出色的远征，第3集团军革命委员会于1918年9月29日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的信中写到：“布留赫尔历尽千辛万苦，挥师进击，只有当年苏沃洛夫出师瑞士方能与之伦比。他率领一小批勇士，为我国年轻军队的史册增添了新的光荣篇章。当以俄国革命的名义向这位领袖人物表示谢意和嘉奖。”^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把刚刚颁布的第一枚红旗勋章授予加伦。

此后，加伦历任师长兼政委、集团军副司令员、驻军司令员、军长兼政委等职，转战各条战线，战功卓著，声名显赫，并曾担任远东军司令、远东共和国陆军部长和远东共和国军事委员会主席。

(二)

1924年8月，苏联政府应孙中山之请求，委派加伦赴中国任广东革命政府首席军事顾问，以接替同年7月在东江不幸殉职的军事顾问团团团长П·А·巴甫洛夫的工作。

^① [苏] А·И·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8页。

10月底，加伦抵达广州。当时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实际上只控制了广东省1/3的地区，其余地区均被陈炯明和其他军阀部队所盘踞。11月13日孙中山离广州北上后，陈炯明自任粤军总司令，妄图卷土重来，进犯广州。针对这种紧张形势，在加伦建议下，12月24日国民党中央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由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蒋介石、杨希闵等委员组成，加伦为顾问。加伦和同事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今后工作的展望》。这份文件指出，对陈炯明部队应当采取“不断地催促和坚持不懈地提出转入进攻”的战略；同时还提出在云贵、广西、广州的各军中以及在海军、黄埔军中进行正常的教育和开展政治工作，消灭土匪，加强防御珠江上的英国炮舰、密切注视商团残余等措施。军事委员会接受了加伦的意见，首先决定将主要兵力投入东线战役，迅速打败陈炯明，牢牢地在广东立稳脚跟。为此任命滇军杨希闵为东线总指挥。

但是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狼狈为奸，企图破坏东征。1925年1月18日，在军事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刘、杨竟借口西线战况恶化，要求重新讨论讨陈的问题。刘震寰提出要将自己的部队派往广西，杨希闵则表示只愿防守东江一线，并要把在梧州地区抵御陈炯明的部队，其中包括广州第一师统统撤回，把滇军的一部分派往西线。面对刘、杨咄咄逼人的架势，其余委员谁也不敢公开表示反对，加伦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明确指出：把精力和兵力转向西部将可能导致广州的失陷。西线敌军沈鸿英虽使谭延闿将军受挫，但并不足以构成威胁，驻守梧州的部队能够抵挡得住，而沈鸿英的支持者唐继尧的部队尚在遥远。因此他建议先消灭来自陈炯明方面的威胁，尔后视战局的

需要，挥师西进^①。

接着，加伦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成立军事委员会，原是要将全军集合在国民党周围，但杨希闵身为总指挥竟然对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加以掣肘，这是令人费解的。他希望大家：大敌当前，应抛弃个人的狭隘利益，以军事上的成功，保证孙中山博士北上政治使命的成功，而如果依了杨希闵，无异背叛孙中山，必然招致革命的失败^②。

加伦在发言结束时，提出了一个方案：“1. 把所提出的各种建议的政治意义交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以确定各建议人与其现在党内的地位是否相称；2. 从军事观点看，凡所提建议可能威胁广州的安全者，则可不审议，予以否决。”^③他还请求在1925年2月1日之前，作出出兵讨伐陈炯明的决定。加伦在这关键时刻所起的作用，正如当时苏联驻北京武官格克尔1925年3月19日在写给加拉罕的《讨伐广东省军阀陈炯明》简报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军事顾问加伦同志向广州总部做了一个半月的说服工作，终于使他们明白了必须毫不迟疑地出兵讨伐陈炯明。”^④

2月初，广东革命政府组成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包括粤军、滇军、桂军、建国军的联军，分左、中、右三路出师东征。东征军迅猛出击，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3万余人，肃清了惠州以外广东东部的军阀势力。加伦高度地赞扬英勇作战的东征黄埔学生军，他说：“这已经证明，追求本民族解放的中国

①②④ [苏] A·И·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36—37页。

③ M·С·贾比才等：《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1920—193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45页。

人民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能这样昂首阔步前进来保卫自己，对这种军队是不应妄加非议的。”^①

东征军攻下潮、梅地区后，正准备围攻惠州，彻底捣毁陈炯明的老巢时，杨希闵、刘震寰等滇、桂军阀，勾结云南的唐继尧，串通香港的陈廉伯，在广州举行了叛乱。对此，加伦建议立即回师，为保卫广州而战。6月底，东征军挥戈羊城，在广州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彻底平息了叛乱。

加伦高度评价了国民革命军讨陈胜利。他说：“孙中山以往军事上迭经失利，使许多中国人认为国民党无能，其实力不足以左右社会事态的发展。不独国民党的敌人这样认为，就连国民党的同情者亦有同感。讨陈胜利和在广州称雄一时的军阀军队的溃败，既显示了党的生命力，也显示了作为党的后盾的实力。无疑，敌人必将因此而加紧纠集力量以对付国民党，然而此举亦必将提高党在那些同情党的阶级和阶层中的威信，增加党员人数，从而使党能够对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总进程施加更大的影响。”^②

加伦不仅重视国民革命军的建设，采用苏联和世界最新的军事理论、军事技术进行讲授和训练，而且又注重日常的军事操练和演习。他运用这些有效的军事教育方法，为中国革命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军事人才。

同时，加伦特别重视对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教育工作。他多次强调黄埔军校在整个广东省的政治形势中所起的

^①杨牧等主编：《黄埔军校名人传略（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254页。

^②〔苏〕A·И·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37页。

作用。他说：“国内发生的每一政治事件，都会反映到学校中来。到（1924年）10月，军校的政治影响即已超出黄埔的范围，成为广州时局中举足轻重的（因素）……军校在政治上日益活跃，它通过在工人组织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同工人组织取得联系，成为广州群众社会政治运动的指导力量。”^①此外，在援引历史上的种种先例，强调形成革命军人的宣誓传统的意义问题上，加伦认为，黄埔军校毕业生，应当到黄花岗革命烈士墓前宣誓忠于革命。这一举动在军队中发扬革命精神是有意义的。

加伦为在国民革命军中推行党代表制度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曾向蒋介石提出在军校内设立党代表制，蒋介石以没有人选为借口，加以抵制。于是加伦提议把问题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处理。中央执委会确认军内设立党代表制是不可避免的，但却规定只能在团一级建立。加伦又委托隶属总顾问的一个政治委员会制定了《军队党代表条例》，规定党代表不仅拥有行政经济的权力，而且拥有监督作战命令的权力，从而使党代表与军事指挥官享有平等权力。蒋介石出于无奈，只好形式上表示同意。后来的事实证明，由于共产党员参加军队的政治工作，使军队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加伦在工作中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据在黄埔军校工作过的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他在对某个战役作出决定之前，从不听取我们一般性议论。他总是先让每个人为他解决个别问题。碰到具体问题时，加伦就去询问中国活动家。他把全部材料汇总起来，用心研究，而后作出决定，再向我们宣布，让

^① [苏] A·И·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156—157页。

我们去执行。加伦在问道：‘一个学员的给养是多少？’时我们答不上来，推说前任总顾问不准深究这类问题。加伦反驳道：‘但你们清楚地知道，黄埔军校成立时，孙中山既没有经费，也没有枪炮。现在扩大军校的问题提出来了，在确定扩大军校必需的补充经费时，我应该相信中国将军的话，但我也要参加计算工作。因此，你们应该过细地了解你们在其中担任顾问的学校、团队或各部队的经济情况。否则，我们的建议就得不到尊重。’”^①

加伦高度赞扬国民革命军士兵的战斗素质。在总结1925年3月攻打军阀林虎的战斗时，他写道：“士兵、下级军官和军队中的一些党代表，其素质不仅胜过上级军官，而且他们作战勇敢，往往以一当五，甚至更多……仔细考察这场战斗，人们以往对中国士兵的种种不良印象就可以一扫而光。在第一团，政治工作才刚刚开展，然而这个团却已经向人们表明，无须多久，为民族解放而英勇献身的中国人民必能造就一支捍卫自己的这样军队；在这支军队面前，那些讥讽、嘲笑者都将被迫住口，而中国人民的朋友则将发出一片赞叹之声。”^②

1925年7月，加伦由于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及其它原因回国治疗。对此，苏联驻北京政治代表加拉罕1925年7月23日发的一份报告写道：“非常遗憾，加伦不得不离开广州，因为他完全病倒了，继续留广州是绝对不行的。让他离开中国是非常可惜的，因为他一身兼有军事家和政治家的素质，这是任何

①转引自〔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135—139页。

②转引自〔苏〕A·И·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44页。

其他工作人员所不能比拟的。他非常适应和了解中国国情，他有惊人的判断力，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刻作出正确的决断。”^①

回国途中，加伦顺道在上海、北京、张家口等地稍事停留。在张家口，他写下了《广东（战事随笔〔1924年12月—1925年7月〕）》的记事体文章，回顾了1924年12月至1925年7月广东发生的历次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及导致这些事件的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记述了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三次汕头会议的经过和争论的内情，反映了他在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和他在这些争论中的态度，并阐明了他对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看法，对研究中国大革命史很有参考价值。

192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北伐时机已经成熟。同年5月，苏联政府再次派加伦来华协助北伐。

早在1925年夏季，加伦就制定了一份国民党军事工作计划。他认为，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还有矛盾，因而他们在此时是不太可能对中国的北伐战争进行武装干涉的；必须通过军事打击，才能粉碎军阀不断加强的反革命运动；广东根据地内部，国民党左派得到了各革命阶层的广泛支持；工农运动的发展，必然使南方的革命运动更加深入发展。基于这些分析，他得出结论：必须不失时机地进行北伐。“现在，为了民族革命运动，再一次提出举行北伐，并向长江进军，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他明确指出：“这次北伐可能在1926年的下半年开始”^②。

^①转引自〔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122—123页。

^②〔苏〕A·И·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214—215页。

北伐的原定进军路线是：首先进军湖南，占领湖南和江西，进而在武昌会师。加伦认为，这样会形成两面受敌，从兵力上说，必须同时派出 15 个师出击，广东只剩下不到 6 个师的兵力，后方空虚，后备力不足。1926 年 6 月，加伦制定了新的北伐战略计划，提议要避免两条战线作战，说明军事行动的目的是占领武汉；为了防止东线孙传芳进攻，分兵警戒江西一线，待西线得手后，再集中兵力进攻东南各省。这一建议，获得军事委员会的通过。实践证明，加伦的计划对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分析和兵力部署，都是正确的。

1926 年 7 月 9 日，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加伦任军事总顾问。在北伐战争中，加伦亲临前线，贯彻作战计划，并且多次乘飞机飞临敌军阵地上空侦察。他还密切注意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认为工人运动是中国革命的先锋力量，高度赞扬上海工人和广州工人的忘我斗争精神。

北伐军进展迅速，8 月下旬，前锋已到达湖北境内，10 月 10 日即胜利占领武汉三镇。但是，随着北伐的胜利，蒋介石终于暴露了反共反人民的野心。1927 年 3 月，在蒋介石大反武汉“赤化”时，加伦带着他的助手来到武汉，继续担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的职务。

四一二大屠杀后，中国革命进入了紧急关头，全国政治形势由南北政权的对立转变为汉、京、宁三个政权分庭抗礼的局面，三方军事力量鼎足而立。在急剧变化的形势面前，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东征讨蒋呢？还是按原计划继续北伐？在决定这个重大战略决策的问题上，鲍罗廷、加伦等人，一开始就举棋不定，争论不休。据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说：“当在革命的武汉阶段提出了继续北伐的问题时，我们同志中间对

进攻方向问题意见不一，有三种方案：1. 打蒋介石；2. 向河南推进；3. 撤回广东。”^①鲍罗廷主张先北伐，后东征，即先“积极向河南推进，以便打击奉军，并把对付奉军的战场让给冯玉祥，而后自己沿陇海铁路向南京推进。”^②“加伦支持组织讨伐蒋介石，但他同其他苏联人一样，对于名义上属于武汉政府的部队是否可靠没有把握，对这些部队的将领们是否赞同率部反对蒋介石同样没有把握。”^③周恩来在谈到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曾说过，当时那种“所谓北上的中心思想，是想避开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接冯玉祥出来，与国际打通”^④。

蒋介石在上海和南京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苏联顾问被迫陆续动身回国。6月中旬，在庆祝国民革命军从河南胜利归来的宴会上，加伦险遭鸩毒杀害^⑤。七一五政变后，加伦不得不于8月11日最后一批离开中国返回苏联。

加伦在中国大革命时期亲自参与了许多重大军事决策的讨论，负责制订过一系列重要军事计划和军事措施。例如：为防范陈炯明进犯广州，他在《近期工作展望（综合报告）》中提议：“为已进入战备状态的许将军的内河舰艇备好燃料，以便待命出动”；“及早着手组建海军，以便从海上向陈炯明后方出击”。在《加伦对蒋介石计划的意见（1925年9月-20日）》中指出，“没有必要建立‘国防委员会’一类的专门机构，因为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能够执行它的职能”；“水雷厂和造

①②③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582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72页。

⑤ M·C·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第38页。

船厂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如要修复,无异于重新建造,而这是我们所负担不起的。故目前我们应把这一点从计划中抹掉”;

“官兵薪饷务必增加,否则,他们不会拥护军队改组”等等。但是,作为苏联政府派驻中国的首席军事顾问,他又负有执行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使命,不言而喻,其见解必然带有局限性和片面性,有时同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甚至大相径庭。如他不同意武装农会和举行农民起义,主张各地在打倒军阀后建立起比广东革命政府右一些的地方政权机构等等。

(三)

1927年加伦回国后,先后担任乌克兰军区副司令员、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远东方面军司令员。在1934年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他还担任过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且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1935年,苏联政府首批授予布琼尼、布留赫尔(即加伦)、伏罗希洛夫、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等五位著名的苏军将领以最高军衔——苏联元帅称号。

加伦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曾负伤18处;担任高级指挥职务后仍刻苦学习,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理论问题的探讨。他悉心阅读本国军事著作,而且大量翻阅外国军事书刊,曾倡议创办《军事科学与革命》的军事理论双周刊。因对革命作出的杰出贡献,他的一生共荣获两枚列宁勋章和五枚红旗勋章。其中的一枚即表彰他在华期间的功勋。

1937年,加伦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1938年在联共（布）党内肃反扩大化运动中，加伦因“日本间谍嫌疑案”被秘密处决，时年仅48岁。斯大林去世后，才恢复了名誉。

封面设计：王艺光

书号：11094 · 237

定价： 3.20 元